

总策划 罗强烈

呐喊
第

主编 卢跃刚 罗强烈

本报今日出击

基于正义与良知的呐喊
首次披露所有新闻幕后
如果你关注这个时代
关爱你自己
本书会告诉你
这近百个中国社会问题故事
离你究竟有多远

拷问良知

南方日报出版社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呐喊丛书

本报 今日出击

主编 卢跃刚 罗强烈

中国青年报

1998年7月
16
星期日
今日八版
第9197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62
(代号 1-9)

YOUTH DAILY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报今日出击：中国青年报调查性报道选 / 卢跃刚，
罗强烈主编.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ISBN 7-80652-019-8

I. 本... II. ①卢...②罗...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
中国—1979—1999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007 号

本报今日出击：拷问良知

卢跃刚 罗强烈 主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4631、87373998-8509、8503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开 本：850mm×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15.125

字 数：303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52-019-8/I·10

定 价：全套(三册)75.00 元 每册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罗强烈

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时常告诉我，我们中国人太需要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了。

非常惭愧，我在新闻界工作了 16 年，直到去年底才“呐喊”了两声，一是《只有本报记者一人旁听的庭审》，一是《党报记者隐性采访历险记》，而且这两声呐喊很快都被深厚无边的旷野吞噬殆尽了；但是，这两声呐喊唤醒了我心底的良知，激活了我胸中的激情，于是，我决定编辑一套《呐喊丛书》，以荟萃国人弥足珍贵的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

鲁迅先生说过，他的“呐喊”“须听将令”。那是一种基于一个时代的信念和理想的将令。“五四”时期，人类无数思想的明灯从西方传照过来，照亮了我们沉沉数千年的封建生存状态。主将们悚然惊起，引进民主与科学，以期从制度上为中国人建立一种崭新的生存空间。——重要之处在于，创建一种民主和文明的生存制度，不仅仅是“五四”一个时期的社会总主题，更是我们

民族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将会是更多世纪的社会总主题。

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民族的所有生存领域残酷地搏斗着。以一种对人民的良知与爱心，以一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负责任的态度，去为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是一件绝对庄严而荣耀的事情。

在布达拉宫那间悬于半空的大堂里，有数千盏酥油灯层层叠叠地燃烧着。我当时只惊异于那种灯海的壮观。但是，当朋友告诉我，自从布达拉宫建成以来，这里的酥油灯就没有熄灭过，灯里的酥油全是由成千上万来这里朝佛的信徒依秩往里添加，一种信念使每盏酥油灯里的酥油从不间断，数千盏酥油灯燃烧着穿越时空，创造了一千多年没有黑暗的岁月……我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我看到了一种力量的汇聚方式与理想的实现途径。

就《呐喊丛书》而言，无论是每一位写作者，还是每一位阅读者，实际上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信徒般地参予着一种基于正义和良知的呐喊。

NA 30/04

风云际会

（代序）

卢跃刚

一开始，我便与强烈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应该编一本书，来记录中国青年报人自 1978 年复刊以来推进新闻改革、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历程，来检索新闻在中国社会 20 年历史进程中的光荣与梦想，遗憾与悲哀。基于这种想法，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不仅是编年史印象中的名篇，更是洋溢着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记录；不仅是 20 年新闻篇章的冷峻检索，更是中国青年报人掏心窝子与新闻界同行，与立志新闻事业的后来者，与昨天、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说话；不仅是中国新闻界一个群体人格与才华的体现，更是这个群体为了维护应有的职业尊严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

于是，中国青年报三代人踏着清晨的露水，沐浴着灿烂的晚霞，匆匆赶赴本世纪最后的约会。走进我们这部书的记者，年龄最大的 70 岁，是抗战时期的老同志；年龄最小的 22 岁，到报社

只有一年多时间；男女老少，或白发苍苍，或英姿勃发，或才高气盛，或老成持重，或一身清贫满腹惆怅，或百转千回几多遗憾，或名满天下文章舍我其谁，或沧桑世故凡几奈我者何，或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低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们前赴后继，同道而来。他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是什么？是归宿，青春的归宿；是中国青年报东围墙根那三棵扎在土地里踏踏实实生长了数百年的老槐树，——春天来了叶繁花开，冬天来了枝杈刚劲直指苍穹。便是那般温暖和苍凉，时时令人感动，时时托付着中国青年报人青春的灵魂。老青年报人爱说这么一句话：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青年报。这句话，如果细细品味，心态极其复杂。以我之观察，有怀念，有希冀，有憧憬，但是，绝没有轻浮；有哀怨，有沮丧，有愤懑，但是，绝没有后悔。于是有了我们这本书。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20年来，中国青年报到底有什么东西感染并吸引着青年才俊加盟旗下，以心相托？前不久，我遇见一位50年代初参与创刊的老青年报人，他说，中国青年报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年报人，形成了中国青年报独特的魅力。以我十几年之体验，这种东西实实在在，能说清楚，否则无法解释20年来的薪火传递人才辈出，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好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鲜明印记。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仅仅提供一个生存的场所，如果仅仅是福利的现状和福利的承诺，或者是名份的虚荣，那也许能托住人，却托不住心。这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因为我们知道“福利”的中国青年报实在是捉襟见肘，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最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珍视什么放弃什

么。这恰恰是最现实的个人选择的基础，虽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此之大，虽然现实问题常常让我们糟心不已烦恼不已。“现实”怎么说？“现实”对我们说：你什么都想得到，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理想”或“理想主义”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也是一个曾经被利用被亵渎并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题。可是，我不得不说，“理想”或“理想主义”构成了中国青年报的凝聚力，至少构成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狂飙突进领中国新闻界之风骚时期的凝聚力。一天，采访中心副主任叶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跃刚，你的序一定要写当今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觉醒”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不管我们努力的程度怎样，只要我们能挺着腰板说“我们努力过”，足矣。得出这样的结论很简单，只要翻翻报纸的合订本就明白了。有人说，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我说，这只是皮毛。我要说，新闻是用“思想”跑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跑出来的。新闻记者本来就是功利性极强的职业，加之特定的政治文化约束，如果“思想”是一张白纸，即使健步如飞，也永远是不知所终，事倍功半；如果满脑门子“功利”选择，左顾右盼，过于权衡利害得失，投机取巧，梦想播的是“跳蚤”而收获“龙种”，将来翻剪报册的时候，只能是永远的内疚和遗憾。我这里所说的“思想”，主要指的是记者的价值和立场。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当一名正直和有良知的

记者，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既有历史的阴影，又有现实的困境，既有压抑，又有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归宿感很难存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屡败屡战，生生不已；才会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报道被历史记录在案。

当记者时间长了，都有稿子被“枪毙”的痛苦经历，读者能看到的报道，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为了一篇稿子被“枪毙”而哭泣过，沮丧过，绝望过，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枪毙”不是摆挑子放弃的理由。决定一篇稿子上与不上，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不去争取、不去努力却没有理由。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李大同说：“真正的新闻理性知道什么是限制，最后超越限制。”本书收集的为《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平反、陈爱武事件、“第五代”中国留学生现象、大兴安岭火灾、1998年洪水等等等等报道的成功就是明证。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抔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抔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两个意象

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即揽奇峻之风景。——惊险而富于挑战。

80年代，中国青年报人构成年轻，思想活跃，支持改革者，鼓吹改革开放。中国青年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忌讳“老”，忌讳“旧”，有很强的年龄危机感。报道强调深度（于是有“深度报道”之说），强调干预社会（于是“批评报道”滥觞），对新思想新观念异乎敏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不遗余力，许多报道一经推出，便有争相传诵争相模仿之盛况。这一时期的报道与“理论新潮”相呼应，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文章推重“气势”，亦不免浓重的思辨色彩。记者风格迥异，各行其是，各领风骚；报社内部浓郁的业务民主空气，等级淡化（当然不是不讲必要的程序），资历淡化，认稿不认人，鼓励争辩，鼓励记者坚持个性，甚至极大限度地理解记者的某些怪异和过激行为。评价记者，老面孔新面孔不重要，能力是第一指标。于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不拘形式，花样翻新，与报道内容相匹配，不断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青年报充满了机会，是培养名编辑名记者的摇篮，成了公认的事实。

90年代，中国青年报进入了漫长的困惑和调整期。困惑和调整，严格地说，至今没有完结。原来一重挤压，现在是双重挤压。一重挤压，自上而下，则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于是90年代初期，“经济蓝讯”、“社会周刊”、“生活周刊”、“冰点”等“特刊”勃兴。媒体市场化冲击，由一重挤压到双重挤压。“买点”在哪儿？出现了以市场取向的“找买点”的争论。围绕着报道主体，出现了“观念”与“关节”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在《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崛起，电视报道改观，社会生活世俗化、市民化趋势，“机关报”性质不能动摇，怎样才能“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我们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线编辑此书时，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90年代的报道单篇单组比较，社会影响远不及80年代的报道，80年代一些报道今天读起来，亦堪称美文。但是，90年代的调查性报道竟在本书中蔚为大观，占了绝对多数，而且总体分量不弱，原因何在？大的方面说，与社会形态、社会发育程度有关，与媒体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有关，当然也与记者的社会经历和生活态度有关。如果说80年代的报道更从宏观上关注社会变革，那么90年代更在微观上关注民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80年代更是“政治”的，90年代更是“社会”的；80年代更提供“认识”，90年代更提供“认识的基础”。这种变化，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的社会功能。——新闻由“典型”回到了“常态”，记者由“主体”回到了“客体”，文体从注重“通讯”写作到更注重“调查性报道”的写作，版面从“大篇幅覆盖”到编辑多重信息组合。我们意识到，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叶研在他的“新闻幕后”中说：职业记者的报道“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第一是叙述，第二是叙述，第三还是叙述”。我以为，这是一种渴望“回归”的极致说法。我同意这个说法。

20年里，我们也曾文过饰非，我们也曾逃避现实，我们也曾说过大话空话套话违心话；我们顽强地坚持过，我们无奈地放弃过，我们痛苦地反思过。然而，我们将不懈地坚持新闻在文明社会里所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惟有此，才有可能使“新闻记者”无愧于艰难的人民与前进着的历史。

我们仅以本书作证。

1999年11月25日于北京木樨地

目 录

倾斜的“金字塔” (1)

一座新楼盖成了，人们才发现，一个厕所都没有。没有就得在一楼修一个。就这么个问题，谁来管？不知道。一个学校，有正副校长8人，处级干部270多人，这到底是学校还是机关？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金字塔”，发现了中国教育的毛病是带有共性的，金字塔倾斜了。

记者手记：一些在文章中被提及名字的老师，向学校领导写信，声明文章中所提到的话并非是自己原意。在金字塔的顶端，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卓资现象 (20)

一日，北京一公司汇一笔款到这里。结果款被如数退回。原因是这里已无一家国有企业，提防上当。由此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卓资现象”。

记者手记：如果我们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要知道，1987年，那是一个火柴要涨1分钱还需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的年代。

卓资的改革太超前了！

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 (44)

一张报纸，只因发了一篇人人叫好的批评报道，惹怒了地方官，报社只得派人挨家挨户把印发出去的报纸重新收回来自行销毁。

记者手记：这篇报道登出来以后，记者没有成为被告，被批评的领导还盛情招待了他的“对头”。

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追踪采访 (61)

一个在中国政界令人瞩目的人物，应该出现在他本应该出席的记者招待会上，但是他没有出席，其中定有原因。

记者手记：日本新闻界评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模仿西方记者，在版面上刊登了中国报纸上从未有过的内容。

谁来监督“监督者” (67)

新乡，一位老教师被刑警活活打死。

他们把被害人撕人心肺的呼喊称之为交响乐；他们把电击受害人从嘴里发出的“的的”声说成是跟机关枪一样；就在受害人被折磨至死的情况下，他们还在下棋、喝酒。这是审讯还是打人取乐？

记者手记：呼唤正义。

8名干部承包盖公章 (95)

为了与外商合资上一个工程，专门派8人负责承包，飞广州、跑深圳，万里长征跑了100多个部门，花了40天时间，终于盖完了这批公章。

记者手记：肯定可以帮助读者找出我们为什么贫穷，为什么落后的深刻原因。

命运备忘录 (102)

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忽然接到一封“呼救”信。来信述说了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3年前，1984年4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MBA，经层层考试筛选，40人入学，至1986年9月完成学业，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 MBA 毕业生。为此，国家耗资百万。不可思议的是：荣膺 MBA 学位而回国的38位学员，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没有一人从事与 MBA 有关的工作，全部处于知识与人才的浪费中。这就好像“活人被处死”一样难受。

原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却又那样的简单，允许人才流动！

记者手记：中国第一代 MBA 就这样起死回生了。所有的 MBA 学员，只要在国内的，都来到了北京。他们凑钱包下了北海的“美膳酒楼”，专请我们主持和参加报道的总编辑、部门主任和编辑记者们，以示感激和祝贺。

不可思议的温州 (127)

温州是个什么鬼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贴着海边，交通闭塞，远离都市，穷山恶水，怎么那么能折腾，从50年代到80年代，都是中国人关注的地方。真是邪了门儿！

记者手记：对于我，一套房子换了一组稿子，12年了，至今房子还没有解决到位，真不知值不值，真不知道，我是聪明人还是傻瓜。

西部贫困地区移民采访记 (152)

从1983年开始，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地区悄悄地进行着一场移民。这次移民同以前的移民不同，这次移民是冲着摆

脱贫困去的。

记者手记：我一直关注移民的事情，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

“部令专车案”侦破前后..... (175)

也有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部令专车，我告诉你，就是那种可以享受不受检查、无需编组等特权的火车。用这种车做什么？从贵州向外地倒卖香烟。用部令专车再加上武装押运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不一定，这一次就栽了。

记者手记：报道登出来以后，我不断地接到恐吓电话，提醒我要“小心点”，我的主管部门在铁路局的订票计划也被取消了。在成都的新闻部门担心报复，如临大敌。我感到很无奈。

公开的新闻内幕..... (198)

碧水蓝天，组织新闻界的记者们到平常去不了的大西北去看一看，开一个笔会。厂家出钱，吃住全包，再拿一个红包，这叫什么？记者走穴！有偿新闻！

记者手记：吃里扒外是一个很骂人的词，这事儿怎么能插到报纸上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呢？

大兴安岭的警告..... (212)

一把火，一把令全国人民从未如此震惊过的火；一把令数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人丧生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的火；一把燃烧了25个昼夜的火……

一位老大娘说，这是天火。

记者手记：“A是A”这是孩子都懂的道理，但是总有人很喜欢把A说成B，把灾难说成好事。以往小灾小凯歌，大灾大胜利的报道模式实在是祸国殃民。

“私奔”采访记..... (259)

本来两个人非常相爱，但出不起彩礼，一走了之；本来已

经有了恋人，家里非要让与人家换亲的一走了之……因为好了，因为爱了，一男一女，提着一个小白包袱，就这样上路了。

记者手记：我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收到读者来信，或者要求婚事上帮忙，或者告知自己即将“私奔”……

西部贫困探源 (280)

没有钱不行，有了钱也不行。

没有资源，穷；有了资源，还是穷。

同样的政策，东部能搞商品经济，西部却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怎么也走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手记：炕上是一团乱七八糟的黑棉絮，屋角是一小堆烂了的土豆。

我问这个村的村长：村里这样的人多吗？

“不少。”

“为什么不考虑治水？”

“上边来人看过，也没想出办法”。

“那为什么每次都把人往这领呢？”

“要钱嘛，要不怎么办？”

第五代 (317)

1978年，中国的国门打开，一大批年轻学子，远渡重洋，来到日本，来到了美国。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五代留学生。

时过数载，人们才发现，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回国，一时间，舆论纷纷扬扬。

记者手记：当报社同事上班来的时候，北京的反应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发现，报社门口，有读者贴了一幅标语：“《中国青年报》万岁！”

浸透血泪的上访信 (352)

3名热血青年想承包工厂，被厂长当成是要搞“西安事变”。
一人被开除，两人被停职，走投无路，一青年自杀身亡。
记者手记：字字得来皆是血。

除恶的中坚 (364)

一个在押犯人无意间供出了一个流氓犯罪团伙。
这6名罪犯全部是干部子女，有的甚至高居要职。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年的中国老百姓在得知上海的
“陈小蒙、胡晓阳案”被破获以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
记者手记：13年了，我的记忆还是那样的清晰，就连当时
公安人员那种欲说还休，欲助无奈的神情也历历在目。

战士万岁 (377)

在老山，在中国界碑的脚下，生长着成千上万这样年轻的
“小草”。他们挺着自己柔的枝、嫩的叶，把中华民族的安危担
在肩上。
记者手记：那样的平凡，那样的普通恰恰就是英雄本色。

绿荫遮盖下的丑恶 (399)

几个壮汉拉开了练拳的架势。出拳！势如闪电！传来一阵
痛苦的呻吟和古怪的笑声。
这是发生在一个社会福利院的故事。山东省淄博市社会福
利院残酷虐待收容人员骇人听闻。
记者手记：那年头坏事也简单，坏人也单纯，批评性报道
并不觉得难写，今天要搞批评，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 (407)

有这么一些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到饭店里大吃大喝，

付的只是一个零头，人们名之曰吃“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

记者手记：陈爱武在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特殊饭的不正之风后，处境一直十分艰难。

武汉“公子楼”调查..... (418)

在武汉市中心，有一栋质量好、朝向好的新楼，住进去的都是领导干部的子女，老百姓称其为“公子楼”。武汉某些领导搞特权为子女多占住房。

记者手记：这栋楼仍然健在，只是显得很不起眼了。

“花花太岁”逃不脱人民法网..... (425)

杭州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有一个柳浪闻莺夜花园，花园里有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这就是闻名全市的熊家。在这个花园里，住着一对兄弟“花花太岁”。

就在这里，在4年的时间内，有100多名妇女被蹂躏。

记者手记：在列车上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在素有人间天堂的地方，怎么长出这么个毒瘤。

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 (437)

1974年底，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全国各地被收缴，一老工人愤愤地说：“这本书引人走正道，哪个天煞的不准读？”一小青年打趣地说：“这是‘民间出版社’出版，‘群众书店’发行，天煞的当然挡不住罗！”

记者手记：有朋友问我：“在你近40年的编辑生涯中，令你最难忘的是哪一篇文章？哪本书？”“还是为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故事。”

后记..... (466)

时间：1988 年 4 月 27 日

作者：马役军 李杰 罗勤

倾斜的“金字塔”

马役军：不容沉默

倾斜的“金字塔”

1987 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和第十一届校工会代表大会。

12 月 22 日，“双代会”即将平静地闭幕的前夕，突然爆出了轰动全校的新闻：一封《致全校教职员工的公开信》，出现在校园内的布告栏上。信中对人民大学的教育管理体制、“双代会”的民主程序等许多问题，向校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加“双代会”的 17 个代表团中，有 10 个团的青年教师代表在公开信上签了名。这些青年教师希望“真正地把人民大学办成人民的大学”！他们要求获得参与民主办学的权力。一时间，公开信成了全校的舆论中心，“双代会”被迫延期闭幕，以讨论这些建议。

我们闻讯来到人民大学采访。

采访期间，上至校长、党委书记、系主任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下至老、中、青年教师和行政后勤的干部职工，每个人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向我们诉说了对学校工作的意见。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共同的现象引起我们的思考：尽管每个人在学校中的位置、看问题的角度都不相同，但在办学上，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人人感觉自己手中无“权”！

一所高等学府究竟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在高墙之内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权力是如何作用于教育的？这些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现行权力系统运动的结果，是在推进还是在阻滞高等教育的发展？……带着许许多多关于“权力”的问号，我们和人大的同志开始一起在校园里寻找答案。

飞速膨胀的行政机构

“联络图”的由来

一位教师，颇费周折帮我们搞到这张“联络图”：《副校长分工示意表》。我们下了一番功夫，才从那纵横交错的实线、虚线、粗线、细线之中（每一种线都有共独特的含义），大致看清了人民大学权力的“金字塔”。

人民大学共有正副校长 8 人。在校党组领导下的校长办公会议之下，7 位副校长分管着 80 多个部门（部门单位图中并未标出）。其中用虚线与校长们“联系”着的教学科研单位，仅占三分之一。

据资料记载，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我党创立的第一所大学——陕北公学。1937 年该校初建时，只有教务处、总务处和政治总部 3 部分。

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逐步走向正规化。1951 年，该校设

有8个教学系，一个专修科，共有教职工1800多人，在校学生3300多人。只有行政事务部、教务部、研究部和干部处4个管理部门。

1978年，经过十年浩劫后，人民大学复校。设教学系15个，另有4个教学直属单位和6个研究所。同时设处级行政管理部门8个。

进入80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行政管理部门首次取代教学科研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张联系图中可以看出，1987年，直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系”增4个，“所”添三双，而非直接从事教学科研的职能部门，却变成了40多个（表中尚未包括党务系统的管理部门）！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80年代与50年代比较，教学科研单位增长4倍，而非教学部门却胀出10倍。真可谓“迅猛发展”。没有谁能记住这庞杂的部门是由谁来分管的。于是，“专业工作者”——校长办公室的同志便绘出了这张联络图。遇上该找校领导的事情，可以“按图索骥”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庞大的行政权力机构，是怎样在运转的吧。

“死循环”

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治平，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小伙子课讲得不错，颇得系里重视。然而现在却不得不办理调离手续，到另一所大学任教。在他和母亲、爱人、孩子老少三代四口“非法”占住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我们采访了他。

谈到调离的原因，王治平悲愤地给我们讲述了他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怪圈”：

“我和爱人家都在外地，结婚后还是各自住单位的集体宿舍。

为了能有一间洞房，我们向分房委员会递上了申请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种种艰难曲折，大约经过了1年的时间，最后才以探亲的名义，借给我们一间住房，并限住1个月。房子窄小破旧，倒也凑合了，但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只好买煤生火。这下问题来了，买煤要煤证，办煤证要户口本，上户口要住房卡，而借住的房子是没有房卡的。转了一大圈，我们俩才发现，这是一个死循环。要跳出这个怪圈，只有两条路，或者忍寒受冻，或者回集体宿舍。一气之下，我们交出了那把倒霉的钥匙，放弃了这次努力争取来的‘周年蜜月’。”

去年，王治平的爱人要临产了，需要有一个“坐月子”的空间。万般无奈，他找到系里，希望能借间房。

“系里很同情我的处境，却又房无一间，只好让我去找主管副校长。校长告诉我，房子的事要找分房委员会。我找到了分房委员会，答复是，借房子这类具体事，要找房管科。当我找到了房管科，您猜人家说什么？我们只接待单位，不对个人。你回去写个报告给系里，让他们出面联系。嘿，你瞧了没有，我跑了一大圈，腿部都蹿细了，又转回到系里，又一次陷入了死循环。”

死循环使他感到绝望。他决定不在这怪圈中消耗精力了。于是他提交了请调报告。万没想到的是，他又陷入了新的死循环。在办理调离手续时，他被告知，必须把现在住的集体宿舍腾出来，才能给你办调离手续。否则不予盖章放行。而对方单位则规定，必须在报到之后，才能解决住房。如此一来，他必须在调走与报到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能暂且栖身的空间。“可是，我不正是因为缺少这个空间才调动工作的吗？”王治平对接连不断的“怪圈”迷惑不解，更悲愤不已。直到我们采访他时，他仍然没有得到解脱。

据我们了解，在人大，象王治平这样在死循环中痛苦挣扎的

人，并不止一个。死循环磨掉了多少人的热情与希望，耗费了多少人的才华与精力啊！不止一位系主任对我们诉说：“为把教育质量搞上去，我们很想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想归想，我们却没有进人的权力。你也办不成。当然，各个部门也有他们的困难，可学校不是要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吗？”

“帕金森定律”的中国注脚

为了改善大学生的住宿条件，扩大招生名额，学九楼在人们急切的盼望中，于 1986 年暑期完工了。然而，落成归落成，新楼却不能使用。人们发现，各个房间的门一旦被锁上，就再难以打开。外边的人进不去，里边的人也别想出来。另外，新楼厕所的大便冲水器都有毛病，需要重新更换。

这些问题该由谁来解决呢？过去，这都是总务处的事。学校后勤方面的事，统由他们负责。不过今非昔比。如今，在总务长的领导下，与总务处平级的单位就有八九个之多（大多是由原总务处所辖的科升格而成）。有权管房子的，就有 4 个处级单位：基建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基建规划）、基建处（负责计划落实）、修建处（负责房屋维修）、校产办公室（负责同外单位催要拖欠房产，因任务单一，只设正副处长各一人，教职工戏称之为“人大催房处”）。面对新楼的问题，基建处说，我们只负责建房子，维修是修建处的事。修建处说，我们的任务是维修旧房，这种无人住过的新房，不在维修之列。各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经有关领导调停，由修建处将门锁、冲水器全部更换、修理一遍。增加开支 5000 元。

不管怎样，学九楼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可是并非所有的楼房都像学九楼那样“幸运”。

电教楼附设的一栋三层楼，建成后才发现，全楼上下竟无一

间厕所！人们必须从三楼跑下来，拐进另一座楼中去“方便”。楼内人员强烈呼吁，起码要在一楼给建一个厕所。这又是一个需要分清责任的“大是大非”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出面解决。该楼至今已使用一年有余，而厕所问题仍在扯皮之中。只苦了那些楼内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楼寻求“方便”。

英国人帕金森曾通过考察英国官僚政体，总结出一条“定律”：大量膨胀的官员和机构，是会彼此之间制造出工作来的。也许，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是对这条“定律”所作的中国式的注解？

据有关人士介绍，人民大学现有在职处级干部 270 余人，至于科级单位和科级干部的数字，直至采访结束，我们也没能了解到。据知情者透露，这些数字由于大大超出上级规定的编制，所以“必须保密”。

诚然，我们相信学校领导的说明，除个别存在的因人设事的问题，大多数行政机构的产生，是出于更好地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良好愿望。但是，行政管理的客观运行机制，却不以这种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权力系统是庞大的，权力本身也很强大，但这种权力已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这个中心，而是异化为凌驾于教学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们要为它的存在而奔忙劳作。请听听他们的心声：

中文系主任谢自立：“听起来我是一个系主任，可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干事。今天这个部门要求填报表，明天那个部门要你去汇报。什么伙食节电、园林绿化、房屋分配、计划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负责人来管，哪还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务长纪宝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说都应该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可现在许多系都安排年轻人干了。原因很简单，

干这个差事真正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却经常得干跑腿儿的活，日常杂事老也应付不完，谁愿意干？法律系有两位30多岁的副主任，干了一年多硬是不愿干了。他们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把我们给撤了，我们给他磕36个响头！”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黄达：“人称我们8位正副校长是八仙过海。其实，八仙连开个碰头会都难。每人都是一大摊事，真得靠各显其能了。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还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虑一下教学和科研的事，当了副校长以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了，可还是不够用。”

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现任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一个单位上边都得有二、三十个单位去管，这样事情能办好吗？肯定要闹官僚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机构、这个架势，就要闹官僚主义。”他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疑问：“我们这些管理部门究竟是为教学研究单位服务，还是给教学研究单位设置障碍？小平同志说，‘管理就是服务’，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管理不是服务，而是让基层为我们服务！”

对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的结果，袁宝华校长可谓一语中的。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探究先放一放，看一看余下三分之一的直接从事教学、科研的部门是如何运作的。

日益萎缩的教育职能

难以得到的5分钟

在人大采访期间，我们先后和几十位老教授、青年教师们交谈。在交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是有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他们在思索着人大教育改革的命运和前途。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大经济学系教授徐禾，对人大的教育改革的思索很有代表性：“我觉得，学校的主要矛盾是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人大包袱太重，总以自己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自居。第一所大学不假，可你的贡献呢？就拿我们经济学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有哪些研究成果被中央采纳，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呢？不光是经济学，哲学、法学也是如此。如果作为个人，不出成果还可原谅，可对一所全国瞩目的大学，却是不能容忍的。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要简单地改变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任何一种体制，如果存在于保守僵化的氛围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被感染、被同化、被窒息的……”

意见不可谓不尖锐，思考不可谓不深刻！问题在于，许许多多像徐禾教授这样的思考和意见有没有人听？意见如果正确，又能不能在教学科研的职能部门得到反馈？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样几件事：

前不久，新闻系副教授、油画家朱维民一下飞机，就兴冲冲地往学校赶。他很为这次赴英国讲学的收获而自豪。因为他不仅完成了预定的讲学内容，而且还和英国人谈妥，可以建立校际联系，互派留学生，费用由对方负担。这种条件对教育经费紧张，外汇短缺的人民大学来说，无疑是笔合算的交易。一进校门，他顾不上回家，就往校长办公室跑，想尽快把这好消息告诉校领导，尽早拍定。

“你先去登个记，约定好时间再来谈。”接待他的一位副校长，公事公办。

“我只需要5分钟。”朱教授强调说。

“我现在没时间，要谈话先去登记。”副校长仍不肯慷慨一下。

“等你有了时间，我可能还没时间呢。我的时间和你的一样宝贵！”朱老师被激怒了，拂袖而去。

这件好事就因为这“5分钟”随之泡了汤。

有此遭遇者，并不只朱老师一人。历史系主任曾向一位分管副校长请示工作。没想到，这位副校长根据那份“联络图”提醒他：“我和你是‘虚线’联系（“联系”不等于“分管”），这些问题跟我说了也没用，我解决不了！”

好一条“虚线”：校长的责任“虚”没了；教育的反馈机制也“虚”没了！

另一位系主任告诉我们：“我在系里干了3年副主任，2年主任。前后5年时间，没有一位校领导坐下来，和我认真研究一下如何办教育。当然，和我们系的老主任比，这不算什么。他当了十几年系主任，据说都没有这种殊荣！”

看来，校长们被各种行政事务缠身，无暇或少有过问教育。但学校的教学毕竟在进行。这就有必要问：

究竟谁在办教育？

工经系在人民大学，被认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可系主任施礼明同志和我们谈起来，却是满腹苦经：“我们和学校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就是教务和研究生院。他们管的就是学生考试量的控制、教师工作量的计算这些硬件。学生招进来、分出去，他们就算完成任务。至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课程安排以及课讲得好坏、学生水平如何、社会是否需要等等，是没有人来问你的。现在办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师的良知和觉悟。为什么出现有什么教师开什么课、开什么专业就招什么生的现象？因为只要你不找上边要钱、要物，那么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

会有人来干涉你。现在是教师办教育、系主任办教育，学校在办什么？我们不了解。今年初开系主任会，传达本学期工作任务。10项任务中涉及教学和科研的仅有2项。

“1986年，我们系里为加强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整整一年，这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统计系主任曾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一番肺腑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里有愧呀！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来。”

透过这些每天都生活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人们的亲身感受，我们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责任都推到校长头上，以为这些都是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了他们。校长，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

教委问：你们要什么权？

我们逐个采访了能够找到的校级领导，感到他们也在对教育改革做着认真的思考。但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

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儿，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里就得有让人们向往与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说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是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100%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难怪一位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感慨地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杨德福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是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就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来说，要财权没财权，要人权没人权，你要雇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定，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50%的拒借率问题不抓，却花几十万元去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街道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都不行，不去就要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今年春天预防肝炎来说，海淀区

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高教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高等学校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无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对此，黄达副校长深有感触。他对我们谈到机构膨胀问题时说：

“精减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减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减，要是下边减了上边不减，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现象。但是发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挂钩。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民以食为天哪，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四、五十岁的人了，拖家带口的，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副教授，心理上也难以摆平。当初，也是组织上需要，人家才放弃教学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的呀。”领导者有领导者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也并非全完道理。但这种权宜之计，势必带来新的矛盾。

学校在呼吁自主权，校长在呼吁自主权。上级有关部门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教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教委的领导问：“你们别尽说没权、没权的，你们说吧，你们要什么权？”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文海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问题不能这么提出来，关键是教委应该改变工作方式。你教委的任务是什么？教委中那么多司、局、处不是把学校当作

一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的独立体，而是当作一个下属的单位。于是，很多具体的事情都要由各司、局、处说了算。学校还能有多少自主权？

“教委要改革管理体制，首先必须转变职能。教委应该主要管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的制定、抓教学设计、信息交流，要多检查、监督，而不是具体去管。学校有什么事不要都非得经过你批准才行。这样，学校的管理就会活起来！”

中国的校长们是可敬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校长，还是“市长”、“区长”，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要求他们事必躬亲。

中国的校长们是可怜的，他们各为校长，但能够用以办教育的权力和精力，实在太少了。

“领导部门最好少一点批准权，多一些监督权，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权力和精力，用到办教育上去。”这就是校长们的渴望。

采访结束了。我们走出校园，回头望了望那座花费了17万元巨款建起的校门，其巍然、厚重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禁想起人民大学“双代会”上一位老师在发言中讲到的故事：

“很多人为我们新建的那座大门感到自豪。然而校外人怎么看它呢？清华大学建筑系上课时，老师告诉学生，这座校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封闭型建筑。为了不重蹈覆辙，老师特地带着学生们到我们的校门前作了观摩……”

满座哄堂大笑。

或许，大笑之后，人们会作深深的思索。

需要思索的，不是校门，而是校门内那座倾斜的“金字塔”……

记者手记

不容沉默

—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我们党创立的第一所大学——陕北公学。所以发生在这个校园的新闻就更具有典型性。也正因为这种深刻的背景，我们对人大的采访就更具挑战性。当我们得到那封《致全校教职员工的公开信》后，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地进入学校去采访，而是在人大校园的外面，找了一家很小的旅店住下来。

我们这两男一女且文质彬彬的旅客，竟住这种十几元钱的低档旅店，立刻被警惕性极高的店方报告上去。于是，几个警察在半夜时分，猛然闯进我和另一男记者的住房。当我们在迷朦中张开睡眼，看到警察正床上床下搜寻什么。当然是一无所获。不甘心的警察后来又突击检查了2次。而每次都是带着更加疑惑的神

情离开房间。

如果他们知道一个月后，《中国青年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那篇震动了中国人民大学、惊动了国家教委的《倾斜的金字塔》，就是在他们几经严密检查而一无所获的这个阴暗的小旅店中完成的第一稿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二

采访是成功的。一些批评性报道的采访方式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对于得到真实而详尽的新闻事实无疑是有帮助的。倘若我们把意图直接表露出来，这个采访流产是肯定的。所以，采访方式在新闻运作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背着被采访人。我们首先要了解情况，然后我们要把采访的意图真实地告诉给被采访者，并向他们核实已经采访的内容。这一点是必须的。

我们的大学，我们教育部门，究竟是在办机关还是在办教育？教育体制落后于时代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们在采访中始终的疑问。也是这篇通讯的主题。这个采访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成功了，可以举一反三，深化我们追求已久的教育报道；而失败了，则后果也是严重的。

我至今还保留着《倾斜的金字塔》见报后的一些反映。有这样的评报：

“教育改革是一个老题目了，从1958年的教改，60年代初的教育改革试验到‘文革’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直到体制改革的今天，教育体制（或教育制度）的改革的问题才真正科学地提出来。《倾斜的金字塔》成功之处在于涉及了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许多社会问题讨论时轰轰烈烈，而线头理到中央主管机构就

不再吱声。实际上就体制改革而言，最高主管机构的改革恰恰是重点。倾斜的修正，要以塔尖和地面的垂直关系为依据，《倾斜的金字塔》就是在考察这种垂直关系……”

“这是一篇既实在又深刻、既尖锐又稳妥地促进教改的好报道！从新闻业务来讲，这篇大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材料扎实，充分运用事实去揭示问题的症结，没有空发议论和感慨——这是我们写批评稿和作探索问题报道时应该发扬的好作风，也是它的妙处！”

“也许，这样慎重的报道也会遭到有关部门的责难，唉！新闻改革真难哪！”

《倾斜的金字塔》在见报不久后的一次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由于许多与会者的要求，这篇报道作为参阅件印发。

三

回头再看这篇报道，似乎还可以重温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些背景和我们的热情。在把教育作为市场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今天，我们当年在报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只是一面镜子。

最初我们的线索就是一封信，这封信成为了我们切入人民大学，思考中国教育体制的入口。在得到那封信之前，尽管对文章中所罗列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我们许久没有找到切入点。这封信给了我们一次机遇。对于重大新闻现象的思考，我在1987年所著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纪事文体采写论》中有这样的说法：采访往往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无主题意识地选择新闻事实；采访者对于突发性的新闻事件不甚了解，需要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选择确立和不断深化新闻的主题。

另一种情况是，有主题设想地选择新闻事实；采访者通过学习、研究，在头脑中已经产生了主题思想的雏形，然后在采访实践中，有意识地围绕着主题思想去选择新闻事实，以验证主题，最终形成完整的主题思想。这种主动性思维的碰撞，往往会产生无意识选择所难以产生的效果。

政府有多少部门，大学就相应有多少机构，这种状况当然不能全部算在学校的头上，但这的确限制阻碍了大学作为特殊的育人机构长足的发展。教育有教育的特殊性，它不应该办成政府机关，也不应该办成经济实体。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育体制，至今我们还不能完整而全面地回答。当时，也正是由于我们对高教体制的弊端已经开始思考，所以在那封信来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作出判断，立即就进入采访，并且很快拿出稿子。尽管后来几易其稿，但主题一直也没有偏离。

这种实践已经成为许多成功记者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目标明确，带着某种意图和主题思维的雏形，到生活中寻找验证事实；另一种是这种主题思维在采访者的头脑中仍是一种潜意识，采访者对此没有产生逻辑上的清晰思维，这种潜意识一旦在现实中寻找到与之相吻合的“载体”，于是主题思维开始进入验证和形成的过程。这种过程使人产生的喜悦心情和状态，颇有些像研究灵感思维的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突然启迪于客观现实的激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与十年浩劫中所谓“主题先行”是截然不同的。其界限在于，主题先行的内涵是先确定思想，然后根据主题需要去寻找材料。这里的要害是“需要”。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我们所说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客观现实的，主题思维的雏形来自于客观，新闻事实

也来自于客观。

四

写批评报道需要承担风险，这显而易见。风险更重要的来自你对具体事实的把握。作为教育改革的这个主题本身没有什么疑义。这类大题目的采访与写作，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并不会多见，所以要把握机会。风险是成功的前奏，风险给予你的职业乐趣也显而易见。

《倾斜的金字塔》见报后，人大新闻系学生会出版的一个叫《新闻人》的刊物刊登了一篇长文，记述了这篇通讯见报后各种反映，我依旧摘录部分原文：

“1988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推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抨击官僚体制的《倾斜的金字塔》一文，它像一枚重磅炸弹，落地开花。

“《倾》文发表后，‘金字塔’内立刻纷纷扬扬。一段时期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有看到报纸的人四处寻找，图书馆报刊阅览室专门复印了《倾》的全文，以备大家查阅。在社会学概论的课堂上，青年教师以此为例，讲解了我国现有组织机构和组织管理的不合理；在哲学课堂上，一位老年教师指出：人大并不是官僚主义最严重的。有的老师为出了这等‘家丑外扬’之事而‘痛哭流涕’。新闻系的一些教师对《倾》文不很满意，认为是‘小骂大帮忙’。同时，一些在文章中被提及名字的老师，向学校领导写信，声明文章中所提到的话并非是自己原意。在金字塔的顶端，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些领导认为记者报道不属实，缺乏职业道德。而袁宝华校长认为：《倾》文写得好，人大要借此搞好改革。

“在‘金字塔’外，关心者也作出反映，北京商学院的领导要求全校学习此文，指出商院也存在此类现象和问题。北京大学某副校长称文章写得好。新闻界的同行们对此文也颇为称道，有的甚至要推荐其为明年的全国好新闻。《倾》文一时间被全国许多报刊转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热点……”

这篇文章后面还说：“在我们的采访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又听到这样的传闻：马役军、李杰、罗勤这3位记者都受到了处分，某编辑被迫辞职……”

当然，这些均未发生。

第二年，在中国好新闻评选中，《倾斜的金字塔》被评委会授予特别奖。

记者的职业是给人以激情的职业。记者职业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去年又有20多名记者以身殉职，他们用消失的生命证实了这种风险。

尽管如此，如果来世让我选择职业，我还会选择记者。

时间：1988年4月21日至29日

作者：杜涌涛

卓资现象

杜涌涛：卓资的宿命

卓资现象

某日，国家核工业部下属一公司欲购买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一批闲置资产。款汇至自治区人民银行，却被如数退回。理由是：卓资县已无一家国营企业，提防上当！

公有制的共和国存在了近40个春秋，有这等事？

不管事实如何，反正由此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卓资现象”。

卓资县最繁华的十字街口，座落着一家国营旅馆，30年来的风雨，使这座式样本来寒伧的楼房，更增添了几分衰败的气象。

来客一眼就会看到，门外并列挂着两块招牌：一块“国营旅馆”保佑着另一块“聚仙楼”。

其实，这种双重身份天正困着卓资县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企

业。

1985年，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县政府，被迫将一大批发不出工资及微利的企业，让利将财产转让给原厂全体职工。

“国营旅馆”便是这批“自寻生路的企业”中的一个。

转让时协议书写明：现有国营工人18人，离退休人员10人，遗属5人。上述人员的一切生活来源全由企业自理，按照协议书所规定的期限还清转让价5.6万元，企业归现有职工全体所有。

县政府的部分领导承认：1985年的转让，虽然给这些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政府在对企业财产的评估数额及机会均等的竞争机制的公开引入等方面，不能不令人感到某种缺憾。

为此，卓资县的领导人冒了更大的风险。

去年10月19日，一张拍卖县委小礼堂、车库和食堂的招标启事公开张贴。继而对负债累累的国营熏鸡公司及微利的国营轻体建材厂等企业和闲置资产，一一公开拍卖。

拍卖，不亚于一场地震，直接震撼着全自治区上下。

一离休老干部喃喃：“变啦！变啦！这与电影里的那些资本家的做法有甚区别？”

使外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是卓资县为鼓励现职行政干部告别机关，经商搞企业，制定了一项别出心裁的政策：“卖干部”。

此项政策规定：凡在拍卖现有企业及闲置资产过程中，现职行政干部投标中标者，以处级、科级、一般干部区别，分别可抵带资产2.5万元、2万元及1.5万元。中标者履行10年留职停薪合同。10年后，若想回原单位，将抵带资产及10年的利息一并还清。

此举给39岁的卓资县县长张楚带来无数麻烦：一批又一批参观团来了，带着无数个问号走了；新闻记者来了，诘问的、咒

骂的，迷惘地走了；当官的谨慎地回避着这块是非之地，不轻易表态。人们在等待着上面的认可，等待着理论的升华。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使卓资拍卖、转让后的企业如敬神般地将旧有的招牌供奉起来。甚至近两年冒出的私人创办的公司，也纷纷打出国营的牌子。

无休无止的理论的纠缠，使本来不善言辞的张楚，更加注重“怎么样”，而不愿深陷于理论的“为什么”。

使他感到欣慰的是：3年前转让的一大批企业，如今已经显示出活力，工业总产值几近翻一番。他对卓资县人民讲话时，心里感到踏实。他自信：“理论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

而县委书记朱暄，以他的角色不能不认真地钻研理论。卓资的困扰，使他亲身经历过的农民刚刚分田到户所引出的争吵又重绕耳边。

他诧异了：中国农村的巨变，并不是出自经典著作或哪个个人构思的结果，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民责任田里长出的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的高粱和结结实实的玉米，就是理论。

他不能不纳闷：那么多企业连年靠国家财政补贴、艰难度日，我们一些热衷于理论的同志心平气和；而现在企业摆脱了我们行政多年的指手划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我们理论的发难就又来了。

然而，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理论印证。

有次，他询问记者：十三大报告中有“部分小型企业可以实行有偿转让”，你说这“有偿转让”和“卖”有什么区别？他开始认真地比较不同提法、说法、词语、概念之间语义的异同。

主人意识的苏醒

某国营公司采购员薛某，到南方某乡镇企业进货。刚下火车，便被豪华“皇冠”拉到一家豪华饭店，豪华一顿。临出门前，该厂厂长又悄悄塞给他 600 元的好处费。

见到货后，他傻眼了：这批产品的质量与样品质量相差甚远。无奈，拿了人家的手短，硬着头皮付了款。公司蒙受了一笔不小的损失，薛某当月资金被罚 20 元，完事大吉。

随后，他继续以公司“主人”的身份，满世界跑。

另一家呼市国营企业，负债累累，有些青年工人却公开声称：倒闭了才好，咱还能换碗饭吃。

2 年前，自治区党委战略组，对全区 500 多家国营企业的 6000 多名职工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感觉不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的职工占总数的 80% 以上。

相反，已实行 2 年多股份制的包头市汽车靠垫厂，98% 的职工却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职工们确立的这种意识并非靠宣传，而是使企业的财产、风险、利益与职工集于一身的股份制机制。

卓资县的国营企业完成股份制的过程，除去 1985 年实行让利转让之外，其余采取现职国营职工每人抵带资产 1 万元（集体职工 5000 元），折股到人的办法。不足企业固定资产总值的部分，由企业和全体职工，在合同期内，分期购买股票偿还。

在此期间，企业真正享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工资、自选用工、自聘干部、自选市场、自定物价等 18 项自主权，政府不得干预。

水泥厂是该县较大的一家国营厂。1984 年承包前，年年亏

损，承包后，当年盈利 12.5 万元。随后，因企业缺乏长远规划，掠夺性生产严重，后劲明显不足。

去年 11 月 28 日，县政府将此厂全额转让，公开向社会招标，标底为 300 万元（企业现有固定资产 316 万元）。在 3 家激烈的竞争中，30 岁出头的原厂长庞玉涛，以 327 万元中标。

这样，除去现有 250 名正式职工的抵带资产 250 万元作股外，水泥厂及全体职工 3 年内再向政府偿还 77 万元，企业便归全体职工所有。

庞玉涛对记者说：“每个工人都有个小本本给我记账，哪天原材料供应不上啦，停水停电啦，找我要损失。”厂长的风险，分散成 250 份。

据知情人估计：除极少数与外省联营的厂和租赁出去的企业外，卓资县 90% 以上的企业已初步走上了股份制轨道。

然而，当 1985 年百货公司在全县第一个实行转让，总经理名密拴一再动员职工集资入股时，却一再成为泡影。他采用了一种与经济利益环环相连的制约办法，即：每个人入股金的多少，不仅与年终分红挂钩，而且直接与职工月工资、奖金及贡献奖挂起钩来。

这一招果然灵。目前，他正尝试一种新的购货手段，即：每进一批货，皆由企业和每个职工分别向银行贷一半款，风险共担。

但是，正像记者采访的卓资县每一位厂长、经理所担忧的一样，名密拴也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沉重的忧虑之中：

卓资的这种政策，上面能容忍多久？18 项自主权应用到什么程度？2 年来，“婆婆”们陆陆续续地又塞给他 15 名职工，尽管企业的职工已经饱和，尽管这个权力属于他本人，但他还是接受了。

他隐约感到：虽然维系政企之间的那根有形的脐带断了，但似有一根无形的脐带，仍然潜在地维系着他们，而这种感觉，相当程度上源于他们本人已经习惯的附属心理。

显然，在企业的“断乳期”，要使职工相当弱化的主人意识真正觉醒，不仅要战胜自我长期的“恋母”心理，更有赖于新的政治经济机制的建立。

哑巴吃黄连

听说来了记者，卓资县城关镇工商所所长魏启珍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来。

1986年卓资进行机构改革时，将食品卫生监督、药政管理、土地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权限，全部移交到这个行政级别只有股级的工商所来。

老魏人实在，说：“你说这合并有哪点不好？就说现在这办事短不了烧香磕头，合并了，老百姓烧上一次也就行啦。”

对于领教过层层衙门那枚公章之卡的人来说，老魏的话，无疑道出了他们的苦衷。比如过去要办理一张饮食服务行业的营业执照，不旅行四五个公章就甭想开业。个体户们对于现在这样一合并打心里高兴。然而，在盟卫生处眼里，这合并，说得好听点叫“僭权”，说得难听点干脆叫“胡闹”。

这不，工商所有了食品卫生监督职责，就需要一张食品卫生检查证吧？可老魏三番五次派人去盟卫生处催办，上面就是不应，后来催得急了，上面的人干脆说：“你们不是搞改革吗？张楚有本事叫张楚给你们发吧。”其实像老魏所反映的这类情况，敲开这个县政府部门每一个环节的办公室，每个干部都能给你讲上三天三夜。

简单地说，198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相当一批企业赢得了18项自主权力。在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条条管理的上层建筑部门必须相应改革。这样，有些部门并了，有些职能被取消了。

这种“拆庙减僧”的举动，使这个县和它的上级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中国的事是这样：上面有个僧院，下面就必须有个庙寺。你拆了人家的庙寺，能使人高兴起来吗？

工商所老魏的话却总是那么直：“许多部门现在下来，连个吃喝占拿的对口部门也没啦。”

老魏的说法也许太无道理，因为在一些公开场合，上级总要提醒各级主管部门，要为卓资县的改革“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说归说，做起事来却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比如说上级业务部门分配经费吧，给你或给他都能找出上千种理由，你不是干瞪眼？在记者采访的部门中，大概备受这种有苦难言折磨的要数农口系统了。

农委是在1986年撤销农、林、牧、水四局基础上成立的。上级各主管部门都不愿给这个非驴非马的部门投资，生怕你相互挪用了。全盟农牧林水机械经费100多万，有些旗县每年可以分几十万，而卓资县2年多一分钱也没有。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蔚焕文说：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局合并后，上级拨的计划生育经费逐年下降，由最高年份的22万，降到去年的9万。他承认，合并后“与上面业务部门关系很紧张。”

计经委副主任老王说起过去上级的投资时，仍露出无限怀旧的神情。他说：“今年上级调拨的建设经费，最多的旗县给了100多万元，其余少的也有30多万，而仅给卓资县蒙古族小学和体育场修建各2万。”

问到企业的投资，他的声音有些激动：“人家说，你卖啦还

给你干什么？”紧接着补充：“当然这些话人家会上不讲。”

卓资与它的上级之间的这种齟齬，在县委书记朱暄看来，“绝非哪个上下领导之间、单位之间的矛盾，而是一场体制之间的深刻的磨擦与冲突，上下的体制一天不能协调一致，这种碰撞就会一天重似一天。”

透明的红印章

鞭炮已不如年三十那么热闹啦。孩子们穿上新衣服满世界疯跑。与往年相比，家家户户对联上“财”呀“福”呀的骤然多了起来。

卓资人用这些字眼掀开了龙年的第一张日历。

上午11点多光景，某局一位多年管货源的局长，此时窝在家中，口中喃喃：“今年拜年的少啦。自己给自己拜啦。”说罢，连往肚里灌了3杯。

春节后，两大院（县委、县政府）的人议论起来都有同感：今年给官拜年的少啦；请官吃饭的少啦；当官的家里好烟好酒少啦（取消了特供制）。

而毗邻的旗县截然是另一番光景：虽然头头们年年发文件，年年搞团拜，正月里来，这些发文件的人们迎来的仍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对此，卓资县委书记朱暄的看法是：“党风的好转，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要变旧体制中‘管’的职能为‘服务’职能，变人为的调节为市场调节。只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逐步建立运转起来，执权柄者手中的那枚印章才能越来越透明起来。”

以建房住房中的不正之风来说，当此问题仍使一些市旗县纪检委的同志忙得东查西堵之时，卓资县的这段时期已成为历史。

截至 1986 年，卓资县已将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部公产房，以个人、单位、国家各三分之一的价钱比例，全部以商品房出售给住。今后，申请住房的人，主要将采取公建私助或私建公助的形式。政府的投资，有相应的基数限定，其余部分自己支付。价格杠杆的调节，使过去一些占房的人主动交出了多余的部分。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各单位的小车，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私用工具，平头布衣是没有这个福分的。1986 年 8 月，卓资县委、县政府决定将所有的行政单位的大小车辆（共 44 辆，现已出售 8 辆）全部承包给个人，司机与原单位脱钩。根据车况好坏，每个司机每年向政府上缴承包费 500—3000 元不等。每辆小车每年到机关事务局值班 4 个月，以保证工作用车。工作用车凭机关事务局发放的车票为证，个人用车凭现钱，以每公里 0.4 元计价，司机的工资停发，汽油、维修等费用全部司机自己承担，5 年承包期满，车归司机本人。

经过细致测算：现有车辆 5 年后共可节约、回收资金 1528592.24 元。

机关事务局副局长老杨对记者说：“过去出车的差使，叫谁去谁不乐意，现是是司机主动上门来找你。”

家住八苏木的一位老农说：“以前，用小车你想也不敢想。现在咱交现钱，可以大大方方地用哩。”

司机小赵更是爽快：“管你书记、县长，还是摆小摊的、种田的咱们随叫随到，保你满意。但用车得交钱，咱现在就凭这方向盘吃饭哩。”

这一改革，使卓资县的书记、县长们到铁路沿线的地方开会、下乡也坐起了火车。七大姑、八大姨更不敢风光了。

县委部分领导与粮食部门的同志座谈时得悉：粮食价格放开之前，市民供应的细粮只占 25%。但仅粮油公司一家，一年往

外批后门面粉就达 30 万斤。

卓资县纪检委郭书记对近年来监纪检委年终评比表彰主要以抓案子的数量作为标准提出异议：“应该以新的机制去促进党风的好转。30 万斤面粉，通过后门批出去，这不单是哪个个人的问题。若抓粮油公司的典型，粮油公司的领导自有他们的苦衷。来批粮的哪个能得罪得起。这下好了，不用煞费苦心地去处理哪个，就将过去人为的调节，改为市场调节，这漏洞就堵了。要我看，这才叫治本。”

有位青年理论工作者表述自己的看法：卓资的改革，每一步都是从弱化、侵削自身行政权力和利益着手的。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调节，它是发展商品经济强烈呼唤的结果，孕育着透明的政治民主生活的萌芽。

卓资县主要领导人向记者透露：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要使相当一大批掌管印章的官员，进一步适应服务、学好服务。要从机制上加以保证。

乌纱渐轻

脱去中山服的共青团卓资县委副书记韩爱平，春节前，在该县最繁华的一条十字街口，混在一群小商贩之中，推销着他的牛肉。

这位已经官居副科级年仅 27 岁的蒙古族青年，在时下一些人心目中，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去年 10 月 21 日，韩爱平与县委另外 5 名干部（团县委 3 名），参加拍卖县委小礼堂、车库、食堂的竞争，以 22 万元的高价（标底是 10 万）一举中标。

按照卓资县制定的鼓励行政干部从事实业的优惠政策，韩爱

平及他的5个伙伴，共可抵带9.5万元，其余12.5万元于月内还清。

几天后，县委组织部将6份盖有7个单位红印的留职停薪协议书，正式摆在他们6个人面前。11月份起，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停发了。

没有退路。很快，几个伙伴将楚楚衣冠脱掉了，起早摸黑拉砖和泥；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卓资县——集宁之间租借录相带；瞄准市场需求的空缺贩烟、贩牛肉——没有这些坐办公室的人不能做的。

如果说，几个月前，韩爱平等5人，对于自己命运所做出的选择，还使党政干部评说不一的话，那么现在出外投标，已引起这个县相当数量干部的积极反应。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相继已有35名党政干部走出了机关。一些干部在初次投标失败后，仍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卓资县出现的这种弃政从商（实业）热，使一位社会学者大感兴趣。他认为，对于我们这个从古至今、官本位思想至上的国度来说，卓资这现象有十分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改革是一个使旧的权力系统被迫适应新的经济机制的过程。它要求人们在传统与新生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而这必然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卓资县的弃政从商（实业）热，不仅受到县内一些人的抗拒，也使相邻旗县一部分人如临大敌。

据说，某些旗县的领导明里暗里封锁这些消息；有些领导公开场合告诫：对于卓资的改革不听、不传、不信。

断“皇粮”

3月10日上午，记者在卓资县北街小学校长办公室内目睹了这样一幕。

办公室内一共两对桌椅。原任校长任再明、副校长李俊山各守一端。原教务处副主任白淑恒坐在一张床边。已经离休的原教务处主任老孙，每天必来此点一卯。记者只能与他在一把瘦骨伶仃的长条椅上并排落座。

老任先开口：“我下台啦！”

“相差那么几分就能说明一切？”老孙愤愤不平。

去年中标的新校长李岐山踱进屋来，他徘徊在地中央，坐没坐处，站不是站，便挤在记者和老孙中间。

可以看出，眼下这个办公室里，李岐山的位置还只能属于这把长条椅。但无疑，老任屁股下面那把交椅已开始晃动了。

其实，不只是老任感到了这种晃动，近期，卓资县事业单位坐热了“铁交椅”的人，不同程度地都感到了这种晃动。晃动的根本原因是“皇粮”被断。

继去年12月11日，北街小学公开招聘校长以来，卓资县多数学校（包括农村）、医院、农林牧水各站等事业单位，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公开招聘了校长、院长或站长。

为了鼓励社会办学和学校间竞争，县政府发放经费不再以各学校的教师人数为基数，而以学生人数为依托，不论民办和公办，多招收一名学生多拨一份经费，学生有选择学校的自主权。

在此种政策下，今年开学初，卓资县仅大榆树乡，便出现了4所私立学校。

过去农村的孩子人不入学，与学校无关。现在不论是公立还

是私立学校，教师走村串户动员学龄儿童入学。许多老师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方便学生的措施。大榆树乡乡长赵明对记者说，今年开学初统计，各学校新增学生共 110 人。

在此同时，这个乡未被聘任的 5 名正式教师却正面临着在职失业（据乡长会议透露，各乡都有类似情况）。学校决定对未被聘任的教师，第一、二年暂以原基本工资的 80% 与 50% 发放，第三年自寻出路。

许多学校对在职教师分配也采取了课时工资制、班级承包付酬、岗位津贴与奖金全浮动工资制等几种形式。

抽查表明：普通中学在全日制课程外，普遍增设了适应本地经济的专业技术课程，部分小学也增设了劳动课程。

与教育单位不同，其它事业单位从公开招标之日起，其事业经费每年将递减 10%。

卓资县最大的第一人民医院去年得到事业经费 16.23 万元。此次招标承包的事业经费是 14 万元，不足部分由医院自己创收补足。

原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宏铸在公开招聘院长的竞争中中标。元月 6 日，他走马上任后，在院内公开招聘各科室主任，原 12 个科室主任有 4 人落马。科室主任逐级聘任医生、护士。未被聘任的医护人员，每天发给一元的生活费，组织学习业务待聘。未经过专门训练靠后门进来的护士被挤入院办的创收部，工资自理。

医院在管理上实行逐级经费承包制，盈余部分科室院级按比例分成，亏损由科室自负。为此，各科室普遍打破了过去工资级别，实行以分计酬制。

赵宏铸向记者介绍：现在医院实行先看病，后挂号的制度，病人看不上大夫的药方，可以另寻高医。门诊还实行了挂牌就

医，病人选择大夫。

卓资县县长张楚谈起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时这样认为：现在走这一步，只是过渡，最终将实现向企业化管理过渡。医生凭医术吃饭，科技人员靠技术吃饭。农牧林水方面有特长的人，就要去农民那里搞饭吃。以后将一步一步断绝“皇粮”。

无形的手

漫步卓资市场，你会感到迷乱。

满街摆小摊的，杂乱地满地一坐；满街打台球的，输家掏5角钱，从早晨8点直打到晚上8点；满街的价格五花八门儿，同一种货相隔个10米20米，价格却各是各的。

乍一看，确实乱。看久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货源充足的市场。彩电，眼下许多大城市没有后门买不到，这儿有。三元牌的，内蒙古人信任的“天鹅”。是贵了点：2150元到2200元不等。凤凰自行车305元，满街是，“双狮”牌自行车却150元一辆。

要说这是个瞬息万变的市场还嫌过分，毕竟是个小县城，难免有它的局限。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变化着的市场：今天和明天不一样，特别是蔬菜，上午晚上不一样。

这些不稳定的感觉汇合起来，也不如国营粮油公司挂出的那块“今日粮油价格”的牌子更令人刺激啦——改革多年，粮油价格放开一直慎而又慎。民以食为天、真要动根底了？

今天元月1日，卓资县粮油价格放开。自此，这个县除黄金之外，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

粮油价格放开采取了变通的方式：把国家过去对市民粮食供应的“暗补”变为“明补”。每个城镇居民，每斤粮食补助0.25

元。

粮价放开后，过去仅有国营几家垄断的粮食市场，骤然增到40多家。目前面粉、大米每市斤都稳定在0.44元和0.46元，尚未出现过浮动。

多家经营的局面，使粮油公司的经理们再也坐不住了。年前，他们在下设的大大小的门店、加工厂，层层搞了承包，分别实行了联销计酬和联产计酬的工资制度。

从经销3个月来的状况看，细粮不用发愁，但那成堆的玉米棒子压得公司各级领导寝食不安，逼得全公司的干部倾巢出动，推销玉米。当地卖不动，去外地卖。总之，他们别无选择：居民们的补贴必须靠他们卖了粮的钱来支付。

眼下，居民们领到了一二月份的粮补，使得起初的惊慌变得格外平静了。而算过细账的人又开始担忧再变回去。

杨圈湾乡一位贩羊皮的老农看着这情景眼热，向他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侄儿打听：“这价格不会降吧，要这样，明年咱家那十来亩地，也要好好料理料理了。”

卓资的市场，也许会给你这样一种启示：人为地去控制价格，带来的是商品匮乏和生产者消极。价格基本是随着需求的强弱而升降，是买方与卖方在讨价还价中痛苦地或快乐地达成的某种默契的协议。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

价值规律正在卓资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价格正在发挥其固有的导航效能。

记者手记

卓资的宿命

《卓资现象》已是 11 年前的旧作了。今天的人们回头再看当年发生在卓资县的那场改革，可能已算不了什么，可在当年，随着这组报道的出台，卓资县的改革不折不扣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从 1988—1989 年两年，全国先后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3000 多名地方官员、研究人员，长途跋涉，来到内蒙古中部这个偏远、贫穷的县城，着实想弄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国家体改委及中央有关部门数次前来考察、研究卓资改革。当年的《新观察》甚至出专刊探讨“卓资现象”。

如果我们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要知道，1987 年，那是一个火柴要涨 1 分钱还需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的年代。

卓资的改革太超前了！

卓资改了什么？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卓资的改革也有点“冒头”。让我们回过头看看，1987年以及之后几年，卓资到底改了什么。

1. 沸沸扬扬“卖企业”：1987年，中央某部给卓资汇去一笔款，结果被银行如数退回。理由是：“卓资已无一家国营企业。小心上当！”在此文前，卓资对全县大大小小的企业一律实行两个字：“卖”和“送”。

所谓“卖”，就是将企业全部卖给本厂职工。并非职工们现掏腰包买下企业，而是以“虚股”形式入股买下企业。以该县水泥厂为例：经核算，水泥厂固定资产共250万元，该厂职工250人，人均折股1000元。如此，水泥厂以全厂职工人均所有的形式，完成了所有权的归属。政府与其今后的联系只是收税与被收税的关系。

所谓“送”，就是将该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送”给外省或外地效益好的企业。由此，该县政府背上了“满清政府”的骂名。

2. 价格全部放开：1988年，粮票取消也是没几年的事，最让人感到刺眼的是卓资大大小小的粮店赫然挂出了“今日米价”的牌子。想想中国计划经济搞了40年，最敏感的粮食价格，一直由国家统购统销，这4个字一下把人们的记忆带回解放前的某些电影片段。不仅如此，卓资放开了所有的商品的价格，一律实行市场价。而此时，中国正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走在价格“双轨制”的钢丝上。大白菜的价格也要由政府制定，副食品上涨2分钱立即可以造成哄抢。

3. 卓资的经济改革完成了所有制的革命和完全的市场调节。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旧有的上层建筑，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对此，卓资对“上层建筑”做了前所未有的大手术：消肿减肥，转变职能。

非议四起“卖干部”：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而难点在于如何消化“富余人员”。卓资的做法是根据改革后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围绕服务经济重新设置机构。到1990年，县委只保留办公室和组宣部两个部门，县政府只设了6个部门。全县干部从改革前的3000多人，精减到400多人。农口的所有事业单位全部转变成经营实体，直接在一线服务农民、养活自己。工商口的许多部门也直接变为经营实体。剩下的“富余人员”卓资采取的办法是“资产抵货”和“实物赎买”，这就是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卖干部”。即以干部、职工行政级别不同，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如：科级干部2.5万元，副科2万元，以此类推。一次性“买断”后，从此脱钩。

改革后的“上层建筑”主要职能是什么？用卓资当时领导人的话主要是3项：（1）制定中长远发展规划；（2）公益事业；（3）收税。

政府回归到政府应该在的轨道上来。

4. 卖汽车：1989年之前，卓资县将全县所有的大小公车，全部折价卖给了个人，干部办公凭乘车票。仅此一项全县每年节约开支300多万元，并彻底杜绝了公车私用现象。

5. 卖住房：早在1987年，卓资就结束了住房福利的时代。全县所有住房全卖给了干部、职工。

卓资承受了什么？

在汪洋一片的旧体制中，卓资像座“孤岛”。

试图以改革自身的逻辑运转的卓资县，遇到了来自纵向官僚体制的冷漠与白眼，即使在横向的同僚那里，“这个异端”也是如此不受欢迎。

与外界赶集似地前来卓资取经的情形正相反，从1987年到1990年前，卓资县的顶头上司乌兰察布盟及更高一层的自治区领导，几乎很少光顾过他们眼皮下这个闹出全国影响的县城。在他们眼里，卓资是个“敏感地区”。熟识中国政治寒暑表的政界人士，对之慎而又慎，态度模棱两可，观望着“大气候”的变化，而一部分城府较浅的官员则干脆声称：这哪是改革，分明是胡闹。

多数官员下乡路过卓资，多是绕道而行：“去了不好表态”。而部分职位较低的“上级部门”人士光顾卓资，大多是带着有色眼镜来此“挑刺儿”。

卓资县上至“七品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不仅顽强地忍耐着新旧体制磨擦所带来的痛苦，同时，也在忍耐着上下左右一派肃然的沉默。

从大处说，卓资县改革以来，上面中断了这个县的所有投资和项目。在一个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甚至在今天，投资与项目对一个地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从中处说，从体制上、机构上，卓资和上面整个脱节了。中国的机构往往是上面有个大庙，下面就有一个小庙，大庙对小庙，这叫垂直领导，而卓资县政府机构改革后只剩6个部门，减弱合并了许多职能，这样上下机构对不上铆，“老子”怎么会将经费无端地给一个不是自己纯种的“儿子”？

从小处说，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损失。以汽车为例，每次上面开会，其他县的领导都带着专车，惟独卓资县的领导，灰头土脸坐火车前去；以住房为例，卓资县的一、二把手，家都不在当

地，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办公室，这个家陪伴他们度过了8个春秋；以吃饭为例，其他县的领导即使家不在当地，县委招待所也会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而卓资的领导，已失去了这一“根据地”，原属县委的宾馆已承包给私人，他们每年年初将伙食费交足，厨房的一张脏兮兮的桌子就是他们的饭桌；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灰色收入”，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实权”，被自己无情地剥夺到最低限度，卓资的干部也认得清清楚楚，在卓资当官不是享受，而是“受罪”。卓资没人“跑官”。

这些对于卓资的改革者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从他们认准了这条路以后，他们就准备好了要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有一样“压力”仍然使他们从内心里感到“寒冷”。这就是时时刻刻包围他们那个庞大的官僚体制的漠然、嘲弄，或者不露声色。

你改去吧，你！

卓资的干部们内心也不叫好：凭什么别的县的干部可以躺在社会主义温暖的福利襁褓中，而我们早早被推进市场经济的严风酷雨里去？

那么改革者本人呢？他们得到了什么？

改革者何许人也？

朱暄，卓资县县委书记。1984年从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调到卓资任职。直到1991年退休回到老家凉城。前不久，老人给我打电话，说想找我聊聊天。我问他近况，答曰：现在老家种树、养羊。我听后心里一阵酸楚：今天的县太爷退下来后，大约决不会为衣食奔波吧？

张楚，卓资县政府县长。1984年到该县任副县长，后任县

长。1991年到自治区任副厅长，后调到国家供销总社任司长。近况不详。

我在《卓资现象》中丝毫没有涉及张楚的背景，其实，抛开张楚的背景研究卓资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如此激进的改革，涉及上上下下如此多人的切身利益，改革中遇到如此大的阻力，而改革仍能一往无前地迈进，别说在11年前，即使在今天，也让人头脑中不由地打一个问号：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改革？

无庸置疑，张楚特殊的背景是这场改革没有中途夭折的关键力量。

张楚来自北京，其岳父是当时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虽然据我所知，这位党政要人从未就张楚的事情向自治区的领导打过任何招呼，也从未对卓资的改革有过任何评价，但是，显然这样一层神秘的关系，客观上成了卓资改革的“保护伞”。

其次，朱暄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是这场改革没有首先从内部分裂，并一直能够艰难地“挺住”的重要原因。

当时，朱暄已经50多岁，而张楚不足40岁，朱又是“一把手”，能够“后退一步，站高一步”，潜下心来，一心“辅佐”这位“少帅”，实在不易。这是我所见过的党政两个“一把手”配合得最好的一个“范例”。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的出身、阅历甚至个性相距甚远，但彼此间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弥合了一切世俗的营营苟苟。为了“改革”，一切都可以放在其后。

第三，张楚的道德、个性、见识以及吃苦精神，是这场改革得以进行的内在力量。

卓资的机构改革从“自我剥夺”开始，一切既存的不合理的利益原则统统打碎重建。诸如：专车、住房等等。这构成了卓资

改革的道德基础。

张楚“敏于行而讷于言”，做得多，而说得少。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更不会为斟词酌句陷在会议室里拔不出来。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行动派”领导。

张楚说得少，并不等于他脑袋里“没货”，恰恰相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见过不少世面，与首都理论界人士也有广泛的交往，这成为卓资改革的思想基础。

最后一点是吃苦精神，这一点看起来最简单，但做起来最难。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子女，一头扎在塞外一个“国贫县”里，一干就是8年。完全过的一种“苦行僧”的生活。为此，他最终牺牲了婚姻。

有一件小事，很能看出张楚那种纯粹的性格：我头一次去卓资采访时，卓资像个“雷区”，政界、理论界及新闻界的人，都在远远观望着。而我这个“稀客”，去了不仅没有受到特殊关照，而且，每天还得自己在食堂买饭，从没人陪。这次采访后，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组系列报道《卓资现象》。因为这是卓资改革首次在全国媒体披露，因而也可以说，是我使卓资产生了全国影响。我二下卓资采访时，张楚仍然没陪我吃顿饭。朱暄在我临走前陪我吃饭，并给我带了两只当地的熏鸡。正在我推托之时，张楚前来我房间送行。朱暄闻之，赶快叫工作人员将熏鸡藏到床头柜中。

在迎来送往难免的吃吃喝喝上，张楚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也许正是这种“不近人情”，那些年卓资县省下了大笔的招待费。1988年之后的几年中，卓资县的接待任务可能是全国县市中最重的之一，但从1989年之后，卓资全县每年的接待费仅有1.4万多元左右。全国绝对找不出第二个这样“抠门儿”的县。

张楚为这事，没少得罪人。

卓资“复辟”了

我写《卓资现象》时，脑子里就不时冒出这样的疑问：卓资的改革能维持多久？改革如何以一种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卓资的复辟就是迟早的一天。道理很简单：卓资不是孤立的卓资，它只是大的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张楚的努力是想使这个零部件变成一个单独运行的小机器。张楚在的时候，这一点初步做到了，但张楚一走，这就小机器必然重新回到大机器上，并且，极力使它不再与大机器的齿轮发生“卡壳儿”。

是的，卓资初步建起了新的制度，但这制度的灵魂是张楚。如果张楚不能解决用“法的形式”取代自己（“英雄形式”），那么，英雄隐去的时候，一切注定要回到“庸人的常态”。

就此，我在7年前曾征询过张楚的意见。张楚一言以蔽之：我没有立法的权力。

这就是张楚的悲剧。这就是卓资的宿命。这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改革的宿命。

1994年，卓资早已是新朝换旧代了。我再下卓资采访，卓资正在全面恢复旧有的机构。去卓资采访有饭吃了。卓资的领导有车坐了。卓资和上下左右正在重新弥合“裂缝”。该走动的还要走起来。总之，县委、政府手中不能没有“权”。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卓资复辟了”没能成稿。

以后，我再没去过卓资，也不知它后来的样子。

再以后从媒体看到：“卓资农民撑起北方书市”。私下想，这大约还透着早年卓资改革些许的影子？

再再以后就是1998年，我回到内蒙古，听说，卓资的县委书记、县长因为提拔干部（据说一下研究了100多名干部），官

· 司打到上面，被双双调离了。

我听后一点也不吃惊：这就是“庸人的常态”。但心里由不得还是唏嘘了一声：卓资，的确已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卓资了。

●

时间：1988年4月

作者：马季元、孙凯、马应珊、黎戈宁

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

马应珊：一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共同完成的报道

武威地市领导压制 新闻批评大发武威

3月17日，甘肃省武威市爆出《武威报》记者手持地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沿街收缴报纸的新闻。该报前一天发了篇《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从而惹出了麻烦。

《人民代表的心里话》是武威市部分人民代表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代表们在发言中反映了基层的一些问题，就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提了些批评意见，结果引起部分地、市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人民代表的心里话

——行署约请武威市人大部分基层代表座谈纪实

3月7日，行署专员魏万进、刚刚到职的副专员刘生荣约请

正在出席武威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的部分基层代表座谈。会议由刘副专员主持。下面是实况简记。

刘生荣：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想法，看法，谈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讲实际话、心里话。

魏万进（以下简称魏）：不要大家讲“好”，要多提意见，发牢骚。对省、地、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干部的工作作风，有啥意见，都可以提，横挑鼻子竖挑眼。

张淑芳（大柳乡双河村农民）：现在水利抓的不好。以前打的井都老了、旧了，有的废了，不能用。水位又下降，只能打冲井，花费大。我队打了一眼，花了2.5万元，人均摊50元。撤区并乡不好，干部并没减少，乡大，乡长、书记照管不过来，一般干部不负责任，说是下村，实际回了家。

魏：你办的企业有啥困难？（张淑芳办双金食品厂）

张淑芳：就是缺原料（白糖）。

李万祥（口路乡石嘴村委员会主任）：说到办企业，张义山区难处多，邻近哈溪，哈溪拉电时要占我们的耕地，天祝县领导说邻帮邻，答应给我们煤窑、采金井口、发车辆通行证，电拉上了，这些一件都没落实。天祝车过张义畅通无阻，张义车到双龙沟却要50元“买路钱”，因此现在群众修路不积极。不积极还有一个原因：武运司客车，一上车就是2元6角，十头八公里也是通票，还说张义也是特区。

魏：国家出钱修的路，任何人不能设卡收费，地方或群众集资修的路，适当收取费用是可以的，中央文件早有规定。但是，既然天祝答应给发通行证是应当落实的。武运司这样乱收费显然是不对的。

何松山（日坝乡四坝村委员会主任）：农民对物价最有意见：粮价涨了1分5厘，工业品却成倍涨价，种粮投的多，收的少，

农民吃了亏，不划算。定购任务又太高，我们村人均900斤，而全村人均只有1亩5分地，亩产按900斤算，2/3交了定购。化肥供不上，连半数都不够。三挂勾，啥紧挂啥，猪收不上挂猪，甜菜收不上挂甜菜。这个政策要研究，国家生产的化肥本来就是用于农业的，应按地亩分掉。猪收不上价格调一下，人就会养猪。可是要限价，农民不卖，就拿化肥来卡脖子，知道农民缺化肥。

教育上，永昌片一年初中毕业生2000多人，大部分上不了高中，一所职业中学只招收一、二百人，农民生活好了，想叫娃们深造一下没条件。

李义花（共和街太平巷居委主任）：街道干部拿钱少，工作多，啥工作都要我们去落实，巷子里有下水道，却不留进水口，污水只好往马路上泼。

魏：菜贵不贵？

李答：很贵，年前一斤白菜2角钱。

李学发（金羊乡三盘磨村委主任）：说到菜，我就是种菜的，我们是六个蔬菜基地村之一，1984年开始以菜换粮，执行中漏洞大，有的人换到一二万斤粮，有的换不到，应该把粮食指标放到村，由村分配到户，按户分摊交菜任务。360万斤粮食指标，换来的菜居民根本吃不完，关键要组织好，堵漏洞。化肥、地膜给菜农少了，白菜涨到一角时，才说菜换化肥，手中没菜，干望。这个政策要早订该多好？

环境污染一直得不到解决，火葬场、皮胶厂还有三盘磨皮衣厂，对人、对蔬菜都有影响。

牛成才（城关镇金属加工厂厂长）：城市建设应有个统一规划，现在是前脚铺路后脚挖，今天搞上水，明天搞下水，后天安电缆。一年总要挖一次，钱尽花到这上面。电力部门让居民一户

安装一个电表，旧表统统不用。本来修一下是可以用的。

景光福（金塔乡中庄村农民）：撤区并乡咋看也没好处。我们乡60多名干部，找人办事难得很，找到这个门，说是在那个门，满院子找不到，说是回了家。人家分工细，干东的不干西。小乡时几个干部，他就不能推。

现在人为啥怀念刘县爷（指副专员刘尔能）？他当县长、书记时一天往下面跑，生产队长都能说出名字，给大家干实事，群众心里热乎。现在农业无人管了，不下降才怪。

刘铎（清水乡王盛村党支部书记）：现在农业管是有人管，咋个管？在纸片上管。下达数字，分派任务，“甜菜必须完成多少多少亩！”下面也哄上面，填数字时，完成了，实际上没有种那么多。刘县爷那时，人家实实在在，我们也不愿哄人家，也哄不过去。三天两头下来，来了就到地上看，能哄过去吗？

这次我们代表团讨论中意见最大的是市上对粮食不够重视。1984年粮多，卖粮走后门。武威市粮食上不去，全区也上不去。种子公从农民中收的混杂粮食，加价卖给农民，结果坑了农民，去年我们那儿买的玉米种，发芽率只有50%；生产资料价格高，乱收费的多，一口人上百元，农民负担重。有些也是应该交的。如水费，收的多，用于水利建设的少。不如干脆放给乡上，收费建设都由乡上搞。

张东财（永丰乡五爱村党支部书记）：撤区并乡给群众带来了不方便，就说干部到乡上开会，原先中午回家吃饭，现在30多里，只能在乡上吃饭，往往吃不上。

柳市长报告中说办了46件实事，实际呢，有的效果不好，去年铺的6公里水管，花10多万元，结果没水源，12月份干了，农民还是到截河坝拉水，来回得七八个小时。

陈泰年（东河乡陈家寨村主任）：市上这两年对农业重视

不够，井都是70年代初打的，老本快吃完了，韩佐、古城等山水灌区去年粮食减产，秋后成熟地只有60%。

农村教育无人重视，学生买课本也要搞搭配。古城中学在武南新华书店提书，课本4千多元，搭配的书2千多元，不拿搭配书，课本也不给提。那些书学生都是不需要的。硬摊派下去。

粮食定购，说是合同，实际上是单方面的，硬压的。真正的合同，应当是双方自愿，互尽义务。合同规定的化肥买不上，说没货，一句话交待了，追究谁去？

朱久年（丰乐镇截河村农民）：春耕需要钱，银行不给贷款，不还款的不给贷，还掉的也不给贷。

撤区并乡说这好那好，一点不好，下面的干部群众没一个赞成的。

刘兴隆（高坝乡碌碡村党支书）：70年代外地学武威，学的是带田，80年代武威又去学别人，还是学带田，人家学武威增产了，我们自己的丢掉了，这说明了啥？不重视农业是全国性的，但我们武威特别突出。抓农业的只有一个副市长，这么大的市，能行吗？多次提意见，还是没引起重视。

乡干部吃粮不干事，确实突出，九点十点到乡政府转一下，不见了，多的回家了。实行责任制后，把乡干部都调在家门上，有好有弊。

生猪奖售的化肥，说是1987年的作废了。早买没货，迟了又说作废了。马上要下种，没肥愁得没法儿。

刘荣生：我刚到职，参加了这么一次会议，听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心里话、实际话，对我熟悉武威的情况，指导我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在平凉工作时就知道武威对全省贡献大，平凉吃着好几个国家、几个省、几个地区的粮食，其中就有武威的粮食，我也吃了不少（笑），大家还是鼓起劲来干。

魏：刘副专员已经作了总结，我再讲几点：首先对代表们的这些中肯诚挚的意见，我代表地委、行署先接受下来，然后加以改进。化肥的问题，我这个专员没当好，预见性不强，去年以来，市上跑，地区也跑，总算抓来了5万多吨，去年此时只有2万多吨；水的问题，形势确实严峻，河水少了，地下水位下降了，现在只有管好用好现有水、旧井改造、新打机井同时抓。这两年地区抓农业是少了，我要做自我批评。今年我个人要以一半时间、一半精力抓农业；农产品价格低的问题确实突出。“谷贱伤农”历来如此，已经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水费要用到水利建设上去，经费不足要靠多种经营解决，如养鱼、渠旁植树，都是有前途的，这要通过改革来实行；乡镇干部不干事的问题，不仅乡镇，县、地、省、中央一些部门也有这个问题。政治体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今年先搞责任制，工资浮动，与效益挂钩。

大家对尔能同志的表扬我赞成，我正式提出：地、县、乡干部都要向刘尔能同志学习，学习他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为人民办实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看了《人民代表的心里话》，武威市市长柳宏克大为恼火，当即打电话给地委书记杨作林，说：“我是省上、地委派来的，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不行我可以走嘛！”杨作林书记与其他几位地委领导就这篇座谈纪要提出了六条看法和五条建议，认为“报社处理方式不对”，“内容问题很多，涉及了许多敏感问题，如粮食订购合同、价格等”，“对领导作风的指责不准确、打击面太大”等等。地委决定：扣发尚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

第二天，报社奉命派出8名记者，两人一组，沿武威市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挨门收报。所到之处，听到的尽是责骂之声。许多

群众说：你们说清楚，这张报错在哪里？说出了，就拿走。参加收报的一位记者说：“我跑了一整天，去了几十个单位，接触了上百人，都说这篇报道说的是实话，是人民的心里话。”8名记者奔波一天，只收回了110份报纸。事后，武威市满城风雨，人们争相传阅未被收走的报纸，纷纷给报社打电话、写信表示强烈不满。

3月19日，订户们收到重印的16日报纸，一条一般性的会议消息代替了原来的谈论纪要，上面还刊出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

省委书记李子奇严厉批评“收报事件”

登有“收报事件”消息的《中国青年报》到了武威市后，人们争相传阅，议论纷纷。都为报纸及时客观地报道这一件事件表示满意。

武威市印刷厂排字车间主任贾昶、武威地委信访办公室主任杨万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们的报纸不是批评太多，而是批评太少。对批评报道要看基本事实是否存在，不能鸡蛋里挑骨头。报纸批评到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上，这样的批评是人民最需要的。出现“收报事件”，这说明我们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意识，说明新闻的监督作用必须要强化。新华书店一位姓王的年轻女同志说：“武威报记者来收报纸时我没有给，我细看了两遍《人民代表的心里话》，觉得说的对着哩，大部分也是我们心里想说的话。报纸登了点人民代表的批评意见就去收报，不知他们对‘民主’二字是怎样理解的。收报纸的作法在全市影响很不好。”武威行署副专员裴永俊，在《武威报》副总编梁林等同志说，地委书记杨作林同志平时民主作风还比较好，也比较善于团结人，

工作也扎实，总的来说是个好同志。但这次收报事件中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事实上压制了不同意见。对这种作法新闻界开展批评是很正常的。

武威地委书记接受批评检讨错误

“发生在武威的收报事件，社会影响很不好，我们欢迎新闻界的批评，感谢中国青年报作出的努力。这对促进我省的民主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李子奇同志还告诉记者：“昨天我们省委专门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严肃批评了武威地委主要负责人压制新闻批评，扣报收报的错误作法。在改革开放和加强建设民主政治的今天，在全国人代会开幕前夕，武威发生这样的事，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希望武威地委认真总结教育，全省各级党委领导也要以此为戒。”

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新闻批评，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时，李子奇同志说：“这两天我认真看了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和转载武威报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批评。新闻批评，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好形式。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的批评百分之百的准确，不能一听反面意见就发火指责。各级人民代表举行座谈和协商对话，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应该受到欢迎，这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舆论的批评监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改进和搞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领导，应该支持和鼓励新闻批评，让新闻批评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对杨作林同志，我们一方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一方面也支持他回去搞好武威的工作。”

省人大主任许飞青就这一问题也和记者交换了意见。他说，我们有些工作本身就不符合价值规律，这中间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的，提出来是为我们更好地搞好工作。对一些不同认识的问题，应该用民主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行政、传统的办法解决。

记者还了解到，在昨天召开的省委书记办公会议上，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同志诚恳地接受了报纸和同志们的批评，并作了认真检讨。他握着记者的手，诚恳表示，衷心感谢报纸批评，并谈了自己回武威后的打算：“一、回去后先向地委作检讨；二、写个书面检查，在《武威报》上公开发表，同时报告省委，建议省委将我的检讨转发全省各地、县，使更多的领导干部接受教训，增强民主意识；三、建议地委专门就支持新闻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问题作出决定，使新闻批评正常化，制度化。”

杨作林同志还谈到：昨天的书记办公会上，省上的几位老同志对我的批评推心置腹，语重心长，使我感触很深，受益非浅，对我做好今后的工作大有好处。

在此间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领导们也认为，通过“收报事件”这一生动的教材，使他们也上了一堂民主建设课，对于提高民主意识大有裨益。

武威地委书记感谢本报批评

就本报对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同志压制新闻批评、收《武威报》的错误开展批评一事，记者同杨作林进行了交谈。

记者问：“这次本报对你批评，你有何感想？”

杨作林答：“中国青年报对我的批评是及时的，也是客观的。在中肯的批评报道中，分析指出了发生收报问题的严重性和出现

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使我弄清了是非，受益非浅，这样的批评我完全能够接受，也能理解。”

问：“新闻界对你公开批评后，思想上压力大不大？”

答：“开始不但对我压力比较大，当时社会议论很多，对爱人和孩子也压力不小。后来认真一想，这件事我确实做错了，报纸对我进行批评是有好处的。因为我这个从当县委领导到地委书记，一直没有受到多少挫折，各方面都比较顺利。因而，使我减弱了民主作风，增长了主观武断。所以，发生这起‘收报事件’不是偶然的。通过这次批评使我看清了自己的弱点，这对我今后搞好工作大有好处，当然我应该感到高兴，把压力变为动力。”

问：“你对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答：“这次所发表的批评报道，在见报前都和本人见面，我觉得很好，思想有个准备，这样的批评，的确是个帮助，而不是整人。所以，我受了批评还感到舒服，因为，这不是我和记者之间的事儿，而是一个到底如何对待民主的大问题。因此，我以参与报道批评了我的记者在感情上没有任何疙瘩。”

记者手记

一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共同完成的报道

近几年，新闻界为搞批评报道叫苦不迭，有的批评报道见报后，记者被上告，甚至打官司上了法庭。但是，《中国青年报》关于“武威收报事件”的批评报道发表后，被批评的地委书记和市长三次到宾馆来看望了写批评稿的记者，离别前，还盛情招待了批评他的“对头”。为什么？因为这组批评报道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相互谅解、共同合作的产物。

—

写批评报道要明确性质。发表批评报道本身不是目的。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开展批评是为了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正常的批评是往怀里拉，而不是往崖下推；诚恳的批评是帮助，而不是整人。这就是我当时采写有关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强令收回报纸事件时的思想感情。

《武威报》副总编辑梁林就此整理出一篇座谈纪要，以《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为题，发表在3月16日出版的《武威报》上。写这篇报道时作者不但没任何发挥拔高，而且还删去了一些有“棱角”的言词。这是一篇很正常的报道。武威市市长柳宏克看了《人民代表的心里话》后，大为恼火，当即打电话给地委书记杨作林，说：“我是省上、地委派来的，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不行我可以走嘛！”紧接着又跑到地委说了些不冷静的话。杨作林书记与其他几位地委领导对这篇报道研究以后，以“对领导作风的指责不准确，打击面太大”等理由，用地委的名义作出决定：扣发尚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宣布当天报纸作废。

本报驻甘肃记者黎戈宁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向记者部主任作了汇报。记者部派我去采访（先后参与采写的还有马季元、孙凯、黎戈宁同志）。我当天下午就赶到了武威市，先到《武威报》社搞清了上述的情况，紧接着又找到地委和行署领导。当我找到杨作林同志说明来意后，他承认收报的过程的确如此，但他当时还是认为收报的作法是正确的。我不能回避，必须对他说清楚：“杨书记，这次报社派我来写关于武威收报事件的批评报道，主要为了澄清是非，不是给某个人过不去。你是党的地委书记，我也是个共产党员，同志之间的批评，应该按党的原则来处理。因此，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配合”。一听说要写批评报道，杨作林同志不太高兴。但我还是客观地写出了批评稿，并送给他本人审阅。他看完稿件后，要求不要见报。我说：“‘收报事件’”在甘肃产生的影响很大，如果不及时解决，反而对你今后的工作不利。你应就此在报上向群众作检讨，这对教育广大干部增强民主意识有好处，群众也会理解你的。”他看完稿件后，在事实上未作修改，只是在语气和修辞上修改了几处。此稿在4月1日

《中国青年报》头版上刊登了。4月2日又发表了武威地区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反收报事件的批评，“群众反映，武威的有些干部整天喝酒不醉，打麻将不睡，跳舞不累，干实事不会。你还批评不得。开展批评难，自我批评更难，接受批评难上加难。人民代表在报纸上发表点意见，就去收报纸，那一般人哪还有说话的地方！人民有权力批评我们的错误，报纸有权力反映人民的呼声，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是哪个人的私产，收缴报纸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刊有批评稿的这两张《中国青年报》到武威后，被群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传阅，纷纷指责地市有关领导的错误作法。这对杨作林书记和柳宏克市长压力很大。

晚上12点以后，武威地委书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悄悄从窗户外面一瞧，杨作林书记正坐在办公桌前抽烟发呆。我推开门进去后，他勉强地招呼我：“马记者请坐，这么晚了你找我还有事吗？”“想和你商量下一步的报道。”“还要搞批评报道？”他的声音都变了，生气地站起来：“听说省委李子奇书记看了《中国青年报》后，在兰州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我，看来我这个地委书记当不成了。这几天，老婆孩子在群众中听到很多议论，也压力很大。”说着他流出了眼泪。

“收报事件，发生在甘肃，作为省委书记，表个态是应该的。但你不要想得太严重。我们中国青年报是会从积极的方面去努力，把这件事情作好的。批评你收报的错误，不是否定你的整个工作成绩。我们还可以找省委领导作汇报，谈谈我们的要求。但你本人必须在报上承认错误，作检讨，争取主动，不然这件事无法收场。”听完我的这些话，他冷静了，同意我再写一篇批评报道，并要求在报道中把他的工作成绩、好的方面也写上几句。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二

批评报道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迁就让步，要实事求是。但不能挖苦人，也不应火上浇油。要从积极的方面去努力。杨作林同志大学毕业后，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多年，担任过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据反映，他作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思想比较开明，工作也很扎实，有成绩。不能因为工作有成绩，就不批评其错误；也不能因为有了错误就否定一切。本着这样的想法，在4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又发表了第3篇批评报道。其中既写了群众对收报错误的批评，又写了群众对杨作林的评价。如：武威市群众说，《武威报》发表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也是我们想说的心理话，批评到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上，这样的批评是人民需要的。出现“收报事件”，这说明我们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意识，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必须消除。武威行署副专员裴永俊、《武威报》副总编辑梁林同志说，“地委书记杨作林同志平时民主作风还比较好，也善于团结人，工作也扎实，总的来说是个好同志。但这次收报事件中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事实上压制了不同意见。对这种作法新闻界开展批评是很正常的。”第二天晚上，杨作林同志拿着这张《中国青年报》到宾馆来看我，一进门，就高兴地说：“小马同志，今天来的《中国青年报》我看了，这样的批评我完全能接受，你批评了我的错误，也肯定了我的人格和工作，我向你表示感谢，向《中国青年报》表示感谢。”紧接着他诚恳地作了检讨。4月5日《中国青年报》又以《武威地委书记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为标题发表了他的检讨。武威地区的群众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这样就对了。”

三

写批评报道要争取有利于推动工作，要注意调节好前后左右和上下级关系。“收报事件”的出现，使武威地、市某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本来行署专员魏万进和副专员刘生荣同志召集人民代表座谈，要求代表们给地、市的工作提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地委书记杨作林、市长柳宏克等同志误认为这是冲着他们来的，因此，作出决定，下令收了报。这样一来，魏万进和刘生荣两位专员当然感到不快。写《人民代表心里话》的《武威报》副总编辑梁林同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作好了等待撤职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记者如何周全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出现“收报事件”的错误，责任在杨作林和柳宏克，我在报道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作法。而对魏万进和刘生荣则作了充分肯定，也肯定了梁林。与此同时，我也尽力为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作了不少工作。我将地委书记、专员、市委书记、市长请到一起座谈，当着大家的面说了我的看法：出现“收报事件”，作为一把手的杨作林同志应负主要责任，不要怪任何人，也不要为难梁林（在场的梁林听了很高兴）。如果以后出现打击报复的事，新闻还会派人来武威。但我们不希望这样。只希望每个领导之间都多从维护党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少为个人考虑，多从工作出发，就没有过不去的事。他们听后能够接受，并赞扬我说：“小马同志你很真诚。以后咱们是好朋友了。”

省委书记李子奇，省人大主任许飞青等同志看到中青报上的批评报道上，把杨作林叫到兰州，在省委书记办公会上，对他作了严肃的批评。紧接着省电台、《甘肃日报》也发了批评报道，《人民日报》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当时，对杨作

林的压力不小，那几天他思想负担很沉重，明显地瘦多了。

为了圆满地搞好这次批评报道，我专程赶到兰州同驻甘肃记者黎戈宁同志一起，找到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秘书长、省人大主任，征求他们对这次批评报道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接受采访时，李子奇同志说：“这两天我认真看了《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和转载《武威报》的《人民代表的心里话》，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批评。新闻批评，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好形式。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的批评百分之百的准确，不能一听反面意见就发火指责。我代表省委感谢《中国青年报》作出的努力。这对促进我省的民主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在采访中，我们也向李子奇书记建议：“杨作林同志已作了检讨，认识了错误。据了解，他平时工作很努力。因此，我们认为这件事批评完了就完了，主要是为了增强大家的民主意识，而不是处分一两个人。所以，我们建议省委不要给杨作林同志任何处分，继续支持他搞好武威的工作。”李子奇听后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和你们的完全一样，对杨作林同志，我们一方面要严肃批评他的错误，将他的检查向全省地、市、县转发，以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要支持他搞好武威的工作，不会给任何处分。”采访结合后，还在兰州饭店等消息的杨作林就急忙问我：“情况怎么样？”“你自己听听就知道了。”我把采访李子奇时对话的录音机打开了。他听了以后，高兴地将磁带复录了一盘。还向我表示了感谢。他说：“你这样的批评我完全理解。”

完成报道任务，我离开武威时，特意到地委、行署、市委、市政府找主要领导和被批评者一一告别，地委的朱书记，行署副专员刘尔能、刘生荣，地委宣传部长，武威报社几位总编等同志一起，还特意设便宴为我送行。这不仅仅是一顿饭的问题，这表明了武威地市领导最后还是能够正确对待批评，是有修养的领

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组批评报道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相互谅解、共同完成的报道。这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 1988 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一等奖。

时间：1988年3月31日

作者：马役军

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追踪采访

马役军：我为什么要追踪王兆国

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追踪采访

1988年3月30日，七届人大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由上海、福建代表团回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9点30分，当两个代表团的成员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人们发现福建省省长王兆国没有出席，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普遍关注和猜测。

记者招待会后，记者驱车来到福建代表团驻地，就此问题询问了福建代表团的负责同志。

他说：“王兆国同志原打算出席此次记者招待会的，但由于省里有些重要事务急需他回去处理，所以赶回了福州。”

记者问：“据《福州晚报》报道，福州出现了抢购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现象，王兆国省长回福州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不排除这种因素。”他说：“当然还有其它的工作。比如，他回去要安排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

记者问：“据传说，王兆国在这次福建省人代会选举中差点落选，这消息不知是否准确？他是否怕回答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有意回避此次记者招待会？”

他说：“这个传说不确实。福建省人代会选举时，王兆国只差一票满票当选。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他得票离全票数只差二三票。王兆国同志曾表示过，他很愿意出席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回答中外记者所提出的问题。”

“那么您是否能证实另一个传说，王兆国此次不参加记者招待会，是有人不让他出席？”记者问。

他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有关负责同志原来是建议兆国同志出来回答记者问题的。此次确是紧急事务，临时性变动。”

“那么王兆国是否还回来开人代会？”记者问。

“要回来的，等他处理完事务，立刻赶回来参加大会选举。”这位负责人说：“等他回来，我想他会欢迎各位记者来采访的。”

记者手记

我为什么要追踪王兆国

一次成功的新闻实践，对于记者认识新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往往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1988年3月30日上午9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邀请上海、福建代表团负责人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当他向中外记者介绍参加招待会的两个代表团成员时，人们发现上海代表团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员由代市长朱镕基领衔，而福建代表团却是一个副省长出席，省长王兆国没有与会。

王兆国是中国政界令人瞩目的人物。他由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跃升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很快又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中日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胡耀邦总书记辞职后，引起中外政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各种猜测说法纷至沓来，很难让人辨别哪些传说是真实的，那些传说是虚假的？

这些背景，足够成为我们弄清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基

本理由。我的判断是，作为福建省政府的首席官员，未出席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招待会，其中定有原因。

想到这儿我很兴奋。记得一个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外国记者说过这样的话：记者如果面对重大新闻不兴奋，只能说明两点，一这不是好新闻，二你不是好记者。

如果在过去，面对向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这样的新闻，我们不过想想罢了。我们的新闻对政治内幕性的东西往往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新闻对中国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的报告，一般都往往停留在表面的报道上。追踪中国高层领导的内幕新闻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许多时候只是奢望。然而，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政治上的民主和透明度，为记者改变惯例，打破习惯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外在环境，使过去谨小慎微的记者，胆子变得大起来。

追踪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原因，并非想在某一重大新闻主题上有什么突破，只是想通过这样一次未知的新闻采访，增加一些实践经验，使我个人的新闻写作能够在真实性问题上前行一步。

我担心别人会和我想法一样，抢这条独家新闻。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首都各家新闻媒体好新闻频出，逼得过去对这种大型会议报道应付自如的记者，每天紧张得神经兮兮。打开报纸最怕的就是发现自己漏掉了好新闻。

我驱车赶到福建代表团驻地，才松了口气，不知是因为中午要吃饭，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反正在中午 12.20 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几乎是空旷的大厅打电话要求采访。

接通福建省代表团负责人，省人大的主任，他坚决拒绝采访，在电话中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得以坐到他面前。他给我的采访时间为 15 分钟。

首先他回答了我对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疑问，他说：“王兆国同志原打算出席这次记者招待会，但由于省里有些重要的事情急需他回去处理，所以赶回了福州。”

作为重大的采访，按惯例应该作采访前的准备，但这种突发性的一些重大事情展开提问：

“据《福州晚报》报道，福州近日出现抢购粮食等农副产品的风潮，王兆国省长回福州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不排除这种因素。”他回答说。“还有其它的工作。比如，他回去要安排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

我接着问他，传说王兆国在这次福建省人代会的选举中差点落选，这消息不知是否准确？他是否怕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而有意回避此次记者招待会？

他说：“这个传说不确实。福建省人代会选举时，王兆国差一票满票当选。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得票离全票只差二、三票。王兆国同志曾表示，他很愿意出席这次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所提出的问题。”

“那么您是否能证实另一个传说，王兆国此次不参加记者招待会，是有人不让他出席？”我追问。

他回答：“没有这回事。有关负责同志原来是建议王兆国同志出来回答记者问题的。此次确是紧急事务，临时性变动。”

时间要到了。我抓紧再问道：“那么王兆国是否还回来开人会？”

“要回来的，等他处理完事务，立刻赶回来参加大会选举。”他回答说：“等他回来，我想他会欢迎各位记者采访的。”

前面说了，我不奢望这个追踪报道能够挖出什么爆炸性新闻，我是想让我笔下的新闻增强些透明度，告诉记者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东西，然而这也不易。当晚上我把写好的消息传给那位负

责人的秘书时，秘书传达了领导的意见，此稿不发，怕对领导产生不良影响。

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些说法的时候，新闻媒体能够公开公正地报道事实的真相，这非但不会帮倒忙，反会澄清事实，消除社会上的某些误传和偏见。许多事情，你越是遮蔽，越是让人“雾里看花”，越可能误导人的认识。所以，新闻的公开性在更多的时候是能够帮助政府解决问题的。我向秘书阐明了观点，并说：“如果事实上无出入，我愿文责自负。”

夜班值班总编辑接到稿子，看后即交一版编辑处理。第二天，《王兆国未出席记者招待会的追踪采访》在一版见报，成为中国青年报上引人瞩目的独家新闻。

当天，日本共同社以“在中国人代会报道中充满活力的中国报纸”为题，评论了这条消息：“围绕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的报道，中国的新闻充满了活力。31日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模仿西方记者，对福建省省长王兆国（原中日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为什么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进行了追踪报道，在版面上刊登了中国报纸历来从没有过的内容……”

对这些褒贬有加的评论，实在不敢恭维。还真没想去模仿谁。你想模仿也模仿不了。只是想让自己的记者之路有些特点。

时间：1988年3月27日至10月13日

作者：李伟中 赵奇

谁来监督“监督者”——新乡一老教师被刑警吊打致死

李伟中 赵奇：呼唤正义

谁来监督“监督者”

——新乡一老教师被刑警吊打致死

神圣意志下的悲剧

他死在黎明前的黑夜

一根硬木铁锹把，挑起反捆在背的青肿的双手。他吊在空中，象古庙上的龙头飞檐叼着一只晃悠悠个性的风铃。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健硕汉子就这样惨死在1987年12月18日黎明前的黑夜。

7天后，河南省新乡市八一大街上搭起了一座灵棚，上面挂有一副比殓尸布还长的对联：

“刑警无端打死老教师何处申冤 群众有权要求政府依法惩办凶手”

这阳光下的寒栗，迫使新乡市第 19 中学，向全市学校发出关于“我校校办工厂厂长栗荣成被市刑警队活活打死一事”的请援信。

哀乐低低回旋，栗荣成的妻子、4 个女儿和他 70 多岁的白发老母，从揉碎的心中爆发出天恻地悲的号哭。

灵棚两侧，逶迤百米摆满了戴眼镜的教师、背书包的娃娃、不知名的父老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其中一幅写着：“远看山上有石，近闻法上有权，哭之冤也！”

《夜半歌声》那张恐怖的脸

1987 年 10 月 30 日晚，新乡 19 中学校办商店承包人张宝耕“嘎吱嘎吱”蹬着自行车回家。冰凉迷蒙的幽光照着陋巷。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沙沙声，张宝耕仿佛感到有双恶鬼勾魂的铁爪正向他的喉咙扼过来，“哗！”一股浓稠刺鼻的液体直扑面门；“咣”一个装满液体的酒瓶在他脑颅上爆碎！

这液体是浓硫酸，顷刻间啃皮咬肉“滋滋”而下，张宝耕头皮给腐蚀得露出了惨白的头骨。

从此他变成电影《夜半歌声》里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他嘴歪鼻斜，皮肉溃烂，一只眼睛烂成了黑洞……

凶手公然向法律挑衅，公安干警个个义愤填膺；张宝耕商店所在地，同时也是栗荣成校办厂所在地的 19 中家属院成了重大嫌疑地点，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会被传唤到派出所或刑警队。青工郭留成在传讯中被认为“不老实”，挨了耳光拳头还要下跪，不跪就抓住头发往下按，再一脚踢翻……这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不再使张宝耕这样的人变成鬼——行刑者这样做

总有他的理由。

强权溅起了黑暗

新乡 19 中给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栗荣成被打死的情况报告”对死者作了这样的鉴定：

“该同志身体魁梧健壮，性格开朗，为人忠厚、诚实，正直大方，对党忠诚老实，历史清白，参加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来，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

神圣目的下运转的国家机器，将栗荣成作为嫌疑犯卷进了审讯室。1987 年 10 月 17 日早晨，他被警车带走，这一去竟成诀别。

此前，在对栗荣成妻子的一次传讯中，有关负责人已发出警告：“要说刑警队不打人，那是假话。”

深度近视的栗荣成生就一副刚强的秉性，“文革”中久经锤炼。那时红卫兵打他、踹他，还要“砸烂他的狗头”，这属虎的“老家伙”仍“死不认罪”。

这回，“人民民主专政”的执行者们，先是捆起来打他皮肉厚实的部位，后又“再给他加加温”，行刑者发明出用椅子构成的“吊架”，使之双脚脱离大地悬空而起。再不“从实招来”？古式“杀威棒”加新式警棍便在他多骨的部位弹击出脆响，同时配以收录机中现代派歌星嘶哑的嚎唱和迪斯科跳跃的音符，合成了一组古老而又新奇、残忍而又幽默的“乐章”。

17 日午夜过后，刑警队员们吃饱喝足，继续在像供拳击手操练的沙袋一般吊着的人体上进行“创作”。栗荣成临终的最后那声呼喊，让棍棒声和流行曲夺走了。直到 18 日凌晨 5 时左右，真心为民除害的“好汉”们，才从凝固了一个悲伤的梦的失神双眸里、从绝命时小便失禁浸湿的裤子上，觉出栗荣成已不知哪一

刻永诀了十亿人间。

他死后那天，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后，市公安局纪检科负责人等找到栗荣成所在学校的书记，只字不提栗荣成已惨死刑警队，却再三打听栗过去有病没病。

同一日上午，一辆警车开来，将栗胡凤荣妻带到车上，问“栗荣成过去有什么病”，“血压高不高”，“吃的什么药”。

又过了一天，栗荣成的校领导和家属才知道栗荣成已死。老师们泣不成声。这时用刑和死亡现场早已被破坏，尸体被送往天空飞着乌鸦的火葬场。

“人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还来了解他的健康情况？”19中校长和书记赶到刑警队质问，紧接着速赴火葬场，阻止那具迷彩服似的带有紫色、红色淤斑和索沟的尸首化为灰烬，给世人留下一个死神的黑斗篷包裹的故事。

黑暗中淌动着几千年的浊流

对栗荣成行凶的7名“好汉”为何那样“无恐”，部分是“有恃”于地位与血缘陈陈相因的“中国特色”，他们多数是省市政法系统干部子弟，老百姓私下称他们“太子队”、“八旗子弟队”。

检查官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令他们尴尬的现实：无力抗拒凌架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这种权力曾不止一次地给过他们难忘的“教训”。新乡郊区宏达公司经理刘春安玩忽职守，使国家蒙受84万元之巨的经济损失。案发后，刘经理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按法律规定，法院最长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必须对公诉进行审理，可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得到刘经理好处的若干人，卓有成效地阻止了审判，法律成了权力恣意玩弄的婢女。

有什么办法？刑警队人员甚至出借手铐给“来帮忙”的人，将与那人的“小哥们儿”有矛盾的中学生非法铐到刑警队，又是打骂又是罚劳役，违法者却不受法律制裁。

但此次逼供栗荣成致死案情巨大，民愤更大。新乡在沸腾。共和国的检察官们下定决心打这场硬官司，拘留了行刑的7名干警，把他们关在看守所里严加看守，就这样还有“内线”为他们送信递条子，订立一次又一次“攻守同盟”。他们中有的干部子弟扬言：“你们最多关我们10天。”

共和国正直的检察官们叹只叹取证难、处理难、处理后巩固更难（不是提前释放，就是保外就医）。黑暗中流淌了几千年的臭阴沟水，过去在、现在仍然在玷污着正义与法律！

“真诚”的殉葬品

新乡市最繁华的大街上，元月19日，披麻戴孝跪着栗荣成的4个女孩，寒风里，像4朵萎缩的小白花。她们捧着爸爸的遗像，擎着一张白纸，上书：我父亲栗荣成被打死了，单位不发工资，母亲的工厂开不了支，姐妹4人没有工作。求官不行，只好来求民。

父亲死后生活维艰，她们如同4只受伤的“小动物”齐齐跪在学校党支部书记脚下，请求借点钱。书记派一老师带她们找到公安局。那里的首长则要她们先把父亲的灵棚撤了，“不撤不管饭”。

古来中国行法权，“存天理”为的是“灭人欲”。“凌刑严法”目的在“镇止民心”，这“目中无人”的文化万古传今，无形中成为支配一些人行为的心理沉淀，他们越以为“真诚”地维护国家利益，越是“真诚”地践踏了人权，蹂躏了小百姓的人格和尊严。他们把权与法当成了吓鸟用的稻草人，而不是用来扩展每个

具体的人享受生活与自由的天赋权利。

检察官宣布拘留7名违法刑警那天，新乡市刑警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坐牢者和送行者一个个挥泪而别。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在胸旗在手”，真诚地为捍卫国家利益工作，有的人孩子生病也边掉泪边说不能回去，有的一次次推迟了婚期……“要在别的单位，早该是新长征突击手了。”他们实在难以接受霎那间由警官变囚徒的命运“大翻个儿”。

一天，被捕的一位副中队长4岁的女儿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告诉母亲：“妈妈你骗我，爸爸没出差，阿姨说，爸爸是坏蛋，爸爸打死老师。”妈妈抱着孩子悲伤啜泣，牢里“英雄”般的父亲也在饮恨吞声，被害者的血液里融进了害人者的泪水——蔑视人权的“真诚”织成了黑纱，盖在死者身上，也盖在生者心上。

让太阳平等地照耀一切

灵棚前，可怜巴巴的小人物在哭……但强权再也不能在人民嘴上装扇门。老百姓都拭目以待法律的公正。

本应护民的权与法岂能变成虐民之具？省人大委员们在《河南日报》上呼吁：“新乡市公安局几个人打死教师一案至今没有得到严肃处理，这些人本身既是执法人，有的又是干部子弟，不依法严处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张扬法纪。”

国家机器需要强有力的运转，但不能以无辜者的眼泪作润滑剂。记者招待会上，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广经希望舆论支持维护法律：“不然公安干警的形象不会好，也不会得到人民信任。”

改革阵痛中的中国——正等待上升的黎明。

人民期待着……

国徽下，铁门前，骄阳和暴雨驱不散人群……

这是中国法制史上鲜见的审判——1988年5月13日至20日，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6名案犯，捆绑吊打致死老教师栗荣成案开庭审理，仅法庭调查和辩论就用了7天半。

·原告代理人泣血控诉

·主犯崔元斌泰然微笑

5月20日，一个声音——青年律师王玉璞的声音，震撼了听众中所有善良人们的心：

“各被告人在从17号上午11点到18号凌晨5点达18个小时之久的时间里，使用了铁锹把、木板、木棍、金属棍、警棍、警绳、手铐、皮带、砖头、破衬衣、破布、椅子、钢丝床等作案工具，对被害人捆绑、悬吊、棒打、电击。”

他们把被害人撕人心肺的呼喊和他们为掩盖罪和所放的音乐称之为交响乐。”

“他们把电击受害人的嘴发出的“的的”声，说成‘这跟机关枪一样’。”

“在受害人忍受着非人折磨的情况下，他们却在下棋、喝酒。”

“这哪里还有一星半点审讯的味道？这不是纯粹打人取乐又是什么?!”

此刻，旁听席上，屈死者栗荣成2个失学的女儿强忍哭声，在饮泣。

被告席上，主犯崔元斌在微笑。

也许，崔犯是为打死人后3天才被拘留，得以破坏犯罪现场而得意？

也许，他正回想着被捕后不久即在其妻工作的医院里，享用洋烟、美食和亲友的体贴，是何等的逍遥？

也许，他正回忆着和另一主犯王伟英安排众行刑者订立的攻守同盟，或是开庭前几天他和王伟英才从医院回到看守所的“自由”？

法庭上，公诉人未加说明，忽然宣布，除崔元斌、王伟英、刘晋军外，另3名被告张健民、杜定旭、刘高元“认罪态度不好”。

“公诉机关认为认罪态度不好的根据是什么呢？”被告张健民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姜副教授反问，“为什么认定这3个人认罪态度不好，恰恰是在法庭上这3个人指出了侦察机关用酒灌人诱供等不正常现象之后呢？”

“只要不判死刑，这一壮汉就能以保外就医为由‘自由’下去。”某法律专家这样评论。

·本案犯崔元斌：未发现栗荣成有疼痛现象

·局外人宋刚：痛陈亲身体验的崔犯的仁慈

“从栗荣成的尸体表面看，就有头部、面部、肩肘部、手部、胸腹部、背部、臀部、大腿部、膝关节部、脚踝部等大面积表皮剥脱和软组织严重损伤。还有胸膜外、肾等部位内出血。其状惨不忍睹。”王玉璞愤怒的声音回荡在审判大厅。

崔元斌对此在法庭上说：“我们未发现栗荣成有难受疼痛的现象。”

此言激怒了深刻体验过崔元斌施予类似“仁慈”的小伙子宋

刚。

“我原在新乡市交际处干抄写画及日杂工作，是办公室治保小组成员。”宋刚对记者说，去年6月25日凌晨2点左右，在交际处（宾馆）一号楼一层楼梯口，我隐约看到院内匆匆走来一男一女。天这么晚了，带个女孩来干什么？我就跟随到大厅西头113房间，悄悄把门推开。

我看到南面床上躺着一个男青年，对那女子说：“哟，玩妞来了。”听他这话，我转头一看，北面床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后来知道就是崔元斌。女的是我老邻居的亲戚。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有住宿证没有？”我问。他们都不吭声。见拿不出住宿证，我说：“走！走！”撵他们出去。“妈的，你找死哩。”他们恶骂，门口闪出一个人挡住出路，照我腹部就是一拳。我痛得抱腹后退时，崔元斌冲上来，扭起我的右胳膊，左手用劲把我肩膀往地下按。

此后，他们又把我架起，连拖带拉弄到楼角黑暗处，朝我小腹就是一脚，将我仰面踹翻在地。崔元斌上前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扳成坐地状，拳脚齐下，砸我的肋部、脖子、肚子和头……我眼冒金星，恶心难受，倒翻在地。不知是谁，又在我下身要害处猛踢一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者得知，5月4日，继续告状的宋刚被交际处除名了。

- 栗荣成冠心病发作死亡，冠心病猝死率男多于女
- 栗荣成因暴力作用疼痛性休克促使心力衰竭死亡

一个声音把我们带回了法庭。

“心脏病发作是栗荣成死亡的真实原因，死亡是心脏病发作的直接结果。”崔元斌的辩护律师慷慨陈辞。

被告律师席对面坐着2位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专家。

“你们关于栗荣成死亡的法医病理学复核鉴定，只解决科学问题，不解决法律问题。”被告的律师指责2位鉴定法医，进而要求法庭宣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技术鉴定书》。

该《鉴定书》在对栗荣成的“死因分析”一栏中，只字未提死者左侧颞顶部头皮下出血区，未提死者屁股上深达数厘米被打得烂成米粒状的肌内及身上令人看了头皮发麻的累累伤情，大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急死发病率男性多于女性”之类科普知识，最后得出结论：“冠心病发作而死亡。”

新乡一些检察官对此大惑不解。尸体解剖发现50岁的栗荣成有冠心病症状，但他1985年患感冒看过一次病外，3年来没病过，连医疗证都一直放在学校里没领。栗荣成所在的19中家属院28位教师和住户代表书面证明：身高体壮的栗荣成“几年来没请过病假，当了校办工厂厂长甚至连节假日也不休息。我们见他在家属院常干重体力活，扛起百把斤重的预制板面不改色。死前的两天，还去郑州出差。”

死者身上的标本等送往中国最权威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这里的鉴定表明，栗荣成具备正常生活的“代谢功能”，死因结论是：

“因受捆绑悬吊及钝器打击等暴力作用，造成广泛软组织损伤及精神过度紧张，疼痛性休克，促使心力衰竭死亡。”

对科学负责，对法律负责，司法部司法鉴定技术研究所的法医刘也和主任法医张国锋来到法庭接受审判长和律师询问。

法院也给河南省检察院的尸体鉴定人送去了开庭通知书，但他们没有到庭。

·崔元斌的律师：念其初犯，请从轻处理

·崔元斌的前朋友刘若愚：哪一次算是初犯

旁听席上，许多听众在擦拭泪水。王玉璞律师发出滚雷般的声音：

“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变态心理的驱使，是草菅人命的表现，是剥夺受害人生命权利的罪行，社会后果极端严重。应当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严惩犯罪分子的决定，对罪行特别严重的主犯从重处罚。”

崔元斌脸上的皮肉绷紧了。

他家请来的律师举手反对，说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崔元斌，“没有犯过其他罪行”，要求法庭“从轻处理。”

受害人律师反驳：“被告人在特定案件中的主犯，是否存在初犯从轻问题，本不言而喻。结合本案，我说一句话：难道要等被告人打死第二个人才能从重吗？”

法庭之外，站立着崔元斌的一位前朋友——从“劳改队”放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刘若愚。闻知“初犯”之说，他怒不可遏。

1983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临近报考的日子，崔元斌及刘康民、刘向民找到市电大青年教师刘若愚，要他去盗窃电大的考卷。

“这事有我们兜着你怕啥？”崔元斌说。他和刘康民当时在市刑警队技术科公干。

刘若愚忙提前婚期，出外旅游。

“你躲？真不够意思。”刘向民又威胁，“你不想弄也行，不过你得腾出位儿叫别人干。你们这一批大学生都下到中学教书，你却跑到电大，走谁的后门我都知道。他能让你进来，我能让你滚。”

这句话刘若愚不敢不信，眼前的几位是市里领导的儿子。“慑于威势，我不敢得罪衙内。”刘若愚交待，“崔元斌给我提供了技术工具——配打开保险柜钥匙的红色塑泥；刘康民向我提供了打开封条的技术手段——水浸法。”

此后逢学期考试，“衙内”又找刘若愚偷试卷。“我看到自己越陷越深，为了自拔，便在最后一次拿卷时，将一袋卷有意丢在外边公办桌上。”刘若愚痛苦地回忆，“当时我想，查不着便罢，查着我也不过是个处分。但不管怎样，我都可以以此为借口拒绝给任何人拿到卷儿啦。”

事情暴露后的一天。夜，刘向民把刘若愚叫到他爹的办公室，“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指点，“你只要不说出我，我就好好替你说话，保你没事儿。你要是把我露出来，我不承认，那就是诬陷罪，非坐牢不可！”

几天后，市刑警队突然把刘若愚关押起来。办这件案的，是今天打死栗荣成老师的刑警二中队；当时的二中队队长，就是现在法庭上的主犯王伟英。

3天3夜的审讯把刘若愚的精神摧垮了。他是被秘密弄到刑警队的。正坐月子的妻子还不知道他怎么失踪了呢。他要回家，他张口了。可他本人是郑州大学中文系82届毕业生，自己不需电大考卷。为谁犯罪？他说出了那几位“衙内”，并提到是他们提供的作案手段。

“胡扯！”审讯他的王伟英压住刘若愚的话头，“橡皮泥是你自己去刑警队技术科拿了。”

3天后，此案送新乡市郊区检察院。刘若愚又试探地提到一位“衙内”“也知道”。郊区检察院正要传讯，主管政法的区委副书记张传玺突然被免职。

在当时的法庭上，刘若愚的辩护律师宣读的辩护辞，居然经

有关领导审查。“判处刘若愚有期徒刑两年，立即执行！”真正的主犯逍遥法外，安稳潇洒读完各自的学业。

苦坐牢中的刘若愚发现，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有关领导劝其妻和他离婚未逞，带人砸开刘若愚家的门窗，抄走他4000余元的家产，小两口的炊具、图书、家俱、被褥等被扔在厕所里。

他被抓进新乡市的劳改队中，受到特殊关照，被单独监禁在第一次启用作禁闭室的原厕所中，这是不透光的小楼梯间，地上蠕动着毒虫，善于啃肉的老鼠窜来窜去。

当时是三伏天，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的刘若愚，撕扯着自己的皮肉，扑在严实的门上狂喊乱敲，“放我出去！”

没人理睬。他昏倒在地。

他不想这样肮脏地死在牢里，于是不敢再提那些“衙内”。2年后他熬出了监狱，至今找不到正式工作。与此同时，崔元斌和刘康民升任刑警队长和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今天，刘若愚看到崔元斌又要插上“初犯从轻”的双翼，看到他为崔元斌等坐牢的悲剧，竟成了隐瞒真情的王伟英当年的功绩和如今要求从轻发落的资本，也忍无可忍了。

·庄严的力量下有人开始愧罪

·庄严正是为不庄严而存在的

审判长令被告人进行最后陈述。从犯杜定旭悲伤痛陈：

“我刚从警校毕业踏入社会，本应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尽保护社会的义务。”

杜定旭有了愧罪之意。这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庄严法律的力量。

它也提醒我们，庄严的法律正是为不庄严而存在的。

栗荣成遗下的妻子、女儿、老母亲正等待法庭公正判决之

际，一个又一个有身份的说客上门了。

“不要再告了，现在你家人已经死了，即使把他们枪毙了，你们能得个啥？”

“我们要得个公正。”栗荣成的妻子胡凤荣答。

“你家4个女孩告状，别把名声坏了。如果判了重刑，人家出来了，你家4个姐别想好受。还是谈谈民事赔偿条件吧，谈好了人家想请你们签个字。”

“签什么字？”

“同意法院判决。”

“法庭现在还没判下来，为什么要求我们签字？”

……

法律和权力在斗争。人民期待着……

谁来监督“监督者”

14种以上的刑具，18个小时施暴，河南省新乡市19中老教师栗荣成，于1987年12月18日黎明前，惨死在该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崔元斌等人的手下。

本报在3月27日、6月17日以《神圣意志下的悲剧》、《人民期待着》为题，向世人披露了惨案的内幕，中央和地方13家新闻单位为维护法制大声疾呼。

1988年7月17日，人民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崔元斌等6名被告一审宣判。

苍白的不会是法律

被告王伟英的律师收到2封电报，请他到庭。他来到审判厅门口，却拒绝入内。

“我抗议！”这位郑州的知名律师王天平怒容满面，他刚得知审判结果：被告崔元斌在起诉书上还是主犯，如今判决书上的主犯只剩下王伟英一人。

王律师想不通：6名被告中“参加刑讯时间最短、实施行为远不及崔元斌恶劣”的王伟英，为什么定为唯一的主犯？如果按职务定罪，没有制止刑讯的更高一层的领导，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行政处分也没有？人死在崔元斌手上，王伟英无期徒刑，为什么崔反倒只判15年？

“审判罪犯不以事实定罪，还有什么公正可言？”王律师愤怒责问。

参加过庭审调查的旁听者，难忘公开出来的证据：

“今天谁都不要穿棉衣。”刑警大队二中队副队长崔元斌在那个夜里对属下说，“谁要是冷了，出出汗。”

他提议并拉开钢丝床。栗老师的衣裤被扒光了，裸体绑、铐在钢丝床上。崔元斌拿一根木杠，穿到栗老师腰下。

“电他的老二（生殖器），让他20年不管用！”崔元斌说。

3根电棍边充电边电击，崔副队长意犹未尽，“不要停！”他嘱咐手下，说完登上吉普车出了大门。时间不长，他从新华公安分局拎回来2根大电警棍。严重损伤大脑、心脏的电击继续着。

王伟英推门而入。“你们怎么把分局的法都用上了？”他制止现代警棍应用于裸体这一崔元斌的“法”，但没有制止刑讯。

警绳缠紧栗老师反剪在背的四肢，一条黑褐色皮带勒套在额上，把栗荣成的脑袋拉向后背，血肉之躯弯成弓形，肚皮朝下悬吊在空中。崔元斌等3名刑警，坐在这异状的人体前，下棋、吃肉、喝小茅香酒、欣赏收录机播放的轻音乐。然后……斩断了栗老师最后一线生命的目光。

“崔元斌参与了两个重要犯罪阶段。”今年5月29日法庭辩

论，王伟英的辩护律师当庭指出，“一个是电击，一个是栗荣成死亡阶段的后夜班，且起了主要作用，应当是本案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如果有不同意见（他打住话头扫视法庭），请公诉人、代理人和其他被告人提出来，我将当庭与其答辩！”

论战没有爆发。相反，王律师的论点论据，得到受害人家属代理人及被告张健民，刘高原律师的赞同。

“人是死在18日凌晨。”被告刘高原的律师说，“法庭调查其他时间的刑讯用了5天，可是调查后半夜崔元斌当班的时间却只用半天。为什么不去深究？”

这位年轻律师当庭揭发市检察院办案人员，用酒灌被告张建民，指供诱供。

“打人的情节，在几天的调查中并没有搞清。”刘高原的律师指出。

没有人当庭反驳他们。然而判决……

为官之道？

——致死栗荣成案事发后，崔元斌的父亲来到郑州，握过新乡重权的手敲响了同案被告王伟英的父母的家门（王父离休前曾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孩子们都是为了工作出的事嘛。”崔老处变不惊，他劝王父找关系说情，又说，“我在新乡也比较熟悉”，“要重判我也不答应，也就是三五年。”

——崔老有个女婿叫王亚东，原在铁路上，“高攀”之后当了民警，如今升任新乡市新华公安分局局长兼政委。今年6月20日，这位女婿到市法院大骂法院院长李栓金，并说，《中国青年报》和《法制日报》发表揭露这案子的报道时；你在北京，为什么不制止，你还想不想当院长！市委副书记亲临劝慰才离去。

——老兄“攀龙”，弟弟王亚伟也成了民警。去年打击卖淫团伙，刑警队查获该民警携手枪嫖宿卖淫妇女，证据确凿，具文呈报市公安局政治处，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案犯崔元斌系崔家的幺儿子，外人称“衙内”。晋升文凭不可少。为了文凭，“衙内”利用他在公安局技术科的职务之便，提供配保险柜钥匙的塑泥，指使市电大教师刘若愚窃得考卷。案发后，刘被判刑两年，因在被审讯中露出“衙内”些许实情，差点屈死狱中。崔元斌上电大不久，又向往市党校，自然如愿以偿。党校毕业，他升任郊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检察院收到署名和不署名告崔元斌强奸妇女的信，”知情人向新闻界透露，“告状信有5封以上，情节还很具体。”

“请问检察长，有没有这些告状信？”记者面对市检察院检察长陈书翰。

“我不知道。”陈检察长答。

“是检察院没收到告状信，还是你个人不知道？”记者又问。

“我不知道。”陈检察长说。他解释道：“强奸这种事，两个人干的，时间长了，没旁证不好查。再说，强奸案该公安局管……”

违法必究，这是法的基本原则，可是，除被告崔元斌强奸妇女之事以外，6月17日《中国青年报》揭露的崔元斌提供作案手段强迫刘若愚盗窃电大考卷，崔元斌、朱坤、刑福喜殴打交际处工作人员宋刚，新乡有关执法部门均收到控告材料，但均压住不查，不立案，也不转。

——刑讯致死栗荣成案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

有同志提出，检察院竟没有向法院提供死者身上受打击最严重处的深度照片（栗老师臀部深入皮下4厘米处成了血肉模糊的烂肉）。

审判时，有被告及律师揭露，检察院没有把被告张建民、刘高原今年3—4月供述实话的问询材料入卷。这势必影响高级法院的判断和量刑。

相反，法院判决书第4页第3—4行，却认定崔元斌个人供述。此情节且不说当时在场的其他被告加以否定，省公安厅的马会、王长安也在现场，他们的证言就足以判断崔元斌的供述是谎言。然而，判决书不仅对这一供述予以认定，并作为依据，减轻崔元斌的罪责，加重别的被告的刑罚。

目睹各种怪现象，记者大惑不解。一个伟人作出了回答：“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权力何以成了罪恶的温床？

新乡的公安干警提出过“从严治警”等改革方案，也曾交给新闻界宣传。可到头来，“提案者”却有“被人耍了一回”的感慨。

“我们是戴着锁链的猫。”一位人民警察主动要求记者录下他的话：“我们不怕罪犯，怕的是领导不公正。如今的犯罪分子，绝少用‘我宰了你！把你老婆孩子扔井里！’威吓我们。最最常用的威胁是：我姑父、我叔叔或我大爷是某长、某书记。咱办案不得不先摸准那些家伙后面有什么官撑着他们的胸脯子。”

“老鼠大了，要把我们这些小猫吃掉。”新乡市一干警讲了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

新兴贸易公司遭诈骗20余万元，经追查该公司业务员阎金山、赵中俊系重大嫌疑人。一天下午4点，公安局一办公室内，阎金山傲然斜视传讯他的侦察员：

“这事你不要管。”他对警察说，“你也管不了。我顶多再拿

出 2000 块钱来，叫你局长和你说话。”

过了 2 天，果然，有公安局某副局长找那警察。

副局长：“阎金山的事谁叫你管的？”

警察：“是×大队长叫我办的。”

副局长：“停了！”

副局长说停，下面只得停。新乡一家国营大厂此后在流通领域损失达百万元。据某干警探底，正是新兴公司一案逍遥法外的赵中俊故伎重演。

“我调回新乡，第一次上街吃碗羊肉烩面，就挨了顿打。”说这话的竟是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魏文来。

“发什么酒疯！”1985 年 3 月 20 日夜，一穿皮茄克、提警棍的大汉，走进面馆大喝。

老魏申辩了两句，就让这汉子抓住衣领，揪了起来。

当兵时害过血吸虫病的一把瘦骨，被拎上“罗马吉普”，驶到刑警大队。车门打开，老魏弓身欲下，那汉子照其尾骨就是一膝盖。老魏倒栽车下，跌破了少肉的前额。

“跪下！”那汉子命令，他是刑警二中队队长。老魏瘦骨难软，队长就与人把他架成“喷气式”，同时揪住他头发往桌上猛撞。

“幸亏我战友是他的上级副大队。”人情搭救了老魏。老魏开始告状。

“告状影响不好，都是一家子嘛。”一有身份的同志劝老魏：“让他给你认错算了。”

尽管中国近代就输入了西方法律制度，法院执法的老魏也没能“近水楼台先得法”。

今年元月 13 日，《新乡晚报》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题，刊出一张《处理打死人命协议书》。42 岁的农民李世

中被刑讯打死。此“协议书”规定：“给死者做棺材和衣服，另外包赔死者家属现金 550 元，粮食 500 斤，以作埋葬之用，特此协议书，自协议之日起，双方均不上告，不申诉，互不纠缠……见证单位：新乡县公安局秦生福……”

1987 年“一年就在新乡的公安手上屈死三条人命，栗荣成只是其中之一”。新乡法院一同志无可奈何摇着头，向记者一一例举。

时间到了 1988 年，在栗荣成之后，新乡长垣一 6 岁男孩死在法官牛天仁枪下……

一位从事了一生公安工作的老人，谈及下一辈犯下刑讯罪时感慨万端：过去我们办案主要靠群众路线。现在群众不愿提供线索作证人。群众靠不上，技术手段又不行，要钱又没钱，最后只有使用封建的东西——严刑逼供！干部制度的毛病和公安的孩子公安安排的劳动制度，又使违法乱纪得不到及时暴露和查处。

“54 式”手枪顶住青工陈阳的太阳穴，刑警张吉予扣动扳机，毁灭了一个朝阳般生命。

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什么反而成了罪恶的温床？

张吉予说：“我有特权思想。”

记者呐喊之后

“找记者去！”

栗荣成被打死在刑警队消息传来，拥在栗家门前抹泪的 19 中教师，几乎异口同声地建议。

然而——

“小心点，整死你！”《法制日报》记者 5 月在新乡采访，听到电话里这一低沉恐怖的声音。他们只好“秘密采访”。

得知新乡案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总编辑赵化下令，“马

上组成摄制组，上新乡拍一部《悲剧后的反思》。”

征得了在京开“全国人大”的河南省部分领导的同意，一辆专车载着11人摄制组奔赴新乡。

摄制组风尘仆仆苦干了一天。仅仅一天！当晚，摄制组就被要求停拍。

“听听群众的话吧！”赵化总编辑呼吁，“群众见到我们摄制组工作，反应是说‘还是中央有青天哪！’这说明群众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工作不仅没破坏安定团结，而且坚定了群众对中央的信赖和希望，消除着新乡的不安定因素。”

新影厂的呼吁无人理睬。倒是每天有两人陪伴“冻结”在旅馆的摄制组成员。“晚上，屋里就咱仨，谈的东西怎么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呢？”摄影师老张夜梦中象被双毛手扼住脖颈似地惊叫出声。

到底还是顶不住了。“顶”到第17天，摄制组心力交瘁，制片厂损失逾万，只有铩羽而回。

如今，轮到了在采访中被持刀威胁、暴力夺去录音机、扣压记者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喊冤了。7月26日至30日，整整4天内，找公安派出所报案，民警居然说：“刑福喜（抢夺者）让你们去给他道歉。”找政法委、找副市长、找代理市长……至今没有解决。

“谁还敢伸脑袋告领导的状？”新乡一司法干部感叹。

公检法是整个社会的监督者，那么在新乡——

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记者手记

呼唤正义

—

1988年，3月7日，凌晨。

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的铁栏门里走出两个年轻记者。

在初春惨白的晨光中，新乡，这座豫北古城，此时还没有完全苏醒。牵动我们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是一位老教师屈死的冤魂。

一个月前，在新华社的一份内参上，我们发现了采访线索：新乡19中49岁的教师栗荣成，被6个刑警刑讯逼供，活活打死。

当天上午，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开始了采访历程。我们首先来到19中一排平房前，这里住着栗荣成的妻子和他4个刚刚成年的女孩。病卧在床的栗妻憔悴不堪，向我们讲述了丈夫是

怎样被抓走，噩运又是如何降临的。栗荣成的小女儿小峰向我们哭述了求援的艰辛之路：“爸爸死后，家里生活困难。元月19日，我们4姐妹上街募捐，端着爸爸的遗像，从上午10点一直走到下午5点，到哪都给人跪下，膝盖都跪成了黑紫色。从前，我们4姐妹连家门不敢多出。前段时间，省里开人代会，我们排在会场两边，向代表一张张送求援书。”

我们的采访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多星期里，我们昼夜奔波在这个古老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采访了19中的党支部书记，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因为自己学校的教师被打死而气愤不已，奔走上访，呼吁求助。我们采访了栗荣成的邻居和同事。这些淳朴而善良的人们，在栗家受到各种威胁、最为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他们搭灵棚、料理生活，帮助他们上访告状，邀请记者。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才来到新乡采访，写出了内参。我们还采访了被硫酸腐蚀得面目全非的受害者。他坚持认为，不能认为是栗荣成害了他。我们还采访了主管这起刑讯逼供案的一个副检察长。这位刚从部队转业的检察官为我们订正了6位警察折磨老教师的重要细节。我们甚至还潜入到病房中，采访了正秘密保外就医的主犯。这位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对自己身陷囹圄百思不解：我为工作没日没夜操劳，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破案、抓凶手？怎么自己反而被打入大牢里？亲身的体验和丰富的素材，为日后的报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春雨淅沥的傍晚，搭上过路的列车，我们启程返京。在卧铺车厢局促的边凳上，回忆着采访中的每一个细节，体味着被采访人讲的每一句话，就着昏黄的灯光，我们对报道的主题展开对话，达成了共识：古来中国“行法权”、“存天理”，为的是“灭人欲”。“凌刑严法”的目的在于镇止民心。这种“目中无人”的文化万古传今，无形中成了支配一些人行为的心理沉淀。他们

越以为真诚地维护国家利益，越是“真诚”地践踏了人权，蹂躏了小老百姓的人格和尊严。他们把权利和法当成了吓鸟用的稻草人，而不是用来扩展每个具体的人享受生活与自由的天赋权利。这，就是“神圣意志”下的悲剧。

二

1988年3月27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天”第一版用整版的篇幅刊出长篇通讯《神圣意志下的悲剧》。反响之大，出人意料。

正在召开的七届人大会议上，港澳、辽宁等代表团就此案提出议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两位领导同志分别就处理好此案向高检法纪司做了指示。《报刊文献》、《法制文摘》、《河南法制报》等10多家报刊转载此文。

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为这篇报道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中国检察学会副会长曹海波在会上说：“《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我看了两遍。这是血的悲剧，令人深思。这篇报道分析了搞法上主权的问题。我认为，实际上就是权上无法。在我们国家，要加强法治，就不能允许法上主权横行霸道。”这位老法律工作者为此呼吁“有必要加快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以法律来保障法律的实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家周振想教授认为出现这样的悲剧，“关键是我们公安队伍的素质太差，执法者本身就缺乏法治观念。”著名律师、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思之情绪激烈，他说：“这场官司不仅关系到一个老教师的冤死，而且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我建立组织首都律师团、记者团去声援受害人家属！”

老律师的话，激起全场一片掌声。

开庭的消息一次次传来，又一次次推后。终于，5月的一个

凌晨，我们又一次从新乡火车站的铁栏门里走出。

法庭内，坐满了旁听的人们，旁听证一时“洛阳纸贵”；法庭外，5月的骄阳驱不散密密聚集的人群。休庭后，我们一走出法院大门，四面八方的人就汇集过来，紧紧围住我们。一位老人抢着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在这里可值钱啦，大家都抢着看，你们写得好。”一位中学教师说：“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新乡的老百姓都十分关心。这些人是干部子弟，很难处理。”他的话音未落，一位老农在人群外大声喊起来：“他老子再大的官，犯了法也要判罪。王子犯法还与民同罪呢。”两个多小时，这些陌生而淳朴的人们一直围着我们，倾诉着他们对法治的渴望。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在新乡，我们对案件又做了更加深入的采访，了解到更多的恶行和冤情。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一桩桩滥用执法权的事件浮出水面。权力竟然成了罪恶的温床，护法者竟然是对法律最大的破坏者。惨痛的现实警示人们：在这个几千年来视民为“草”的古老国度，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和强有力的监督，执法者的权力观就会发生畸变，普通人的权利，甚至生命，就会像野地里一棵弱草，被随意地践踏。

法院能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无数双眼睛注视着。

三

1988年6月17日，中国青年报用半个版的篇幅刊出我们第二次新乡之行的报道《人民期待着……》。

“7月17日开庭请速来新乡。”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3封内容相同的电报摆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当天晚上9时，我们赶上去西宁的直快列车。早晨6时，在新乡下车。

法院门口人山人海。旁听证再次成为“紧俏商品”。当我们穿过密集的人群时，一个小伙子冷不防抓走了李伟中的旁听证。他用乞求的口气说“记者同志，你有记者证，能进去，这个就给我吧。”李伟中爽快地答应了，小伙子立刻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

法庭作出了庄严的判决。

但我们并没有就此结束对整个案件的追踪。新的线索和新的思索，促使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挖掘新的事实。

在一个宁静的晚上，我们找到了刑讯逼供案主犯、已被判刑15年的崔元斌的同伙刑福喜。那是一个个体小老板，曾伙同崔一起毒打某宾馆服务员宋刚。当我们刚进他家时，他还挺客气，但我们一问此事，他立刻暴跳如雷，把家中房门猛地关上，抓起一把菜刀，与两个同伙一起抢下我们的录音机和记者证。

次日，我们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不料接案民警竟说“邢福喜让你们先给他道歉，否则就不退录音机和采访证。”我们找到派出所的所长，他竟也说“这事我管不了”。随后，我们找了治安大队，找了刑警大队，找了市公安局办公室，找了主管政法的副市长，2天时间内，我们在新乡到处反映。然而，到哪都是“踢皮球”。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了刚刚开完会出门的新乡市市长。这位刚在全市提出“廉政三条”的市长对我们的申诉毫不动容，连眼皮都不抬，很潇洒地说：“你们找法律部门去，政府不管”。然后，扬长而去。

一位到招待所看我们的司法局干部听说此事，激动地喊了起来：“你看看，你看看，连你们记者告状都告不下来，一般老百姓可想而知，就是冤死了，也没人管。”

回到北京，报社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起暴力威胁记者、破坏舆论监督的严重事件。1988年8月19日上午，在《中国青年报》，由报社领导主持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人

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工人日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中国新闻社、《文汇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 12 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舆论监督的正常进行，是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促进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

新闻发布会后，我们还来到中央电台，接受“午间半小时”节目的现场录音采访。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一版右上方以醒目的标题《记者采访中受到暴力威胁采访工具被抢记者证被扣 新乡市政府公安部门等有关领导互相推诿置之不理》，刊出了我们的记者来信。

数日之内，中央和地方各主要报纸相继刊发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四

1988 年 10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刊出我们写的关于新乡事件的第 3 篇报道《谁来监督“监督者”》，揭露了个别警察胡作非为，揭露了记者采访遭到的种种压力。

对新乡某些人来说，这更是一篇“重磅炸弹”。因为，在此期间，关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已经受到处分的流言在新乡到处散布，不料，现在又冒出了一篇更尖锐、揭露更深的报道。

在新乡方面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最后结论“《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东西都是属实的。”

我们坚信，正义的声音是挡不住的。

骑着一辆车，握着一支笔，也曾冒着春雨，也曾顶着烈日，

遇到过热情，遇到过仗义，遇到过冷漠，也遇到过威胁。作为记者，我们深知，自己的职责是记录社会，反映事实；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努力体验着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欢乐，捕捉那些似乎平常而又格外深重的苦难。当我们用笔将那些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那些凝结在小棚屋内的呼声传到四面八方时，我们说，我们真为自己是记者而骄傲。因为，我们记录着时代。

也许，这也就是历史。毋庸置疑，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苦的道路上，我们记录中的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痕迹。但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应该在这个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

因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们都有权利说：
我们，就是历史。

时间：1988 年 3 月 18 日

作者：杨柏

8 名干部承包盖公章

杨柏：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8 名干部承包盖公章

“盖公章问题”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两个月前贵州都匀小围寨上马一个工程，盖了 70 多枚公章还远未了结，严重影响了开工时间。于是人们被逼出新招——把盖公章的苦差事交出去“承包”，居然收到奇效：40 天盖回了 270 枚，被称为创出了“深圳速度”。于是有人建议要成立盖章“专业公司”，至少也要催生出一批“盖章专业户”。

贵州清镇铁合金厂早就决定要上马一项扩建工程，该项目采用补偿贸易的方式从瑞士工商公司引进资金 495 万美元。这么大的一笔数字，双方负责人一签字即可生效。可是涉及中方的有关手续要跑省内外 100 多个部门，需盖数百枚公章。工程迫在眉睫，章盖不齐则无法开工。于是该厂灵机一动，推出“改革新

招”：由 8 名中层干部承包，飞北京、跑深圳、湛江、大同、河南、四川，“万里长征”，花了 40 天，对那些公章持有者采取“跟踪追击”的“战术”：不论你下班还是午休，走到哪里跟到哪，死缠硬磨，终于盖齐了这批公章，从而使工程得以上马。

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了解到这一“奇迹”后，第一个感觉是“哭笑不得”。他说，“不知有什么必要非要盖这么多公章？即使非盖不可，难道不能快点给人家盖吗？你这样慢腾腾地盖下去，我们的‘翻两番’何日才能实现？”

记者手记

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1988年3月16日，当我从传真机上把刚发走的稿子拿下来，仔细地再看一遍时，习惯心理是推测一下这条稿何时能见报，能上什么位置，如此重大的命题，用这种近乎调侃的笔调，编辑部会否接受？然而，没曾想，这条稿子仅隔了一天，就见诸3月18日那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并且3月19日新华社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向全国转发了这条消息。说真的，当时这条稿遇到了这种待遇，让我兴奋莫名。而后来北京打来电话说，这是因为碰上了樊永生副总编辑上夜班，他当时看过这条消息只做了一个决定：推迟一天，上个“好位置”。这个“好位置”就是3.18这一天的头版头条。而经他亲手处理，消息见报时仅在原稿的尾巴处，删去了20多个字。

消息无论是题材还是写法，似乎均受到了比日常更突出的肯定。年底，经王石同志推荐，还获得了全国青年报刊好新闻好作品（消息类）一等奖。这是我，那时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

所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是什么原因使这条只有 470 字（含标点）的消息，受到如此的重视？

我当时想，可能是因为那几天采访付出了“血的代价”。发现这条消息的线索那一天，我赴遵义采访正在返回贵阳的中途上。汽车抛锚时，我为去找一口水喝，结果在一个地质队的院子里遇到了一阵风。风吹倒了临时用竹竿搭起来的脚手架，我在避之不及时，被一根竹竿打到了头部，弄得满脸是血。是车上三位解放军战士，拿出他们随身带的急救包，让我压住伤口。后来车修好了，回到贵阳，一同去遵义采访的记者站通讯干事顾筑胜把我带到他的岳母所在的交通医院，缝了两针，并打了防止破伤风感染的针，才算完成了一天的旅程。

我就是在这一天晚上获得线索的。贵州省经济工作会上传出了一个令人震动的消息：贵州清镇铁合金厂引进外资上一个项目，碰到令人头痛的盖公章问题。在当时全国的国企改革都在推行承包的大潮中，该厂居然想出了承包盖章的办法，为此引发了出席会议的常务副省长的一大通感慨。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小顾就踏上了奔赴贵州清镇铁合金厂的车子。

采访极其顺利。我们不仅见到了 8 名干部中的 4 个人，而且还获得了一些相关资料。80 年代，国际市场上一度出现铁合金（冶炼不锈钢的填加料）非常畅销的势头，这对于拥有铁合金矿产资源优势，包括拥有冶炼这种产品所需大量电力优势的贵州而言，抓住机遇就意味着可以冲进国际市场。于是经人穿针引线，他们用补偿贸易的方式，从瑞士工商公司引入资金近 500 万美元，准备把该厂的生产能力扩大几倍。中外合资谈判很顺利，可是当签过了字，在项目工期进度要求面前，犯了难。因为，在当

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你要上马一个这样的项目，光审批就要跑省内外上百个部门。在他们工厂的附近，仅征用土地就要处理与地方政府包括区乡村老百姓的各种关系。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它的非稳定因素决定了市场给人的时间很有限，快出手，才能赚到钱。该厂在厂务会上提出了“承包盖公章”的办法，没想到这一招调动了8个中层干部的积极性，他们40天盖回了绝大多数需要盖的公章。80年代，一个处于贵州大山深处的国有企业的干部，还没有学会脸不红心不跳地给相关部门的领导发红包，他们盖公章的惟一办法是“死缠硬磨”。极端的例子是一位科长讲的，他找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你上班，我跟你上班；你中午回家，我就跟到你家，影子似的盯了两天，就把该盖的章盖到手了。那时候，公章持有者对“寻租”这种卡、拉、然后“OK”的事，并不那么十分精通，于是，在财务上难处理的交易成本问题并没有影响他们盖回公章的速度。（当然，也因为事已成功，他们不愿意再提里面的诸多细节。）我们只用了一个白天，采访就完成了。

为了突出主题，当天晚上写稿子时，我想到了要调动与此相关背景。

我想起了脑子里曾有印象的两件事。一是《羊城晚报》曾报道过广州白天鹅宾馆（或是一个另外的大酒店），上马前也遇到过盖公章问题。于是消息的第一句话就写成了：“‘盖公章问题’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二是为了表明此事件的无独有偶，我特地把从《黔南报》上收集、剪下来的材料调动了起来。都匀小围寨为一个工程，盖了70个公章，工程还不能上马，已影响了项目开工。——这些例子与深圳了天盖一层大楼的速度相比，其效率损失是多么严重！我深信这种对比的语言结构处理方式，肯定可以帮助读者找出我们为什么贫穷，我们为什么落后的

深刻原因。

有趣的是，我在消息的第3自然段，运用了西方记者写新闻，突出引语的作法，引述了经济工作会上，贵州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树魁的一段话。他对承包盖公章的第一反应是“哭笑不得”。毫无疑问“哭笑不得”这4个字，反应了一个高层领导干部，面对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主义窒息生产力发展也无可奈何的心态。同时也借他的口发出了呐喊：“有没有必要盖这么多公章？”这是对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后一句话则是悲剧性的：“如果有必要盖，你能不能快点盖”——这又回归到了对僵化体制官僚作风条件下“人格”改善的依赖，这种情绪的批判虽然也声色俱厉，突出了荒诞的新闻故事中的严肃主题，但也并没有找到解开扣子的法门。当然，就消息写作而言，我们只能运用新闻事实来说话，把事件的主题意义推到发展商品经济需要相伴进行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的平台面前，已经是一种极限了。我想这条消息，后来被人大量引用，或许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功夫在诗外”的新闻语言——一家体制内有影响的报纸，以这种方式发表这样的新闻，本身就有深长意味。

其实，搞新闻，往往是有多么深刻的思想，才能真正抓住并把握多么重要的题材。作为一名记者，我关注中国的官僚主义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落伍、贫困的问题，远远早于写作这条消息之前。1979年，还在读大学时，我在同班同学奚晓青的家里读到了当时的一本大杂志：吉林省社科院出版发行的《社会科学战线》。在1979年第4期上，有一篇署名孙越生的文章《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坐在那里不动窝，读了一遍，我就被孙越生所阐述的《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所震撼。对中国的官僚政治阻碍中国现代化，有了一种初步认识。1986年7月，在北京，我又买到了孙

越生整理校订第一次结集出版的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解析)》，这本写作背景是1948年的书，使我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时间：1987年12月2日

作者：张建伟 蒋峥 陆小娅 郭蓝燕 高峻 宁光强

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

张建伟：MBA 在中国的命运

命运备忘录

——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

1984年4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MBA)。7月，招生在全国铺开。9月，440名精通外语、有3年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才被选拔出来，获准应试。10月，440人再次被严格的考试筛选，仅留下40人步入MBA学业的起跑线上。2年后，1986年9月，39人完成学业，赴美实习，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学员。同年12月，荣膺MBA学位的38人归国，投入中国的改革大潮……

然而，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接收到MBA的呼救信号。

呼救者声声叹息：

——我们，38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虽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

——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

——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国家级人才培养项目”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明白，我们干嘛要进行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痛苦的呼救震撼了报社，6名记者紧急出动，行程十几省，奔波万里路，朝一个个呼救点追踪而去……

MBA：中国的呼唤

1984年4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

“我很高兴地宣布，两国已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特别训练班，毕业生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一学位将由纽约州立大学授予。”

早些时候，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也曾表示，希望美国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

在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关注下，这个“特别训练班”——中美合作培养MBA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MBA——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现代西方经济的宠儿。

MBA学位，是西方近百年管理经验的结晶。在美国，每5个硕士生就有一个攻读MBA。哈佛大学的MBA，被称为比“博士还值得骄傲的学位”，拿到这个学位，立即会被大公司聘为经理人员，年薪高达6万美元，决无失业的危险。今天，正是30岁左右、具有MBA的学位的人掌管了半个美国经济，为西方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需要MBA。

据 1982 年调查：我国县团级以上企业领导中，懂得管理的不到 1/3，而具有科学管理知识的人员只占 15.2%。

据一次简单的考试摸底测定：我国工商贸易等 7 个行业的 520 名厂长、经理，企业管理知识平均及格率只有 60%，即使有大学学历的企业领导，也有 20% 不及格。许多人对“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等现代化管理观念闻所未闻。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改革征途上，我国政府远见卓识，把中国的青年英才推上世界经济舞台，去获取西方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实是中华民族刻不容缓的事情。

MBA 因此被列为国家级人才培养项目。

为了 MBA，国家经委每年拿出全国人才培养费用的一半投入学员受训的大连培训中心。

为了 MBA，学员所在单位将为各自的学员提供 20000 元左右的学杂费。

中国需要 MBA，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为了 MBA，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为了中国，MBA 理应产出 3 倍的效应！

MBA：命运之剑

当我们 6 名记者分头与 38 名 MBA 毕业生会面时，他们已毕业 10 个月。

10 个月中，他们大多数人一事无成。

对 MBA 来说，10 个月是什么概念？

我们听到了现代世界发出的警告：

面对变动不定的现代世界，经过工商管理硕士训练的现代管理人才，他们的知识只在 17 个月内完全有效。17 个月后，他们

必须补充新的知识，学习并掌握新的外事经济案例，才能重新适应残酷竞争的世界经济。

10个月已经过去，浪费已成现实。

然而，这还不是我们最为沉痛的感觉。

在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的前后，我们还分头访问了他们的单位领导。

没有一位领导认为他们不重视这批人才，相反，他们提出了一套一套的重视人才理论。

一边是重视，一边是浪费。

我们对MBA命运的反思就从这里开始。

命运之一：难以摆脱的怪圈

一切信息都表明，MBA毕业生回国后将被委以重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评论：“他们将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先锋行列。他们承担了将西方经济学及管理学理论融于中国改革的使命……他们经过两年的学习而得到MBA学位，他们将处于引导中国工业及政府部门前进的路上。”

在准备返回的几天内，美国一些工商界的首脑人物闻讯赶来，在百忙中分头设便宴款待他们，以期同他们拉上关系。

一个形象的比喻诞生了：中国的首届MBA毕业生不仅要成为祖国改革事业的先锋，还应成为管理革命中的“母鸡”，孵化出中国90年代管理革命的春潮。

然而，一接触现实，他们便立刻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虚化的幻念。

在国家经委袁宝华副主任接见他们的第2天，MBA学员王川山就乘上北去的列车。这时，是12月28日。30日，他兴致勃

勃地回到原单位——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敲敲院长办公室的门，没人。

他每天来研究院。直到2月份，院长才找他谈话：“院里的意见，你先回室里工作，以后院里有什么用得上的，我们再安排。”

他彻底地凉了。攻读MBA学位前，他是搞设计的。攻读MBA之后，他又转回了设计室。他感到了一种命运的嘲弄。

同王川山一样，盛维民回单位后，也转回了他的原岗位，搞课题研究。面对来采访的记者，他长叹一声：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里倒是为我安排了新岗位：搞规划和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定。可我学的是MBA呀！我想，一个人有效的职业生涯不过二三十年，我这样晃下去，连过去的专业都丢了，还不如先回去搞技术。管理，以后有机会再说。人还是该现实点，不能好高骛远。”于是，他痛下决心，回到3年前离开的那个研究室，拣起已经荒疏了的科研课题。

几乎所有的MBA毕业生都经历了这种命运的落差。没有人打击他们，也没有人迫害他们，只是没有人理睬他们的MBA——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大的财力及人力投入人才获得的高级工商管理经验和科学理论。

改革进行了9年，许多单位对知识及人才浪费的现状仍如此麻木。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没有浪费人才。但对什么叫浪费人才，他们并不知道。

人才浪费的质量指标有3个：（一）被无效率地使用；（二）与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相比较，正从事不太有价值的活动；（三）闲置。

38名MBA毕业生在回国后的10个月中，多数处于前两种状态，少数被闲置。

人才浪费的数量指标只有一个：经过特殊培训的人才倘有20%的知识领域与所从事的职业不搭界，即属于浪费。

据38名硕士对自己知识应用比率的乐观估算，他们在10个月中勉强应用上的知识大约30%，处于浪费状态中的占大头。

我们同他们的领导进行过上百次的对话，他们告诉我们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但没有一位领导从这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人才浪费的根源。

我们有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唯独缺乏人才使用效率！

命运之二：“欲穷千里目”——只争朝夕

刘中天，MBA学员曾给这位老大哥起了个外号叫“老枪”。可这把“老枪”遇上了他的厂长，就彻底哑了火：想调走？那不行。你就踏实在这里干吧。我既然能供得起你上学，就能养得起你。不信？看我养二20年！

20年？！刘中天今年已四十有二……

正是为了把尚有热乎气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及时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上，他根据原单位几乎没有涉外经营的实际情况，自己联系单位准备调动。他必须只争朝夕。

“谁说用不上？上回毛里塔尼亚外宾来，我看那个翻译就不行。下回再来外宾，你上！”

厂长有厂长的道理。

记者来到刘中天所在的工厂，几番求见厂长，得到的却是专人陪同游览厂区附近风景的礼遇。直到记者通过中间人再三申明：此行绝非问罪，而厂里惜才、爱才的苦心记者也完全明了，才终于得见厂长，并当场得到了一番教益：“刘中天学的东西现在是有有点用不上，但我们不能放他，我们厂将来也是要发展的。

人家美国都知道重视这种人才，咱就不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

“只争朝夕”的 MBA，撞上了“欲穷千里目”的厂长，即使你有一万种“危机感”，又能感动谁？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MBA 的这种危机感感动了美国人。

8 月底，布法罗管理学院院长阿罗托博士来到北京。听中国弟子们谈回国几个月后的情况，阿罗托说：“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我发现，你们并不是想找一个薪水高、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想找到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找到为你们的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找到，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

一些急性子的美国人甚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领导人，为 MBA 毕业生摆脱困境而四处奔走。

然而，我们的人并不着急。38 名 MBA 毕业生中，有一半人都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希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希望中（中国这么大）的某个地方能用上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

所有的“呼救信”都如石沉大海。其中一位毕业生急中生智，写了一份广告，想通过报纸把自己卖给“识货”人。终没有发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那广告拿出来，苦笑着说，他没发出，是怕外国人看了笑话。

中国，你已经拥有一大批只争朝夕的人才，然而，你还要建立起一个只争朝夕的体制。

这是中国人才悲剧的根源。

命运之三：燕窝鱼翅金饭碗

天津新港船厂的厂长非常诚恳地对记者说：“谁家有个金饭

碗不会用？我不会总拿金饭碗盛白开水。有了燕窝鱼翅，我也拿它装。”

王海涛怀揣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回到了对金饭碗、白开水以及燕窝鱼翅之关系颇有研究、曾以改革而名噪一时的新港船厂。

他被“对口”到经营科，给常驻外国专家当生活翻译，兼管杂务。厂长这样解释：“现在厂里有困难，他也得帮帮厂里，当阵子翻译。互相理解嘛。”

大约这样理解了几个月后，王海涛成为本厂与英国某公司洽谈造冷藏船生意的谈判队伍中的正式口语译员。谈判之余，他还要兼管其他专家的杂务事宜。

那天，王海涛拿着电传给外国专家送去，那位老外把脚翘在桌上，高兴地哼了一句：“啊哈，我亲爱的邮递员来啦！”他生气，可还没话说。

可是，当“老外”听说他是 MBA，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小伙子，这可不是你该干的工作呀！”

不该干也得干。只是干了几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他不必再参加谈判了，换一个人来顶他的翻译位置。

他不知道换的是什么人，但他确切地知道：谈判已进入确定什么人去英国进行考察的阶段。

他心存疑虑，又不敢问。否则，有争出国的嫌疑。

他不懂，当金饭碗能盛燕窝鱼翅的时候，为什么也要换成白开水。

在采访与写作期间，我们看到听到又有许多引进团出国了，许多人為自己引进了冰箱、彩电，却为国家引进了一堆废钢烂铁。而我们的 MBA 毕业生，有能力、有智慧、有诚心为国家避免损失的人才，却只有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暗暗垂泪的权

利。

在领导决策领域，甚至在引进技术、使用人才这样的决策领域，歪门邪道、任人唯亲比科学、比知识、比人才往往更有力量。

命运之四：MBA 无球跑动

张小军早有先见之明，他知道在他原来工作的年营业额不过 200 万元的地区邮电局里，他的 MBA 知识很难用上多少。一回国，他就开始联系调动，目标是正在筹建中的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请看，这是我的 MBA 学位证书，这是我所学过的专业课程，这是我的学习成绩单。”

平时挺蔫的张小军，毛遂自荐时却衣冠楚楚，镇静大方，侃侃而谈。

国际金融、投资评价、管理战略……副总经理不由得对这个没有来头的小伙子另眼相看了：“好，我们非常乐意接收你！”

谁知，当单位“同意调出”的公函送到上级机关时，却当即被签署了如下意见：“如愿付 2 万元培训费，同意调出。”

张小军不是不知道，他读 MBA，单位是吐了“血”的，学费加上赴美机票，共花了 10000 多。要不是上级机关“赞助”了 3000 多元，他也看不见美国的月亮了。可是，他执著地认为，钱是国家花的，我人也是国家的，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为国家创造更大的效益呢！

于是，张小军怀着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从巢湖市奔赴省城合肥，企图说服上级领导。

然而这一次，他又没能见到负责人事的副局长。接待他的一

位政治部负责人说：“你挑吧，除了局机关，你调到本系统在合肥的任何单位都行。比方说，去学校教书，或者到科研所搞情报，这样，你的两地分居也解决了。”

对于如此慷慨的恩赐，张小军真该感激涕零，然而他却苦笑了。谈了半天，这位负责人也还没弄懂 MBA 是怎么回事。

张小军不知道，就在他往返奔波，为向领导解释 MBA 而大费口舌之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挂出了“全满”的牌子。

在巢湖，他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过去的工作有人顶了，单身宿舍也有人住了。除了偶尔为别人顶个班，他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他陷入了“在职失业”的困境。

在职失业——单位不放。中国有多少人才在这普普通通的 8 个字中被窒息了创造的生命？

38 名 MBA 毕业生中，多数人表达了流动的意愿，但“单位不放”4 个字成为流动意愿的牢笼。

我们如果只有把人管死的规章，而不建立把人搞活的法律，无论何等伟大的改革，都不能使人才获得最后的解放！

命运之五：权力最有力量

在 38 名 MBA 毕业生中，有 2 个流动了，而且十分轻巧，一路绿灯。这两个人一个叫陈宪星，一个叫李觉非。

陈宪星原所在的大连重型机器厂是我国重点企业之一，厂长开明，重视人才。听说陈要调走，自然不放。

陈要去的是一家合资企业，中美合办的，听说陈是 MBA，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当然，也考核了一番。陈有 MBA，并不怕考，一考就中。美方首脑当即任命陈为质量部经理，准备让他飞往国外去施展他的 MBA “武功”。

然而，陈的单位有充分理由不允许陈流动。对此，美方也无可奈何。

真巧。恰在这时，一位国务委员来到大连，在一次宴会上，那位美方经理向他反映了这件事。这位国务委员当即对大连市市长讲，合资企业需要人才，应该支持一下。不久，市长打电话给大连重型机器厂厂长，请他们考虑。厂长们开了个会，决定执行市长指示。

陈宪星就这样流动了。

事情就这样简单。

李觉非的流动稍稍复杂了一点，但也毫不费力。

年初，李觉非揣着 MBA 文凭回国，第一次踏进为他付了 3 年工资、三年学费和赴美机票的一家中型企业。这是他原来所在单位的一个下属厂，因为单位掏不起钱，才千方百计把他“下放”了。厂子不愿收，局长保证：“李觉非回来至少给你们干 5 年。”

现在，李觉非果然前来报到了。厂长大喜：“欢迎，欢迎。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儿适合？体改办？生产计划科……”

其实，李觉非早已打定主意了，哪儿也不适合，一句话：调离。

厂长办公会开过了，决定：只要李觉非交回培训费，就可调离。

然而这一次，在“权”这个更大的法宝面前，“钱”这个法宝失灵了。李觉非一分钱未掏，照样起走了自己的人事关系。工厂的 10000 多元人才投资，不过打了个水漂儿。这一切，据他的同学说，是因为他有某种靠山。

现在，李觉非已经离家南下，去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大展宏图了。

对陈、李的流动方式，MBA 研究生班的美方一位负责人极感兴趣。

这位美方负责人从陈、李的流动受到启发，对记者说，看来，只要求助于合资企业，让外国人找你们的“大头”，就可以走出困境。

记者问：在美国，人才流动也通过这种方式才行得通吗？

对此，这位谨慎的美国人没有多讲。他只是让一位服务员为记者沏了一杯中国茶，而他本人喝起美国的麦氏咖啡。

记者对这杯“麦氏咖啡”进行了研究。

西方各国人才市场的运行，都是以“单位择优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双选机制为基础，以用人单位和人才个体间择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为主导的。在这种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招聘自己所需人才，也可以解聘自己不需要的人才；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就任或辞职，双方以合同互相制约。这一切，有“雇佣机会均等法案”为普遍的法律依据，不必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也不必由“谁是哪个单位的便哪个单位说了算”。

写到这里，我们忽然醒悟到：我国的人才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

官僚主义、任人唯亲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可恶的。但仅靠思想教育并不能根除它们，只有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根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双选竞争的人才市场形成的时候，官僚主义者即使想浪费人才也无所用其力。

喝了洋墨水、拿了高等文凭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人才。但仅靠单位的制约并不能改造他们。只有在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择优汰劣的时候，任何庸才都遮不住他的假面。

命运之六：古城之间一条路

从古城太原出发，朝古城西安奔跑。六七百公里的路，李保存跑过多少回，他自己也记不清。

他跑什么？

作为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经营处生产部的负责人，本厂对他重视和满意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对外进出口贸易，工作较对口。所学高级工商管理知识，在中国极度短缺对外经济谈判人才的情况下，正大有用武之处。

在他毕业回厂以前，企业产品也多次参加广交会，但由于缺乏熟悉西方商业贸易的人才，不懂外语也不了解外商心理，从来没有拿回过一分钱的收获。今年4月，李保存杀向广州，一下子谈成了2个项目。对此，企业领导大加褒扬。

然而，在与外商谈判中，谙熟谈判业务的李保存却不过是个“中介”，握有权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中的中方谈判人不仅英语很差，而且对谈判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战的贸易桌上，他既要权衡本厂利益在外贸中的得失，还得将此化为有权力的中方代表听得懂的意思，谦虚谨慎地告诉他，再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说出来，并翻译给外商。同时，李保存还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译过来。如此往复无穷，形同苦役。

尽管如此，意向书还是签定了。李保存还是高兴的。到7月，他接到了有签约权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来函，告知广交会上与巴基斯坦商人谈成的2.5万只洗涤定时器的合同书已寄到了中国，并有一附件。

李保存读信后，立刻明白了。他必须再次赶赴西安，继续充

当翻译。

他知道，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还知道，这并不怪厂长，因为，即使他本人就是厂长，也会这样被驱使、被浪费，因为厂长也没有外向合同的签约权。

另一位 MBA 毕业生连李保存这种可驱使的幸福都没有。毕业 10 个月，他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回国后，他被塞进那个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大家都不干事，人们不屑于同这个喝“洋墨水”的 MBA 人物竞争。有时，人们也问一句：“喂，你学的那玩意是干嘛的？怎么没见你露一手？”

他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在评职称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那个白头发的科长。他知道自己竞争不过科长，因为他没长出白头发。

“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科长在造舆论。

“我的能力还不够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白头发于是胜利了。

MBA 学位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竞争，竞争，这是中国改革者多么偏爱的字眼。但只有竞争的观念，没有竞争的机制，人才永不会在最适点上生存。

命运之七：传统之树现代果

在 38 名 MBA 毕业生中，有两位据说是命运最好的人，一个叫陈学忠，已经当上副厂长；一个叫余长斌，毕业后干了几个月的车间工长，9 月初被任命为分厂调度股负责人。

可能因为当上了副厂长，陈学忠对记者讲话很谨慎。但谈起 MBA 学业，仍很兴奋。他说，这种学习，很好，很科学，很开

眼界。他推崇美国教学法，不讲书，讲体会，讲方法；美国教授学识渊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职，那案例教学自然深刻而实用。他比喻说，真像吃橄榄，吃时苦涩，回味无穷。

但问及这样有用而伟大的知识他这个厂长用上了多少时，他便谨慎起来。他说，国情不同，观念不同，所有制不同，自然，知识用起来也不同。但他肯定，一定能用上。

余长斌也说不准他的 MBA 知识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也说他的境遇非常好，因为领导非常好，非常开明。采访领导时，领导也说余长斌非常好，非常肯干，举个例子，他虽然学了 MBA，但到车间当工长，毫无怨言，“工人身上多少油，他的身上也多少油。”

在 38 名 MBA 毕业生中，这两位境遇最好的人最使我们迷惑：无疑，他们的 MBA 知识也处于浪费中，但他们都活得如鱼得水一般，为什么？

余长斌的一段话提醒了我们。他说，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身上蹭的油有多少，并不能表明你管理水平就是强，相反，有时还会标出负值。“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的高低。要讲在现有企业里应用 MBA 那套管理，咱的企业素质和工人的文化素质、心理状态都还跟不上。但只要改革开放不变，只要领导继续这么开明，我的 MBA 知识就不会瞎！”

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所期待的避免人才浪费的出路，那就是——等待。等待中国的传统人都变成现代人。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各单位领导津津乐道的“重视人才”理论了，这些理论如此博大精深，已成为中国人才环境的传统之树。

这些理论是：（一）种子论。人才好比种子，群众才是土地。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群众是不是满意他。（二）台阶论。

是人才也得一步一步爬台阶，科员，工长，段长，主任，副手，助理，厂长……三五年一个台阶，50来岁，委以重任，年龄正好。这时，各个台阶上的人对他才都有好印象，他工作起来才如鱼得水。（三）储备论。MBA知识用不上怕什么，先储备起来嘛。知识不怕多，总会用得上。艺不压身嘛！

用不着分析，也用不着说明，这套理论正在中国大地上被最广泛地实践着。它们是如此的正确、如此的合乎规范，以致于无论我们的人才被浪费到何种程度，也不会有人怀疑这种理论的正确！

MBA，这个被移植到中国的现代之果，正被挂在这种无比正确、合乎规范的传统之树上。

大树已经苍老，但还活着。

果实正在腐烂，只留给人们它鲜活时的记忆。

MBA——SOS

11月中旬，我们6名记者在疲于奔命地采访之后，再次聚会京都。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浪费人才的官僚主义者。然而，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体制危机的投影。

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旧观念，呼唤新观念。然而，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MBA在中国的命运提醒我们：全方位、立体化的人

才流动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做这种徒劳的努力，只留下一篇MBA在中国的命运备忘录。备忘录的扉页注上两组字母：MBA——SOS。

SOS，是国际上通用的遇难者呼救信号。

曾有母子二人海上遇难，漂浮到沙滩。正是夜间，无论怎样地呼喊，四际无人，难以获救。她脱下衣服，把幼小的后代紧紧裹起，拥在怀中，又饿又冷，挨到天明。天空出现了飞机，她张开双臂，拼命地呼喊。飞行员听不到。她累了，她快死了，她倒在了沙滩上，再也爬不起来。她可以死，但必须救出自己的孩子。她拼出最后的力气，在沙滩上爬行，用沉重的、奄奄一息的躯体在沙滩上划出3个硕大的字母——SOS。又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SOS被飞行员发现。她们终于获救了。

MBA——SOS!

记者手记

MBA 在中国的命运

活人死了

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忽然接到一封来信,说得明确些,是一封“呼救”信。来信述说了—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3年前,1984年4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MBA),经层层考试筛选,40人入学,至1986年9月完成学业,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MBA毕业生。为此,国家耗资百万。不可思议的是:荣膺MBA学位而回国的38位学员,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没有一人从事与MBA有关的工作,全部处于知识与人才的浪费中。他们觉得,这就好像“活人被处死”一样难受。

来信者是38位MBA学员之一,他希望《中国青年报》过问此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新闻线索。

《中国青年报》显示出超人的胆魄。

报社决定：派出6名记者，对分布全国各地的38名MBA和他们的单位、家属，以及大学中外双方教师，进行全覆盖采访，总社由副总编辑张飙和科学部主任陆小娅调度指挥。

直到今天，一家报社面对一个新闻线索，投入如此财力和人力，仍是惟一的一次。

魂困大连城

6名记者的分工采访量有些不同，我负责的一路，有11名MBA，并要采访大连工学院——MBA学员的母校，估计是任务量最大的一路。

采访还算顺利，到11月中旬，副总编辑张飙、科学部主任陆小娅和所有的采访记者，会聚大连，开始集中采访资料，并研讨写作提纲。

谁也未曾想到，我们在大连被“困”住了。

与西方传媒不同，直到今天，中国报业没有“主笔制”。对中国的报业来说，这似乎是根本不用讨论的事情。实行“主笔制”，这显然是说，如果有一批记者采访了某个题材，将由这位“主笔”统领写作，其他记者不过是“资料采访员”而已。不用说，这在中国是犯忌的。具有国有企业特征的中国报业领导，犯不着为了“荣宠”一位“主笔”而得罪一批国有企业“干部”，那张报纸毕竟不是属于他本人的。实际上，如果不是行文至此，不披露真实的情况，下面的文章就做不下去，这个问题连我也不会去碰它。

不是说记者们的采访不努力。当然不是。大家都很辛苦。弄

来的采访资料也很详实，每个人都写了提纲，并在讨论会之后，要求每个人都写一篇报道，而材料根据各人所需进行交换。是的，大家都很努力，不仅努力采访了，而且正在努力地写作。但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不同意，甚至写作者本人也不满意。

怎么办呢？没办法。我们试图就这样把这批稿件见报。毕竟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某篇稿件，发表之前，大家都不满意，可一旦发表了，在读者中的反应还不错。

但这次不同。报社投入如此人力财力和时间，不是为了搞出一堆“是不是好稿，一点把握没有”的“纸上垃圾”。

回到北京，稿件交给总编辑们审阅。

记得这批稿件，足有三四万字，200字一页的稿纸，叠起来，有两块砖头那么厚。想想也真难为了每一位报社领导，他们每个人都认真地阅读了，而每个人都认真地阅读了以后，个个都摇着头，沉默不语。

对一个记者来说，没有比这场面更让人心悸的了。

我的好朋友、具体指挥调度这次采访与写作的副总编辑张颀是最着急的，但显然，他也束手无策。而且，我相信，正因为他和我的关系密切，尤其要避嫌疑。我不相信他没有想到这篇稿件由一个人主笔统筹会更好一些。但他不能说这个话。

于是，这次花费如此人力财力采访写作出来的稿件，面临被“枪毙”的危险。

死中求生

好几天过去了，关于这组稿件毫无声息。记者们陆续回到自己所在的地方记者站去了。这次《中国青年报》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报道行动，就这样胎死腹中了吗？

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只要认真编辑一下，这组稿件起码还是可以见报的。因此——我忘记是谁的动议了——有人建议把稿件拿给李大同，请他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办法。

其时，李大同是学校教育部的编辑，这组报道的编辑与他无关。但即使在《中国青年报》（我总觉得，《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和编辑们有一种个性：谁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什么差距。这是一种很好的性格，如果它仅仅指向“不服输”的话），编辑们还是觉得，李大同是最棒的编辑。他总会有个好办法吧！

大同后来说，他很认真很认真地读了稿件（“真是一种苦役”——他说），然后把这堆“砖头”放在那里，瞪着它们，沉默了好久。

我敢肯定他的心里也有斗争。毕竟不关他的事。他也犯不着为了一组稿件得罪“当事人的”记者和编辑们。

但李大同毕竟是李大同。他还是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找到了总编辑。他说：“没办法了。如果这样，这组稿件不能发表。但有一个起死回生的办法，必须由你拍板：把这堆东西交给张建伟。由他一个人干！他搞成什么样子，也就是什么样子啦。”

总编辑说：“好吧。就这样。”

我听到这个消息，有点震惊。自从《第五代》以后，我确实“狂妄”了一个时期，但现在，我“老实”多了。《中国青年报》有青年记者成才最好的环境，这是我从不否认的。但我也得为领导们想想。而且老是当“出头的椽子”，总有一天要给“当头一棒”的。

记得在一次记者会上，某位记者说：南方记者，面临太热的环境，要减少他们的任务量，并要给更多的补贴；北方记者，面

临太冷的环境，也要减少任务量，也要给更多的补贴。并且说：“我们虽然写的稿件也许不如别人，但我们很辛苦的。”我不是记者部主任，但居然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立刻说道：“一张报纸，评价记者优劣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报纸版面上的表现。例如，你是辛辛苦苦的，你采访了两个月，写来了一篇稿件，给‘枪毙’了；而我呢，一点也不辛苦，轻轻松松地在同样的时间内采写来一堆稿件，不仅见报而且得到读者好评。请问，该给谁更高的补贴？！”此言一出，全场寂然。我立刻省悟：我得罪了北方记者，也得罪了南方记者。因此，即使在《中国青年报》，我后来总结出的“采访成本论”也从来未曾得到认可。人们愿意承认“脚底板上出新闻”，但从来不愿意承认“智慧更能出新闻”。不是没有新闻，而是缺少发现——对此，人们更乐于说“新闻是记者的双脚发现的”，而不愿意承认，同样都有一双脚，同样都到了某个地方，写出的新闻却天差地别，因为，记者的双脚差不多，而他们的大脑却差得太多。

这样的话，我记得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说过一次，但后来就不再说。因为这段话居然被传播成“张建伟不用采访就写作”。言外之意，“张建伟的新闻作品都是编造的。”记得还因此发生过一次事件。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稿件，后经调查“失实”，被人家给告了。该记者承认他“没有采访就写出了稿件”，但他紧接着说：“张建伟就是不采访就写的！”面对这样的“推论”和“谣传”，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因此，即使在《中国青年报》，即使面对如此信任和关怀我的领导们，我也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在许多时候，我不想“出头”。

但现在，没办法了。我必须出头了。我后来多次在报社说：“这组稿件，即使不是由我，而是由任何一个记者来‘主笔’，都

会成功！”但现在，我必须承认，那说法是“虚伪”的。实际上，在当时，我在感激大同的勇敢和总编辑的信任的同时，产生的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负。我在做人方面永远都不会“成熟”。

报道是重写的。那堆原稿，我几乎看也没看。经过如此长时间的采访和讨论，几乎所有的人物和事件的细节都装在我心里。我只有一个拿不准的地方，但又是李大同帮我解决了。

记得我是这样说的：“这组报道必须弄成一篇，才会有深度和力度。大家对它的期望值太高了，我必须写得很好才能通过。但，我一时间找不到一种比《第五代》更有力度的结构。你说该怎么办？”

大同毫不犹豫地说：“《第五代》的结构既然是成功的，再用一次又有何妨？！”

我于是当了一次从来没有被承认过（此前我自己也没承认过）的“主笔”。整整“闷”了3天，拿出了那篇被称为“1987年的中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的稿件。稿件又经李大同删砍，随后见报。

与7部委首脑对话

肯定是这样的：《命运备忘录》问世的当天早晨，那份《中国青年报》就放到了李鹏代总理的办公桌上，否则，我们不会那么快便接到了通知：国家经委等7部委首脑，为MBA问题，要求与《中国青年报》对话。

我当时已经回到天津记者站。张飙用紧急电话又把我召回北京。

我不大愿意参加这次对话。因为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正兼任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而我，正是他的学生。学

生与校长“对话”，在这样的场合，因为这样一篇火力十足的报道，这，总让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但张飙在电话里说：“谁不来都行，你不来不行！”我只好服从命令。

对话的地点在国家经委所在地，晚清的时候，那里是恭亲王府。走进去，果然雕梁画栋，一派王者气氛。

袁宝华主任（校长）就坐在我对面。我在心中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

对话开始的时候有些“话不投机”。7家部委的领导同志不大相信稿件中的描述：38个MBA，他们的知识，就一个用上的也没有？！领导同志肯定报道有些“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此，张飙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对话进行了2个小时左右。袁宝华主任说，不必纠缠枝节问题啦，看看问题该怎样解决吧。

从表面上，问题似乎很好解决：只要允许MBA们自由流动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当年的中国，并没有人才自由流动制度，甚至连政策也没有。而且，毕竟各单位花了钱，就那么让你“一走了之”，也实在说不过去。

然而，不允许这批MBA自由流动，问题又绝对不能解决。

最后，袁宝华主任拍板：给予这批MBA“特殊政策”，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起死回生

在中国，对我们这些记者来说，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除了

“写什么，怎样写”以外，观其最后结果，常常还不在于报道引起了多大社会反响，更重要的，还在于报道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

毫无疑问，《命运备忘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圆满达成报道目标。

中国第一代 MBA 就这样起死回生了。

所有的 MBA 学员，只要在国内的，都来到了北京，向《中国青年报》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凑钱包下了北海的“美膳酒楼”，专请我们主持和参加报道的总编辑、部门主任和编辑记者们，以示感激和祝贺。

这是我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

时间：1987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

作者：卢跃刚 刘扬

不可思议的温州

卢跃刚：一套房子换一组稿子

不可思议的温州

红色幽默

一个幽灵——“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

在一度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温州采访，不知怎的，脑子里不时冒出这句和《共产党宣言》开首有点相像的话。其形似，其神就大谬不然了。

多少年来，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无法逃避那个幽灵的困扰。

譬如说吧，为年搞农业就只准种粮食，种瓜菜便是资本主义；搞多种经营其实只许养猪，养羊就是资本主义；而养猪也有

限制，一个圈里5头猪，规定内的两头姓“社”，多养的3头就姓“资”。纺土布，是苍南宜山区的传统副业，而纺车成了极可怕的东西——搞“复辟”的工具。于是，所有家庭的木制纺车通通烧掉，铁制纺车尽数是贴上封条……

对此，温州的一位基层干部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社会主义变成了一面政治哈哈镜，照人人走样，照物物变形。”

温州人多地少，老百姓单靠几分地难以为生。客观现实迫使温州人从土地以外另谋出路，发展各种工副业。可是用“社会主义哈哈镜”一照，不得了！小商品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壤”，家庭手工业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大批从事家庭工副业的农民尽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支持农民脱贫致富的干部全都“同资本主义穿连裆裤”。整个温州，“资本主义大泛滥”！

尽管“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被一批再批、七斗八斗，可是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受到了顽强的挑战。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要求人们为了“革命”不要计较基本的生活需要，而老百姓修炼不出可以不吃飯的功夫，于是便同“社会主义”产生了冲突。早在1957年，温州的永嘉县就刮过“资本主义单干风”当时在全国进行了公开批判。而在以后的20年间，“单干风”（其实就是后来所搞的大包干）总是或明或暗、时大时小地在刮。每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便以“分田单干”去对付“一大二公”。乐清县委曾向温州地委禀报说，尽管县委“下最大决心纠正”（单干风），可下边还是“边纠正，边分散”，有的村竟把田分了10多次。许多生产队对领导不说实话，对上说是集体化，而暗地里在搞包产到户。当地农民还订立盟约：“铁打门牙，不准漏风”。

1978年，在浙江省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一个县委理论组的干部做了题为《分田单干就是复辟》的发言。当时，温州大多

数千干部群众希望分田单干，按照那个“理论”，就被认为是盼望“资本主义复辟”。对此，那个干部从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角度加以解释，可是他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搞了近30年社会主义，为什么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竟会越来越多？

“其实，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他们盼望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复归。”今天，温州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可是当年，谁敢说这个话呢？

当然，那时，一心一意坚持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也不乏其人，苍南县新西河村的龚振龙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老实厚道的村干部，在他管辖的地方，竭尽全力排除了一切“资本主义干扰”，也排除了任何脱贫致富的可能。村里穷气逼人，而老龚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绝没偏离过“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老龚的妻子没有他那么高的“社会主义觉悟”，老龚当了20来年干部，他的妻子竟拉着孩子讨了20多年的饭。显然，这对老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那时有的人认为，这恰恰衬托出老龚“社会主义立场”的坚定。（其实，老龚并没有“坚定”下去。如今，他已经通过发展商品生产致富，家里盖起了一座漂亮的小楼，终于欣然告别了靠讨饭度日来固守的“社会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社会主义”幽灵的“功德”，是把社会主义由科学扭曲成空想。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那些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下的“原则”，在“资本主义”面前是那样的虚弱无力。

温州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那里曾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小商小贩，消灭资本主义黑市场”运动。一天，“围剿指挥部”

的总指挥家中来了贵客，他亲自上街买菜。转了几条街，国营菜场皆有“场”无菜（农民都“以粮为纲”了，菜场失去了货源），小商贩又被剿得销声匿迹，这位“剿总”也尝受到“社会主义”的不便。出于无奈，他只好悄悄地奔向郊区的“黑市场”。正当他同一个卖海鲜的小贩进行黑市交易的时候，这位“剿总”手下的围剿队员呼啸而至，吓得“剿总”和小贩一齐奔逃。

按照过去的标准，这位“剿总”算是一个“社会主义立场”最为坚定的人物，而实际上，他的言与行、表与里并不那么一致。“原则”的荒谬造成了人的虚伪。

“这些年来，那个附加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表现得相当充分，也暴露得相当充分，如今它该寿终正寝了吧？”记者问一位温州人。

“冒牌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但不等于说它已经灭绝。借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叫做‘叶枯根烂心不死’。”那位年轻干部冷静地分析道。

经过拨乱反正，温州对过去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清算，市委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由于我们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一大二公’，因此，‘就把私人建房、自谋职业、街道企业、家属厂、代管厂及个体工商业户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可是时隔不久，这个市的某市镇就发生了打击专业大户的事件，有4个专业大户被判刑投监，一个闻风出逃，被全国通缉。负责“严打”的部门理直气壮，声称：“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私人经商办企业发了财，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犯罪！”

看来，一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那个幽灵还会冒出来游荡、作祟。

然而，不管前边还有多少路障和曲折，温州人仍然充满了信

心。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那个屁股上打着“左”的纹章的幽灵，还能游荡多久呢？

名份的困扰

中国人讲究“正名”，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人均耕地只有四分五厘的温州人，历经磨难和风险，压着资本主义的“帽子”多少年以后，梦寐以求有一顶社会主义“红帽子”戴在头上，名正言顺地赚钱谋生脱贫致富。

这种心理并不奇怪。很有些人爱拿一顶固定尺寸的“红帽子”去衡量温州色彩纷呈的现实。不管是否好心，结果总是闹笑话，给后人留下把柄。为了正视听、辨真伪，几个月前，有人到温州组织了一场温州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结果是什么呢？姓“资”的不是“资”，姓“社”的不是“社”，这很像一个政治谜语。

初到温州，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里的人坚韧顽强，极擅经营，赚钱很有耐心。他们的祖辈在本世纪初就“八仙过海”，粗估有10万人在陌生的欧洲大陆繁衍生息；有的温州籍华侨成了世界著名的实业家。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温州有14万购销员，还有那些剃头、补鞋、修表、弹棉花、干木工的手艺人，钻遍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每一个角落。无法否认，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中，温州人得到的实惠，温州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全国有名的。

温州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是惊人的。记者了解到，温州许多经营大户、农民企业家从事工商业的历史可以从“文革”开始算起。“地下工厂”、“地下包工”、“地下经商”、“分田单干”等等，没有一样不是屡打屡兴。包产到户，家庭工业，挂户经营，信贷利率浮动，谁都没干净过，但毕竟在实践上斩将过关。温州

人好像穿上了“红舞鞋”，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跳啊跳啊，遵循着某种特定的不容逆转的轨迹，翻出了更新的花样。

在经历了“家庭工业”时期后，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农民企业家，把辛勤积攒起来的资金，涓涓细流归大河，集中起来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购置较先进的机器设备，形成了与国营、集体企业竞争的新态势——“合股经济”。

“合股经济”一出生，便多灾多难。首先是归属不明，不好划定“成分”。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套，它既不是“国营”、“集体”，也不是“个体”，它是什么？这在温州有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结果，合股企业被打入另册，只发给临时执照。这种临时执照被农村企业家们称作“临时护照”和“临时居民身份证”。实际上把合股企业人为地搁在了悬崖上。

苍南县金乡镇，以前是“后无山，前无滩，全靠耕地四分之三”，30—40%的人每年要在外讨饭三四个月。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较快，这里是挂户经营和信用社利率浮动发源地，“合股经济”比较发达。可是1984年以来近4年时间里，70多家合股企业都未能在工商管理部门正式注册，全国著名农民企业家叶文贵的金乡压沿薄膜厂也在“临时居民”之列。有资料说：1987年温州“合股经济”比重比1986年上升5%，占温州全部经济的20%。

金乡保温饭盒厂是由11个农民合股兴建的。他们与轻工业部杭州机械研究所合作研制的保温饭盒获国家专利，并被列入“星火计划”。1986年8月批量生产到现在，已销售了10万只以上，很受野外作业者的欢迎。他们自有资金55万元，贷款13万元，年产值120万元。该厂副厂长包帮琮告诉记者，他们投资研制保温饭盒，始终提心吊胆。执照一年一换，根本无法预测第二年上面念的是哪本经。临时执照好几年都是锁在抽屉里，不敢拿出来给订货单位看。

投入资金近百万的金乡申富冷冻厂也曾有与保温饭盒厂相同的遭遇。他们与温州市渔业公司签合同合作6年，到公证处却不能给予公证，公证处的人说，你们厂临时执照有效期一年，怎么能办6年的公证？

经济学家林子力在他的《温州商品经济研究报告》中写到：“尽管私人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在资金来源、借贷利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但他们的经济效益均胜全民一筹。”他调查的塑料、纺织行业，私人企业的产品成本比国营低40—42%，利润率比国营高14—40%，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比全民快22—87天。

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根不红，苗不正”，一直让温州合股经营者和有关部门惶惶不可终日。

颇有戏剧性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来温州，认为合股经营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经营形式，它区别于50年代的“合作主”。精明而务实的温州人立即领会了这一思想的确切含意：“合股”换“合作”，使合股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戴上了“红帽子”。他们顺着这一思路加以论证和阐发，从而改变了温州经济格局的概念，大大地加重了社会主义的砝码。

前面提到的叶文贵金乡压沿薄膜厂、金乡保温饭盒厂等十几家金乡的合股企业，在今年10月初拿到了正式营业执照，注册性质是“合作经营”。

温州人为改善自身发展的政治环境，塑造美好的外观形象，可谓绞尽了脑汁。当然，谁要是以为扣上顶“黑帽子”，就能使商品经济绝迹，那可未必。因为商品经济自有一套兴衰存亡的法则；因为温州并不是戴着“红帽子”发展起来的。人们只是希望，十三大报告深刻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驱逐某些人头脑中“左”的思路，使温州人摆脱那种种无谓的“名份”的

困扰，理直气壮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上前进。

“空白地”说

有人公布调查结果：温州的私人企业只用所获利润的 20% 投入扩大再生产，却拿出 80% 的利润超前消费和盖祠堂庙宇、修筑“椅子坟”，并判断：这是小农（或小商）经济的局限以及农民的短视。

在一个发育健全的市场背景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情理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上面的调查结果，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温州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是土生土长的“老温州”。他给记者打了个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温州经济的发展状态：冬春一度“冷”，夏秋再转“热”。农民投资要先摸年初的红头“一号”（中央）、“二号”（省市）文件精神，再决定是否投资或投资多少。温州敏感的政治晴雨表的变化，每一次都在温州的经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平阳县过去曾以逃荒要饭在温州闻名。1976 年春，平阳有 8000 人外出讨饭，卖儿卖女 350 多人。

平阳县的顺溪镇，距县城 60 多公里，深入雁荡山腹地。这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就是穷得叮当响。能人多出山谋生。

1985 年初，区、乡政府为了发展山区经济，把本地在外有影响的能人陈治龙请回山区，开辟车木机技术市场。一时间，寂静的冷清的顺溪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技术引回来了，能人归山了，山里人的眼界开阔了，产品销往数省。光是陈治龙经营的车木机械制造厂的产值就达到了 100 多万元。

可是好景不长。1985 年底到 1986 年初，由于车木机技术市

场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引起了合同纠纷；加上一些8分钱“检举揭发信”和当时的部署等等，一支相当规格的工作组进山了。

工作组进山，第一件事是封账户，终止一切经济活动。第二是逮人。陈治龙被指控“行贿”而收容审查。收审日期，1986年2月10日起，1986年9月25日止。

工作组进山来，能人技术出山去。且不说陈治龙收审7个月的法律依据何在（当时的县领导解释说：那时案件太多，可能顾不过来；再说此案涉及的人较多，调查工作量大，短期查不清，害怕放出去通风报信），就说一度繁荣的顺溪这7个月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引回山区的100多个业务关系全飞了；数十个专业户闻风而逃；车木机市场萧条。

乡镇政府财源切断，这年少收入十几万元。

成百山区农民就业赚钱机会丧失。

陈治龙损失更加惨重，100多万元的业务没了，还债卖掉了厂房，加上合同赔偿，个人损失十几万元。

一句话，顺溪变成了荒芜冷落的“空白地”。

李仁续到顺溪听到此事后非常气愤，回去即向市委书记董朝才作了汇报。董书记说：“让他们赔偿损失。”

李仁续说：“他们是谁？让谁赔？”

谁？谁？找不着主儿。工作组是由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集体，这个“主儿”也太不明确太不具体了。

有意思的是，陈治龙出狱没几天，县里召开全县企业家、能人座谈会，县委书记指示乡镇企业局一定要把陈治龙请出来。座谈会上，郑重其事地发给了陈治龙一个红壳布面烫金的“平阳县先进生产者”证书，一个企业家、能人的“聘请书”。乡镇听说

他要去外县安家，坚决挽留，并在年底评他为先进工作者，给他挂了朵大红花。

花十几万元买了朵大红花。陈治龙想哭，但哭不出来。昨天决定收审他的人，今天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继续为山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当事人证明：“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是全国的，上面查得很紧。收审陈治龙是依法办事，放他，结论是‘有问题，不予追究’。”）

有位长年搞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针对此事颇有感慨地说：“我们长期以来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活动与老百姓的生计毫无关系，搞生产是外行，搞运动是能手。”

现代法治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对政府或组织行为的制约，而不仅是管辖老百姓。工作组、专案组，这类政治组织权力极大，往往超越法律。我们查阅温州的历史档案，发现每个动荡时期都可以看到工作组、专案组的踪影。我们还发现，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些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态度、意识惊人地相似，并且都留下了一大段“空白地”。

1956年到1980年，农村包产到户，这个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形式，从开始出现到真正获得生存权利，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屡遭查禁，伴随着多少干部群众的磨难，经历了漫长的24年。

1977年5月至1978年4月，在七县一市的几个“点”上，查出并取缔地下工厂148个，地下商店3000个，地下运输队933个，地下包工队155个，纠正分小小队10884个，纠正分田单干24313个队。

1982年在上级工作组的强大干预下，乐清县错抓经营能人“八大王”，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才予以释放，恢复名

誉，全部归还没收的财产。这一折腾，几乎搞垮了乐清县柳市著名的小五金、低压电器市场（注：这个市场是温州十大市场之一，年销售额达一亿元以上）。

.....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些亲身经历吧，温州人对政治极敏感。著名农民企业家叶文贵以惜时如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而闻名，可是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那天，他什么事情都不干，关起门收看电视实况，从头到尾研究报告内容。

温州的今天来之不易的。1949年解放后到1981年的32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共6.5亿元，而温州1983年至1986年不到4年，主要靠群众和集体，总投资就达到14.9亿元。温州人昨天和今天都在进行伟大的创造。可是，我们的眼光不能总盯着“莺歌燕舞”，我们还应该看到温州人的进步，是背负着沉重包袱的进步。

多少年来，温州人的许多创造性活动，都因同那些被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种种“原则”相冲突，曾遭到责难、打击，甚至查禁，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空白地”。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寻找谁该对此负责。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怎样造就成的，他们如何思维和行事，从而避免“空白地”的再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将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呢？

两柄尚方剑

温州引人注目的改革与发展，是在现有政治体制条件下进行的，这自然使人们在总体上对温州的干部刮目相看。而去年6月，在全国性的“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上，温州市委党校一位与会者很不客气地说：对于温州农民在实践中的许多创造，不少

领导的态度是：“始而打击取缔，继而否定摇头，进而举棋不定”。

他的概括或许是准确的，因为一般来说，“求实”比“听话”要危险得多；创新比守旧要危险得多。

在我们接触的干部当中，陈定模认为是“温州最大胆的干部”。自从3年前担任苍南县龙港镇最高首脑以来，他带领农民在一片荒滩上，奇迹般地创建出名闻遐迩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亦称“温州的深圳”。

1983年，我们的政策尚处在“农民离土不离乡”的阶段。陈定模却看到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决心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他遂向县委要来农民进城审批权。这一来，大批农民蜂拥而至。

事实上，在陈定模之前，有的干部在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下已经开始“超前”了。早在1980年底，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在全国首次采用“浮动利率”开展存贷业务，效益甚为显著，而当时是明确禁止“浮动利率”的，否则以“扰乱国家金融”问罪。省里有关领导闻知此事，指责金乡“无法无天”。但温州市农业银行认定自己“从实际出发”，居然在全市推广起金乡的做法来。

让我们再来谈陈定模。农民涌进龙港后，陈定模又开始施行一项措施——向在龙港建厂盖房者，无论农民还是干部，一律收取“地皮使用费”和“城市公共设施费”（这是全国最早的将土地作为商品的事例之一）。

一时，轩然大波骤起。1985年底至1986年初，省、市工作组开进龙港，说是整风，实质是审查陈定模批地建房中的问题，并在镇上设立了“检举箱”和“接待室”。出人意料的是，有农民当着工作组领导的面发问：“我们讨饭20多年，你们怎么不来？现在龙港搞起来了，你们来干什么？”陈定模呢？就在

这短短几个月时间，他负责接待了从中央到各地一万多到龙港参观的党政领导和记者。他一边问参观取经看稀奇的人们介绍龙港奇迹般起飞的奥秘，一边向工作组作“检查”。隔不久，万里副总理来龙港视察，窝了一肚子火没处撒的陈定模，鼓起了勇气告了一状。万里当场质询，对陈定模的审查才算有个初步了结。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发现，虽然这类干部往往要承担各种风险，批评、审查、不予提升。但是，他们几乎都会拿出两柄“尚方宝剑”保护自己。其一，“从本地实际出发”；其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细想起来，这两柄“尚方宝剑”还真有些来历；前者，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者，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了温州的今天，温州许多优秀干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艰苦的努力。1957年，温州永嘉县的一些地方从实际出发，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当时28岁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肯定了群众的这一创举，并在全县农村进行推广。应该说，李云河是务实的。而结果呢？包产到户被作为“资本主义单干风”在全国公开批判，李云河被开除了党籍。温州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就是原苍南县金乡镇镇长金钦治。他虽然是搞政府领导工作的，农民的实践和创新，逼迫他认真地调查情况研究问题。他针对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列出与传统理论和当时的政策有抵触的十几个理论问题，利用各种场合，在上级领导面前，在理论家面前，为农民的创造争论、辩护。

有的干部在觉醒，有的干部在反思。有一件事让一个温州的干部终生不能忘怀：在割“尾巴”的年代，温州市区一位妇女实在是不能维持生活，就东借西凑弄了点本钱，挑上两篓小虾去市场卖，担子还没放稳，市场管理人员就奔袭而来。别的商贩有经

验，没等人来就溜之乎也。可她初来乍到，不懂“行市”，两婆小虾被悉数没收了。哭天喊地，求爷爷告奶奶，人家硬是不理，她一气之下投河自尽。恰好有一老者路过，奋不顾身下河抢救，结果这位妇女得救了，那位老者却牺牲了。

另外一位温州市委的同志则对记者讲述了时间稍为久远的一桩往事。那年，整个温州地区都在“打单干”，有亲人“分田单干”的干部，都被严令检讨、划清界限。地委有一打游击出身的干部，因乡下一个兄弟也在单干，受到领导严厉批评。他本人虽多次劝说，仍不能制止兄弟单干，最好只好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赞助”兄弟，保证人家吃饱肚子，方才使兄弟罢手，自己“清白”。

诸如此类的“故事”，记者在采访时听到许多，而且均出自当地干部之口。这反映出他们对“为官之道”的一种新的理解，一种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即能否使人民富裕幸福为根本标准来衡量干部行为是非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

写到这里，我们想到了市委党校那位同志所作的概括：正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和党的工作是被群众的创造力所推动的，并没有完全摆脱“看不清，拿不准，各部门不协调”的状况。应该说，这些情况是存在的。温州的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因袭的重负不能不影响他们前进的步伐。一位饱经温州沧桑的干部感慨万端地对记者说：在旧的体制下，“我们的干部同农民的利益是分割的，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对农民的痛苦缺乏切肤之痛。”正因如此，广大群众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至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

没有主旋律的挽歌

温州市移风易俗办公室访问实录

温州有一个全中国目前绝无仅有的县级机关——“市移风易俗办公室”。

温州以农村经济改革和“温州模式”闻名遐迩，同时也以“椅子坟”、庙宇等令人侧目。

温州市移风易俗办公室在市委市政府大院后的西墙根占据着一席之地。办公室主任上省府开会，办公室的元老、56岁的老陈代表他的12位同事接待了记者。

记者：温州新鲜事多，为什么成立一个这种名目的办公室？

陈：从1979年开始，温州出大殡现象十分严重。市区出殡，庞大的队伍吹吹打打，都要经过信河街华侨饭店门口。省委书记来温州就住华侨饭店，推开窗子就能看见。1981年搞得实在不像话了，市委决定成立移风易俗办公室，隶属市民政局。管了一段，情况有些好转。后来被撤销了一段。1986年底又开始重视，将办公室升格为县局级，更名为温州市殡葬改革办公室，1987年4月又改为现名，由一位市委副书记专门负责。

记者：移风易俗的工作范围应该说是很宽泛的。据我们所知，温州除了“白化”问题（“椅子坟”都是白色的，矗立在山坡上）外，还有别的问题。

陈：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殡葬改革。光是这一项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目前是搞坟山清理，凡1987年1月15日前造成的坟，就不许扩大改建，并补征较高的占地费和绿化费，采取绿化覆盖。市区和靠近市区的县实行火葬，边远县实行土葬，但要造公墓。

记者：温州的“椅子坟”之多之大之豪华全国闻名。本报也披露过。可是一段时期以来有增无减。这几年每年约有3万座墓在山上冒出。可以说已经到了危及山林、形成公害的地步。

陈：是的。乐清县有个人光是买坟青石就花了12000元，我们估计坟的总造价可突破8万元。乐清县乐城镇有一户的坟占山地600平方米，一家四代都埋在那里。《温州日报》说乐清县北白象河深村有一黄姓老农去世，光是丧事就耗资2.5万元。

记者：听说城里人的火化率也不算高。

陈：城里人可以到农村从承包人手里高价买到土地。按《土地法》，应该没收这笔收入。温州有两种人火化，一是国家干部，一是五保户。这次规定，公墓土地不能卖给城里人。但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

记者：我们看见政府年初颁布的加强殡葬管理的通告贴在街上，都被商业广告覆盖了。不知你们查禁的效果如何？

陈：他们都摸清了我们的活动规律，白天不出殡，晚上才偷偷出城。我们堵住出大殡的，就要收缴吹打乐器，要罚款。所以城里人出殡都是无声无息的，因为哪里有鞭炮响我们就到哪里查。听不到鞭炮声，居委会也不报告，我们就专门派人到大街小巷转。很多时候，我都是晚上一个人出去查，凌晨4点才回家。

记者：真够辛苦的。

陈：可不是，又饿又累。可是屡禁不止，我看和有钱后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关系。

记者采访归来后的闲聊

记者采访归来，熄灯卧床，辗转不寐，好象横贯温州的瓯江的潮水仍在拍击着心房，两人索性闲聊起来：

卢跃刚：我们在温州好像发现了许多“化石”。“移风易俗，

改造中国”，曾经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

刘扬：那时不知有多少人都把做梦当理想了。以为只要经过一场文化革命，就可以把那些旧道德、旧习俗、异教邪说、私心杂念，统统从中国大陆赶出去。

卢：那时我们都还小，看见典籍被焚烧，庙宇被砸烂，城市道路换上“四新”、“反帝”、“防修”之类的路标，一些被称为“孝子贤孙”的白发老头瑟缩着脖子在街上示众，大姑娘的长辫子被毫不留情地剪去，仿佛生活在一个脱胎换骨的世界。

刘：结果如何呢？从手头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到，温州这地方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就有几次修坟、建祠堂庙宇的高潮。据苍南县统计，全县新建庙宇837处，宗族祠堂498处，匡算耗资700余万元。苍南县金乡镇有居民4300多户，信佛的4000户，其余信天主教等。

卢：温州有的地方敬神迎佛、出殡送葬、祝寿行礼，动辄几万、十几万，其豪华奢靡，令人瞠目咋舌。在这里，“财”不仅要“外露”，而且还大肆炫耀。分析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就事论事贴标签的基础上，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视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长期受压抑的心态，其个体价值的外化形式，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又遭到遏制，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陷入病态。

刘：这是对过去搞的那套东西的一个折射，一个讽刺。严格地说，温州还很不完善，就像个连走路都晃荡的小孩子。

卢：还应该从宏观上发展一下我们的思路。温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组合体：贫穷与富裕共生；宗教信仰五花八门，互不干扰；愚昧落后与先进发达结伴而行。柳市盖了幢“老人楼”，一层经商，二层老人娱乐室，三层烧香拜佛。温州人不是不知道教育的重要，可是20%的小学办在祠庙里，诸神和菩萨平时锁起

来，初一、十五又打开。

刘：这就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旧的价值体系正在解体，正在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在刚刚构建。

卢：能否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新的价值体系的第一块奠基石？

刘：我看是。

卢：我仿佛听见温州的光明与黑暗、美好与丑陋、落后与进步正在为过去的历史唱着一首挽歌，一首没有主旋律的挽歌。

记者手记

一套房子换一组稿子

为了温州系列报道，我损失了一套房子。

1987年7月，我刚调到《中国青年报》总编室半年多，便和经济部的刘扬一起到温州采访。我们一进温州团市委，便接到了报社让我立即返京处理拆迁房事宜的电报。

是回还是留，颇踌躇。

温州当时交通闭塞，没有火车，没有飞机。走海路，10个小时轮船到上海，然后换火车。走陆路10个小时到杭州，然后换火车。来不容易，回也不容易。可是不回去，妻子带着3岁的孩子，3间平房要搬家，更重要的是，要与北京市搞拆迁的那帮狡猾的家伙谈判拆迁房安置。妻子不是能张罗事儿的那种人。

后来惨了，整个家被塞进了报社仓夹道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周转平房，两室一厅的拆迁房被当时横行霸道的秘书长（后来当了副社长受贿判刑）在我没回来的情况下，分给了别人。

当时年轻，想问题不周全，顾此失彼，主要是没想到中青报

那么灿烂的地方有一个混蛋秘书长。

房子的事儿按下不表。

我们对温州的认识，是从温州档案馆开始的。

温州是个什么鬼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贴着海边，交通闭塞，远离都市，穷山恶水，怎么那么能折腾，从50年代到80年代，都是中国政治关注的地方。真是邪了门儿！

围绕着温州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争论了30年，一直到1987年大争论，还是争论不清。

温州人敢于冒险，本世纪初，十几万人远渡重洋到欧洲。

温州人精力过剩，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几十年没消停过。只要有政治运动，就会打击一批资本主义。50年代永嘉的分田单干，六七十年代（包括文革和学大寨时期）开地下工厂、地下钱庄，七八十年代私人以各种公家的名义戴上“红帽子”进行实业和商业活动。

从本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我们去考察温州，无论怎样改朝换代，都无法阻止浸入温州人血脉的商业精神。因此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我和刘扬在温州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查看了温州1957—1987年30年的历史。一个星期呆下来，我们得出了3个结论：温州3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打击“资本主义”的历史；姓资姓社的讨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华而不实的讨论，最血雨腥风的讨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所有改革，其本质是“回归”，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改革”。——农村回归到合作化以前，城市回归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前。

一些营造了“天上人间”美景的人当然不习惯地上的生活。因此，我亦把这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争论概括为天上与地下的争论，吃饱精神与吃饱肚子的争论。

绝大多数改革政策，其勇气不是体现在前所未有的创新，而是体现在敢不敢于面对现实，敢不敢于回到从前，敢不敢于否定自己。

为了避免争论，完成市场经济过渡，党的十三大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后来出了个顺口溜：“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理论，并不能解决政治较量为背景的争论，并不能化解长期营造起来的左的政治文化语境。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荒唐的局面：左的阵营理直气壮，改革者偷偷摸摸，人们最保险的生存策略仍然是“宁左勿右”。

可温州人比谁都明白，“左”只能是苟且偷生，“右”才能解决发展问题。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肚子的问题”。左和右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假问题，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但也是个必须疲于奔命应付的问题。

所以，温州人比谁都需要“正名”，比谁都需要摘掉资本主义“屎盆子”，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红帽子”。

温州便是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政治生态中生存的。中国便是在这种左右摇摆的政治生态中生存的。

由政治文化切入温州问题，才可能切中所谓大争论的要害。

这种切法相当敏感。那时我和刘扬都年轻，胆儿大，决定了就干，也没和主管副总编汇报商量。

在温州观察很有意思。我们首先观察到，温州全国著名的十大商品市场，乐清县的机电市场、永嘉的纽扣市场、苍南的徽章证件市场……都不在当地的政治中心，或者说远离交通、通信、传统商业集于一身的政治中心，然后从这些偏僻的乡镇向全国辐射，蓬蓬勃勃发展。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却是事实。产业与商业的形成与当地资

源似乎没有逻辑关系，交通、通信都不方便，但是不论你到哪儿，都能感受到那股子一定能赚钱的劲头，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爆发力。

温州的党和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用4个字概括：“无为而治”。睁只眼，闭只眼。上面逼得紧了，就打击一下；上面松懈了，就放任自流。民间对付政府，麻雀战、地道战一起上。总之，要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杀出一条生路来。

温州要说穷，穷得叮当响，除了靠近温州市区的瑞安市，其余的县绝大部分都是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县；要说富，又富得流油。

对于我们来说，温州的消费是我们当时的工资收入所不能承受的。我们只能在政府办的温州宾馆吃两块五一份的份饭。一份饭（温州人似乎饭量小，所以给的也少），我们只能吃个半饱。我一米七八，刘扬一米八二，二十八九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肚子饿，只能到外面吃面（按北方的标准，每碗面的分量太少），或者买两只猪蹄子啃。我们的钱只够吃面，啃猪蹄子，只有这两样东西最便宜。刘扬号称在家从不吃猪蹄子，可是肚子饿，看我啃得香，也抓着啃。他那狼吞虎咽啃猪蹄子的样子，可真难看。

这就是温州，不可思议的温州。

我们写了5篇报道：

开篇《红色幽默》。我给刘扬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什么冯·尼格的《五号屠场》、《回到你老婆身边去吧》，海勒的《四十四条军规》，等等。我说：“如果说美国是‘黑色幽默’，我们几十年搞的这套玩意儿、争论什么姓资姓社就是‘红色幽默’。”“对，红色幽默！”刘扬说。“就用‘红色幽默’来概括温州吧。第一篇的标题就是它。”我说。“就是它。我来写第一篇。”刘扬说。“好。”我说。《红色幽默》写了3稿，刘扬第一稿，副总编

辑樊永生改了第二稿，我又改了一稿。写的是温州批“资本主义”，结果是“资本主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2篇《名份的困扰》。原标题是《红帽子，屎盆子》，总编辑认为不雅，改为现标题。原标题强调荒唐感、谐趣感、状态感，改的标题有一种理性的沉重。早期私有企业求发展的障碍，首先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歧视，可以允许外国的私营企业进来合资独资办企业，但是不允许国人办私营企业（只允许办个体经营执照，也就是说不准办更大的私营企业，一句话，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私营企业到了一定规模，要求更大发展，怎么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于是戴“红帽子”，建立一个既虚幻又实用的“保护伞”。然而，这种规避制度瓶颈的权宜之计，给将来带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核心问题是“产权不清”。这既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秘密，也是企业家短期行为、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90年代大规模的产权纠纷便是这一祸患的显现。对产权不清的企业家，甚至涉及是否倾家荡产、是否杀头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第3篇《空白地说》。到温州后，我发现一个现象，每次“大批资本主义”、打击私营经济的政治运动，每次政策的摇摆，每次围绕姓资姓社的讨论，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即人心涣散，经济滑坡。如果我们划一条曲线，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特别是温州这样的区域经济）非常不规则起伏的演进图景，——一条以不规则的坐标系为背景的不规则曲线，经济的“起”与“起”之间的低谷我称之为“空白地”。“空白地”，实际有两“说”，一说损失，即错误的代价；一说企业家的状态，即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和心态。进而“说”，如果一种制度、一项政策的运行成本过高（按经济学的眼光，无论怎样的成本，理论上都是

可以计算的)，都应该进行反省。要不然，为什么要提出改革开放呢？

第4篇《两柄尚方剑》。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当时，温州市委和政府挤在同一个破旧的大院子里，这与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温州相比而言，是个有钱的地方，可是，市委市政府迎头给你了个穷酸的模样。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在做秀，后来才知道，政府财政确实没钱。他们的政策是藏富于民。这样倒好了，遇到非难和误解的时候，温州党和政府官员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论争。温州人聪明。他们论争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一个是党所确定的理论，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犹如“两柄尚方剑”，前者把意识形态中那种教条主义的东西屏蔽了，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可以试验的灰色地带；后者在价值层面上对那些华而不实、祸国殃民的指责提出了质疑。上面的理论，已经认可的标准，来对付上面的指责，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这两条，车轱辘话来回说，相当实用。

第5篇《没有主旋律的挽歌》。温州从社会的角度说，最受到谴责的有几种现象，一是“椅子坟”，一种是使用童工，一种是假冒伪劣，一种是信教群众众多。宗教问题敏感，不能碰，虽然这个问题与政治文化的考察最为贴近；童工和假冒伪劣属于另外的专题；惟有“椅子坟”是介于两者之间，属于消费，可以切入“温州人怎么花钱”问题。所以，我们着重考察了“椅子坟”。“椅子坟”是温州的一大景观：满山坡都是白色的大大小小的圈椅状的坟墓，占地面积很大，十分扎眼。“椅子坟”实际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温州的坟墓五花八门，大的坟墓，可以圈地几亩，高墙隔绝，动辄数十万元（1987年以前的数十万元可是笔巨款），豪华得吓人。有的年轻企业家甚至活得好好的，花几十万

盖“冥官”，既荒唐，又滑稽。经过深入访问，我们发现，温州“椅子坟”是个多维度的复杂现象，很难用“封建迷信”、“炫耀富贵”等等说法来概括。有没有这些成分？有。但是对于温州来说，没那么简单。钱的用途，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投资，一种是消费。是不是温州人不希望赚更多的钱？不是。当时，名正言顺地扩大投资规模，风险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投资的制度性限制太大，私营经济再往前走，路在何方，很不确定。所以，如果说修“椅子坟”这种畸形消费是炫耀，还不如说是压抑和恐惧。他们有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经历。于是，我提议，用记者对话的方式完成这篇报道。严格地讲，这已经不是一篇报道了。

这是一组相当敏感的稿子，就这么发表了，有反响，但是没麻烦。万幸。

对于我，一套房子换了一组稿子，12年了，至今房子还没有解决到位，真不知道值不值，真不知道，我是聪明人还是傻瓜。

时间：1987 年 10 月 15 日至 23 日

作者：麦天枢 黎戈宁

西部贫困地区移民采访记

黎戈宁：逐水草而生存

西部贫困地区移民采访记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近几年来，甘肃中部和宁夏西海固干旱地区的 20 余县（区），相继有 20 万农民计 5 万多个农户，举家迁往河西走廊及黄河河谷地区。这项由国家统一规划迁往新的生存地的移民工程，目前正在继续进行中。

此举是人们在己生存地无节制生育和过分垦殖的必然后果，而移民本身，又反映出许多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为此，本报记者在移出地和移入地穿行 14 县，对这项人口调节工程进行了新闻考察。

“唉，可是旱透了！从 1986 年 6 月 23 日下了一场雨，直到今年 5 月 24 日才滴哒了 3.9 毫米，半个小时就又晒干了。”甘肃景泰县的杨县长，一个 30 来岁的年轻人一见面，就跟记者说天。

其实，地是天的注释。一出兰州城，记者便看到了：不论沟，不论岭，不论荒坡，不论粮田，除了从黄河里抽出来的一抹绿色，数百里一片秋、冬之色。

8 月连日无遮无挡的太阳，不光把压砂地（一种抗旱措施）里几丛可怜的残苗烤黄了，把山坡上低矮的野草榨干了，也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数以千万计的水窖掏了个底朝天。

甘肃中部和宁夏西南 28 个县（区），盛夏季节 140 多万人的吃水发生困难。沿途到处可以看见这样的壮观场面：拉着盛水胶囊的拖拉机、装满了水的油灌车，排成行在山路上吭吭；村僻路窄进不去机动车的地方，十里、二十里山道上毛驴车摇摇晃晃，拖的是一只装水的汽油桶；挑担的汉子歇脚，双手扶着两只盛水的大罐子。拉水的汽车进村，成了一切生灵的节日：黄牛排成队在后要追汽车，鸟儿一群群在天上扑汽车，老人孩子拥成团在村口等汽车——等着分一人一天 5 斤或 5 斤的活命水。

为了解决众多人畜的吃水饮水，国家每年要花去数千万元的资金，单是拉水补助，近 700 万元。

烈日炎炎，记者来到靖远县曹砚乡。这是一个只有 8000 多口人的山乡，过去为供应这 8000 人以及 1000 头大牲畜和 5000 只羊的用水，最多时每天要出动 80 辆黄河车，在 30 多公里山路上每天运两趟。前几年国家投资 130 万元兴建了从黄河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小型接力扬水管道工程，并每年对所需电费、修理费给予上万元的补助。

站在储水的“涝坝”前，看着成群飞来、挤在岸边润喉的山雀，看着忙着计量付款装水的拖拉机、小手扶，乡党委副书记老

傅说：“比起七八十里路上拉水，我们这儿好多了；比起人家地下出水天上落水的，这日子也真难着呢！”原因是有许多人家无力支付补助后的三分之一的的水钱（成本一立方米水 1.5 元左右，个人只交 0.5 元）。记者了解了四砚村一个姓杜的家庭：5 口人，10 只羊，6 头大牲畜（当地的富裕户），一年吃水要花 432 元！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切都靠天。遇到旱年，做饭取暖的燃料，便成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自由市场 4 分钱能买一斤山芋，却买不来一斤草。田里的禾苗旱死了，就到山坡上铲。据定西县 1982 年的统计，平均每个农户一年铲草皮破坏植被达 25.3 亩，全县铲过的山坡地皮数以百万亩计。近几年国家扶持种草种树，有计划地向农民供应燃料煤，这种“铲光”现象得到改变，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在静远县的马塬和其他山村，记者在居民的土坯灶头旁，仍然看到刚刚铲来的草皮。煤的指标有，但他没有钱买。

树越来越少，草越铲越光，雨越下越小，人却越生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向越来越贫瘠的大自然进行越来越无情的摧残，大自然返过头更严厉地报复人。还有有代表性的定西县为例：在清代，大的旱灾年均 17 年一次，1912 年至 1946 年间 4 年一次，1952 年至 1983 年间 1.4 年就旱一年。在定西和定西相邻的地区，年降雨量不足 400 毫米，蒸发量却高于 1500 毫米，大自然已是严重的不敷出。然而，自然条件难以承受的人口，却在建国以来，以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速度发展。以静远县为例，建国初它的人口 15 万，目前已是 48 万（含新划出的一个区），增长 3.2 倍。而整个定西、西海固地区，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超过 1.5 倍。

这些地区的人口问题，向社会呈现一个严酷的现实：医疗卫生条件发展了，婴儿成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解放前不足百分之五十），而与此同时，人们生育的观念和传统并没有发生变化。

宁夏中卫县景庄村，有个姓王的村民，解放初从邻村迁入时，夫妻两人，10年生内了5儿1女，如今，这批儿女又为他们生下19个孙男孙女。就是说，这对夫妻30年内，为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添了25个要吃要穿要喝的生灵。而王爷爷在邻村的三兄一弟，几乎有着与他同样发达的“小家庭”。

三军会师圣地会宁县，去年、今年的计划生育又“没有完成计划”。这个解放初只有17万人口，今天已拥有44.7万之众的“超贫困县”，一年几乎能生下一万来。

然而，任意推动人口发展着的人们，不得不领受的，则是日益发展着的贫困。六盘山西侧的甘肃省庄浪县，由于人口的发展，现在每平方公里人口承载量达220人，而1978年国际沙漠化会议的结论是：像庄浪这样的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合理承载量是20人。目前，该县人均只有耕地2.6亩（主要是山坡旱地），比解放初人均耕地拥有量下降了一半多。去年是庄浪少有的收获年，但全县仍有30%的农户吃不饱肚子。目前全县“特困户”就有4200多个，占总户数的7%。

这“特困户”“困”到啥程度呢？记者在曹砚乡，有过直观感受。主人叫王建中，夫妻，3个孩子，全家5口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破窑洞里，炕上一团破棉絮，地上一个龇牙裂嘴的破水缸，灶头只有3只粗瓷碗，一口没有耳子的铁锅，整个家当不值30元。今年的大旱，全部生活来源便是国家的救济。而在这个千把户人家的小乡里，王建中这样的“特困户”就有51个。

过量的人口已是现实，千里赤地般的大自然已是现实，贫困已是现实。出路何在呢？

1982年夏，赵紫阳同志视察定西地区后，赞同甘肃同志提出的移民设想。同年末，经国务院专会研究，由定西、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移民70万人的计划，当即付诸实施。

这是一项宏大的人口调节工程。它力图为移民直接开辟新的生存地，同时也使出移地带的居民与大自然的矛盾得以缓解。

难舍的祖宗之地

缺吃，缺穿，缺柴，缺水，要搬到一个水土丰腴的地方去，国家还按人头给以现金补助，这似乎是一笔十分明白的进账。然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却难以如此选择优劣。

在甘肃会宁，记者来到一个叫作下李的村子管辖下的山村。十来个人，住在高高的山顶上，耕种清一色的高坡“挂田”，有的田陡得连牲口也站不稳脚，旱灾加上几乎年年有的雹灾，大多数年份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由国家投资、世界粮食计划署资助的白草塬引黄灌区上水后，县乡政府想动员这里的居民都移过去，开了许多的会，挨家串户算细账，讲将来，就没有一个人家报名。县里派车把各家代表接到白草塬去看平展展的田，看那哗哗淌着的水，眼见为实了，至今还没一户想动窝。记者在打谷场上与忙农活的村民们交谈，那道理好像商量过的一般：人，住惯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分。一位姓张的老人干脆说：“不是讲自愿么？我们就自愿在下李背山！”当然，我们不久真的就看见他儿子背着一捆禾谷，缘着六十多度的山坡爬了上来。

靖远县的马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山村。全村 14 户，80 多口人，一条大山沟将要与山对面的乡政府隔开，刮顺风时，乡里的大喇叭叫喊能听得见，人要过去，得爬三个半小时的坡。种在塬上，吃在塬上，一切生活在圈在三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全村一半男子没去过 80 里外的县城，一多半女人没到过沟对面的乡政府，一位 78 岁的仲老太太，自民国初年嫁过来，不曾出过马塬一步。这些年连着旱，什么都缺，水也从几十里路上拉着

吃，县移民办5年前就准备把全村移出去，结果除了一个姓仲的复员战士带着妻儿4口上了新开发的灌区（走后3年，这个山村又生下了相同数目的婴儿），其余的一概雷打不动。

来到马塬，大约是外面绝少有“干部”下到这样的基层（连同行的乡里副书记，也“10年时间没来了”），几乎全村人都挤到村中间两墙相夹的阴凉处，围着记者看新鲜。

记者说：“今年天旱成这样子，几乎寸草不生，大概得搬了吧？”

人到中年的孙队长说：“今年旱了，还有明年、后年么，还能年年都旱了？”

记者给他们说外面的世界，说新灌区的好处和那里已有移民今天过的日子，一位姓仲的汉子悠悠地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好的过呢！”

这个山村不光拒绝移居他乡，也拒绝与外面的世界作一“比较”。

然而，要说到甘肃渭源县陡地沟村终于半途而废的迁移，就不是轻松的童话，而是纯粹的悲剧了。

全村60来户，300来口人，住在山遥路僻的地方，不光灾害多，吃不饱，而且人畜皆用的地下水含有过量有害元素，大部分居民都患大骨节等“水土病”。因此，省里一位领导看过后，专拨款项，要把他们全都移出去。然而，外面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全村人拧成个疙瘩，就是不搬。理由多得很，其中一条是：祖坟就在这山里头，活着的下去了，土里头的怎么办呢？县委、团地委、团县委十几个干部上山去作动员，话儿说得硬了些，对方领头的一声吆喝，全村人抓起棍棒铁锹，轰隆隆把干部们全都轰下山去了。

当然，这陡地沟村的居民，今天依然在陡地沟吃救济粮，遗

传儿子，也遗传大骨节。

本来，移民是为了驱穷，可越穷越需要移的，偏偏越是移不动。据两省安置处（即移民处）提供的材料：已完成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复员退伍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手艺的“能人”。就是说，“越是有能耐的，越要奔了好处去。”

移出去的人们呢，终于又以实际行动，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严酷的数字：10%的移民，犹犹豫豫上了路，尔后又斩钉截铁地打道回府，远返故乡。

在甘肃庄浪县的郑和乡，记者拜访了许多“跑回来的”人家。山村陋屋里的主人们不加掩饰地表白，往往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刘姓妇女说：“河西那地方好是好，地平平的，有水，住下一个一年半载，吃穿都有的。就是住不惯，好像那地方的鸟儿，也没咱这关山的鸟儿叫得好听。”更有一位姓马的汉子说：“好啥呢？路全都平展展的，一眼望不到边，走也走不到个头”——连“平”，也成了缺点。他们顽强地以自己习惯了的一切，去要求那块新的土地。

还有一位姓王的媳妇，一到河西就“病”了，躺了一年，终于把“看定了移民好处”的丈夫拖回了家乡。到家第2天，她便硬朗朗满沟转悠，乡干部说她是“心病”，这农家媳妇的回答还很有些哲理：“人不就活个心么，心病了不叫病，还啥叫病？”

这个乡的端里子沟，有11户人家，42口人，山高天寒，常常麦子不熟就落霜，人均不到3亩薄地，收成年景也吃不饱。乡里动员了干部群众集资，国家补贴外加补贴终于把全村迁往河西。记者到来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受不了那地方”，又跑回来了。走时房拆了，畜卖了，家具也“踢哒”了，但宁肯住在残垣断壁上新架的棚棚里，也要守着这块他们熟悉的地方。那乡里李书记——一位很有责任感的青年干部，边谈边抹眼泪：“早知道

他们都这结果，何苦呢？看这千里路上折腾的，一个个特困户了！”

跑，单个跑，成群跑，白天跑，连夜跑，跑得千奇百怪，跑得烈烈隆隆。玉门市花海乡，开发祁连山雪水搞了个移民基地，年底一批来了 800 多，谁知移民刚到，就刮起一场黑风，遮天蔽日刮了一整天带半夜，风停不几天，近 300 移民扶老携幼上了回头的火车。乡里干部紧着解释：这大风在玉门也是几十年不遇，碰巧了。但是跑的人就是不信有这样“巧”，担心当地人成年跟这黑风打交道。有个叫赵丙录的移民，一家 3 口“插花”移到河西金塔县的头风村，住了“农转非”人家留下的房，种了上年庄稼收千斤的熟地，本属于“一年温饱，二年致富”的。可他听说这房子里死过人，不几天孩子从炕上掉下来摔断了锁子骨，他坚信这村里有“毛鬼神”，终于拖儿带女坐上火车，到他那有“好神”的故乡去了……

不论怎样，大多数移民终于向他们的故乡告别，在他们所陌生的土地上定居了。甘肃省移民处的蒋处长说：“人的工作，得耐心，大多数住下来了，这就是成绩，过些年，这些人不会不影响故乡的人，事实最有说服力。”

那么，已经定居的移民究竟怎么样了昵？

“新大陆”的移民

据甘肃“两西”建设指挥部同志介绍，该省近 10 万移民大都在移入地“一年定居，二年解决温饱，三年开始致富”。为此，记者走访了甘肃、宁夏的近百个移民家庭，以为这个判断是可靠的。

河西临泽县板桥乡西沂村，有个移民叫王振民，小夫妻带一

个孩子，两年前移来时，两个小箱子，一个铺盖卷，口袋里还有卖了家产的300元钱，属于中部移民的中等情况。移入后，他们住在村里集体作价赊给他的6间泥顶房，种6亩水浇地，当年粮食就有剩余，今年开始售商品粮。他对记者说：“这地方，只要天不塌，有一亩地吃肚子也是没问题的。”农家的温饱，自然条件是第一位的。

金塔县友好村，记者来到移民李福其家，他与帮工的人们正忙着盖新房，差不多一亩大的院子，一圈盖了9间。他与媳妇、妹妹还带着一个孩子，4口人是3年前移来的，种14亩地，年年打粮近万斤，还种油料、西瓜等经济作物。他说，同村来的六七户移民，他这算是差些的——房盖得晚。

在金塔的双沟林场，记者逐户查看了这个移民村从中部7县移来的22户人家，除了3户住原林场留下的仓库改成的“机动房”，余者都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房子的风格几乎一县来的一个样，也都五七间不等很宽敞，“耳房”里的粮食，虽还没收秋，仍都要以“几千”来估量。

以上3种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那个本来就是这次移民目标的“大部分”。当然，这大部分中也有不少特殊富了的，那售粮数万斤户，收益万元户，在移民中也不算凤毛麟角。当地人也认为，移民中有本事、吃苦的，比当地人还富得快。

实际上，已经富裕起来的移民，使更多的人对移居河西的前景充满信心。在金塔羊井子湾，记者曾与一批“打前站”的青年人促膝畅谈。这羊井子湾是个新开发的移民基地，眼下还是黄沙一片，风浪涛天，小伙子们住在沙海小舟般的一个简易泥棚里。但是，由于水利工程建成，滩边儿的土地已开始养育新绿和初果。这些从中部永静县千里而来的年轻人，在这里边平整土地（有收入），边打土坯建房，待地平渠通，就要把全家接过来。他

们有理由相信：两年后就会过上与当地入一样吃穿不愁的日子。

那么那“小部分”呢？那些千里迢迢移来了，国家花了钱，当地匀了田，依然还要吃救济，向县里、乡里跑着要钱要粮的移民，又是什么原因呢？

上午，正是农家干活的时辰，记者来到会宁白草原灌区移民村一户姓王的人家，壮壮实实的小伙子还在炕上睡大觉。儿子迷迷糊糊揉眼睛，老子一句紧跟一句向乡里干部诉“苦情”，为年底的“救济”作铺垫。出门来，县移民办的老高感叹：唉，太懒了！别的干不了吧，工程平地还不会？一个工日要补6斤精粮、一两油呢，还不够吃？

甘肃移民处的老王，来到安西县一个移民点，见一帮青年人干活的时节，却蹲在向阳墙帮里玩石头子棋。他上去问：“有空，咋不打点土坯准备盖房？”答：“有锹头，没锹把子。”树就长在渠边上，砍个枝杈就是锹把，可上面给了锹头，他们还在等着有人来安锹把。看了地回来，这老王又问：“地里燕麦长那么多，你们怎么也不拔一拔？”答：“拔过了，它又长出来了呢！”又长出来了，那就是老天爷的事情了。

金塔县大庄子乡，有一户“特殊移民”。说特殊，是因为这个5口之家，女主人有丈夫又没丈夫。她叫张菊英，1985年与丈夫带3个孩子从榆中移来。这个灾年讨过饭的妇女，看上了大庄子的前景，下决心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可丈夫却受不了“水地里的苦”（原籍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春天一把籽，秋来一把镰”，可种水地辛苦在田间管理，几乎从下种到收获一日也离不开辛苦），坚持要走。意见终于不统一，男的终于走了，又回原籍靠天去了。张菊英留下来苦干3年，共产粮13000多斤，交售4500多斤，养猪7口（已售6口），养鸡20只，今年已经盖起了6间新房，买骡1头，还添了3件新家俱。年初她给丈夫捎回话

去：“只要回来好好干，这家也是你的家。”然而，记者8月底来到金塔时，她的丈夫还没个消息。

说起张菊英的丈夫，说起一些移民的“懒”来，河西的干部、群众没有不摇头的：不干，还不穷了？一个两个懒的哪里都有。这么些人这么个懒法，这里头是个啥作怪呢？

这是需要探讨的课题。

令人忧虑的“优越性”

甘肃定西县东岳乡。33岁的乡党委书记从笔记本上为我们掏出这样一串数字：自1973年（前无统计）至1986年的13年间，这个只有8500来口人的小乡，吃了国家回销粮、救济粮590万斤，接受扶贫救济款10.5万元，还有棉布、衣服、被褥等年年送的大批救济物资。

这位刚调来一年时间、显得精明强干的乡党委书记，说起这地方、这地方的人，直叹气：“咋活呢？田里黑燕麦把麦子都淹没了，村村去喊，就是不给你拔；人呢？几十里赶集去了，也不是作买卖，去吃一碗二毛钱的浆水面；没钱，乡里帮着找出路，3元一天的劳务联系下了，村挨村问就是没人报名，宁肯挤在南墙根下晒太阳。我们这里的石灰石销路好着呢，干一天怎么也弄个四五元，可张罗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去挖、去拉。日子靠什么呢？一到年关你来看吧，要救济粮救济款的，乡政府门口人踏人，好像这里的书记、乡长欠了大伙的一样！就有那么一种人，人们把他们叫作共产党的老儿子（最小的儿子）……”

这位书记带我们就近看了几个“老儿子”。

一个姓李的农民，家有妻子和3个女儿。我们先看了他的“老家”：顺土崖掘进去一眼大约6平方米的窑洞，过去几十年，

他没有再掘一眼或把它掘得大一点（只需要十来天的工夫），窑壁一侧掘了一个小炕，不到两平方米大个椭圆型。他个大，一个人时就弯腰卧，娶了媳妇生了娃，全家把腿耷拉在炕沿上卧。再看他的新家：3间崭新的大瓦房，是县民政出钱、乡里出劳力盖的，刚刚搬进来。一个月前乡书记扛来一袋水泥，要他把炕沿灶头抹一抹，小心爬成坡，可那袋水泥还原封扔在房角角，乡书记骂：“你自己不抹，还等我来抹么？”他只笑笑没言语。全家几乎一无所有，炕上放一床破棉絮，那是当年救济的军被；人在门前地里拔麦子，是为了中午填肚子。他跟乡书记说：“今年收成还不错，还了借的能吃到10月……”

像这样的人家，全乡数以10计，今年已经给12户盖了房，县上没钱了，但看了样来“挂号”的还有一长串。

在榆中县的上庄乡，我们去看了另一个“老儿子”。他52岁，前些年还干一点，这几年干脆就不干了，吃了睡，睡了吃，还要抽烟喝点酒，没钱没粮了跟着乡干部屁股从早到晚地磨。我们到他家是上午10点半，8月，正是这里夏收的大忙时节（这个乡今年有雨是个收成年），他还躺在被窝里，炕头上摆个旱烟盘，还摆个水烟袋。出得门来，那乡书记骂：“要不是可怜他那几个娃娃（大的13，小的5岁），哪怕犯错误，我也不救济他。咱这地方又不是没有门道，前头沟里就淘金子呢，他就是不干，你有啥办法？”

救济，救济，救济是这个地区几乎年年唱的社会生活主题曲。庄浪县：1955年至1985年31年间，吃了国家回销粮3.8亿斤，救济款1370万元，这不包括每年470万元的财政补贴、各种投资资助，县里同志说，他们与兄弟县相比，“算个中等水平”。甘肃省：建国以来救济扶贫款额高达22个亿，回销救济的粮食则以百亿斤计……

天灾人祸，非人力所造成的生活困难，给予必需的帮助，这是社会的责任，也确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可越来越多的人把张大嘴的脑袋完全睡在国家的胸膛上，后果就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负担了。一个劲地“救济”，没有救了贫，却助长了惰性。现在的一些片面的行政领导意识，似乎又在助长这种风气。

某县有个叫黄九的农民，是个“要饭专业户”。天旱不收时要，丰收的年节也成年跑着要，并且专爱上县委、地委领导的小院里去要。领导一问哪乡哪村，电话跟着就来了，“救济”也跟着就来了。今年初，他又到一县委领导家里要，县上跟来一个严厉的电话，为了消除黄九要饭造成的“政治影响”，乡里紧急研究，决定按他家的人头每月每人供应30斤救济粮。

其实，不光农民要，不少县的主要干部也是“要饭”专业户。在甘肃中部采访，省移民处的蒋处长与我们同行，走到哪里，老蒋都被团团围住，千言万语一句话：多给点钱。在一个县的招待所，县里领导来看望，说是刚从省上回来。问干啥去了，答：“干啥呀，还不就是要钱！这次没白跑，算是给了5万元。”说起要钱来，县里向省上要，乡里向县里要，打报告要，坐进办公室磨着要，到主管领导家求情要，人们衡量县长或书记的本事的标准之一，就是你能不能比前任要来更多的钱。

不论农民要，还是县长要，无非是向国家伸手，比想办法出力的自力更生容易多了。

至于移民，记者在采访中得到大量让人伤神材料：这些地区的居民，许多都是内地来的自流移民的后代，例如靖远县的沙滩等地，最早就是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灾民前来开发的。为了生存追逐新的生存地，这本是人类甚至一切生命的本能。可现在，虽然过不下去了，国家花钱他也不动窝。

就是在今天的主要移入地河西，它的开发史也是一部漫长的

移民史。除了汉朝整建制开来的屯垦军队，大多数都是内地不断涌入的自流移民。与当地干部探讨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顺口就揭了“根底”：“过去不跑饿死了，谁管？现在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再穷也不怕活不下去，不迁怕啥呢？”

在临泽县板桥乡，记者采访了一户“文革”末期迁来的自流移民。他叫杨德礼，因为富农成分，在村里熬不下去，1976年跑到这里住了下来，过了多年才入上户口，如今房子盖了10多间，办起了全乡唯一的铁器修造厂，已是家大业大，正儿八经的万元户。说起他的迁移和他的本领，这中年汉子笑笑说：“吃了这富农帽子的亏，也沾了这富农帽子的便宜。人家贫下中农年年救济优先，不干也过得去，咱自己不抓挠靠谁呢？”

不正常的社会环境，迫使他勤劳、苦干，终于走出了一条致富之路。那么，在提倡竞争、鼓励致富的今天，怎样使更多的人变得勤劳，走向富裕呢？这或许是一个比70万移民工程更宏大、更重要的社会课题。

这不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问题

在河西，记者听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当地群众对他乡来的移民那种掏心窝般的民情、人情，让人从中领会到人类整体之所以顽强不馁的道理。

金塔县西岔村，有个会宁来的谭姓老人——移民中少有的主动西迁的古稀老人。他随县上组织的移民考察队来了一趟，看见这里种的瓜果没人看，也没人偷；院里晾着粮食，夜里主人敞着院门睡觉也不怕丢，就下决心来了——他原籍的村子里，因为穷，玉米棒子一硬，就得夜夜守田。果然，村里人的厚道热情，让老人家至今说起来还泪花闪闪：初来乍到，几乎什么也没有，

支书、村长带头，为他送来菜，送来磨好的白面，还有一大块十几斤的猪肉，全村人家挨家地送。老人家把儿子招来了，干了两年，如今房子也盖了起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河西人”。

金塔的友好村，一个移民用移民费和原籍折变了家产的款，买了一头骡子，不巧几天后因故死了。支书、队长带头，全村户户自愿掏口袋，为这家人捐了900元，要他再买一头。为了不给学生教师添负担，支书没给村校打招呼，可把红帖儿拿到学校写榜时，教师们不由分说又写上了他们的名字。我们拜访了友好村的这户新居民，说着村里的人友好，他说：“没说的，没说的，咱不在这儿好好过，天良也没了……”

在金塔，在临泽，几乎村村都有类似的故事，户户移民都感受到异乡人情的温暖。就连这里县的书记，农建办的主任，全都到村里转圈儿看望过数以千计的移民户，金塔县农建办的主任，大部分移民的来龙去脉不搬本本就说得上来，谁家还缺化肥都挂在心上。因此，这些县移民“跑了的”最少，扎下根来富了的最多。

然而，同一个河西，“气候”有所不齐。玉门市的赤金镇，是铁人王进喜的故乡。几年来它所接受的移民，三分之二以上“跑了”。我们在镇政府办公室里，找见分管移民工作的这个万把人口小镇的镇长，回答：“情况不清楚，得找下面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来谈。”我们直接到村里去，大致算是弄明白了“跑”的直接原因。寒冬时节，数以百计的移民风尘仆仆地来了，汽车、拖拉机把人从火车站送到了村口，这要安置移民的地方，队干部还不知道有移民这回事。这个“插花”移民的地方，东湖三队只有5户“老户”，“插”进来16户，没过完冬就跑得只剩3户了；东沙门一队“老户”11家，一下子送来了22户104个移民，安不下，村里仓库的湿地上铺层草一冬天地睡人，许多移民膝盖肿得

不能打弯，不到1年跑得只剩下2户了。

在安西县的三道沟镇，我们看了至今住在旧羊圈里的3户移民。他们叙说的，是一个悲惨故事：天快黑了，一台拖拉机把他们送到这方圆数十里无人烟的“西荒地”，“突突突”又开走了。行李火车托运，一个月后才运到，这3户12人，在西壁透风的破羊棚里，夜夜用随身带的两床被子撕扯着御寒。当然，两年过去，他们用劳动，开发了已见阳光的新生活，而那镇上村上的主要干部，至今没有去看一眼。

回到移出地。

纵观定西、西海固移民，我们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对“左”的东西的荡涤中，我们的行政表现得成熟了。移民之初，政策的制定者们就提出了一个原则：自愿。关乎人的命运悲欢，不论出于什么理由，不尊重工作对象的意志，必然酿成复杂的社会后果。我们看到，正是因为遵循了这条原则，大多数地方移民工作虽然繁难，却进展顺利。

可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干部都能领会“自愿”的社会价值。

庄浪县永宁乡。一听移民，党委马上举为“中心任务”，喇叭喊，板报写，大会小会讲，一面说迁到河西是“早上栽树，晚上纳凉”，“伸手就能抓个热馍馍”；一面按村子人口分县上派来的指标：兄弟两个的，必须去一个，儿子不去，老子顶上，折腾得全乡乱成一团。那些没见过世面、不知河西详情的移民们，连成片哭，挤成团骂……哭爹喊娘地送出去，不到一年几乎全跑回来了，一点小家当千里路上折腾得光光净净，全都成了“新特困户”。

如今这乡和这县许多类似的乡镇的干部们都在“总结”。“总

结”了他们的“认识不高”、“方法简单”，有一条却没人提到，就是那县政府好大喜功的“指标”——省上协商性的计划是一年1000人，待有了经验，群众体会到了好处再逐年扩大，可县里第一年就提出个全省最高数字——4000。这不单纯是“简单”，在一些干部那里，可复杂着呢——移出去的是人口，“移”进来的，是人均产量、人均收入数的增长，是可以写成上报材料的“政绩”。

景泰县往黄河杨水灌区移民，由于效益好，移民距离近，加上被移区连着干旱，如今已是报名者排队。然而，数以十计的国营企业，身在兰州城，却热心于从这个穷县的土地上经营“福利”，全县灌区被这些企业占故“农场”的土地，近70000亩。记者察看了这些农场中的一部分：有的转包给农场经营者的亲戚，有的出租给远来的外省人，有的就转手给当地的乡、村干部。为了多安排一点移民，这县的移民办主任老万，成年一家家跑着讨地债，真正是乐此不倦。

而在相邻靖远县新开发的兴堡子川黄河灌区移民点上，记者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移民的地还没有划分，东升乡的乡政府，却率先圈了20亩地盖起了“政府院”。这灌区每亩地造价600多元，他们盖的房子，每排门前30平方米一个大花圃，院子后面还圈了10亩大的政府果园，准备着为这里的干部们提供“福利”。同时，全工程土地，已不能满足现有移民申请者的安排，一些相近的山区农民，已开始不顾规划学着样儿“圈”了起来。

同是一个政策，同是共产党领导，同是一种境遇，一样的工作，为什么就行若天地，理同隆冬炎夏？

在这些因贫困而需要移民出去的县份，记者看到许多不正常

现象：有个县工资都发不出去，违章借一家水泥厂的款子维持，县委县府却花了 300 万元，一下子买了两幢气派不凡的办公楼。有个县建了一个宾馆，3 层楼里层层铺着红地毯，屋屋建有卫生间，可你住进去，还得跑到楼外十几米去小便，原因是该县没有自来水，那造价高昂的卫生间是看的不是用的。有个县因为县里有国际援建的项目，借接待外宾，造了一个能接待数百人的大宾馆，一年也就“接待”上那么两个、三个外国人，可宾馆里却安排了数十个县里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宾馆名义买的两台小汽车，也垫在了县委领导屁股底下。

移民本质上是移贫，去贫，那么，这些以“富”表现的真正的贫气，怎样才能移去呢？

这不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问题。

记者手记

逐水草而生存

自从盘古开天地，移动就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能活动促进着社会的发展。

在中华的历史上，朝朝代代都有着大的移民活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移动中定居在黄河流域，促使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开创了黄河文化。原始末期，周文王推行仁政，赢得了民心，扩充势力到了长江流域，使大批周人和周文化迁移入楚，带来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金戈铁马统一六国后，遣谪 50 万“罪徒”到岭南戍边开发，同时派大将军蒙恬率 30 万大军西征出击匈奴，并遣犯人去进行屯垦，从而把汉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巩固了西北边境，促进了这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时，一次往塞外移民达 70 万人，不但提高了这里的生产技术，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上也起了重大作用。魏晋南北朝及宋代的战乱形成过两次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元、明、清时期，或沙漠边民进入内地，或内地人移居

边疆……中华民族是在人类的游动中发展的，中华大地上每个家族都有着一部移民史，伴随而来的也是中华民族的辛酸史和奋进史。

1983年始，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地区悄悄地进行了一场移民活动。

这次移民活动与以往的任何一次移民活动不同，这是一次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一场迁移。这次迁移计划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山区迁移百万左右的农民到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进行开发土地、重建家园活动。

当时在这两个地区约有700万人口，由于人口超载，资源匮乏，使得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有关方面算过这样一笔账，若移出去100万人口，按每人退出5亩地，就能退出500万亩土地和节省100万人的用水和燃料等，国家可以省去向这些地方调粮水的运输费，这些地方也缓解了人的饮水矛盾和人畜饮水矛盾。移出地有着大片的荒地，由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只要移过去的人肯下苦开荒种地，3年之内就可以脱贫致富。而留在当地的人因为自然资源的缓解（移走一个，三人资源两人用），有条件开始向良性循环发展，从而尽快停止破坏植被，解决温饱。

这本来是明摆着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然而，由于历史上每次移民的悲剧色彩，特别是近代史上的几次移民对当地的影响较深，加上当地对以往移民的种种失之偏颇的议论，使得“移民”二字在这里成为了贬义词，为这场移民工作带来不利因素。移民活动也不敢称为移民，甘肃称之为“安置”，设立的机构叫安置办公室；宁夏则称之为“吊庄”。而移民活动一开始，组织者便提出了“不宣传、不公开报道、不引起社会波动”的三不原则。

应该说政府的愿望是好的，组织实施也很细致，但这毕竟是

一次组织农民背井离乡的活动，加上长年积淀的那种“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的故土难离思想，让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热恋过的故土到新的开发地生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面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问题，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让人们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社会、认识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基层，应该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7年的一次记者会上，在汇报线索时，我提出想搞移民采访的想法。因为这时移民工作已进行了4年多，可以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摸索出了一些规律、找到了一些工作中的不足。此时当局对移民工作的报道工作也放开了一条口子，我也最早对移民工作在中青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是中央新闻单位报道最早的，得到了移民机构的首肯，因此此时进行报道，应该说时机也成熟了。编辑部同意了我的意见，会议之后，我就积极进行准备，并到“三西”建设领导小组兰州工作处和甘肃省安置办公室找了不少的资料。

由于有了前面的铺垫，这次的采访工作非常顺利和幸运。安置处不但为我们专门提供了交通工具，安置处的蒋处长还亲自陪同我们走访了甘肃中部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到甘肃河西地区采访时，蒋处长虽然没有陪我们，但都亲自给有关的移民县打电话，要求为我们提供交通、生活及采访上的方便。有了这样的关照，使我们能在20多天的时间里穿行并采访了14个县，在每个县，都能既听到县上整体移民情况的介绍，还能在移民村进行实地采访，基本是是半天走乡跨县，半天听县上的汇报，半天在移民区采访，平均一天半走一个县，这样高的工作效率和安置处给我们提供的方便是分不开的。

在20多天所走、所看、所听、所想中，我们确实感到移民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移民工作的艰辛恐怕也只有在实际的工作

中才会有所感受。移民工作复杂就复杂在影响它的原因太多，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工作方法的、思维方式的等等因素无不左右着移民工作的成败。比如说，有位农民移到新的地方开荒种地，人是很勤劳的，种的又是别人种过的熟地，当年粮食就喜获丰收，照这样下去，不出两年，就能走上致富道路，可是有一天，他的孩子从床上摔下来，脖子受了些伤，于是他说这里的风水不好，坚决要求回去。无论人们怎样劝导，他硬是风雨无阻地回到了他原来那条贫穷的山沟里。还有我们曾有过的扶贫政策，把一些人越扶越懒，穷的什么都没有了，还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反正相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给他找点活干也懒得去干。在移民地，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客观地反映这些东西而不片面追求某种轰动效应，使我们的报道收到了好的效果。

这组报道发表后，安置处以及“三西”办和我们加强了联系，说我们反映问题比较客观和朴素，我们也主动和安置处经常沟通一些情况，以至后来的移民工作会和三西工作会都特邀我们参加，倾听我们的意见，也希望我们给予实事求是的报道。有一段时期，有的媒体对三西移民的报道，确实出现过片面的宣传，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写出来当新闻，使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有所想法。有些新闻工作者还和移民工作者闹对立，成为了当地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或农民中的一些问题如计划生育、故土难离、闲散懒惰等要不要报道，我们和政府间也是有争论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专门探讨此事时，我对有些领导说，只要不是恶意，有此说法可以商榷，比如说计划生育问题，如果不抓紧，移出去100万人口，再生上100万人口，移民工作等于白干。我们还说我们的农民与南方的农民比起来无论经济头脑还是思想观念都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才使得我们干部的工作比起其它地方要难

做，如果我们的农民很有经济头脑，那我们的干部工作就很好做了，这里的干部也就好当了。这种议论和揭示问题即便是有批评的成份，也是比较容易被当地官员接受的。

甘肃和宁夏的这场移民活动经过一些曲折后，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毕竟是一次为没有生存环境的农民找出路的移民活动，是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往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迁移，符合人类活动发展的规律。人们起初有疑虑，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看到了移民的好处，基本上三年都能达到温饱的水平。后来，移民工作已不用再动员了，出现了想方设法走后门要求移民，形势在往另一方面转化，完全不同于我们文章所讲述的那样了。中央领导也曾指示“三西”的有关同志要很好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为以后的三峡库区移民积累一些经验。

我由于一直关注移民的事情，后来专门写了一本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这场移民活动的由来和发展过程，当时的“三西”领导小组组长林乎加同志题写了书名，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同志作了序，算是对这段工作的总结。后来我离开了兰州，目前的移民状况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所叙，无非是想说，新闻的批评报道是必要的，但一定要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这种批评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对于善意的失误，不必刻薄地挖苦，否则凭一时痛快，留下一种敌对，于将来的工作并无多少益处。

时间：1987年8月8日至26日

作者：朱会伦

“部令专车”案侦破前后

朱会伦：艰难的采访

“部令专车”案侦破前后

1987年3月3日，《人民日报》一版上登出了一条重要新闻：6月27日，成都破获一起利用“部令专车”（即这种车皮享有不受检查、不须编组、有车头即可挂走等特权）武装押运的特大非法贩烟案。21名烟贩被当场扣获，价值20余万元的33000多条香烟被没收。此案正在作深入调查。

《人民日报》刊登这条消息时加编者按说：光天化日之下，在铁路川黔线上竟发生利用“部令专车”武装押运非法贩运香烟的特大案件。案犯目无党纪国法到了如此猖狂的地步，背后没有人指使和支持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同一天，铁道部部长丁关根针对这一案件指出：利用“部令专车”武装押运进行贩卖活动，是我国铁路史上罕见的犯罪案

件，是铁路部门的耻辱。一定要追查到底，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严厉惩办！

—

1987年6月26日，四川省烟草专卖局突然收到一封从贵阳拍来的匿名电报：“请接602121号烟车，今日已发，龙潭寺前后站。”

经查，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和成都市烟草专卖局均未在贵阳进烟。

情况可疑！

市烟草专卖局的同志立即赶到成都市民警治安大队，要求协助查处。

治安大队的陈永明队长和检指科的严鹄科长，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作出判断：这是一次非法贩烟犯罪活动！绝不能放任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当晚10时许，夜色朦胧。一张经过精密编织的网在成都东部、石板滩站、龙潭寺站悄悄地撒开了。24双机敏的眼睛在若干个点上严密地监视着3个站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约11时，车站的陈晓刚发现通往成都铁路局材料总厂的走行线上，有一伙人鬼鬼祟祟，点着蜡烛，神秘而紧张地在装卸什么。旁边停靠着一节标有“部令87（107）局管内”字样的车皮。几辆卡车和微型汽车分别排列在这节车皮的周围。

陈晓刚火速赶到观察点大本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战友温国华。

“小温，你和烟草专卖局的同志去落实一下，那里是不是在卸烟？我随后着装就来！”

小温和市烟草专卖局的两位同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数米远以外走过。

“是烟！有‘黄果树’、‘花溪’……”烟草专卖局的同志按捺不住说道。

怎么办？我们只有两个人。而且我穿的还是便服。平时少言寡语的小温迅速思考着。

要立即控制局面，停止装烟，不能让其中的人溜了！

说时迟，那时快。小温“嗖”的一声，从枪盒里抽出手枪，“咔嚓”一声推上膛，突如其来地命令道：

“谁也不许动！都到那边去蹲下！”小温用手指了一个地方。同时，烟草局的一位同志把小温给他的警用电筒照得通亮。

随着枪弹的上膛声，面对持枪的小温和突如其来的命令，正在聚精会神地卸烟的19个烟贩顿时不知所措，全部乖乖地到旁边蹲了下来。这时，陈晓刚也身着民警服赶到了现场。他立即用对讲机向队部报告，请求支援。

此时，停在外面已装好的两辆车（一辆邮车、一辆微型汽车），见势不妙，趁机夺路而逃。

陈晓刚、温国华严密监视着这伙烟贩，关上标有部令600212号车车皮的门，等待支援。这时，百米以外的黑暗中，突然有两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二

这两个人影，一个是贵阳铁路分局生活服务段保卫股的股长修光荣。他身上带着“五四”式手枪和数十发子弹。是专程从贵阳赶来押护烟款的。另一名是成都铁工局劳动服务公司营业员朱镇山。

此时，二人一直在黑暗中监视着卸烟的情况。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糟了，出事啦！二人慌忙给东站调度员罗克明打电话，要求“按计划行事”。

罗克明接到电话后，伙同正在值班的杨正勇，调动机车，向装着香烟的车皮开去。

增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副大队长周长远马上指挥将车皮里的香烟装入被扣下的汽车，运往国库。同时，派人搜索周围。

不一会儿，刚刚打完电话、返回卸烟处附近的朱镇山被抓获了，接着又发现了修光荣。修神色可疑，前言不搭后语。公安人员邓方志迅速插上前去，不等修回头，已从他身上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和 10 发子弹。

正在此时，“哐啷”一声，一个突如其来的车头，已将装有香烟的车皮和另外几节车箱挂上，要强行拖走。

公安人员迅速赶到车头，向驾驶人员交涉：车皮内装有非法贩运倒卖的香烟，公安机关正在查处，不能拉走离开现场。

驾驶员马上用对讲机进行联系。只听对讲机传来对方的回答说：

“不管他们的。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轰隆”一响。不顾公安人员的劝阻，车头把装有违法香烟的车皮拖走了。

这时已是 28 日凌晨一点。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车皮将要拖向何方？干警们不得而知。4 名干警迅速跳上车去，不顾个人安危，随车而行。车在人在，人在赃物在。

这是一个早就阴谋策划好的“行动计划”。早在 26 日下午，贵铁分局生活服务段前来成都销烟的高宗仁（生活段劳动服务公司主任）、张静、修光荣等人先期到达成都，召集早已熟悉的烟

贩朱镇山、张明琼等人，密谋销烟车皮停靠的地点及烟价。开初，有人提出在龙潭寺站下，没有达成协议；接着有人提出停靠天迴镇，因易暴露，也遭到否决。最后一致同意停靠繁忙而不易被发现的成都东站。

商妥以后，高宗仁等人又打电话从东站招来调度员罗克明，一边请他吃饭，一边制定了“万一暴露”后，即调车头将车皮拉走的“行动计划”。

烟车被拖到成都铁路局材料总厂。

车下的公安干警火速跟踪，赶到材料总厂。奇怪的事出现了！公安人员讲明身分、出示证件，提出进厂的正当理由后，门卫仍然坚决不让公安人员进厂。治安大队的负责人耐着性子，交涉了半小时之久，毫无结果。

相持之下，随同协助查烟的市烟草局的同志拨通了成都铁路分局企管办×主任的电话，讲明情况，对方回答说：“我管不了！”又与该局物管处×处长联系。×处长通知门卫，公安人员才得以进厂。

当晚，截获的3万多条香烟，全部被收缴，安全地运进了国库。21名案犯被带回传讯或审讯。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结束了！

三

审讯，正在加紧进行。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叫张静。今年31岁。是贵阳铁路分局生活管理段职工。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贩卖烟的？多少次了？

答：1984年，我调到段上就开始做烟生意了。前前后后约有20次。每次少则几十箱，多则几百箱（每箱50条），购烟使

用的是公款。起初使用支票，后来用现金。赚的钱，一部分段上用来发奖金，一部分用来买汽车。已买了一辆小北京，一辆双排座的日本丰田。今年段上的办公用品全换了，约花12万元。另外赚的钱还修了一栋6层楼的招待所。有时段上还给我们发奖金。有一次给发了500元，今年2月一次给我发了600元。为了搞到烟，段上要给一些经办人送礼。如节假日，要给贵阳烟草公司经理部×××、×××送苹果，给贵州省烟草公司经理部×××、×××送茅台酒。

.....

问：你是干什么的？

答：我叫修光荣。贵阳铁路分局生活管理段保卫股长。

问：你要如实交待你押烟的问题。

答：我们保卫股是从去年9月开始派人参与来成都押护烟款的。先后来了6次。6月21日，段上的领导通知我到成都押款。22日上午，我去贵阳铁路公安局二科，办了临时持枪证。我只说到成都出差。他们也没有问我。具体多少烟，卖多少钱一条，我不管。我的任务就是把烟款安全护送回贵阳就行了。

问：你叫汪涛吗？

答：是的。

问：你要交待清楚你贩烟的问题。

答：我1984年任贵阳铁路分局生活管理段业务室副主任，兼商业服务部经理。

“我知道倒卖香烟是违法行为。但我认为并不会出大的问题。出了事，通通关系就行了。今年5月，我们的一车烟入川后在新都县石板滩被查。我们给邹段长（贵铁分局生活段段长）通了电话，邹段长找到分局（贵铁分局）的×局长（实为副局长），×局长给成都铁路分局的一名局长（也是一名副局长）打电话，这

位局长，就以“双代会”（职代会、先代会）用烟为名，下令石板滩站将烟车放行了。事后，邹段长还安慰大家说没关系。贩烟收入，一部分上会计账，一部分入段上的小金库。怎么上，由邹段长一句话决定，除发奖金外，我还一次得了1000元，一次得了1200元。”

汪涛其人，成都公安部门并不陌生。早在去年9月，他贩烟成都，为逃避侦察，丢下19000元的现金溜走了。去年12月，他再次来蓉贩烟，公安机关跟踪追查他两天两夜，跑了8个县。最后，他溜之大吉。这次案发后，在贵阳被收审，于7月17日从贵阳押往成都。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朱镇山。1982年在成都铁二局当材料工。1984年底调铁二局劳动服务公司供销经理部当营业员至今。

下面是朱镇山的交待：从1985年以来，我先后参加贩烟活动共有11次。今年有5次。其中销售倒卖涉及的单位有铁二局劳动服务公司、成铁局经营部、铁二局建筑处、成铁局机关劳动服务公司。还有很多个体户。我主要帮助销售倒手，从中获利。

6月28日，在搜查朱镇山家时，搜查出电冰箱3台、彩电一台、电冰箱发票6张，自行车发票4张，购销烟各种单据若干张，空白介绍信若干张，茅台、董酒15箱。

四

一位普通公民对记者说：这次“6·26”特大贩烟案公诸于众，应该给新闻界记上一功，特别是给首先冒危险披露这一事件的成都电视台和《成都晚报》记上一功。

6月28日晚，信息灵敏的成都电视台，在当晚7点40分的

新闻节目中，用文字和录像生动地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

成都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当即打电话给市公安部门询问此事。随后，市里的负责同志迅速调看了电视台的录像。并作了指示。

6月30日，《成都晚报》报道此案后，成都市街头巷尾，更是议论纷纷。

7月2日，《四川日报》作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当日下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省长蒋民宽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也调看了成都电视台拍摄的破获“6.27”大烟案的片子。杨汝岱指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是正面支持保卫改革、开放、搞活。这一案件抓得好！要一抓到底，查个水落石出。查到哪里就追到那里，不管他是谁！中共四川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白尚武同志负责此案的领导工作。

7月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了烟案的消息。铁道部、烟草专卖部门及有关各部门纷纷表态、指示，要坚决清查，一查到底。

然而，发生在去年底同样性质的一起非法贩烟案，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成都客运段多种经营公司，从贵阳贩运一车皮卷烟到成都倒卖，被成都市烟草专卖局、市治安大队于1986年12月24日查获，共计2万多条。

这起贩烟案性质也是严重的。当时成都电视台也录好像，《成都晚报》也写好了稿，正准备报道，可是有人通过负责同志打招呼，把新闻稿卡了下来。于是未能引起更上一级部门的关注，也未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据说不报道有两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临近春运时期，怕报道后影响职工的积极性；二是客运段刚评上全国的先进，报道了对客运段影响不好。

一名记者不无深刻地说：“如果当初报道了那则新闻，有些铁路部门恐怕不会陷得今天这么深！有些领导恐怕帮的是倒忙！”

难怪“6·27”烟案破获以后，被抓获的高宗仁还若无其事地对同伴和烟贩们打气说：“不要紧，等我们头头一来，他们就得放人！”

案发后的7月1日下午，贵铁分局生活段的副段长李大富和另外一个人，持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到成都市治安大队专案组。声称受该局×局长的委托来蓉，证明高宗仁、张静等人这次贩烟活动是受组织指派的，要求经济上从宽处理，把收审的人放回。遭到公安人员的当场拒绝。

报纸披露“6·27”烟案后，对报社、新闻记者的威胁、恐吓、侮辱的怪事接连不断。

见报后不到5天，《成都晚报》就收到匿名恐吓信。与此同时，还不断接到打听写报道记者的去向的匿名电话。在贵阳，记者采访时竟受到跟踪……

五

“6·27”烟案的侦破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夺路而逃的那两辆邮车和微型车呢？跑到哪里去了？

《四川日报》报道时，详细地叙述了逃跑时的情况。这引起了四川省和成都市邮电部门的重视。邮车，一定是邮电部门的。他们立即指派有关人员进行清查。

7月2日，一个电话打到了治安大队专案组说：“成都市邮

政局运输科驾驶员刘吉林很可疑。27日晚8至10时，车和人去向不明”。

刘吉林被带到治安大队。开始他矢口否认。但在严科长这位老公安人员威严而富有经验的目光下，刘吉林神色慌乱，终于坦白了。

“烟放在什么地方？”老严追问道。

“放在沙河堡一户农民家里。”

严科长带上人马，立即驱车前往沙河堡追烟。

来到沙河堡农民周兆玉家。一查，只有950条烟。

“其余的烟呢？”严科长追问说。

周回答其弟周兆友已取走。

严科长灵机一动，带上周兆玉火速赶到周兆友家。当场抓获烟贩周兆友、周兆军和米泽英3人。缴获了米泽英销烟的7187元现金。

原来，这一邮车烟，是黑市烟贩米泽英和周兆友、张朝贵3人合伙干的。他们从二道贩子朱镇山之手倒买后，再倒卖到四道贩子手中，从中牟利。全车共拉走“黄果树”、“云雾山”等香烟8850条，除追回的950条外，其余的已全部倒卖。就在米泽英、周兆友被抓获的当天，张朝贵也自动到专案组自首。

邮政部门早有规定，不得利用邮车和工作之便，违法运载和邮寄香烟（按规定只能邮寄两条）。刘吉林明知故犯，现已被停职检查。

至此，“6·27”烟案部令专车600212号车的香烟，已追回收缴39079条烟，现金140720元。其余小部分条烟被那辆微型车拉走，现在仍在侦破中。

六

成都铁路部门违法贩烟由来已久。据四川省烟草专卖部门提供的档案材料表明，在最近成都查获的铁路特大贩烟案之前，烟草专卖局已多次查获成都铁路局下属一些单位的违法贩烟案件。这是新华社7月14发出的电文。

事实确是如此！

就在公安部门全力以赴侦破部令专车600212号车的“6·27”烟案时，另一辆部令专车正在贵州开往成都的铁路上悄悄地运行。

这车共装烟（“云烟”、“红塔山”、“阿诗玛”）953箱，46750条。由铁道部成都第二工程局第一生活采购站从贵阳非法贩运至成都。于6月26日从贵州董公寺出发，6月30日凌晨一点到达成都。

慑于侦破打击“6·27”烟案的威力，到达成都后，铁二局第一生活采购站的几位领导为了逃避打击，以“减少损失”为名，分三处将这些烟转移藏匿。并迅速派人专程到贵阳篡改发票，以总数总额不变，改成多次进烟（实际上是一次进的）的若干张发票，以应付专案组的检查。

同时，又指派两路人马，分赴遵义和湖南，撤销该站今年6至8月与两地已定的购烟合同。

这一车烟实际上才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封匿名电报揭发的602121号车。而公安机关先前破获的600212号车，却是歪打正着，意外的收获。

602121号车皮的香烟卸入铁二局一材料厂仓库后，7月4日，已将车皮偷偷调往江津。

根据群众揭发和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这一车皮烟于7月7日破获。

据查证，铁二局第一生活采购站非法贩运倒卖香烟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至今已先后贩运了16次。数额达17559箱，877950条，总价值为465万元，非法牟利数十万元。

四川省公安厅的负责人在7月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铁二局第一生活采购站从未获得四川、贵州两省的烟草专卖部门的批发许可证，故其进行的香烟批发活动属非法。并说：对违法犯罪人员，将依法惩处。

7月18日，铁二局党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撤销生活处处长、处党委书记许成奎的职务。

在公安人员的努力下，“6·27”烟案案情不断向纵深发展。牵涉的面不断扩大，人员急骤增多。

据案犯交待，铁道部第五工程局成都生活采购站也在非法贩运香烟。

正待公安人员急需查实时，7月20日，铁五局生活采购站主动派人到专案组说明情况，交待了该站从1986年11月到今年5月，先后8次从贵阳购进云雾山、黄果树、红塔山等高中档香烟共3122箱，156100条，到成都倒卖，从中获利数万元。

1986年7月，成铁贵阳分局直属贸易公司，采用非法手段套购贩运香烟62349条，到成都黑市高价倒卖，被成都市烟草专卖部门查获。案发后，该贸易公司派人到专卖局行贿自行车、名酒，还表示要送彩电，遭到拒绝后，丢下自行车、名酒就跑了。1986年12月25日，成都铁路局客运段多种经营办公室贩烟被查获。

1986年5月10日，铁二局贵阳生活采购站利用部令专车（车皮号为60—605375）非法贩运香烟35000条，到重庆高价倒

卖，被重庆市烟草专卖局查获。于当年8月11日处以没收非法利润10823元，罚款20429元。

请看，成都铁路部门非法投运倒卖香烟，到了何等地步！难道其领导部门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有趣的是，1985年成都铁路局和四川烟草专卖局就烟草专卖品的运输问题，还专门发了一个正正经经的文件。文件指出：“凡需调运省外的卷烟、雪茄烟、烤烟，一律凭省级烟草公司根据烟草总公司的调拨计划、文件或合同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手续。铁路整车运输卷烟、雪茄烟……，凭要车计划表由省烟草公司汇总审查，并加盖烟草运输专用章后办理托运。无准运证明和省烟草公司运输专用章的要车计划，铁路、交通运输部门拒绝审批和承运。”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文件印发后的去年和今年，成都铁路部门竞相非法贩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潮！难道这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

七

案犯交待，“6·27”贩烟是领导让他们干的！

谁？哪些领导？烟从何而来？什么时候开始的？获取暴利多少？

一个由公安干警、市烟草公司、成铁局公安处组成的联合专案调查组组成了。7月4日，他们前往贵阳。

在贵阳，专案组遍访了贵铁分局生活段的干部和群众；在遵义，他们一笔一笔核实数目；在安顺市，他们实地调查了进烟的情况；他们走访了省、市烟草部门；调查了贵阳市10个烟草批发站……

事情终于清楚了：

贵铁分局生活段，贩运倒卖香烟已有相当历史。早在 1984 年，就有人干了。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由领导指挥、业务室经营，专人负责的工作班子，多次采用非法手段利用部令专车，套购香烟到成都倒卖。

1986 年 4 月，根据群众的反映和有关领导的指示，生活段纪委指派保卫干事 × × 追查汪涛等人在成都贩烟的事。可笑的是，追查不但没有结果，以后 × × 本人也参与到贩烟的活动中去了。

1986 年，在贵铁分局生活段有一个现象一直存在：一方面是纪委书记带着一个小组在清查段上某些人贩烟倒卖活动；另一方面段长邹振贻却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张旗鼓地动用公款、人力、物力进行贩烟倒卖活动。

现已查明，“6·27”这车皮烟，是由段长邹振贻一手指挥，段党委书记吕德东同意，副段长李大富签字办理押运销售人员免票手续，于 6 月 24 日从贵阳北站发车，开往成都的。

这车烟的主要来源是从贵州省烟草公司经营部、贵阳筑城综合服务部、遵义地委招待所劳动服务公司、绥阳县烟草公司等地购进的。在成都倒卖后，至少可获利 3 万多元。

现在，贵铁分局生活段段长邹振贻已被撤职收审，段党委书记吕德东，副段长李大富已被撤职；段纪委书记汤志奇已被免职。

八

有人提出，“贵铁分局生活段这么长时间，进行违法贩烟倒卖活动，难道分局领导真的不知道吗？”

早在1986年4月，群众对生活段的贩烟行为，就有揭发反映。分局的有关领导还专门指示，要段纪委查处汪涛的贩烟倒卖活动。

1986年7月，贵铁分局所属的直属贸易公司倒卖香烟，在成都被查获后，分局还出面做工作，协助进行解决。

记者在贵铁分局采访时，分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局领导也多次给段上打过招呼，叫他们不要搞。可他们就是不听！

当记者提出5月石板滩那次，×副局长为何要给成都打电话时，这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是邹振贻骗了这位副局长，说了假话。

当记者提出成铁分局“双代会”并未提出要烟，这位副局长为何不调查清楚，就随意表态支持，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时，对方无言以对。

明明知道，仅仅打个招呼，不采取措施；事出以后，不调查，不弄清楚，就轻率地相信，表态，利用手中权力，给违法行为开绿灯，以上当受骗推卸责任。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对待人民的利益，对待违法犯罪的！

因此，人民有责任问他们：你们在如此猖狂的违法贩烟活动里应负什么责任？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生活段在贵铁分局和他们上级的眼里，不但没有劣迹，而且是局里的“荣誉”和“宝贝”。1986年，生活段被成都铁路局命名为6个分局中最早的“文明生活段”之一。同时，还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生活系统的“先进集体”。

如果不是“6·27”烟案的爆发，今年7月，铁道部全国路段生活系统的先进集体现场会，将在贵铁分局生活段召开。段上的领导还将在会上介绍他们生活管理的“先进经验”。

九

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人7月3日表态说：成都铁路局无视国家法令，利用部令列车武装押运贩卖卷烟，实属胆大妄为的恶性投机倒把案件，不严肃查办不足以平民愤。

表态的当天，不少人很纳闷：这些烟从何而来？难道不是从烟草生产和销售部门出来的吗？

为此，记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牢骚满腹，气愤已极的烟客一个又一个反映，北京、上海、广州、四川、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的国营商店里，几乎都买不到好烟。而在私人的烟摊上，则比比皆是，应有尽有！价格都要高出1至3倍。

国营商店的好烟到那里去了呢？

这些私人烟摊上的好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请看看烟草专卖的管理。

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烟草专卖条例》，并相应地建立了各级烟草专卖部门。对烟草的专卖实行国家经营。这样的目的在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提高质量、改善供应、调节消费、增加积累。

《烟草专卖条例》规定：卷烟、雪茄烟的国内市场由烟草总公司统一安排。卷烟、雪茄烟的收购、分配、调拨、批发业务由烟草公司及其委托单位统一经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该项业务。生产企业不得自行销售。并规定没有领取专卖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卷烟、雪茄烟零售业务或烟丝产销业务。条例还规定：卷烟、雪茄烟的出厂价格、调拨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由烟草总公司统一制定。未经制定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变动，也不得变相提价或降价。卷烟、雪

茄烟的运输，必须持有烟草公司证明，方可办理托运手续。

事实上这个《条例》是不尽完善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完善《条例》，各地也不认真执行。仅贵阳市第七批发站 1986 年 8 月至 12 月，就批发给四川省江津县的个体户烟贩陈治行 9352 箱、467600 条香烟，价值 242 万元。

按《条例》规定，擅自提价、降价的单位或个人，除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外，并处以商品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无准运证明，擅自托运烤烟、雪茄烟、烟丝者，处以相当于调拨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这就是《条例》中对违法者经济上最严重的处罚了。然而，这对赚大钱的烟贩来说，只不过是拔一根毫毛而已。如今已根本达不到处罚他们的目的！贵阳有一个个体户，早在两年前就违反了高价倒卖的规定。当宣布对他处以 800 元的罚款时，他吃了一惊：“才 800 元！我带了 2000 元，还担心不够呢？这点小意思！”他大大方方掏出 800 元往桌上一丢，毫无悔改之意大摇大摆地走了！

许多地方的烟草专卖部门，对烟草的批发业务没有严格的批发对象。对国营、集体、个体的批发没有区别、限制和指导，想给国营批三五千条就批三五千条，想给个体户批上一万条，就批一万条。由于国营商店不敢给批发人员“好处”，而个体商贩则可以送自行车、彩电，自然批发人员对国营商店刻薄，而对个体户优惠了。

好烟的搭配也一样，往往国营商店好烟搭配数量少，而个体户搭配数量高。高档烟，个体户可以自行提高价格倒卖，低档烟个体户则可以降低价格倾销，个体户随行就市，资金周转快，短期内就赚大钱。而国营商店则不敢提高或降低价格销售，低档烟大量积压，一积压，就不敢进货。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搭配回

的好烟也不敢放到柜台上卖。一放上柜台，非把柜台给你挤烂不可。本来就少，何不落得个清闲。于是，这极少的一部分好烟正好被商店拿来拉关系，走后门，搞协作，有的走上犯罪道路。

四川宜宾地区一家烟草专卖部门，为了获得一批彩电，而成都一家糖酒公司则为了获得高档香烟，于是一桩以数万条高档香烟换 16 部索尼原装彩电的生意做成了；1985 年底，四川甲级烟供应异常紧张，然而，内江市一家烟草专卖公司则不惜把 875 箱、4 万多条香烟，运往广州，从广州换回一辆皇冠牌小轿车，据说对方还帮该公司的经理和办公室主任一人买了一台“旧彩电”；1986 年，四川渡口市一烟草公司经理因受贿，投机倒把罪被判刑；1985 年广州一卷烟厂厂长，因受贿等罪被枪决；湖南常德一烟厂厂长因贪污、受贿、流氓罪，被处决。

事实，真可谓触目惊心！

记者手记

艰难的采访

采访《“部令专车”案侦破前后》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发生在1987年6月成都至贵阳之间的一起以部令专车、武装押运、非法倒卖香烟的案件震惊了全国，惊动了中央。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丁关根发表谈话说：利用部令专车武装押运进行贩卖活动，是我国铁路史上罕见的犯罪案件，一定要追查到底，不论涉及谁，都要严厉惩办！

案情发生在1987年的6月26日，这起案件首先是由一封从贵阳拍至成都的匿名举报电话而引发的。当天，四川省烟草专卖局收到一封从贵阳拍来的电报。电报说，有一烟车从贵阳发至成都，请接站。而四川省烟草专卖局感到奇怪，省、市烟草部门并未从贵阳进烟。事情极为可疑。于是，案件就这样展开了。

经过省、市烟草局的周密布防，在成都市治安大队的全力支持下，6月27日，成都市破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以“部令专车”（即这种车皮有不受检查，不需编组，有车头即可挂走的

特权)，武装押运的特大非法贩烟案。

案件破获后，成都的省、市新闻媒体迅速作出了报道。几天后的7月3日，《人民日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案件，并在编者按中说：光天化日之下，在铁路川黔线上竟发生利用“部令专车”武装押运非法贩运香烟的特大案件。案犯目无党纪国法到了如此猖狂的地步，背后没有人指使和支持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这起案件，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报》驻四川的记者，对这起案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案件是破获了，烟车被押了，香烟已被转运进了国库，人也被抓获。然而，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是谁指使干的？是哪些人干的？为什么要武装押运？谁批准的部令专车？等等，都需要作出回答，都需要了解并且向读者披露。

于是，我开始介入这起案件的采访和报道。

这起案件首先在成都市曝光后，迅速在成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省、市部门都纷纷表态要严查此案，成都铁路局的态度也很坚决，绝不姑息犯罪分子。一时间，市民们议论纷纷，犯罪分子陷入舆论的包围之中。就在《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成都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这起案件报道后的第3天，《成都晚报》的负责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称：“限你们在7月7日以后不许再报道烟案的事了。否则，我们就炸平你们晚报。我们已安放了炸弹。”并在信中用恶毒的下流语言说：“我们已轮奸了你们的几名女记者。她们知道我们的××有多长多大。”他们还威胁说：“你们再报道，我们就把那几名女记者的尸体放在你们社门口。”

一时间，成都的新闻单位搞得很紧张，担心贩烟团伙对新闻单位进行报复。一些报刊的记者采写报道，不敢再刊登记者真名了。《成都晚报》更是风声鹤唳，将后门关闭，前门也加强了警

卫。公安部门在暗中加强对晚报的保卫，24小时巡逻。与此同时，一些采访报道烟案的记者不断接到匿名威胁电话。还有人专门打听调查这些记者的行踪。

为了搞清这起案件的真相，我在案件发生后便迅速投入采访。先是搞清这起案件的破案复杂过程，接着旁听对案犯的审讯，再查看记录。那几天是白天黑夜熬战。在把成都的问题搞清后，还需要到案件的另一端贵阳去采访。我和《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等单位的几名记者在贵阳采访，简直像搞地下活动。与知情者谈情况，要秘密地进行，有接头暗号、接头地点。有时往往要反复几次才能取得联系。对方还要对记者加以考察，经过多次在电话中交谈后，认为你有正义感，敢说真话，敢于把这些黑幕见诸报端，才与你接触，才给你提供情况。有一天，在我们几个记者住的房门口，发现了一个红白相交的三角标记。大家好生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公安人员来看了研究后说，这是一种恐吓标记，意思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这一下，记者们更紧张了。有几位记者马上转移了地方，公开的采访，转入了“地下”。有一天，有一位记者接到一个不知名的电话，要求接受采访，提供材料。这位打电话的人只许去一人，不许带录音机，不能在公开人多的地方，要到他指定的地方接受采访。这位记者担心采访中的安全问题，但又不愿放弃这个采访机会，说不定能真正了解很多内幕。经与调查组破案的公安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安全措施，记者只身深入采访，公安人员身带武器便衣随后保持距离进行监视保卫。还好，这是一次真正的采访。

有一天，一个不愿披露姓名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为我报提供材料。按照他的要求和联系地点，我去了。然而，到了那里后，我等了10余分钟，仍不见人，正在犹豫是否上当时，有一

位中年女同志出现了。她问我是姓朱吗？当我回答是《中国青年报》的朱会伦时，她才解释她代替其丈夫来接我。她带我走过了两条街，才把我交给了她丈夫。这位中年男子经过对我一番“反调查”、“反采访”后，才露出了对我的信任。他随后向我提供了贵阳市有关部门长期贩运倒卖香烟牟取暴利的情况，并认为这起贩烟案是有关领导长期以来视而不见、姑息纵容的结果。这位中年男子接受了我的采访，但手里并没有材料。随后他又带我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一个住地取出了一包材料给我。他说，这样做不是对你不信任，是怕把材料给了不信任的人。那天采访完取走材料，天色已晚。事后，我还真有点担心，要是真遇上一个贩烟团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为了弄清这些香烟是谁批的，是谁同意用“部令专车”运输的，是谁派人押运的，我们到贵阳市烟草部门采访，烟草部门说领导不在，不接受采访；我们到商业部门采访，商业部门的领导说，这事应找省委、找宣传部门，他们拒绝接受采访；我们到贵阳铁路部门，铁路部门说，此事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他们不便说话。整个上层采访陷入了僵局。

好在记者总是有办法。东方不亮西方亮，上层采访不到就采访中层，中层采访不到就采访群众。有些情况不能从组织那里得到，再回过头来找专案组，专案组给予了友好的配合。在贵阳一个星期艰难的采访结束了，我便火速赶回成都进行写作。

8月8日，《“部令专车”案侦破前后》一文，便开始在《中国青年报》连载。反响是强烈的。那几天，争看《中国青年报》“烟案”一文的读者可不少，有些读者是等着看报纸。与此同时，四川的《青年晨报》也用一版半的篇幅刊载了这篇长达16000字的报道。《青年晨报》这天的报纸成为最抢手的报纸，价格卖到2角一张（原价5分）。贵阳还有人私自翻印这张报纸到街上卖，

赚钱。

我采写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以及其它报纸刊登转载之后，完全没有想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首先是我不断接到各种恐吓电话，提醒我要“小心点”。我回答他们我当然要“小心”。我家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成都市的公安部门对我家采取了暗中保护措施。那一段我要么就少出门，要么就远出门，趋利避害。这篇报道，还引起了四川省的一些领导的大为不满，说这篇报道有损安定团结，不宜详细公开报道。成都铁路部门更是大为光火，因此而使横祸殃及到《中国青年》报驻川站的挂靠单位共青团四川省委。团省委在铁路局窗口的卧铺定票计划待遇，因此一度惨遭停止。团省委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同志对我也极有意见。我感到很无奈。

采写有影响的报道，是很艰苦的，同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我想，这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是值得的。一个人的一生中遇不上几次好的机会，特别是重要的机会是难得的。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如果再遇上这样有影响的机会，我还是会不怕艰难地去采访，我还是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将义无反顾！

时间：1987年7月14日

作者：王安

公开的新闻内幕

王安：遭遇有悖新闻

公开的新闻内幕

——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

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结伴的一个记者团近日将到达兰州，结束40多天的西北旅行。此文记述的是这支记者团以及它的牵头者——《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的故事。虽然这类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却掩口不提，其间有什么“猫儿匿”？

6月4日

有一个记者团，说是什么笔会，大西北转一圈，吃住行全管——这美差摊给了我。

我去取飞西安的机票。《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的张东升握住我的手，话带着甜音：“怎么样，20多天没问题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请多帮忙。”

“好说，扛包提箱的事只管叫我。”

6月6日

凌晨1点到西安，住小寨饭店。

上午去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接待室里挂着一片锦旗和奖状。双方互通姓名后，厂方介绍情况，下午参观。这是个技术密集型企业，贴墙纸防火地毯日本冷风机，相当现代化。

晚上逛西安夜市。《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记者张波说：“我干新闻时间不长，可总觉得这样干不对味。”他是指由企业摊钱请新闻单位采访。

我是第一次参加记者团，这类事还没想透。实业界与新闻界相互融通，也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记者团难出好稿，这倒早有所闻。回到饭店，我给报社发了封信，说：“我好像入了个套子。”

6月7日

老吕离团走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中央电视台的，现在才听说他是某学院电教室的。他带的录像机是租的，一天要100元。拍不了片子，也拖不起，只好走了。这样，记者团只剩11个人了。

去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的检波器分厂，还是老一套：介绍情况，参观车间食堂宿舍幼儿园，座谈照相吃饭上车回饭店。

又是一天。回想起来，好像只是贴墙纸防火地毯日本冷风机。今儿的厂与昨儿的厂，与明儿的后儿的什么厂（明天干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比如党政关系，介绍得都不错，写哪个厂都行。可眼下我为什么要采访这个厂？很明白，跟了团，跟了饭票走。

6月8日

厂家派车拉我们游了半坡遗址、兵马俑和华清池。

下午看到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甲方（《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保证按乙方要求的报纸（《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工人日报》、《中国机械报》)的上稿质量;乙方(甘肃天水长城电工合金材料厂)在5月15日前汇款5000元到甲方银行账户;如甲方没按协议办,全部退款。

我总惦着协议书的事,以致当听到一则电视广告“……可以赊购”时,我马上想到我自己:我正在赊吃赊住赊玩呢!

6月9日

参观陕西重型机器厂,程序照旧。

晚饭前,我们几人聚在一起,商议进行“兵谏”(昨天刚去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华清池)。混了几天,大家已不耐烦。

正说间,张东升进来了。他走到哪哪就热闹:“北京某报在新闻界最臭,走到哪吃到哪,威力无比!……”张东升就有这本事,把一些并不新鲜的新闻界情形串在一块,让你北京来的记者都插不上嘴。刚见面时我以为他有30多岁,其实只有23岁,真是个人才。这么热闹,大家也不好“谏”个什么了,且罢。

晚饭后,大家硬请张东升介绍行程安排。张东升说:“明天去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们新拍了《老井》。西安完了去延安、宝鸡,我们可以去扶风县法门寺看佛指舍利。还有天水、西宁、麦积山、青海湖、格尔木、敦煌……这样算下来,时间可能出了月底。”

虽然时间含糊了些,但那些好去处令人神往,大家心里稍安。

6月10日

上午去西安电影制片厂。

中午在黎明泡馍馆吃陕西名吃羊肉泡馍。席间,西安冷冻机厂厂长来敬酒,方知这一餐是他们厂请的。

这么多天了,我还一字没写。记者团第一篇成稿是:《双增双节的新阵地——西安石油仪器厂职工食堂餐馆化的启事》。

6月11日

早晨去国营262厂。进门一横幅：“热烈欢迎中央新闻采访团来我厂莅临指导。”众人大惊。

晚饭桌上厂里一位同志说：“诸位一定能有几篇杰作吧？”众人忙说：“发稿权不在我们手里。”

张东升拿来他去青海湖的照片给大家看，云白水蓝——青海湖在召唤。

6月12日

在黄河机器制造厂，厂方介绍引进电冰箱生产线“点菜拼盘”经验——能自己生产的就不引进；又讲起过五关斩六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过程。

这也许是一件微观效益很高的事例。但据说全国家电生产线已呈过剩趋势，是不是正是由于微观积极而宏观失控所造成的？拿不准，没有宏观概念，至今我们没有与任何一级主管部门接触。

晚上，张东升在我门前来回走了几趟。正不知什么事，他进来了，让我去“捧捧场”，前天中午请我们吃羊肉泡馍的西安冷冻机厂厂长来了。

到了张东升屋里，大家已坐齐。厂长给了一份1986年6月8日的材料《三中全会促进了西冷厂变化》，然后介绍了该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最后，漫不经心地说出他们与黄河厂搞联营时遇到的一点儿纠纷。

众人一听就明白了，安慰了一番。也许有人想弄个明白，可中午刚在黄河厂吃的饭，现在又能说什么呢？咳，小小的西冷厂，怪可怜的。

忽然，我觉得我也怪可怜的，象是被人卖了。

6月13日

早饭桌上，《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吴副站长说，他们记者站有个女记者是最能干的，她去年拉广告拉了26万元，在公共汽车上她都能拉成广告，可惜她死了。众叹息一番。

原订今天去西安仪表厂，不知为什么没去。大家只好憋在屋里。上午10点钟，团里3位老同志提请与《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薛主任等一班人会谈，我私下称之为“第二次兵谏”。

中午，“兵谏”结果出来了，新华社丁曼约法三章：1. 不要对外叫记者团；2. 不承担宣传义务，不是参观了工厂就一定要宣传，遇到不好的事我们可能还要批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3. 不接受礼品。

6月14日

早上6点被叫醒了，铜川东风机械厂的车在楼下等着，后天去延安卷烟厂。

忽听说张东升不去延安了，要回北京再去请记者。记者团里已有几个人说要中途离团。

一听说张东升回北京，几个人连声说“我们也走”。这样，《经济日报》郑波、《光明日报》彭程和我三人离了团，冒雨去车站买票，张波送我们。一下子剩了我们几个，怪冷落的。看着灰色的天，我想，可能张东升正在天上飞。

在火车站，见一女同志，好眼熟，擦肩而过。我们都回头看她，她也回头看我们。我们努力回想，才想起她是我们去过的一个厂的人。

人海茫茫，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但她可能会记得我们——那天来了帮记者转了转，吃了饭就走了。可能她还知道记者团拿了厂里的钱。他们，所有接待过我们看到过我们听说过我们的人，就是从我们身上获得记者的概念的。

6月25日

《人民日报》吴以荣 19 日、《科技日报》许善斌 20 日、新华社刘齐鸣 23 日回到北京。张东升 17 日带着《中国日报》、《北京周报》等 6 家报社的记者回到西安，正好补上空缺。

6月29日

看到了《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的《新闻采访团组织计划(草稿)》，预计行期 50 天。时间才三分之一，已有一半人马离了团。

另外，计划参观 23 个企业，预计支出 50000 元（包括摄制电视片费用 10000 元）；而《组织新闻采访团情况一览表》预计收入 110500 元——净赚 60500 元？

我想起一个词：掮客。《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旧社会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

这六七万元算不算“佣金”？而“佣金”是不是组织记者团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买卖”的一方厂家方面，有些厂家是自愿搞这“买卖”的，“这要比自己登广告好”；也有一些厂家不愿意。在去延安的路上，司机对记者团说：“转一天就走？你们知道你们吃的鱼和干贝是从哪来的？是我们前几天从西安拉的！”而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干脆不接待我们这个记者团，因为“要钱太狠”。

7月1日

变革的年代，一切事情都在重新估量，我且把“掮客”当做中性词。

眼下，经济领域里的掮客声誉日好，文艺界的掮客褒贬不一，而新闻掮客该怎么评价呢？

也许，没有掮客，西北这些偏远地区的厂家就会永不为人知，西北地区就难以搞活——假如宣传有如此大功效的话。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在读者心目中党的宣传工具的新闻单位，由于掇客介入，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这条原则，极易大打折扣。

那么，新闻掇客存在的基础是什么？

7月3日

张波来信说：“记者团去宝鸡后，薛主任找我谈话，怪我不该透露内情，把事情捅出来，对我没好处，害怕社会怪罪我的。我已不再考虑我自己了。新闻界要是连我这样的人都容不下，新闻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记者手记

遭遇有偿新闻

听听汇报吃吃饭就能写出新闻吗

事情过去快10年了。我想，如果今天遇到张东升，我仍会有点不好意思。

张东升当时是《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的人，我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1987年6月4日我们在北京头一次见面，他正在组织一个记者团，或叫什么笔会，去西北走几个企业，厂家出钱，吃住行全包。我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玩玩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便说：“好说，扛包提箱的事只管叫我。”

6月6日晨，北京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到了西安，在西安勘探仪器总厂呆了一天。厂方自是极热情，各位书记厂长一一汇报，很认真的。地处大西北，中央来个人不易。6月11日，国营262厂的大横幅可以看出这种热情：“热烈欢迎中央新闻采访

团来我厂莅临指导”——大家都挺不好意思，不是因为这横幅有点语病，而是咱能指导个啥？

6月12日晚，前天中午请我们吃羊肉泡馍的西安冷冻机厂的厂长来到记者的住地，厂长给了一份1986年6月8日的材料《三中全会促进了西冷厂变化》，然后介绍了该厂落实知识分子的情况，最后，漫不经心地说出他们与黄河机器制造厂搞联营中遇到了一点儿纠纷。

众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才是厂长想说的。有人想把事情弄明白，帮帮西冷厂，但今天中午刚在黄河厂吃了饭，又能说什么呢？

至此，这些天不舒服的感觉达到高峰。

我们这算干什么呢？跟着饭票走，在厂子里转转，听听汇报，就能写出新闻？一个厂子也许能写出新闻，十几个相似的厂子都能写出新闻？（有一位记者写了篇稿子讲某厂的食堂如何教育职工不要浪费）这些稿子是给读者看的还是给厂家看的？这些稿子能客观吗？

比如6月12日在黄河机器制造厂，厂方介绍了他们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过程。也许这是一件微观效益很高的事例，但当时已有传闻全国家电生产过剩，是不是正是由于微观积极而导致宏观失控？

我们这些记者吃了厂里的，还能不能站在宏观上说真话？

后来看到一份协议书，逼我下决心走人。

回家也。咱没本事车间食堂宿舍幼儿园转转，座谈照相吃饭上车回饭店然后造出篇稿子。就是能造出稿子，咱也不敢保证厂家高兴编辑叫好一篇篇在报上连载。就是编辑捏着鼻子给你上，咱个人拿点小好处然后拿些不咸不淡的稿子糊弄读者进而损害报社，咱心里也不落忍呀。左想右想，只好回家。

6月14日晨，记者团离开西安去延安，我们几个人决定不走下去了。可怎么跟张东升说呢？他人很热情的，千方百计给记者们弄到音乐会的票，看了半场他自己又先退场回饭店给记者的房间存上洗澡水（晚了就没水了）。正为难着，我下楼到车上和其他记者告别。下得车来，张东升提着大包小包远远地走来，我只好装着大方迎上去，他却一侧身让了过去，这倒解了我的难。

吃里扒外是很骂人的一个词

从6月15日回到北京，到7月14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公开的新闻内幕——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在这一个月里，我很艰苦地想这算怎么回事儿。

我自己造了个理论来说服自己——正常的情形应该是新闻机构首先靠其新闻质量和声誉立世，从而赢得读者，进而吸引广告，而经济实力又保障其赖以立世的新闻声誉不受诱惑污损。但眼下的情形有些不同，新闻机构不像过去那样由国家全包下来，又没有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因而也不大珍惜自己的声誉，在半下海的状态下，用说不清是国家的还是新闻机构自己的产品（新闻）去和企业交换些眼前的好处，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人正在挖掘自己的根基（新闻声誉）。

转型期有很多机会，能抓住是能耐。张东升就抓住了。记者团采访计划预计50天，参观23个企业，预计收入110500元，而支出50000元（包括电视拍摄费10000元）——如果顺利能赚60500元。张东升算什么角色？当时还给张东升想了个挺文的词：新闻掮客。

道理是想了一些，但这事儿能不能捅到报纸上去？——吃里扒外是一个很骂人的词。

纪实是新闻的一个基本职责，在1987年，中国新闻界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判断新闻掇客之类的事的是非可能不易，而且严格说也不是新闻机构的责任，但至少应该记录下来。于是用了无是非判断的日记形式。当然，记录也会伤害。

没有想到文章会闹出大动静。7月14日《日记》见报的第三天，中宣部召集开会，记得我穿着短裤和圆领衫就上会了，没想到在会上还要发言，我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被关闭了。后来听说张东升去了海南。我从来没把张东升当坏人看，这年月好人坏人的标准总在变。我想他一定成了大款，他有这个能耐。

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不能拿红包

过了许多年，记者团的事很普遍了，很小巫见大巫了，如今叫“走穴”，张东升的角色叫“穴头”。

说实话，我的想法也在变，后来我也走过穴，也参加过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也拿过红包。对我自己，对我的编辑，我有一个杠杠——虽然拿了红包，如果真是白的，说白也无妨，比如商场开业一类，但绝不能把黑的说成白，记者还没贱到一个红包就能改嘴。有时候是非就是说不清，比如我写稿的今天，1997年2月，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大报上，登着一些试车手记之类的稿子，并堂堂正正地宣告是受某国车商的邀请——并不隐瞒国际走穴也。

是非模糊是可能的，但应该知道的是，什么时候不能拿红包。

1993年春节过后，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经济蓝讯》当主编，大家商量报道选题，便扯起了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如何了得，集资年利率24%，且随时可以兑取。大家对长城公司的背景全

然不知，当下决定探个虚实。我告诉采访此事的记者和实习生，所有与长城公司的接触，都必须是两个人同时在场——让你行贿或诬陷受贿都困难着点。

3月9日《长城上吊起个馅饼，谁敢咬》见报，对长城公司提出疑问，说长城集资不大符合经济常识。此文一出引来许多询问电话，据说还有挤兑。长城公司倒没动怒，反而请吃饭，磨到晚上6点多推不掉，便招呼《蓝讯》连编辑带实习生六七个人一起去，别闹出什么不好意思的事。

3月27日，长城公司开新闻发布会状告人民银行，《蓝讯》去了7个人。我先下了车，跑进去照相，之后在会场里转悠，到签到处看都是谁来了。在签到本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想必是《蓝讯》的人代签的。

3月30日，《蓝讯》发表后续报道。

这之后长城公司被查封，沈太福非法集资被逮捕。涉及10万人10亿资金，是个大事。当时查新闻界，气氛很紧张，一会儿传某电台记者被捕，一会儿说某报社编辑被传讯。由于《蓝讯》报道长城公司太中性（实在也不该由新闻来定性），甚至让人误解《蓝讯》为沈太福说话，因此对《中国青年报》的传闻更邪乎。

我的朋友汪微波在日本听说王安跳楼自杀，急打电话来核实。《蓝讯》采访长城公司的记者在杭州出差，有天半夜打来电话，心里嘀咕，探听北京的情况，我问他：你的确没有拿长城公司的钱吗？所有采访都是你们两个人吗？如果这两点没问题，睡你的觉去！

别的不好说，但只要手脚干净，就没大事。

怕什么就来什么。这时候我才知道，长城公司3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是有红包的，每人300元。《蓝讯》有4个人拿了，

如果不拿当时可能进不去门。4个人把钱交到我手里。后来长城公司清查小组来函要求退红包，《蓝讯》退了4份1200元，开回收据。再后来又来了函，还是退红包，我没理睬。过些日子，又从党委转来同样的函，我急了，打电话到清查小组，说我们已退完了。对方说有7个人的名字，只退了4个人。我说，其中有3个人的名字是代签的，可以请公安查一下笔迹，如果账还对不上，那必是有人贪污了，有一半可能问题出在你们那边。后来再也没来函。

到1993年年中，中央金融宏观调控会议之后又开了宣传会议，那时才知道，在长城公司的半年非法集资过程中，传媒中唯一提出疑问的，是《中国青年报》。

连红包都不用给也抢着发稿

给记者塞红包，记者就值这俩钱，在正常情形下是对记者的不敬。但有一次，人家不给红包，我却觉得对新闻界更为不敬。

1994年2月，新华社的一位朋友来找我，说起这么件事：他曾采访过号称“点子大王”的何阳，这两天给自己的浙江老乡李昌达和何阳牵线，李昌达买何阳的技术，最后不欢而散。

在现实中，技术转让纠纷多了，没什么新闻价值。但这事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恼怒：2月1日晚，李昌达在北京越秀大酒店交给何阳8万元的汇票，另2万元现金暂没给。李昌达解释说，这现金都是乡亲们各家凑的，每家几十块钱，也就相当于过年买鞭炮的钱。但在2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这“相当于买鞭炮的钱”就变成了“买鞭炮的钱”，在其后的报道中就变成了《不买鞭炮买智慧，农民向何阳预定致富点子》。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以讹传讹的故事，据那位新华社的朋友

说，从一开始就琢磨着怎么借这事利用新闻给自己扬名。请记者来，塞个200元的红包，回去不过发个“豆腐块儿”，说“何阳又卖点子了”。但如果农民连鞭炮都不放了也要买何阳的点子，那就有点新闻了，“连红包都不用给，抢着发稿”。

这事本与我无关，但也太拿新闻界不当事了。

2月15日，我的《没留神涮了道新闻》见报，很精确地几乎按着时点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其后新闻界议论纷纷，有直言相斥的，也有婉言维护的。

3月29日，我写了《新闻可真是经不起涮》，提出4点新闻被涮的根据——在2月3日下午5时这个时点，在向记者宣布“买点子”这个新闻时，李昌达并没有与何阳签协议买技术，这个事实不存在；当读者在2月5日第一次（6日、7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读到买点子的故事时，这个事实也不存在，李昌达更在5日当天上午把汇票要了回去；其实是个转让技术的事，却再呐喊一回向点子大王买点子，招摇一番；最重要的一点是，2月9日，李昌达告诉我，过年乡亲们还是要放鞭炮的。按常理也可以判断这话是真的，而偏要造出“不放鞭炮买点子”这样的故事，糊弄记者欺骗公众，这算怎么回事？

这实在是一件小事，新闻界里该琢磨的大事多了。

过了这几年，有时候我也问自己：为这点小事认真，值得吗？可大事干不来，小事也不当真，那还干什么新闻——这算怎么回事？

时间：1987年6月24日至7月4日

作者：雷收麦 李伟中 叶研 贾永

大兴安岭的警告

叶研：调查与分析

大兴安岭的警告

红色的警告

一把火，一把令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

“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

“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北纬53°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

“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

是的，现实给人类的答复往往不只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还是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关于火种的故事

A 关于加格达奇的故事。

大兴安岭地区共有人口 31 万，是一个以木材和营林生产为主体的森工企业。首府加格达奇——美人松的意思，一个由少数民族语言赋予的美称。

虽说这里人口不稠，工厂不多，但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大都市里有的这里几乎一切都有。

许多奔扑火而来的记者都想不到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里。

然而，你茫然了。这里不叫镇，也不叫市，而被称作“加区”。“为什么不能称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

一个媳妇仨婆婆。它不敢称“市”，一旦称“市”，行政归属问题就会扯皮，内蒙古自治区想收回它，黑龙江省又不肯轻易放掉这“碗边的肥肉”，更何况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的林业部呢？于是，加格达奇只好委屈了。

大兴安岭成了真正的“一仆三主”。每年的企业赢利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

1985 年国务院规定，大兴安岭可从企业赢利留成中提留近

5000 万元育林基金。田纪云副总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于林、用之于林”。就是这笔经费也要七扣八扣，林业部拿去相当大一部分移作他用。余下的除去上缴能源交通费，扣除维持营林机构经费等，用于森林保护的只剩下 9%。而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若干项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道路，是林区的神经和血脉。有了道路，既能作为防火隔离带，又能为快速扑灭山火提供交通条件。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道路的建设，这些国家每公顷林地拥有道路已达 5—7.5 公里，我国的伊春林区每公顷拥有道路 2.2 公里，而大兴安岭每公顷仅有道路 1.1 公里。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林业部的计划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计划司，人人都当“二传手”，谁也不肯掏腰包。

解决样子城问题，既是节约木材、减少浪费的一个渠道，又是解决防火隐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煤，当地有，位于西林吉的吉莲煤矿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但也苦于没有道路。“要修建道路，连通古莲。”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领导早就下了这个决心，不可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伸手要钱，还得找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计划指标，你不给钱，我们自己解决，大兴安岭准备从已被拨去的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以“无此文件”规定为名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他们只好边斩边奏，修通了古莲至图强的一条沙石路。正是这条路竟成了一个屏障，在这次扑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这笔修路费用还在地方财政的赤字栏上。

同样，森林瞭望塔是林区的眼睛。由于经费不足，大兴安岭的森林瞭望塔仅是伊春的 1/3。缺少瞭望，无法判断火灾的方

位。

“5·7”大火中，由于方位判断的失误，一度影响了正确的指挥。400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战员受命驰援，辗转奔波了4天，竟然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

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B 钱袋的故事

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旧体制的框架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

由于大兴安岭的体制缺陷所决定，防火工作先天不足。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

又是一个三足鼎立！

三家各有各的经济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战斗整体。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1985年起，大兴安岭建立了护林防火中心，这里也组织了多人去国外培训。主管防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凤鸣说：“我们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装备现代化、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和资源管理中心，可林业部迟迟不表态，直到今年的5月5日，发生森林大火前夕，还在为资金扯皮。”

漠河县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县份，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廩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可是在防火投资上，他们却抠得令人瞠目。

按理，作为西林吉林业局所在地的漠河县应该建一座气象站，哪怕建一个气象哨也好。可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也没人操这份心。

记者向县里一位副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

“‘北极村’里有。”

距县城 80 公里的北极村，确有一座气象站，归属国家气象总局，负责全球气象资料的交换工作。站长周汝锵告诉记者，他们没有为漠河县提供气象预报的责任与任务，再说距离 80 公里，小气候也会有差异。话虽这么说，但这个站每年防火防汛期都主动向县里提供天气情况。谁能想到，漠河县这个“受益单位”却死活不肯掏这几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周站长苦笑着：“前些天还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为这事扯皮呢。”

扑火过程中，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计算，这次大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扑火救灾，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元。

这笔账应该由谁来算呢？

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平时不肯对森林防护多投资，而到发生火灾，却丢了大本钱。群众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这钱花得冤啊！”

C 两个“马大哈”与四个“酒鬼”的故事

请谅解我们使用了“马大哈”这样不雅的词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机会恰恰丧失在这批“马大哈”手中！

因使用割灌机在林区造成了多次火灾。今春，大兴安岭林管局发出通知，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部署是部署了，可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4月28日，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指挥科一位副科长手里，8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5个，恰恰是那生灵涂炭、惨遭损失的北三局没有被通知到。

5月5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此刻，较漠河境内出现的两处火情早一天；较大火吞没漠河县城早两天！

如此重大的气象变化，居然没触动县防火办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经。他没有向主管负责同志汇报，而把这预警截留在办公室中了。

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火前，就是扑火救灾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大兴安岭地区某局参加扑火救灾的小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西线我们的车经常拉指挥部头头。一天，一位副总指挥去检查火场情况。

“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别说头儿了，我都气得慌。

“副总指挥问：‘为什么不打火？谁是领导？’你猜那哥四个咋说：‘咋的呀，这疙瘩我们管，你是干啥的？’”

“一听说是副总指挥，还是省政府领导，这哥四个才紧张了，说马上组织扑打。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还是当地林场的呢，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

听来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诞，又都是个别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代表。但在国家机器的链条上，有这么几个齿轮有毛病，那机器还怎么正常运转！

D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让我们把视线缩微到漠河县，只把视点聚焦到防火工作上，或许能从这悲剧发生前的情节里发现些什么。

过去，漠河县驻扎着一支由 70 多名干练的小伙子组成的武装森林警察，主要负责富克山的森林防护工作，当然也协助西林吉林业局扑灭过不少次山火。

然而，这支被群众称作“森林卫士”的森警队伍竟被“请”出境了。

事情是这样的。富克山里有黄金矿藏，县里为增加经济收入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散劳动力开矿淘金。采矿中不免发生一些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根据有关法规收取费用，因为县里有人多次弄虚作假，被森警队罚款 12000 多元，于是留下积怨。

去年 11 月的一天，值勤森警拦住县黄金公司副经理的小车，检查进山证，并因此发生纠葛。接着县里公安局立案侦查，审计局检查罚款是否有经济问题，物价局也派人检查森警队办理“入山证”是否多收了钱……

这种事本不奇怪，可结果是漠河县领导拍着胸脯保证：“撤了森警，护林防火工作由我们统一管理，保证管好。”经地区有关领导拍板定案，森警队就这样撤离了漠河。

“官司”打完了。至于护林防火工作，县里虽然成立了一支 30 人组成的快速扑火队，可是第一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第二没进行一天的训练。大火烧来后，人们又怀念起森警来：“要是森警队在这儿，拿起风力灭火机，突突突，早灭了！”然而，晚了。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县的消防工作。去年春天，县糕点厂着了一把火，消防车拉着警笛来了，水枪手端起水枪摆出架式，谁想，消防车的水箱里没有一滴水。

平时，消防车多用来接站送站，有时接送站竟也拉响警笛。今春以来，不管风势大小，总是拉着警笛兜着圈子呜呜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消防车再叫，也没人当回事了。

一位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叫烽火戏诸侯啊！”

从上述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体制的不协调，由于某些干部的玩忽职守，由于对特大火灾放松了戒备，在大兴

安岭——我们祖国的绿色宝库中，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火种。

烧不散的会议

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

“噢，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的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山里着火，就像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样，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领导说的那样，这把火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

会议照样进行……

8日凌晨2时至4时许，从古莲火场烧来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又分层次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2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

类似的会议在另一个火区——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以同样的节奏召开着。这天夜晚，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古有救了。谁知，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参加会

议。23点45分，几位县里的领导仍围绕“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在争论。屋外，狂风大作，火光已经烧红了夜空，手持风力灭火机的上百名森警队员望着即将进镇的大火急得直跺脚。屋内张教导员被这种没完没了的会议激怒了：“你们研究，我们打火去了！”他率兵冲向迎面烧来的大火，此刻，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会而议之”。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要有特殊的动员方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一个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

大火对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是不留情面的！

在大火映衬之下

当大火来临之际，我们的干部们都在做些什么？

翻开5月7日的历史纪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以其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为抢救群众和国家财产而奋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同一时刻和同一地点，有的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另一种角色。

A 在社会责任与自我保全撞击的一刹那

5月7日下午4时，古莲火场狂风大作，火借风势，如同《天方夜谭》中的魔鬼从魔瓶中爬出，可惜，在它刚刚从魔瓶中露出头角时，没人把他堵回瓶中。而这，任古莲火场指挥的县委李副书记原本是应该能做到的。

本来，这把火并不算太大，经过林业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整夜的扑打，7日上午明火已经熄灭。按理，应全力以赴清理火场，消灭残火、余火，打出隔离带。可他们没这样做。

火场上，只留下少许职工看守，千余扑火大军退至公路。李副书记在面包车里吃罐头去了。

老天爷留给漠河人民免受劫难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

终于，烈火窜跳起来，突破了没人防守的防线，轻而易举地向远方推进。

全军撤退，寻找安全地带——李副书记做出了抉择。

“我去派车，一会儿来接你们。”说罢，他钻进小轿车，一溜烟奔回县城。

群龙无首，被他扔下的扑火大军失去了同烈火最后一搏的机会。火魔狞笑着，摇了摇凶恶的身躯，朝人们扑来。回县城后，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疏散家人。有人看到，这位年轻干部赶在大火进城前，将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此后，他又去指挥群众疏散了——这是在从他手上放跑的火魔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时候。

B 自信精神与自然规律

当黑烟红火的立体屏障遮天蔽日地推进到县城西侧山梁的时候，县委王书记当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她泼辣果断，当然，她也难以接受哪怕是失败的可能。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她抄起电话，通过广播电视再次下令出击。

“县城里的男女青壮劳力，一律自带工具去西山打防火道。老弱病幼留在家中，不得乱动。要相信政府……”播音员正参加地理气象函授学习，他根据这几天蒙古高压槽的移动，预料到可能有强风。他想在王书记的紧急通知中加进让群众赶快疏散的话，可他没敢——“所有人要听从指挥，不得违反纪律，违者严加惩处！”

留在县城的千余劳力走出各自家门，赶到西山梁子的时候，大火已怪叫着进镇了……

这天，地区每隔一小时来一次电话询问火情，县里都未能如

实汇报，昨天，图强林业局已经集结了百余精壮的扑火队员准备前来支援，也被谢绝了。即使刚才，106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都被动员上山打防火隔离带的时候，她都未向图强求援，也没有向地区防火指挥部请调空运灭火队。

她相信自己的力量。

直到7日下午6时，大火临头了，她才慌张地向地区报告：“请上级给予必要的指示和支持。”然而，一切都晚了。

地区张副专员：“今天我几次问你们火场情况。你们都说控制住了。怎么火这么大了才通知我们？”

王：“……”

就一个10多年前的知青来说，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泼辣果断的作风，但是，在这重大的灾害面前，她的科学精神却令人遗憾地与她的职务不相匹配。

“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你们要地区采取什么办法？”张副专员急切地问。

王：“如可能，马上把图强的消防车调来。”

王书记想到图强的消防车了，却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火浪，正以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高速向图强涌去。

图强派去的两辆消防车中途遇火，其中一辆被火吞没，两人遇难。

未几，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葬身火海。

C 废墟上的红瓦房和它的主人

灾后，漠河县城凄凄凉凉的废墟上，奇迹般矗立着一栋红砖瓦房。这里住着4户人家，其中东头：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高家；西头：县公安局消防科科长秦家。

“这栋房是秦科长用消防车和推土机保下来的。”群众反映，当时消防车呈“品”字形护卫在高、秦二宅周围。

“我保县长？我是保人民啊——！”消防科长说。

“我不把消防车卡住那儿，人就烧死多啦！再说谁的财产都应该保嘛。”

一个饮食个体户的话：“11点钟火都小了，我带孩子们回来保饭店，见4台消防车和大推土机全力保红旗旅社（县长和秦科长住宅旁）那疙瘩。那时，我前边吉祥旅社还没着，我说你们消防车去把吉祥旅社东边刚起火的小房打灭，这旅社就保住了。可人家不理我。那工夫只要好好组织，不少房子能保住。我家的饭店着了，就是俺爷儿几个救下来的。”

推土机手证明：“那晚都半夜多了，秦科长骑着摩托车喊我去推防火道。先是绕着他们那栋房推了一圈，接着又让我去推靠高县长家的那两栋房。好端端的房子，又没起火，推了多可惜，我不忍心下手。见我犹豫，秦科长跳上车来指挥，推倒了那两栋房。周围没什么大火了，还打啥防火道啊！”

红瓦房在废墟中巍然矗立。

烈火借给了人民眼睛。

D “宿命”与大话

“我原籍河南新野。三国时火烧新野，如今又火烧漠河。晦气，晦气！”漠河县高县长对记者来访时的寒暄，竟有一种宿命的味道。

5月31日中午，记者来到高县长家。

县长很热情，他15岁当兵，19岁转业到林区。任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之后，他拿出了更高的热情与魄力。

“1983年我来时木材产量才9万立方米，去年已增到24万！”高县长自豪地对记者说。这期间，漠河还成了万两黄金县，市政建设也初具规模。

然而林区建设中还有至少与木材生产同等重要的工作。

1958年，刘少奇同志视察伊春林区。他问当地负责人：“在林区什么是第一位的工作？”

“防火。”对方回答。

“对了。”

去年9月11日，田纪云副总理视察漠河时明确指示：“样子城问题不解决，会火烧连营啊！”高县长当即保证：“我们保证以煤代木，尽快解决样子城问题！”

然而，直到漠河受灾，县里只成立了一个3人的煤炭公司，共拉煤一卡车。县领导家的样子堆却越来越高。

“这里完了。”高县长对记者说，“最低限度是撤职。我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可能会服刑去。’唉，最基层的责任者就是我。”高县长感慨万端。

不知算是可叹还是可悲，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掉了，6月2日，全县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县长的嗓门又洪亮起来：“同志们——！我们要拿出当年大会战的精神，3个月完成相当于过去十年的建筑任务！建筑总面积207732平方米！其中平房364栋，楼房40栋！”

台下听众望着大片废墟苦笑。不论从实际施工期计算，还是从铁路运输能力来看，3个月完成20万平方米的建筑量根本完不成。

“……火灾震动世界，人人关心着中国的北极——漠河！我们建设的快慢，显示着……”高县长仍在真诚而激动地说着。

大火向人们昭示了这些现象，却未能烧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不是结束语

我们准备结束本篇，但并不希望结束这场灾难留给人们的思

考。

此刻，我们要将如下严峻的数字摆在读者面前：

据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文件记载，1966年一场因吸烟引起的大火，共燃烧了32天，毁林52万公顷。从1964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到今年5月这场特大火灾之前，森林可采资源减少了一半。其中森林火灾烧毁4865万立方米，占可采资源的30%。按开发20年的消耗比，大兴安岭林区只能维持生产26年了。大兴安岭开发到1986年，22年间，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881起，烧毁森林面积等于这些年来营林更新林地面积总和的164倍！

大森林——人类的摇篮。

大兴安岭——这个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中国最大的林区，这个生长着祖国未来无数栋梁之材的绿色宝库，竟年年在遭受着如此的戕害！

连年的大火，该烧醒酣睡的人们了！

“我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语调颤抖：“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1987年6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代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

1987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常委们代表10亿公民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他们说：

“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相当普遍。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大火向我们发出了红色的警告，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

考。

黑色的咏叹

自我保护——人的种种选择

自我保护——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然而，当自我保护的能力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渺小时，人哪，你将作何选择？

A. 生离死别——在那悲怆的瞬间

漠河县那位本来就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师傅，吞吞吐吐地叙述了他的逃难经历，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眼角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大火临近了，他扶着年迈的老母亲，扯着两个刚刚懂事的孩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家门。

大火拖着浓烟，以比汽车还快的速度从后面追扑过来。附近都是呼呼燃烧的火苗，没有一处安全地带。越是焦灼，步子越慢，尤其那年迈的老母亲，紧张得难以支撑自己的身子骨，更谈不上走路了。身后的大火还在一丈一尺地逼近。

眼下，已经没有能力把母亲和两个孩子一齐带走了。他只能顾及一头，否则就会一同葬身火海。

进退维谷，老母亲是万万不能扔下的！她老人家那么大年龄，行动缓慢，扔下，就等于把她掷给了死神……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沙丘，急中生智，他把两个孩子叫到身前：“爸把你们埋在这儿，千万不要乱动，火一会儿就能过去，把你奶奶送走，你就来接待你们。”

他回头望了望沙坑里的孩子，背起老母亲，甩开大步，追赶逃难的人群……

烟很浓，孩子看不到爸爸眼角的泪花。懂事儿的孩子乖乖地

趴在沙坑里，沙子，一把把埋在他们身上……。

当他返回来时，火已经烧过去了，沙坑中的两个孩子虽被烧伤，却保住了生命。看着那些被大火夺去生命的遗骨，他不免有几分庆幸，多亏了这个沙坑！

并非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沙坑”。

在她和丈夫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

烈火近在咫尺，她，一位被阿木尔林业局连年命名的“三八红旗手”，已哭成一个泪人。

10余年前，丈夫因公负伤，瘫痪在床。她守护着他，照料着他，如同侍弄襁褓里的孩子。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两颗心早已熔铸到一起。她给他带来了生的勇气，活的乐趣。

“不能背走你，我就守着你。要死，咱俩也死在一块。”一个孱弱的女人，在烈火面前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你要是真的爱我，可怜我，快带孩子逃命去吧！”不能让她为自己殉葬——一个瘫痪的男子汉的抉择。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我求求你了，不为别的，只为了咱们的孩子，快，快走吧！”

“不。”一双泪眼注视着丈夫。

“快走，你给我快走，你这是在坑害我呀……”他挣扎着，发怒了，就像一头狮子一样地吼叫着。

生离死别。她走了，泪人似的带着孩子走了。

大火，吞噬了她的家。大自然撕毁了一个和谐的家庭。

自我保护——无论是保护自身，保护自己的骨肉亲人，保护自己的财产以便灾后的生存——这便是人类得以生存，得以繁衍的最原始的动力。

B. 赵老爷子的呼唤与张宝玉的剖白

5月7日23时30分，阿木尔林业局的广播、电视一遍遍地播送紧急疏散通知。太晚了，许多人并没听到，这个时间里，母亲们已经搂着孩子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五处靠西头第一家，住着贮木场的老共产党员赵喜荣。

他也没有听到广播通知。

红彤彤的火光映着夜空，呼啸的大风挟雷携电。被火光和大风惊醒的赵喜荣不觉大吃一惊：“大火烧来了，得叫醒邻居们……”

他敲响邻居们的窗棂：“快！大火进镇了，快起来向河边跑！”

一家、两家、三家……被惊醒的群众拖儿带女撤向安全地带。

赵喜荣和老伴及小外甥却惨死在自家窖中。人们猜测，他叫完邻居回去领老伴和小外甥时，被大火堵在屋里，没法子，只好钻了地窖。

“赵老爷子的呼唤，救命的呼唤，一直响在我们的耳边。”一位被救的邻居说。

漠河县木旋厂厂长张宝玉模样挺英俊。他曾当过消防警察，知道“火”是怎么回事。

5月7日晚上，大火烧到桥头贮木场，他爬到房顶上一看，糟了，西北风刮得飞沙走石，碗口粗的大树被刮断，火头正向镇里蔓延。还有啥说的，赶快跑。

他有一台破旧的解放牌汽车，一个车轮坏了，几个工人正七手八脚地装车轮。

“要说私心，我有。”他坦诚地说：“不瞒你们，我的汽车参加了保险，险额是一万五，其实现在转卖，顶多值五千元。我寻思，烧就烧了呗，烧了去索赔，我能白得一万元。”

大火来临的前一天，张宝玉就嘱咐妻子把保险单和存款折带在身上，做好应急准备，万一大火烧来，不至于倾家荡产。

车轮上好了，大火也进镇了。

“上车！”他招呼一声，跳进驾驶室，在场的8个工人上了车。

去哪儿，第一个意念当然回家，先把老婆孩儿接出来。汽车灯照不到3米远，到处弥漫着烟雾，好不容易冲到了家门口，几个工人跳下车：“厂长，装什么，电视机还是家具？”

“什么也甭管。砸开仓房，搬两袋面，把炒勺、菜刀带上，快！”

张宝玉放下手中的茶杯：“说心里话，我走在路上时，还想着尽量抢出点东西，可到了节骨眼，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到大火过后别饿着就行了。”

车启动了，烟雾中看到路边一个走失的女孩正哇哇哭泣，他拉上来；一些走投无路、牵衣顿足的老乡，他也拉上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停车，凡是路上他见到的，统统拉上，终于，逃到了安全地带。

“我的车没烧，那白捡的一万元也没捡到，家是烧光了，家底少说也有一万五。不是扬脖唱高调，我心里挺踏实的……”

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C. 求生——犯人与庭长都有“生”的渴望

“放我们出去，放开我们！”

“我们也是人！”

漠河县看守所的铁门里，一群在押犯人发疯似地吼叫。当天幕被烧成暗红色，火星火球在空中乱舞时，48名在押犯人顿失往日真实或伪装的老实与慎微。他们死命撞击着铁门，呼喊，狂叫着，哭闹着。

几位已经被判死刑的要犯和一起黄金走私案的主犯深知自己的归宿，但就是死，他们也不情愿选择这种死法。

公安干警及时将这些犯人带离危险地带。“这次没死，我感谢政府，感谢公安干警。”已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犯人刘兴河说。

寻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但是，在灾难面前，人们只有携起手来，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抗御更大灾害的侵袭。数以万计的人这样做了，他们抛下妻儿老小战斗在扑火第一线。但是，在烈火的焚烧下，确有一些人的人格发生了衰变——

5月21日21时，前线一度告急，局指挥部命令党员干部上前线，图强林业局法院经济庭张副庭长却犹豫着，他先是登上一辆汽车，想偷偷溜掉。但没有泯灭的良心又告诉他这样做的卑下，他又从车上下来。这时，远方的火龙在腾飞，他害怕了，他怕自己也像一些遇难者那样被烧成一段炭、一滩油。

终于，他下定决心非溜掉不可。他拦住一辆小车，软硬兼施，缠住司机要拉他走。车刚启动，被指挥部一位领导拦住了。

“你们不要命，我要，我就是不下车！”他嘟哝着。

8天后，他被撤了职务，调离政法部门。

职务可以撤销，处分可以接受，你，在那瘫痪在床的丈夫面前，在那赵老爷子面前，又如何找回自己的人格与灵魂？

相互依存——变与不变的人际关系

席卷大地的烈火使物体扭曲、变形，完好的街道成为断壁残垣，明亮的玻璃化为液体，扑火战士身上的笔都被烤变了形。

同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烈火中呈现新的组合、变异、升华……

A. “你走吧”——他原谅了“小偷”

漠河县东北角一栋宿舍里，住着6户居民。5月7日晚，6户人家携妻带子，相继逃出门。眼睁睁望着烈火一栋栋地吞掉房舍，他们心疼啊。

夜半，风小了，火势也减弱了，6户居民凑到一起：“不能看着家被烧！”

农机局一位同志牵头，一支由男女老幼组成的小小队伍，从火海中穿越而过。

来的正是时候，这栋房子尚未着火，但附近的木料垛已经着起来，房子岌岌可危。

“快，寻水！”

农机局一同志冲回家中，找桶找盆。忽然，他愣住了：一位陌生人正趁混乱跑到他家里翻东西。“可恶，梁上君子！”火过来了，他没有时间过问这件事，心里却气呼呼的。

水桶、脸盆叮当作响，人们穿梭般奔来奔去，连未上学的孩子也端起脸盆……

或许是受了感染，或许是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这位“梁上君子”迟疑了一会，挽起袖子，也投入了灭火的战斗。他真诚地干着，汗流满面，不知情者还以为他是谁家的亲戚哩！他是在用汗水洗刷自己心灵中的邪恶吗？

房子保住了。失主看“小偷”，“小偷”看失主。相对无言。“你走吧！”终于，失主挥了挥手，原谅了他。

或许，通过洗礼，他能弥补心中的空虚。

B. 孩子与母亲

伟伟，一个4岁的孩子，用那幼稚而天真的眼睛望着记者的笔记本。

我们记下了他的话——

“那天着大火，我跑丢了，正在哭，了解放军叔叔，把我

抱上车，车上一帮小朋友呢。解放军叔叔叫我们别哭，都趴在车厢里，他们站在边上……”。

伟伟的母亲告诉我们，怕烧了孩子，解放军让车上的孩子统统趴下，他们在车厢边挺着肩膀围了一圈，就这样一直开到满归，最后又千方百计把孩子送了回来。

一转身，伟伟钻到床底下玩去了。调皮的孩子啊，你会记得烟雾中自己身边那堵草绿色的人墙吗？

——但愿他也不会忘记。大火烧过的第二天，育英林场里，他呱呱坠地了。

父亲刘存章在废墟前踱来踱去。他埋怨：“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到人间？”

母亲，一位鄂温克族妇女，经过灾难的折腾、惊吓，生下儿子便病倒了。没有奶吃，没有屋子，婴儿也奄奄一息。望着脸色蜡黄，气喘吁吁的妻子，再望一眼那个真正是生不逢时的儿子，刘存章愁肠百结。这时，他多么需要人们的帮助啊！

来了。边防驻军某团的卫生队巡诊来了。子弟兵把母子双双接到医疗队。母亲和孩子的生命都得到保全。

团领导跑来了，带来了大火中幸存下的乳粉、白糖、麦乳精。距团部几百里远的某连听到消息后，专程派车来，把100多个鸡蛋送到产妇身边……

产妇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志愿兵包双喜的妻子代花拉把孩子揽在怀里。母亲流泪了：“孩子，你长大了知道你妈妈是鄂温克族，可你能记得你曾接受过一位蒙古族妈妈的哺育吗？”

C. 从哈尔滨摇来的轮椅车以及轮椅车的背后

5月31日，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涂料厂的残疾工人李永祥摇着轮椅，终于来到了灾区。他亲手向有关部门送上他捐助给灾区人民的100元钱。

在他的轮椅背后，有着许许多多的人。

当美国泰勒斯卫星云图显示了大兴安岭火情时，是国务院当机立断，成立了灭火救灾领导小组。于是，35000名解放军官兵、7000名武装森林警察相继奔赴火场，空军的68架飞机也投入救灾，揭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立体化的扑火救灾战役。在东线，子弟兵连续奋战，誓保塔河；在西线，军警民并肩战斗，切断火源，扼守防线，保护原始森林。没有社会的力量，这把火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

这场大火，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也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与支援。人民捐款赠物，大学生上街募捐；海外游子慷慨解囊。记者在漠河县见到一车车的服装、被褥、罐头、面包源源运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漠河县的小朋友收到了北京小朋友寄来的铅笔、手帕，福建小朋友寄来的红领巾……

还有比财物更可珍贵的——灾区里有两家邻居，曾因一些矛盾，几年不说话。大火来临了，邻居甲穿越浓烟烈火，把乙的孩子从大火中抢出，于是两人和好如初。

同样，军队和人民、警察与人民也加深了相互理解，烈火浓烟的灾害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5月7日，大火包围了盘古林业公司，一些群众手足无措，有的人无望地向院里泼水，以求能有一块生存之地；一位老大爷跪倒在地，迎着火头直磕响头，乞求神灵保护。而真来保护他们的是被称作“红孩儿敢死队”的森警战士。当大火头像墙一样扑过来，火舌已经舔着一家居民房的松木栅栏和仓库油毡时，森警队教导员端着往复式水枪首先冲进烈火中，战士们也勇往直前，趴在地上，把脸贴到地面上端着风力灭火机猛烈“扫射”。防火服冒烟了，防火安全帽烤软了，裸露的脸部被灼得冒油，他们全然不顾。盘古终于保住了。

过去，一些群众对人民警察有些看法，盘古保卫战后，他们

杀了一口 400 斤重的肥猪，犒劳“敢死”队员。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支持、信赖。烈火，使人们心灵中的真、善、美曝光，把人们的心熔铸在一起。

当然，也会有另一类的现象在烈火中“曝光”：熊熊烈火中，某县委领导家的电冰箱、彩电和收录机，先后 6 次（！）被其爱人单位里的人抢运转移；还有，那废墟中赫赫矗立的县长与消防科长家的红瓦房……

这，又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

认识自身或许比认识自然更艰难

当人类已经登上月球、征服太空的时候，我们对于自身到底认识了多少？当我们面对大自然施予的这无情浩劫，发现了我们的种种孱弱与颀预时，我们又能对自己做些什么？

6 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传来一个有趣的信息：一位人体特异功能者曾自告奋勇前往灾区参与救火。然而，即使是被人们视为神奇的“特异功能”，恐怕也无由解释灾难中人性的种种“特异”的暴露。

认识自己还得靠人类自身。

A. 被送回的物资与待清理的废墟

大火过后，阿木尔百货商场被哄抢了。5 月 8 日，阿木尔林业局发出通令，拘留了无视法令趁火哄抢百货商店的案犯时，很快，30 多人主动向公安机关送还哄抢的洗衣机、收录机、布匹，价值三万余元，共拉了两大汽车。

灾难面前，法律、纪律、公共道德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它原有的权威，过去的秩序被打乱了。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人，当社会秩序、规则迅速重新建立时，人们也恢复了心理的平衡。

物质的损失和废墟需要清理，但精神呢？

“四大皆空”——灾后，一个青年对记者说。记者看到，当附近烈火尚未熄灭，许多救灾工作正在进行时，漠河县招待所里，一些工作人员每顿都要喝酒，有时酒瓶里还剩一半便扔进篓里。吃饱喝足，口袋里揣上几瓶罐头，腋下夹几瓶啤酒，摇摇晃晃扬长而去。仅仅说他们暴殄天物，不珍惜救灾物资，似乎太表面化了。莫非是“一醉解千愁”吗？

“人生的一场梦”——县防火办旁的运动场主席台上，有人这样写道。大片废墟上孤苦伶仃地矗立着一间临时搭就的小房，主人老白对记者说：“火烧当日穷。火来得太突然，就和做梦似的，家没了，东西没了，像我这样，人没伤着就不错了，谁知道今后怎样啊！”

“火大、风急，人力不可抗拒。就是中央领导来了也没用。”某位县里领导说。

灾难是可怕的，但是在灾难面前的颓唐困顿、束手待毙，不是比受灾更可怕吗？

幸而这只是极少数人。

“图强灾后仍图强”，一家报纸这样介绍图强林业局。大灾过后，这个林业局并未心灰意冷，而是与群众一起重新认识自己。人虽然离不开大自然，但不能屈服于自然。这次发生的特大火灾，有天灾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人祸。如果早些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能力，如果早些在森林中开辟隔离带，修筑防火道路，如果早些解决好林区城镇规划，解决“样子城”问题，是不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惩罚的。图强林业局党委首先清理精神上的废墟，他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已经带领群众投入了重建家园的工作。

B. “人定胜天”与敢不敢看“天”

灾后第二天，漠河县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刷上了“人定胜天”4个大字。山上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废墟里余烟袅袅，一些死难

者还在暴尸街头，恢复广播的大喇叭里已经播放着豫剧唱段。

“人定胜天”是口号是愿望，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认识灾害，征服自然，首先要求人们正视“天”——正视与承认自然灾害与造成灾害的成因。

我们联想起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位专程前来进行灾害心理学专题调查的年轻人，走进了漠河县民政局办公室。

一位工作人员带搭不理：“你们是新闻记者吗？”不无疑惑的眼光上下扫视着两位不速之客。“不。我们是社会科学院的。”“有证件吗？”“有。有工作证，也有介绍信。”

反复查看了工作证，确认不是新闻记者后，他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渐渐堆出笑来：“不是记者嘛，可以接待。”

如果说漠河县民政局的做法情有可原的话，县广播站欺骗记者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记者：“请问王局长，大火逼进县城时，县里是否通知群众疏散？”

王局长：“5月7日，我们共播了四个通知，最后一个通知是傍晚18时30分左右播的，内容是让群众疏散。”

记者：“谁播送的？”王局长：“播音员小×。”

记者：“对不起。我们已经找过小×，他没有播过这样内容的通知。他还说，他很内疚，没敢加上几句让群众疏散的话，如果加上了，可能少死几个人。这些天，他在给老师同学的信中，还不断表示忏悔……”

王局长：“……”

记者：“有广播稿吗？”王局长：“这么乱，早找不到了。”记者：“录音带呢？”王局长：“……”

不知是一种认识方法，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有人下令邮

局不得给记者提供电话电报用来发稿，甚至规定，报火情只能写割灌机起火，不能写吸烟起火（5把火中有3把是吸烟引起的）。某报记者使用自己带来的电传机，竟被罚了款。而这，是发生在世界气象卫星每天十几次掠过大兴安岭上空；林业部每天召开火情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每天播放火情新闻，许多新闻单位竞相设法发回稿件的情况下。

C. 终于公开的“秘密”

——“你们到底掌握了什么秘密？”这是某县某部门对本报记者进行两天单独讯问时的问话。

5月30日，在灾区采访回来的记者，在招待所餐厅目睹一些人在大吃大喝的场面，职业的敏感驱使记者取来相机拍摄了这里的镜头，此时，这里“高潮”已过，桌面上尚有几名食客与六七盘菜肴。

不多时，县旅游局副局长兼招待所所长带着几个粗壮的汉子闯进来，一把扭住记者的衣领：“你就是李先念的儿子、邓小平的孙子，今天我也整死你！”几个人一拥而上，扭住了记者的胳膊。

“砸他的相机！”一片吼声。

此时，县委李副书记敞披着军大衣，站在人群背后，对几个公安干警说：“不能放过这四个记者。”

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农民日报》记者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无不义愤。某报记者问李副书记：“你怎么不管？”李悻悻地说：“反正漠河也没好了，愿意咋的就咋的吧！”

另一名记者取出相机想拍下这不该发生的场面，一个干部伸出手来挡住镜头，粗声喝止：“不准拍照！”第三名记者上前劝阻，竟也遭到拳头。

于是，在对记者的单独讯问中出现了这样的发问：“你们到

底掌握了什么秘密？”

是的，到了公开“秘密”的时候了。

害怕别人掌握“秘密”，羞于亮出自我，人类怎能认识自己！

死死生生——人类永恒的主题

火，虽然是炽热的，但酿成的灾害又是那么冷酷无情。

在满（归）——西（林吉）公路 19 公里处，草草安葬着 50 多名被烈火夺去生命的罹难者。不少简易棺槨停放在山坡上，压着油毡，人们还来不及象样地祭奠和安葬死者。

在看到死的同时，我们更看到了生：

——灾区，十几名新生儿呱呱坠地，差不多都起了叫他们记住这历史瞬间的名字——火生。

——5 月 24 日，图强物资库废墟上的简易帐篷前，大红“喜”字一扫人们的愁眉苦脸。喜联写道：火情、灾情、爱情，情情系心；国事、家事、婚事，事事在意。横额“患难夫妻”。

新郎李庆增、新娘王淑芬原订 5 月 10 日结婚。大火烧了洞房，烧了嫁妆，但烧不散两情依依。

新的生活开始了。

——端午节，漠河一中高二（1）班学生马媛春做好两个纸葫芦，亲自送给她的老师。生，要生活得更充实，更美好。

——废墟里，羊角葱冒出了绿芽，小姑娘看到了生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无情的焚烧，无情的冶炼。

灾难中，人的灵魂受到陶冶和锤打，真正的人格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缔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萌生——美，是烧不毁的。

愿这把火烧掉人们的无知和愚昧，烧掉人间的丑恶。

大森林，留下了黑色的咏叹。

绿色的悲哀

一个肩着历史重负的民族，一个正开始在国际竞争的跑道上、作跨越历史断层飞跃的民族，遭到了大自然灾难当头的一击。一场大火，席卷了大于一个葡萄牙、相当1/3个意大利、等于15.5个新加坡的土地；焚毁了建筑430万平方米楼厦所需的木材，损失是何等惨重！

在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应当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建立怎样的关系？让我们透过人与自然的生态圈，探测5月这场灾难的又一深层原因。

生态移民

A. 从古老的迷雾中走来

上溯几个月或几年，迎着北方的寒风，播火者走来了——汪玉峰、王敬保、付邦兰……他们都是被人称为“盲流”的外乡人。这次大兴安岭春天的5把火，有4把是他们亲手点燃的。

他们在尘土飞扬的乡路上走着，跋涉者身后那地平线上渐渐隐没的小村庄，就是今天他们在牢房的铁窗里梦绕魂牵的家园。

来自山东、河北、江苏……命运不同，互不相识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汇集到同一条路上——一支今天被称作“盲流”，昨天被称为“闯关东”的路上。

在大兴安岭干着林区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活的“盲流”们，多达一万九千多人。

而在大兴安岭的数十万“本地人”中，除去几千名鄂伦春族猎人，几乎都与内地有亲缘关系。他们的祖父、曾祖父或他们自己，也曾踏在小汪、小王走的同一条路上，朝中国肥沃的最北

部，朝着大森林走去。

B. 他们为何远走他乡？

“俺家穷。”来自黄河边的山东菏泽汉子老吴说，“俺家那几亩地，过上碱了，不长苗。再说那点地，还不够老娘们种的，不走出来，穷呵。”

“《水浒》里的水泊梁山，是在你们那儿吗？”我们问。

“还什么‘水泊’哩，哪辈子就干啦。”老吴怎么也无法想象，黄河两岸贫瘠的土地上，曾有着茂密的大森林，养育过一代代豪杰，哺育着我们民族的成长。

“你瞧这信。”一脸络腮胡的老吴说，“是俺家那口子写来的。听说这块儿着大火，她搂着我那宝贝儿子哭了多少回，得信我还活着，写信来叫我做啥也得回家。我咋想离开家？可我钱还没挣上，回去怎么过日子？”

土地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命。可老吴那块缺少森林蕴养的有机质的土地，那块小得只用靠妇女精耕细作的土地，使老吴的劳动变成多余，不能再给他提供财富。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却占世界四分之一。每年人口还在增长 1200 万，耕地则减少上百万亩。中国农村数以千万计剩余劳动力，亟待寻找出路。

并不是每个农村都能建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为了生存，小汪和老吴他们只好离开不再带给他们财富的土地，犹如驰往未开垦西部寻找财富的美国牛仔，踏上了祖辈们“闯关东”的老路。

C. 生态移民的恶性循环

让我们看看地球的另一边，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边缘，黄沙漫漫的路上，一支持续了数年的浩荡人流，也在艰难地朝有绿色的地方蠕动。连年大旱，使 1000 多万非洲人背井离乡。

过去他们的家乡，也曾有过热带森林的壮丽景色，如今大象出没的地方，已被流沙覆盖。当年繁荣兴旺的港口市镇，现在竟然坐落在离海岸 150 英里的沙漠内。

移民进入塞内加尔，像过去对待自己家乡的森林那样砍伐树木，由于因干旱而枯死的树难砍，他们宁可砍伐活着的树，而不去利用已经枯死的树做烧柴。在尼日尔，一位欧洲的生态学家反映，“我惊讶地看到几百头驴子和骆驼，背上驮着连根一起拔除的干草。”

绿色消失了，人流又继续蠕动。大河的河床龟裂着，太阳像倒悬在天上的硕大热风机，扫荡着憔悴而又疲惫的迁徙队伍。在这悲惨的行列中，有的人走着走着永远倒下了，其他人注定还要艰难地走下去，继续吞食能提供生物能源的绿色。

中国“盲流”的队伍也在行进，离开了因祖先毁林而把后代的幸福抵押出去的土地……

这是生态意义上的移民！

于是，被载入历史的这一刻终于来了，5月6日燥热的下午，汪玉峰启动了割灌机，就像启动了让火山喷发的按钮。

大立柜价值观

A. 实用心理加现金价值观的驱使

5月那些令人焦灼的傍晚，电视机屏幕上，大兴安岭跃上天空的火焰，像利剑一样刺进了中国人心中。

“唉，把我儿子的大立柜烧没了。”有人感叹。

“木头东西又要涨价了……”更多的人如是说。

据记者随机抽样调查，80%的人都是从木头与金钱的角度评价这次森林大火后果。于是一位颇富新闻敏感的晚报记者及时采写了《未来几年木材不涨价》的消息。

森林火灾只有金钱上的意义么？汪玉峰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位“播火者”在被捕时仍然真诚而执著地问道：“我这个月的工资还开支不开支？”

马林林场一个高鼻梁小伙子小胡的认识略有不同，在送怀孕妻子疏散的列车上，他两眼放着光：“烧得好哇！”仿佛有个仙境般的世界出现在眼前。“这回大火可帮了忙，不用清林了，省得那些灌木、小树绊跟头。瞧我冬天砍大树，挣老鼻子钱！”

某些群众的实用心理与播火者的现今价值观殊途同归，这有趣的社会学现象，似乎显示着乱伐森林的原始动力和大兴安岭之灾的深层社会原因。

B. 需求压力下的短视

性情粗犷豪放的伐木者上山啦，他们高喊着“顺山倒来——！”把一片片百年大树“轰轰”放倒，显示出不可抗拒的人类力量。上好山，采好树，放倒的木头拉得下去拉不下去，他们不管。承包了，拉木头是别人的事。

拉木头的呢，捡好的拉，这才能多来钱，许多上好的木材就这样被扔在山上，雨打风吹，只消一年，不再是“材”，而是森林火灾的柴！木头完成了转为金钱的跳跃，下一轮砍削大地头皮的行动得以在更大规模上进行。

贮木场上，木材越堆越高，同时，林区各家各户屋前屋后的“小山”也越堆越高。一棵运到山外就可大有作为的栋梁之材，被利斧劈成样子。烧！大兴安岭每年要烧60万立方米的木头，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扔在灶洞炕洞里成了灰！加上火灾和其他浪费，国家每生产1立方米的木材，实际要消耗3立方米的森林资源。

伐木者们的得利，并不能舒展计划制订者们的眉头。

50年代生育高峰出现的婴儿，现已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

他们要住房、要新式组合家具，然而木材紧缺。这几年出生的孩子们，要画片、要书本，然而纸浆原料奇缺。如同老百姓期待装满各种欲望的“大立柜”，日益膨胀的基建规模，调整、扩大的企业生产，以至缝纫机厂大批等待安装台板才能出厂的半成品，都在期待着木材，以完成指标、计划。

人们需要木材，以及木材带来的产值和利润。人们运用现实经济规律来管理森林，却忽视了森林还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C. 只顾今天的哲学

不止一次了，大兴安岭的同志力陈：“我们算实际的账，只要增加合理的森林保护投资，得到的保护效益达 1:20 左右，投入 100 元的防火保护费，就能使 2000 元的森林资源在一年内不受损失。在这方面，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所揭示的情况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今年 2 月，大兴安岭林业局副局长张凤鸣还在大会上呼吁：“森林护林防火的保护效益，成番论倍地高于投入价值。因此，正确的决策，负责的领导，就应当舍得在保护上合理投入。那种防火不给钱，‘着火花大钱’的糊涂历史，应当结束了。”

但是，林业部门照样不给计划性的防火投入，反而每年要从大兴安岭，“取之于林，用之于林”的育林防火基金中抽走一大笔以做他用。

“我们连扑火车辆的油料配给都没有。”灾后，大兴安岭林业局长凄然地对记者说。这个林管局，1983 年就曾提出要增加 900 名森林警察，至今仍未被批准。这次扑火立下不朽功勋的森林警察干部战士们说：“我们像没娘养的黑部队，既不属于解放军，又不属于武警和民兵。”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4 个森警总队，为自己的体制问题奔波了 8 年，始终没有结果。森警部队连服装都是“买”来的，每到换装季节，森警后勤部门的干部就

开始四处奔波，说好话，递好烟……

这还不算委屈。他们委屈的是，每年都扑灭山火，可是建队37年来，今年第一次为扑火勇士们评功，“森警部队是被大兴安岭这把火烧出来的。”一位森警干部对记者说，“如果没这把火，我们很难有出头之日。因为森林着火，当地领导和林业部门要负责任。过火面积能少报就少报，能不报就不报。扑火有功，但为了领导也要‘小局服从大局’。”

好不容易，林业部引进一套上千万元的纤维板机器设备，可大量利用浪费在林区的木材及剩余物，按说该给林子最大、原料最多、浪费惊人的大兴安岭了吧？老实巴交的大兴安岭人，派了个科技干部、技术人员上北京要设备去了，另外一个省听说后派了个副省长去，这套设备便给了这个省。“我们也觉得太不合理”，决策者对大兴安岭道歉，“下回有一定照顾你们。”在“照顾”之前，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只得继续遭受“有计划”的浪费。

在合理的、人为需要的压力下，掠夺大自然几乎成了难以避免的结果。

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81年夏，四川遭受特大水灾。经科学认定，真正原因是长江上游滥伐森林所致。而四川省的森林屡遭砍伐，主要是3次：第一次是上世纪建造皇宫；第二次是50年代大炼钢铁；第三次是“以粮为纲”政策的不适当实施。

贫穷困苦和急功近利两方面的驱使，加上对生态学的无知和漠视，使得个人、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行为，都趋向于毁灭大森林。可惜，人们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有关文件表明：大兴安岭开发22年来，提供给社会4万多立方米木材，据不完全统计被大火烧毁的森林资源多达五万多立方米。

人是自然的儿子还是自然的暴君

A. 相互依存的生物圈

5月7日灾难之夜，翻滚而来的烈火呼啸着惊醒了图强贮木场工人张景财一家。一条名叫“虎子”的大灰狗“汪汪”悲叫，引着一家老小在烈火中冲出一条生路，来到较安全的河堤上，“虎子”又返身朝着了火的家里冲去。

两个多小时后，拥挤着逃难者的大坝上，带着伤痕的“虎子”又出现了，它找到主人，欢快地轻叫着，拽着主人往医院的方向引。主人跟着“虎子”来到医院前，只见地上乖乖地卧着家里的4头大猪，它们都是“虎子”冒火舍命抢救出来的。其中两头大母猪，今年7月就要产仔了。正为财产烧光而伤心的全家人，深为这深谙人性的生灵所感动，灾后粮食不足，全家人饿着肚子，也要分一部分饼干给虎子吃。

“卖给我吧，我出三百五，四百，五百……”有人后来要买虎子。

主人说：“一千块也不卖！”

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千金难买！动物是人类祖先驯养、保护、利用的生灵，是人与自然生物圈中的一个环扣，然而，在动物诞生于这个世界之前呢——

B. 森林是大自然生态平衡的首要支柱

几百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祖先从树上爬下了地面。大森林的第一产品，不是木头，不是金钱，不是“大立柜”，而是土壤、水分、氧气和它所护佑的生命。

在森林覆盖下，大自然花100至400年才慢慢创造出10厘米厚的表土。一个地区积蓄足够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则需要3000至12000年时间。林木伐光后，倾盆大雨很快滤去大地表层

的矿物质，有机质也会很快被烈日蒸腾。由于森林植被缩小，黑龙江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从过去的 6% 下降至现在的 1-2%，黑土不黑了。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50 万平方公里，每年仅长江就要挟带 24 亿吨表层土入海。

森林是“绿色的水库”、每 500 亩森林所蓄的水量相当于一座 100 万立方米水库的库容。森林还为地球提供充足的氧气。森林的减少，将导致大气中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变化和酸雨的形成。

森林又是最丰富的物种基因库。已知的动植物品种有半数是在森林的保护下生活和生长。地球陆地面积 10000 年前还有 2/3 生长着各种森林，现在只剩下不到 1/3 了。以这样的速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每天都丧失一个物种。到 2135 年，世界上将有一半的物种灭绝。

C. 自然要仰仗人类的永久照顾

大兴安岭自然保护区已经没有什么珍贵动植物了。人类的愚昧和贪婪，最终将由被灭绝的物种名单所证明。

我们也没有多少可资开发的原始森林了。除了大兴安岭这个全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外，就数云南的西双版纳了。

那里的动植物命运更惨，“孔雀巢人家树上”的景象已成别梦，“乘象之国”的美喻也早已作古。据材料记载，1977 年以来，仅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大象和野牛，就有近 200 头被猎杀。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正以每年 20 万亩的速度毁灭。北方，大兴安岭“绿色宝库”惨遭浩劫；南方，西双版纳“孔雀之乡”又在遭受戕害。照此速度，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与大兴安岭的有采资源一样，将只有 20 余年的寿命了！真要让我们的子孙只能从历史照片或电影胶片上欣赏原始森林奇异的美景吗？

聪慧而有灵性的动物向人类报复了：

——在南曼和勐养，愤怒的野象捣毁人们的住房，偷袭举行婚礼的队伍；

——在攸乐山，象群冲翻粮仓，一气扼死4头水牛；

——在勐腊的密林里，出现了一支与人类为敌的“大象游击队”，见人就追杀。

——1985年3月，数十人进入勐养自然保护区围猎，枪声逼使一头大象逃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将一名农工踩成肉饼。

然而，动物对人类反抗，与人类对森林的巨大破坏力相比，却显得何等微弱。

人与自然就是这样，既是异质的对立，又是有机的统一；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塑造者。

我们将被历史证明是怎样的塑造者呢？

5月，一架飞机在着火和未着火的大兴安岭上空飞行，机上乘坐着东北航空护林局副局长工程师赵希宇和一位记者。他们向下望去，见到了清朝以河流、道路为依托开设的林区防火道旧迹。这些曾把森林化整为零，与大自然达成和解的防火道上，现在已经长满了灌木，将森林连成一片，又将大火连成一片。

“大兴安岭林区建国后开发这么多年，为什么有些最基本的防火措施还不如清代？”他们痛心地问。

地球只有一个

A. 往事不应是我们的未来

5月8日，横在大兴安岭地区“一把手”邱兴亚面前的灾区，是一幅生态系统惨遭破坏的广阔而凄凉的景象。邱兴亚站立在几具烧得不成人形的尸体面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大滴大滴的泪珠从那饱经忧患的眼中涌出。远方，翻滚腾跃的浓烟烈火正直冲云霄，就像爆炸在广岛上空的蘑菇云。

“蘑菇云”只抹去了两个城市，人类对森林的破坏，不知毁灭了多少文明。非洲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曾有一个绿色的帝国和供养一支强大军队的财力。大象曾是他征服罗马的坦克和战车。如今，他那辉煌的帝国早已沉没在流沙底层。著名的玛雅文明，曾在中美洲繁荣了 1700 年。人口增长，砍伐了树林。几十年后，光秃秃的土地被热带暴雨冲刷着，玛雅人失却了农业的基础，消失在公元 8 世纪。

黄河上游，丝绸路上，楼兰古国，乃至今天的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早年都曾是“森林茂树软草肥美”之地，许多地方“沃野千里，仓稼殷积，人民炽盛，牛马千里”，更有“七里十万家”的繁华城市。如今却是“四望黄沙，城垣倾颓”，成为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毁灭了森林，丧失了土壤之后，文明也一个跟着一个湮没了。

这段历史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未来。

B. 灾难没有国界

今天，人类的生态环境是严峻的。

看看我们居住的地球吧——

非洲，继 1968 年至 1973 年大旱之后，一场人类近代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席卷了 34 个国家。这场大难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非洲大陆现在每年失去 360 万公顷森林，还因为“甚至连位于湿润森林地带的几万公顷咖啡园和可可园，也被 1983 年 1 月至 2 月的一场丛林大火焚烧殆尽”。全球现有 25 亿人生活朝不保夕。

看看养育我们的这片国土吧——

占全国森林总面积 11.1%，全国木材总蓄积量 14% 的大兴安岭的这场大火，使大兴安岭南端面临着沙漠化威胁的松嫩平原产粮区、草原及东北工业基地，进一步面临失去天然屏障的威胁。《风沙直逼北京城》、《北京失去平衡》，一系列新闻早已报道

出中国心脏地带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如果我们继续自毁家园，”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们警告，“非洲的饥荒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大饥荒的一个前奏。”

C. 保护地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墙的颜色。”爱尔兰籍歌星吉尔多夫看了《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纪录片后，激动万分，“成万名难民中，只有 300 名分配到了救济品，而救济品只是区区一盒牛油。领不到的难民只好满面愁容地往后墙站，这道墙就像生死之间的界限。”他决心组织各国著名歌星，义演募捐。

“全世界是一个整体。”不久前，歌星们对 15 亿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观众唱道，“……我们住在地球上，像一个大家庭。”

15 年前，在瑞典召开了国际社会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组织由此成立，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

5 年前，人类再一次为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在非洲聚会。在这次“人类环境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内罗毕宣言》。

“由于人类自己造成的‘自然’灾害，使其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近 10 年里增加了 3 倍。”3 天前，7 月 1 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卡利德博士，对中国政府副总理及十几位部委负责人说，“这些问题没有国界，其后果漫布于整个世界，危害到我们每一个人。”

与此同时，报刊上又揭露了安徽泾县出现新的毁林事件；

大兴安岭受灾最重的某县领导慷慨陈辞：“发扬大会战精神……尽快把采伐量恢复到灾前水平……”然而营林育林呢？

一支又一支的“盲流”队伍，正在走向或准备走向世界上森林最小的大国仅剩的几片森林。

这就是绿色的悲哀。

记者手记

调查与分析

败也本报 成也本报

《中国青年报》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优秀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文集。报道博得社会上和新闻界广泛好评，中国新闻学会为此召开专题研讨会。在《中国青年报》社内，“三色报道”也被放置在报社历史的重要位置上。在新报人的印象中，“三色报道”无疑是本报复刊后最为成功的深度报道之一。其实，那年的火灾报道过程中有一个严重教训值得检讨。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本报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反应迟钝的原因在哪儿。那年5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面的天气预报就及时播发了美国泰勒斯气象卫星的云图。云图上黑龙江省境内亮着两处震动全国的红色火区。火区在中国仅存不

多的林区久久停留。当时总编辑老徐在唐山记者全会上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8日，我向当时的报社社长建议派人，回答是，用新华社的稿子吧。找贺延光建议摄影部派人，摄影部正要在青岛举行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发奖仪式。找国内部杨浪，杨浪一时也派不出人。火灾一天天越烧越大，沈阳军区一再增派打火部队，各媒体逐渐增强了对火灾的报道，本报没有反应。

到了14日，杨浪问我能不能去。我四处建议派人，倒没想到自己去，而且在盯版，部门里马上调整了一下，决定还是去。从唐山调回了正参加记者会的黑龙江记者站站长雷收麦，从国内部派了李伟中和实习生贾永。报社老牌军事记者李钺基协助联系了空军的飞机。15日，火灾发生一个多礼拜以后，我们4人离开北京。这以前，在火场上，老有人在问：“《中国青年报》怎么没来？”到了火场，又老听人说：“你们怎么才来？”

直到12年以后的现在，我仍然感觉《中国青年报》的大兴安岭火灾报道是有失误的。失误在于，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我们的反应不灵。为了实现新闻的基本特征，大家又有意识地在后来多年的新闻实践中坚持努力，才初步具备了迅速决策的反应能力。这些年，“时间抢点”、“实时性报道”、“快速反应”、“部署能力”等语词在同仁口中频繁出现，反映了我们对“后发制人”和大型全景式报道的反思。1998年两会报道后网上的热烈议论中，广西记者张双武一篇《“神鞭”与“快枪”》形象地阐述了时效新闻和深度报道的关系。新闻是易碎的。再有深度的报道也不可能不顾及时效。可在本月发也可在下月发的东西，是杂志干的活，可在上半年发也可在下半年发的东西，最好是出书。

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在实时性进行式报道上，我们无疑没占多少上风。

那年头不光BP机、手机、卫星电话没听说过，连微波长途

电话都没有。当地邮电局把电报一卡，再弄个某通讯社的记者来审大家的稿子，实时性新闻确实难办。不像 1998 年水灾报道，人手一台手机，有条件随时同编辑部通话，现场的东西能直接传回编辑部。火灾的实时性报道都是托人带到漠河县以外发的电报稿。报社 30 多天得不到记者的消息。我们 4 人一站一站从漠河辗转回到报社，凌晨走进大门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各报已经开始对火灾进行回顾性的综合报道，本报在同我们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刊登了一篇外报记者的长篇报道。“信息不通，传闻你们在漠河被围打，都住院了。”

我们在火灾现场一个月时间的考虑，就是实时性报道已经落后，只有以深度报道这一招取胜了。我们是这次集团采访（规模比近几年有组织的任何采访团都大）中工作最扎实最艰苦的记者，我们掌握了大量这次火灾的基本事实，在全国对这次火灾报道的最后阶段，应以《中国青年报》的独家深度报道来杀青，没想到让外报占了我们自己的窝子。一个多月烟熏火烤、风餐露宿、围打讯问的憋气，全冲上脑门。

当天上班后，社长、总编老徐等领导和 4 名记者坐到一块开了个会。记者汇报采访情况后，领导作出的决定是，还可以写，写了再看。这个会议决定，加上万里副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是“三色报道”得以“出笼”的条件。因此我感到，大兴安岭火灾报道的反败为胜，也应归于本报的某种机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的原因都是报社的报道反应机制。

灾难就是灾难

之所以使用“A 是 A”这样的重复判断，是因为总有人很喜

欢把 A 说成 B，把灾难说成好事。以往小灾小凯歌，大灾大胜利的报道模式实在是祸国殃民。

人类与灾害斗争当然可以表现出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需要褒扬，这不等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好事。

抗灾行为避免了更大损失，也可以说取得胜利，但这不能取代对中国防灾减灾工作基础薄弱的检讨。

而在更多的场合，自然灾害之所以造成重大损失，扩大为重大灾难，是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不负责任、违反科学规律瞎指挥造成的，造成灾难诸多的人为因素，甚至大灾当前官员放弃国家和人民利益以求自保的行为，难道可以用抗灾工作的内容去掩盖吗？

把灾难说成好事，是灾难之上的灾难，是社会的灾难。这个判断直至今日仍然是灾难报道的要害。不是说军民抗灾的英雄事迹不能颂扬，“三色报道”就写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大火来临之际的种种崇高行为。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灾难报道至少应该把灾害和抗灾两个概念分清，着眼环境治理、强化防灾减灾能力；把灾害和灾难两个概念分清，特别对造成损失的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绝不能放过，这正是灾难报道最需要深入分析的部分。

在 4 人集中出发当天上午，杨浪召集了不到 30 分钟的碰头会。实际上是一个确定报道思路的会。有人说，哪儿来那么多“凯歌”？再也不能不顾基本事实了。有人提出：“写大火映衬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大火。”这后来成为贯彻采访写作始终的思路。报道因为批评了官僚主义在火灾中的表现，如消防队长调动消防车首先保自己和县长的家等，受到全国读者的支持，但记者的主观出发点，未必就是要批评谁。你干得太过了，该报道就报道，提出批评的是看了报道的大众，处理这事的是职权部门。

用现在的话来说，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应该是调查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背景报道。“深度报道”是指报道特征而言，不指报道类型。大兴安岭火灾报道被认为有“深度”，估计主要是因为其指导思路确定为 A 是 A，具体为“大火——社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有关灾难的事件报道中，首先要回答的是，到底发生什么基本事实？比如 1998 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洪灾报道，《中国青年报》告诉读者：

- 武汉内涝之后，长江承受最大压力的是荆江地段。
- 九江决口了。
- 荆江分洪区几十万群众转移。
- 荆江沿线弃守民垸。
- 蘆洲湾失守。
- 嫩江基本无险可守，大庆危急。
- ……

总之，首先是灾难本身，而后是军民抗灾。否则，受众就无法弄清你们讲了半天到底讲了些什么。在大兴安岭采访出发之前的短会上，有人提出“记者的眼睛就是公众的眼睛”。说的是一个传播学的原理。即大众传播的前一阶段，是信息收集，记者是传播链前端的信息感应器。这些，《中国青年报》做到了。而且，在上述最终获得全国抗洪新闻奖的报道中，无一不用手机通讯，实施了实时性报道。

关于 1987 年大兴安岭火灾的基本事实过程，我们也作了如实报道。只是我们为了获得最真实的信息，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

告诉人发生了什么并非易事。这里涉及一个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除亲历式、参与式、目击式报道外，所有报道都是“再现过程”。除非你碰巧在现场获得重大独家新闻的机会，如熊波抵达湖北公安县后一小时即遇到荆江分洪区几十万群众大撤退，如刘武和解海龙能及时赶到弃守民垸的现场；除非你反应快到事件刚发生就能切入现场，如贺延光车船都顺，当即摸到九江决口处。上述机会实在是极少极少。绝大部分场合，是事件发生后你才赶到。你遇到的难题和地质、考古工作者相似：根据现有资料进行分析，去再现一个已经过去的过程。如果事关利害冲突，收集资料就得非常慎重，说对了九成不算数，一成不准，麻烦就来了。而灾难报道几乎都伴随着损失责任的判定。责任者对你的采访不是一般地戒备，对你的报道不是一般地在意。

那年，许多事实，如县长和消防队长的房子被保下来了，人人皆知，口耳相传，没到火场，在齐齐哈尔就可以得知这些消息。耳闻太容易了，于是许多媒体就满足于报道这些“耳闻”，前面加个“据说”就行了。然而《中国青年报》不到迫不得已绝不用“据说”，经我的嘴告诉你的就应该是铁锤砸砧子一样的事实，而且有证据。对每一事实细节，《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要在社会设施残缺的废墟上去寻找至少两个以上直接的消息来源进行印证。灾民都撤了，到哪里找人？问个路都困难。车都烧了，诺大一个县，到哪都靠两条腿。核实细节难度至此，何况全过程？

调 查

山火引起家火，烧林场又烧了县城，烧了县城又没烧县长的住房。这些情况背后得有一个交代，即整个起火和最后烧进县城，如何大火、如何转移、如何撤退、如何要求救援这个过程得

向读者交代清楚。也许因为采访难度大，众多到达火场的记者，谁也没想要做这件事。但《中国青年报》不会放过最基本的事实。

5月23日凌晨，我和雷收麦随打火部队从漠河古莲林场（那年大兴安岭林区第一个起火点）的火墙里突围。下午在县城废墟，见到两个人从黑漆漆的断墙里跳出来，正是分别了十几天的李伟中和贾永。他们也是刚随森警部队的“红孩儿”敢死队从秀峰林场火场突围成功。李伟中当天就毫不迟疑地到县消防队了解情况，在县长住房外拍照，之后几天寻找县长。这种直切正题的调查方式，表现了李伟中特有的单刀直入的犀利风格。我们4人在县里立刻显得扎眼了。29日在县旅游局招待所（县里仅存的设备齐全的建筑，西部火场打火指挥部设在这里，外来人员的食堂也在这儿），发生了记者和警察的小摩擦。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引起了当地有些人的注意。

30日中午，在旅游局招待所餐厅，李伟中找到我说，又有人在小餐厅大吃大喝。我起身跟他穿过伙房，一边给相机的闪光灯充了电。李伟中推开3号餐厅的门，一桌人，一桌菜。我的相机一闪，已经得手。抽身来到客房区中央新影厂住的房间，李伟中过了一会儿才到。他走进那个餐厅，在餐桌边对着菜盘又拍了一张。等我们往外走，已经有旅游局长为首的20多人堵住了去路，一位副县长躲在人后。

“就是这几个！”人丛里一声指认，走在前边的李伟中被几个大汉扭住。我插进去拉人，背后已挨了几记黑拳。转身找出手的人，一片人，没法分清谁干的，就算知道是谁，也没招对付，因为李伟中、雷收麦也开始挨黑拳。雷收麦感到胸闷气短，赶紧服速效救心丸。李伟中不但犀利而且顽强。被人扭住时仍挣扎不停。可能因为知道伟中姓李，对方大喝道：“你就是李先念的儿

子，我也整死你！”事后，我们被警察带到一间屋子里，讯问、作笔录，谁也弄不清讯问的性质，是一般问问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翌日，当地公安部门的一位领导，到我们的帐篷来把我们几个人都叫去“谈话”。主要谈的不是前一天餐厅冲突的事，却都是他本人在起火当夜的行动。谈话变成了我们提问，对方回答。中途，对方好像是有事出去，一份有关当夜部分干部的行动过程材料就放在桌上。我们等了几分钟没见人回来，就开始翻阅这份材料，并记录。后来我估计，大概在警察讯问我们时，看了我们出示的团中央给总参、空军的介绍信。介绍信其实是李伟中为乘坐空军运打火物资的飞机去团中央开具的，但是否“团中央”、“总参”、“空军作战部”等机构名称出现在边远县份，给我们4人蒙上了“带有特殊使命”的官方神秘色彩，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这天的“谈话”更像提供材料，更像希望我们掌握某些情况。我们抓住了这些不很明朗的机会，继续收集资料。几天来，我们对起火前后一段时间内，当地领导的在位情况、每一台消防车当夜的行车路线，都有了相对准确的把握。当记者能说出几号消防车或哪位领导当夜几点在什么位置时，他的分析就有了事实前提。

记者了解了表面的全部，又了解了背后的全部，同那些瞎子摸象、浮光掠影的采访已有本质区别，这里说的本质区别是准确与真实意义上的区别。因为具体事实、单独判断完全可能同总体事实、基本判断不同。

事实背后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灾区“发生了什么”，这不算完。最好的报道

是继而告诉你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某种意义上，调查性报道、分析性报道就是“原因报道”、“背景报道”。

调查到位了，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认识。在后来的记者部研讨中，出现了众多从皮肉之苦中煎熬出来的、从大量艰苦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珍贵的新闻理论观点，而且几乎构成体系。比那些在院校中传授的新闻学课程实在得多的体系。其中观点之一，“发现是思想的发现”，是相对“看到不等于发现”而言。没有思想的透析，仍然不能形成深度报道。

那年《红色的警告》写了火灾反映出来的官僚体制的问题，《黑色的咏叹》写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我感觉已经是很有“认识”了。这时李伟中还没罢手，他从森林的损失看到的不仅是木材资源的损失，而是环境的毁坏，是全球环境恶化中人类的短视和社会管理对环境的漠视。于是他写了《绿色的悲哀》。写了“大立柜”森林观、“生态移民”等等。后来的十几年越来越证明他的远见，证明他当时“认识”的到位。当1998年洪水到来的时候，环境恶化、防灾基础设施薄弱是成灾的根本原因在全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1998年，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调查队走一两个月也找不到可供采伐一星期的成片的林子了。全国林业系统先后停止大规模森林采伐，其主业从砍树转变为植树。

《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一生有许多转折和选择，很意外地，他回回都获得成功。他能看到的始终是现象世界，而不可能知道规定这些表层现象的任何规律性原因。当记者的不能指望阿甘的傻福气，多少得有点“认识”，报道多少得涉及一点表象的原因。

时间：1987年6月6日至13日

作者：麦天枢 胡野秋

“私奔”采访记

麦天枢：“私奔”的背后

“私奔”采访记

近几年，安徽定远农村出现了上千对青年恋人以“私奔”的形式结成婚姻的现象，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显得很不协调。一方面，“私奔”往往导致非法同居，这明显违反《婚姻法》的规定，自然不在提倡之列；另一方面，当这种行为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时，我们就不能不探究个中的原因了。

这一系列采访记，客观地揭示导致这一现象的各种社会原因，以期引起各界及为人父母者的关注，共同抵制和破除封建残余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对广大青年的束缚和压抑，支持和帮助他们走上健康幸福的恋爱婚姻之路。

不可遏止的“传染病”

记者走进安徽定远县妇联办公室，首先看到的是一对风尘仆仆的青年恋人。他们正向“吴大姐”述说着他们为了“爱”而奔逃在外的艰难遭遇。明白记者来意的吴同志对正襟危坐的两青年一扬手：“瞧，这又是一对私奔的，几乎天天都有。”

当记者下山村采访回来，借宿在程桥乡政府的一处单身宿舍里，半夜3点钟有人敲门——该乡下李村一小伙子来找在乡里工作的表哥：“村里又跑了一对！”

当记者来到三县交界的最偏远的三河乡，副乡长老张扳起指头算了算：“今年元月到3月，我们知道的已经跑了8对了。”

在记者足迹所及的10个乡，几乎每个乡都有因“私奔”而起的民事纠纷找上门来；在记者访问过的40多个村、队，几乎每个村、队都有通过“私奔”组成的家庭，或有青年恋人正在以“私奔”谋求建立家庭，不少乡镇“私奔”数占全部新婚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人们认为，尽管定远过去也有过“跑婚”的，但多少年也难得听说一起。“私奔”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出现，正是“文革”结束后“解放戏、解放电影的那一阵子”。但“私奔”发展为当地一种普遍的婚姻现象，还是这几年的事。

由于对“私奔”还没有正确的统计材料，较为熟悉情况的妇女、法律工作者，一般认为“保守点说，也上了千”。记者依据采访过的乡村的情况分析，1986年“私奔”成姻的不下300对。该县负责同志也认为，由于婚姻问题较为复杂，一时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私奔”现象在若干年内还会有所发展。

目前，“私奔”已不光在定远日有所闻、日有所议，周围的

凤阳、嘉山、肥东等县，都出现同一问题。记者在定远农村就见到一些外县“奔”来的青年，在通往凤阳的山路上，几对私奔者竟不期而遇，结伴而行。

从记者直接或间接采访的近百对“私奔”者的情况看，“私奔”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爱上了，出不起结婚的彩礼钱等等，于是，一走了之；本来有了恋人，家里却要让姑娘为哥哥或弟弟“换亲”，于是，当天晚上便不知去向；本来已“订”了婚了，姑娘偏偏又“自由了”，惟恐家里逼婚，听到“订”过的人家有娶的消息，一夜间便随恋人双双远去；两人“好了”，按习惯找媒人去说合，女家或是看不上男家，或是看不上小伙子，或是忌讳同姓什么的，来个“不同意”，于是，两人一个小包袱就上了路，先“生米做成熟饭”再说……

随着“私奔”日益普遍，一般青年下决心“私奔”，也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过去一般都是“提亲”不成才考虑“私奔”，现在是先考虑“私奔”然后才去“提亲”——两人感情发展到考虑结婚的阶段后，分析一番男方的条件和女方家长的态度，“估计”不会同意，便准备出走。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目前已为一半以上的“私奔者”所采用。

按当地农村的传统观念，女儿“跟人家跑了”，就等于嫁了人，若强要回来再结姻缘，“跟离了再嫁差不多”，因此，私奔者一般都以一个新家庭为归宿。青年们正是利用这种观念，使一日之行成百年之好，一时之“奔”成为事实婚姻。“一奔就成”，导致效法者日众。

由于“私奔”现象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引导，以追求爱情为主旋律的私奔浪潮中，也杂有不少违法现象：一些不是法定婚龄的青年恋人私奔，造成事实上的早婚；甚至一些男青年的家长为经济上的考虑还鼓动孩子“私奔”；个别道德败坏的人，乘机拐

带十五六岁的少女甚至幼女出走，个别乡村学校出现中、小学生私奔的现象。

从“私奔”的总体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奔”为“婚”，实际上是非法同居，这就使旨在追求爱情、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私奔”带有更加复杂的社会色彩。

爱情“禁区”

在定远县“私奔”事件此起彼落的同时，包办买卖婚姻也相当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远农村生产发展较快，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还多，按县里统计数字看，达400多元。在记者采访过的村庄里，人均收入达600元、700元的也不鲜见。然而，随着富裕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则是姑娘的身价，是婚事的筹码。

记者看到县委刚刚转发的县农调队的一份“百户农民家庭”调查，关于婚姻花费，里面写到：

“1980年以前，男女双方见面至亲相陪，婚姻订妥，办理登记到结婚，花费400至500元，购‘四大件（指手表、自行车等）’和衣服，招待至亲即可。如今看门头费600元至800元，会亲费400至500元，过彩礼1500至2000元，结婚请客招待、家具、被物等费2000至2500元，四间瓦房（三间正房一间伙房）成了起码条件，一般人家娶媳妇得花万元以上。”

在这个县的耿巷乡，记者采访了一个娶过媳妇不久的家庭。这家主人姓刘，媳妇“订”在20多里外的朱湾乡，一切该花的都花了，喜洋洋去接亲，女方又提出要“开门钱”、“梳头钱”、“上车钱”等，父亲不得不几十里路上跑回乡里又筹措1000元，

谁知花完后，路上还要“过桥钱”，偏偏这20里路上又有三四座桥，无奈，只好要开车的冲过去。媳妇因此进门便抱头痛哭，把喜事搅了个天昏地暗，小伙子的父亲一屁股坐下去，一脸铁青，个把小时没力气起来。

记者赴黄山水库采访，路过唐圩村时，听说这时有一个“跑出来的媳妇”，顺便寻上门去。“媳妇”姓张，本是另一个村的幼儿教师，数年前订婚时就不同意，两家人喝订亲酒，她独自上山打柴去了。可家里收了人家的礼钱，要了人家的礼物，母亲终于以死逼她上了男家。结婚的当天晚上就因姑娘不愿同床而打了起来，以后夜夜打、天天哭，新婚10多天就跑到几里外唐圩村的亲戚家，发誓“死也不回去”。

像这样的婚姻悲剧，以及因彩礼逼得小伙子上了吊、喝了药的事情，记者在采访中时有所闻。

在这种经济和精神的重压之下，除了一些姑娘较多、“奇货可居”的家庭外，多数家庭和青年人都不堪承受。年轻人以“私奔”找到了“出路”；社会、父辈也通过“换亲”和“转亲”找到了他们的“出路”。

在程桥乡的连环村西岳桥队，记者找到了这个队的队长——转亲的热心人老胡。多年前，他在3个乡里“转”成了3对，把3对兄妹及家长请到县城，花了45元（每家15元）吃便饭，席间，他依据6个青年的相貌、年龄、胖瘦，写了一张“搭配”条，“传阅”后无人摇头，就大事告成。结婚那天，由他导演，3家把姑娘送到三乡交界的一个路口（担心有谁以迟到悔婚），然后各家把属于自己的姑娘“接”回去入洞房，并宣布不论哪家姑娘跑了，另两家都有权把自己女儿“接回”。

不想此举在周围村里大受“好评”，更多的人找他来“换”或“转”。最近他又“转”成了3对，因为这3家家长都熟识，

一个晚上便达成协议。只是因为其中一家的妻子突然去世，家里缺个女人，儿子需要比预订的时间早娶，老胡照顾这个特殊情况，将几个月前订下的名单又作了“调整”，把一个大些的姑娘“调”到这家，且新婚已成。

说到这种婚姻方式，老胡“总结”了好几条好处：1. 节省，一顿便饭就了了；2. 转亲比换亲选择余地大了，青年人容易满意；3. 名声好听——“这是明媒正娶”，比“私奔强多了”。

然而，记者却随处看到听到“换”与“转”造成的婚姻悲剧。在上李村、在北张村、在金巷村、在……记者都看到因此而破裂的新婚家庭或“私奔”在外的青年人。

采访西岳桥的当天下午，记者听说相邻的宫集村又一个“换”成的家庭出了不幸，顺道去看望。她姓刘，是个可敬如母亲的“姐姐”，父母早逝，她一人拉扯着两个弟弟，直到25岁（这在当地已是少有的“老姑娘”了），为了给大弟换个媳妇，嫁了一位年逾30岁的小个子男人。不想，就在记者到达的前两天，她的弟媳妇却又跟一个在蚌埠作临时工的小伙子“私奔”了（她们姐弟与大多数换亲的一样，没有办婚姻登记），为了逼迫婆家“解决”弟媳妇的问题，她只好按人们的习惯作做，回到“娘家”来，尽管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

包办婚姻在促成大面积私奔的同时，又促使“换”和“转”迅速发展，目前，定远有的乡“转亲”已由“三拐弯”发展到“七拐弯”，有个17户人家的山村，5家媳妇是“换”、“转”的。

两种追求是决然矛盾的，对抗仍在继续中。

爱不是唯一的根源

因为“好了”，因为爱才出走，才“私奔”，这本是绝大多数

“私奔者”直接的出发点。

为了见一面，并肩站在人堆后面呆上那么一会、一双恋人可以每晚跑几里、十几里路到邻村、邻乡去看露天电影，同一部片子转村走，他们不辞辛苦转村“陪”；为了把一首情诗送到恋人手上，姑娘可以跑几里路到恋人村庄的路口去，期望能碰见“他”、直“期望”到晚上10点多钟；为了获得单独接触的机会，两人不约而同到山上去打草，宁肯天天吃干粮，喝生水，柴草打得家里用不了……

记者采访过的私奔者中，绝大多数或男方家庭较为贫困，或男方“单姓小户”，在村里没有“势力”，或男方合族“没有一个吃公粮的”，与姑娘家庭“门”不当，“户”不对。但姑娘们“只看人好”，在所不惜。县里有关部门的同志总结认为，要是男方家庭条件比女方好，也就用不着私奔了。对定远县的姑娘们来说，“私奔”是普遍的“水往低处流”。

在一块千百年以包办或半包办（指父母谈妥后由子女去“见见面”的婚姻）为习惯性婚姻生活的土地上，青年人群起而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并且不惜“忤逆”而“私奔”，必定具有婚姻之外的众多原因。

走在定远的土地上，我们强烈地感到中华民族和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一个没有旧例可循的特殊过程：院后面“水牛抬杠”田里走，茅屋里的电视机却在播放日美贸易战的消息和伯明翰大学舞蹈团的节目；水牛背上用缰绳头拍打着手掌心的姑娘，一色的烫发头、高跟鞋；坑凹不平的村路上用平板车拉化肥的小伙子，不少穿着花衬衫、牛仔裤；过去不少村庄没有几个姑娘进过县城，如今没到过合肥的也不多了；藕塘镇的青年人跟着本地兴旺的“花生生意”遍游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几乎个个“开过大眼界”；在记者有幸看到的一些农村青年的“情书”中，里面

大大方方地写着“拥抱”。在有的青年含羞取出的日记本上，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在思考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爱情，怎样的婚姻才幸福之类过去只属于学问家的问题。

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把青年人“爱恋”的触角伸向他们也意想不到的角落。岱山乡男青年小罗，在村建筑队当瓦工，一年四季“跑天下”，去年“跑”到三河乡的大雍村，真就跑出来一桩婚姻。他随队给袁家盖新房，十几天时间里，便与这家的姑娘克玲倾心相爱。托人“提亲”被拒绝后，他们商量了一个时辰，小罗在村外等着，克玲提只筐子“割猪草”，一夜间便奔到几十里外去了。尽管他们历尽艰辛，记者到来时，他们已经组成一个甜蜜的小家庭。

在西州里店乡采访时，我们了解到一对曾在这里做工3个多月的私奔者。他们相爱后，“提亲”“不同意”，又没有个合适的亲戚家可以避难，便跑到百里外的西州里店来了。他们借了一间草房，男的参加当地一个施工队日有所入，竟也直整到两个家庭的“官司”平息，终于作为夫妻凯旋。

因此，县里一些同志与记者讨论“私奔”问题时，往往感叹良深。过去干集体，你不挣那个“工分”就没得吃，往哪跑？现在别说跑上十天半个月的，跑了一年的也饿不下，连个介绍信也不用开。看来，生活不知不觉地赋予人们比过去多的可能性。

耿巷乡有个姓刘的男青年，过去因盗窃罪判过3年刑，回来后，因家里伶仃一人，日子不好过，跑到马鞍山市作临时工去了。几年后，与一位城市待业青年谈上了恋爱，“估计”女方家长不会同意，一个晚上便“奔”回家乡来了。女方家长以及当这个“长”那个“长”的亲戚来了多少次，想把女儿带回去，终于没有成功。

记者与几位乡干部谈论这对新婚夫妇，人们都觉得不可理

解：这真是些年了，要是过去，不要说一个坐过牢的，就是个本本分分的人吧，到城里头还能呆住了？人家如今不光呆住了，还搞了个漂亮媳妇回来，一天出双入对的，比谁也过的自在。

当然，对于习惯于旧生活的人们，任何新变化往往都首先是个谜。

不受保护的婚姻

真爱情的路往往不是平坦的。

如果说从定远青年群起追求有爱情的婚姻中感受的是社会进步的欣慰的话，那么，从他们不同寻常的遭遇中，我们则更多地感到这种追求的壮烈和庄严。

在幸福村，记者拜访了一对青年夫妇，男的叫乔如意，女的叫汪金兰，他们是数年前小乔到金兰家所在的一个国营林场作临时工时相识并相爱的。由于他是农民，她全家都是城镇户口，金兰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来往。因此两人约了个时间，“奔”而远去。先在外县住了两个月，后回到小乔家。金兰家人终于找上门来，把女儿“抢”走了。各种办法用尽，金兰还是“非如意不嫁”，并且“视死如归”，父母和亲戚们不得不“由她去”。结婚那天，家人不让她在屋里换衣服，金兰在户外的猪圈里换上了新装。她前脚走，娘家后脚一把火，把金兰用过的衣物烧个精光，说是“给死人送行”，“等于以后再没这个女儿了”。现在他们结婚一年多时间，父母还是不肯相认，连金兰新生孩子夭折，家人也没来看一眼。

大桥乡岗阳村的殷保龙和王本霞，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可父母非要逼本霞嫁给邻村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不可。强逼之下，本霞跳湖被人救起，上吊又被救活，直

到父母双双绝食逼嫁，她才穿了一身男装到了男家（未办结婚登记）。“新婚”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她终于寻机逃离“婆家”，与保龙一起出走。不几天，这位大队支书带了40多人，浩浩荡荡赶到相邻的肥东县这对“私奔”者的落脚处，将保龙抓住，打得遍体鳞伤，被当地机关解救并由岗阳村村长将人接回后，又被“支书”软禁，直到乡里出来干涉，殷保龙才获人身自由。记者前来采访时，这对漂泊近半年的恋人仍然躲藏在外，不敢返乡。

在记者采访过的“私奔者”中间，绝少有哪个是一奔而顺利成婚的。不光“经济上受了损失（指未得彩礼、瓦房等）”，而且“名声扫地（一般认为女儿跟人家跑了，‘和当了妓女差不多’——家长语）”，气急败坏的姑娘家长或捉人或追堵抓人打人，或上门寻衅闹事，“私奔者”往往非受皮肉之苦，则遭“打砸抢”之祸。在西朱村朱家，我们看到一小伙子家差点被“岳父大人”砍断了房子横梁；在岗刘村吕家，我们看到一堆被砸成碎片的铁锅和抹上大粪的稻谷；在南集村杨家，我们看到一个被女方统统“接管”了的家，一头水牛在锁着的茅屋里吃草，主人则不能归来……由于女儿一跑，先上男家打人，砸锅牵牛、抢粮食已成惯例；“儿子干了蠢事”的家庭相继外出避难也成为惯例，哪怕地不能种、畜不能养也只能忍让。依记者采访情况和乡干部的估计，定远县因儿女“私奔”而受上述祸害的家庭，占私奔总数的七成以上。

奇怪又不怪的是，砸家占舍这样普遍的严重违法现象，竟然无一受到应有的制裁，原因呢？法律规定，类似案件不能公诉，要有受害人起诉才能立案处理。由于受害人一般认为“事情过去还是亲家，不好一下子把脸伤透了”，结果使“打砸抢”如同“私奔”一样迅速传染并发展。

三河乡一女青年与恋人“私奔”后，她的3个哥哥带人跑到

男家去，罚男青年的双亲跪玻璃堆，从头顶向下浇粪便汤，扬了化肥、撒了粮食、砸了家具。忍无可忍之中，男方家长立状投诉，法院立即调查并将这“无论如何要抢回妹妹”的“3兄弟”逮捕一人、拘留两人。这是全定远县数以百计类似事件中唯一有人投诉的一例，也是法律机构“有机会”插手处理的唯一一例。

遗憾的是，当记者前来采访时，这“3兄弟”均已释放，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其母到男家以“亲家”相求后，男方撤诉不愿治“亲戚”的罪。

法律只能站在一边看热闹，而青年恋人们的人身安全及家庭利益继续处在危险中。

相反相成的趋势

不要以为为了组合新家庭而不断蔓延的“私奔”是唯一的趋势，在定远县，不断出现的离婚并使已有家庭解体，也是一个趋势。记者在采访中不断听到、看到包办婚姻引起的一个个家庭破裂的悲剧。走进县法院，便有一个青年女子正在那里向法官申诉离婚理由；在汽车里，小车司机也拿出一份离婚起诉书与记者商量——看他家在农村的小姨的离婚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县法院的有关负责同志肯定地对记者说，虽然下属各法院的数字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全县农村离婚率上升，则是近几年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然而，在这支不断扩大的离婚队伍中，竟然没有一对是曾经“私奔”了的。省妇联的同志对此分析说：“私奔”的有感情，当然用不着离婚。

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道理。为此，我们也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家庭。

记者在陈桥乡，从下李村一个刚刚“散伙”的换婚家庭的阴

影中走出来，向南，来到了岗刘村的一个茅屋里。主人陈恒强，32岁，媳妇张万平，22岁，坐下来，当着村干部和一位长辈谈起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欢声笑语，让人十分留恋这个简陋的家庭。

这个通过“私奔”最终建立的家庭，几个月前已经添了人口。可当初小张被族人抢来逼去，娘家人几乎与她当时的恋人，如今的丈夫动了刀子。陈家两兄弟父母早逝，弟弟恒木29岁了，至今还是单身，全家除了几间茅屋几亩地，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和睦相处，“从早到晚乐呵呵的（一村干部语）。”在座一位老人说：“婚结了，恒强人也学好了，不像从前胡闹了（他曾干过偷盗的违法事），媳妇不夸，我们也得说个公道话。”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媳妇笑道：“别夸，小心再夸出毛病来！”那恒强一歪脑袋接上：“真是，夸还能夸出毛病了，越夸该越好呢！”于是，主客全部淹没在茅屋里愉快的笑声中。

这种和谐、大方、开朗、平等的气氛，在记者所到的传统农家，真是未得多见。

在靠山的西朱村，记者见识了3兄弟用不同方式组成的“两个半家庭”。

老大朱政庭，是父母给“说下的媳妇”，当记者进门后，那媳妇便出去了，只是在老朱喊了“开水”、“花生”之后，过来了两趟，放下东西，便又习惯地一边去忙她的活计去了。在丈夫面前，在客人面前，她表现的是定远大多数农村家庭妇女的地位：没有与客同坐的资格，没有说话交谈的权利。

而我们来到老三朱政林的家，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夫妻俩并排坐在一个长条凳上跟客说话，你打断她，她纠正你，说着过去的故事和今天的生活。一个能够如此生活着的家庭，3年前他们为了逃避4000元彩礼和3间瓦房私奔在外流浪数月，真应该说

是个微不足道的“代价”。

老二朱政顺，比起老大，难说幸与不幸，但与老三比起来，他显然少了点机运。他在村里修修补补、打兔子、砍山，都是一把好手，人称“事事通”。8年前他也“自由”了一位姑娘，只是“私奔”后姑娘被族人抢回，他找到公社，当时的领导不支持，于是到今天年近40，还是孤零零一人。

记者在定远县采访，听了许许多多类似的故事：“私奔”无比艰难，而对于拥有爱情，谁能怀疑他们创造生活的热情？

当然，也不能因此简单地得出结论：“私奔”就等于幸福。爱情婚姻对包办买卖婚姻来说，无疑是进步，而一个家庭的长久幸福，则是另一个问题。县妇联等部门的有关同志对记者说，据他们了解，有的“私奔”者由于涉世未深，对婚姻的考虑尚未成熟，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出走促成婚姻，这种婚姻很难说能否经得住生活的磨练，或许，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实际上，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不少这样的情况：由于年龄不够或互相了解不深，“奔”了，也终于分手而去，未能成婚。

爱情需要热情和勇气，也需成熟与冷静。

私奔并不是爱情的最佳出路。

最佳出路在哪里？

农村青年群起追求爱情，这无疑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然而，如此众多的农村青年还要捡起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时代的爱的武器——私奔，冒着被打家劫舍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追求爱情，这就不能不说是社会生活的缺憾了。

比私奔更美好的出路在哪里呢？怎样才能使有情人不需周折和牺牲便成眷属呢？为此，记者曾与定远县委、县政府、法律等

方面的负责同志座谈。

其实，定远县有关方面的同志，已为解决私奔以及私奔引起的社会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县妇联的同志接受一宗跑一宗，数以百计的适婚恋人，在县、乡妇联干部的奔波下，终于结束了流浪，建立幸福的家庭。记者在兴隆、三河、程桥等乡镇采访时，都看到乡里有关干部正忙着为找上门来的群众或自己找到群众门上去调解私奔纠纷。

然而，并不是每个部门都能埋头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藕塘有个村，2年前有9位姑娘相约不为彩礼，要自己找个理想的爱人，事后被县里有些同志知道后，立即被“总结”了好些“条”，树为“典型”。目前9姑娘已嫁出4人，有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他们正准备再“凑”4个姑娘进去，以保持“9姑娘的荣誉”。工作先作为“荣誉”，效果就可想而知，两年后的今天，全定远也没再能出现另一个“9姑娘”或“8姑娘”。

记者在定远期间，县里一个单位正在筹备一个农村青年集体婚礼，“筹备”之始，首先想到的是打报告要几千元钱，要大轿子车，婚礼后带新郎新娘们去游苏州。这种集体婚礼和婚事“新办”，如果全县数以万计的青年都来参加的话，不知定远县财政局能否吃得消，如果以后的集体婚礼不给花公家的钱，不让旅游的话，不知还能否“新”起来？看来，形式主义的东西，难以为大多数定远青年的爱情找到出路。

对此，县委书记陈六同志表示了明确的态度：一定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为自由恋爱者办实事，开绿灯，花架子不能搞。他告诉记者，县里已决定成立以县委宣传部牵头，由司法、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干部组成的调查研究机构，以全面了解“私奔”的社会原因，寻找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县人大也要考虑针对定远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些地方法规，以有

力的措施制止日盛一日的彩礼风和遍及各乡的“打砸抢”。这位县委书记还认为，婚姻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近几年不断蔓延的“私奔”还会呈上升趋势，这不是靠行政命令或“突击”能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把妥善解决“私奔”作为党组织和政府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由于一到定远，各方面都首先向记者推荐藕塘，介绍“9姑娘”，记者来到“9姑娘”的诞生地冉周村。

无疑，这个村子在婚嫁方面，是记者所到村庄中最具文明色彩的。不光“9姑娘”，这里大多数青年都通过自由恋爱组建了家庭，并且没有一对采取私奔的形式。村支书沈燕兰同志告诉记者，冉周已经形成自由恋爱与俭办婚事的风气了。

这个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走家串户之中，记者感到冉周与其他村庄相比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是中小学教育办得好，青年文化程度高，大多数都上过中学，“9姑娘”中有8姑娘是初、高中毕业生，青年求学，家长乐于让孩子上学，已成良性循环；二是商品经济意识浓，几乎家家都做花生生意——尽管这个村并不是花生产地，但他们从邻乡、邻村买原料加工后，卖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去，买来卖去之中，几乎全村的成年人都见过“大世面”。

看来，广大农村青年及其家长婚姻观的变化，最终还决定于婚姻、爱情之外的众多因素。

记者手记

“私奔”的背后

关于定远农村青年恋人的“私奔”，我和胡野秋采写的六篇《采访记》见报后，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引起一些注意：第一篇发表后，即有外国通讯社据此发电讯，并由《参考消息》“出口转内销”；还未载完，英文版《中国妇女》等报刊即联系转载；香港《大公报》等很快也予转载；定远县委立即作出决定，并发出《致全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动员全社会与包办买卖婚姻作斗争，以解决“私奔”问题；我自己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收到读者来信，或要求在婚事上“帮忙”，或告知自己行将“私奔”，或希望记者对其艰难的爱情给予支持……依记者部的意见，我把自己参加这次采写所记的“笔记”摘几段出来，与大家在业务方面一起作些探讨。

在采写中跳出圈外对采访和写作写点儿“笔记”，一直是我记者生活中的一件乐事。以这个形式交谈一下自己的想法，或者更自然一些。

遥远的“发现”

从大同下乡采访回来，与往常一样，我到近邻山西青年社的阅览室，去浏览一段时间的报刊杂志，从中了解山西之外的土地上新近发生的事情。在我，当记者以来，这个习惯从不曾间断过。我一直认为，在较广大的范围熟悉活生生的生活，对于一个记者的思维，有时往往比读书更重要。它不光有利于养成思维的“大局观”，把自己最熟悉的本省情况，经常地放在一个较清晰的大镜子面前，能更准确地评价和判断自己一日的所思所作，甚至往往直接形成采访和写作的题目，或者鉴于广东，江浙的发展，在山西在太原找到有意义的反差（如《在同一片蓝天下》、《富有者》），或在山西社会现象的基础上，从外界获得启示和答案（如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苏州市的职业教育）。

不过，过去的这种浏览，一般都作为自己熟悉社会，丰富思想的过程，当这次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千对私奔者的悲喜剧》时，当时便比较激动，山西农村的包办买卖婚姻是“有成绩”的，乡下时闻悲剧频频；全国各地彩礼加码，人们不堪负担，报刊上亦消息频频，可安徽定远的青年人，是如何找到了这样一个简单又充满历史戏剧性的方法？我眼前活动着的是一批为寻求精神解放和自由而在所不惜的人，似乎觉得他们的行为，意义已超出他们婚姻的幸福与否，爱情的成败如何。

于是，我给记者部打了一个电话：希望有机会到安徽一趟，去看看定远的“私奔”。

先入之见

机会是别人给我的。

当月底，我因故调回记者部工作，定远之行顺理成章得到记者部、内部和报社领导的支持。行前，我就自己所知的情况，拿出了一份有八个标题的“计划”。

其实，对大致已知的目标的采访，我一直坚持“主观”在前，“客观”在后，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同行中谈到“采访自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记者在采访中不光要随时随地捕捉住自己的情绪、感觉和思维的“火花”，努力使它们落纸在案，同时在采访前，是否有充分的理性准备，也关系到工作效率的高低和收获大小。

对于“私奔”，对于定远青年群众性的“私奔”，我是把它完全放到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下来思考各种可能性的。“奔”的状况究竟如何呢？都“奔”到哪里去——今天的社会是否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方便呢？那里的法律在干什么呢——对私奔本身的违法同居，对非法干涉婚姻的种种现象——如果说他们还没具体措施，那他们都是什么态度呢？有爱情的家庭与无爱情的家庭，爱着的人们与无爱的人们，难道生活会是同样的么？又是什么东西突然间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一下子懂得爱，勇敢地追求爱情了呢……

当然，有的题目，生活或报纸还难以回答，而不曾有的题目，也会在采访中新又产生，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正是事先的多思考，多设想甚至多想象，在采访中便获得更多的可能性、主动性。不管怎样，用“先入之见”去统治事实是错误的；无“先入之见”的盲目进入也非合理。当然，更重要的是：“先入之

见”本身必须是依据于更广阔的生活的思考。

从不配合到配合

我和野秋一到定远，在团干部面前首先吃了“闭门羹”，这实有些出人意料。我们认为，那个地方能够容忍“私奔”，还不失为尊重人的明智环境，如果一声命令把跑的都抓回去，在当今农村不是不可能。然而，定远的不少干部，则认为他们的不光彩，有碍“政绩”，团县委的干部几乎噤若寒蝉：见面当天默坐一个下午也未做通工作，不光不敢让我们看他们手头的一份材料，谈点情况也要“请示了县委再说”，连去县委书记家，也不敢带路，怕别人疑心记者的到来与他们有瓜葛。于是，我们俩人不得不问巷摸门找到县委书记家里去。

那免不了的“陪同”，也的确有点意思，先是团干部陪，接着“升格”，宣传部通讯科长陪，次后又是副部长陪，最后，陪我们采访的已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本人了。当然，这些同志同行，对于我们在11天里跑10个乡镇，40多个村庄的大面积，快节奏采访，提供了不少方便。

原因呢？除了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两个记者的行为当然是第一性的：不论在机关里还是在乡村，不论与法院院长还是私奔的家属，你以平等，热情又诚心实意地去讨论不同层次的问题；有车则好，无车呢，我们骑自行车，扛自行车，甚至在七八里山路上步行，径直到必须去的农民家里去，大约这样工作的记者是不必要戒备也值得“配合”。

这次定远采访，除了团县委，几乎每一个层次的采访对象都给予了最充分的配合，这里的“运气”可以这样概括：你的采访对象是哪个层次，你的寒暄与提问就属于哪个层次，你将永远与

你的采访对象“一般高”。

这需要生活，也需要真诚。

“点”与“面”

11天时间，跑10个乡镇，40多个村镇，近百个家庭，工作量比较大。在较短的时间里，对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怎样才能既从面上准确地把握事实的真相、原因和趋向，又获得写作所需材料的典型性呢？

前五天，我们是“挨着跑”，不同的乡镇，不同的村庄，尽可能地把握总体印象，而后几天，则侧重典型材料的获取，直接“跑目标”，“跑问题”。

重要的是，整个采访的过程，是对写作不断认识、不断思考、不断设计的过程。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笔记本上是八个较成熟的题目，每个题目的材料都已在头脑中排列组合结束，只需要“拿出来”一道工序了。只是回编辑部后，报社领导认为八篇多了一点，便将《奔往何方》与《无所事事的法》两篇压去，将有关内容分归主篇。

题裁·体裁·行文

爱情、婚姻本是社会普遍得不能再普遍的问题，但由于许多不言自明的原因，又成了一个极为敏感极为复杂的问题。真是不幸，我们的国度里道德专家是如此众多。因此，在机关报上为爱情写文章，从第一个念头出现，就得先考虑怎样才不被“枪毙”。

主要考虑到此——实际就是考虑到此，决定用“采访记”的形式，尽可能地客观叙述，不加议论，只给读者以编排过的事

实。语言把握冷静，不过多流露情绪，当然，如果读者从中能感到些情绪，那也正是记者的肚腔里便有的“目的”。

当然，就是这样，也亏了徐祝庆、周志春及国内部的同志把了不少的“关”——从一些故事的取舍到有的题目的更改，终于使六篇采访记以更见冷静的面貌出现，彻底地消除了“提倡私奔”之嫌。不然，依我的脾性，或许还会有些“不当说”的话出来惹麻烦。

有些东西，这么说就出来了，那么说则“呛”死了，有时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呢？这对我个人来说，似乎是此次采写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其实，私奔提出的问题是极为丰富的：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东西呢——人呢？“翻番”呢？还是别的什么呢？爱情的形式与人们整个的生存形式是个什么关系呢？真爱情所需要的正常环境与我们现存的观念现存的一切究竟有哪些矛盾呢？允许爱情是个进步，可爱情的位置是否已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了呢？多数人的爱情到了需要少数人“关心”的程度，它究竟说明了些什么呢……

当然，生活已经提出了问题，并不需要立即回答，或许也不是立即能够回答的。

时间：1987年5月29日至6月3日

作者：杨柏 杨宏 殷红 胡平 李明今 张文彦 杜涌涛
邓琮琮

西部贫困探源

杨柏：骏马是否还可以长鸣？

邓琮琮：穿行在云贵与黄土高原之间

西部贫困探源

贫困。谁能给贫困下定义？

新中国始建之时，人们料定贫穷很快就会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在中国大地上悄悄逝去。谁想到，在一些地方它竟穷追不舍在我们身后跟了30年，至今挥之不去。

不可否认，和自身相比，30多年间，中国前进了，而且，前进的步幅很大。

一个乐观的事实

中国的农业在全球7%的耕地上养活了全世界25%的人口。

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 70%，但必须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并且是在技术手段大大落后于后者的前提下进行的。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希·珀金斯据此称赞“中国的农民为世界文明奠定基础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穷困的水准随着发达地区的经济进步水涨船高，贫困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现象。

一个严峻的事实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人均年收入在 200 美元（折合人民币 746 元）以下的为贫困人口。

1980 年，“七五”计划完成之时，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为全国 18 个连片贫困区（共计 430 个县）规定的脱贫标准是：以县为单位，人均年收入 150 元人民币，口粮 400 斤。

倘若，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实行内封闭循环，这种横向比较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它面向世界开放，那么，这种比较就不仅是有意義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了。

尽管发达与不发达的悬殊，并非仅仅在于经济的实力，但它毕竟作为先决条件划分了三个世界。

数十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将贫困的帽子摔到太平洋里去。当我们面向全球，将自己置身于世界行列之中时，我们发现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依旧是一个巨大的空缺。而西部是这个空缺的空缺，作为一个极端的例证，西藏全区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江苏一个乡。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改革如同一股旋风在神州大地上疾走如飞的时候，西部落后地区的进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视。经济学

家断言：西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于是，举国上下关注西部，而又颇感诧异：翻开印象的扉页，山是秃的，地是黄的……一句话，险山恶水穷地方。然而，细读资料的卷帙，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中国的西部，纵横 600 多万平方公里，11 省区直抵南北，占据了我国版图的 2/3。山川源于斯，文明启于斯。在全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水准的国情下，这里的资源储量却异常丰饶。人均土地面积为全国平均值的 2.5 倍。拥有全国 98% 的草原牧场，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森林面积 7.7 亿亩，总蓄积量 60 亿立方米，分别为全国的 45% 和 58%。每个省区都有自己优质的农副土特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储量不少居全国前列。在东部为南水北调绞尽脑汁之时，西部水资源年径流量为 18000 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69%，人均 6000 立方米，每亩耕地 3000 立方米。加上浑然天成的旅游资源……照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样的条件，务工、务农、务林、务牧，应该是干什么成什么。

然而，生活常常事与愿违。

潜力并不等于现实。理论资源储量，虽犹如日月当空，耀得人炫目，却并未造福于这片土地。

全国 7000 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竟占了 70%。也就是说，西部十一个省（区）的三亿同胞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尚未解决吃饱饭的问题。

清明时节，进入甘肃定西地区，满目所见一片灰黄。百十公里外，麦苗青，菜花黄了。定西却仍不见一丝绿意。夹在沟壑纵横的山凹里的村落，全部是泥屋，远远望去，与山地同色，分不清彼此。高寒、持续性的干旱，使这片海拔 2000 米的黄土高原上有 80 万人、100 多万牲畜吃水成了问题。庄稼的墒情就更不

用说了。四季移运的速度在这里变得缓慢。靠天吃饭使丰歉年景上下相差 10 亿斤。歉收，国家要调进六七亿斤粮食，丰收，国家也要调进五六亿斤。自产自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片土地上 550 多万人口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每一座垛岭上的梯田都从山脚一直修到了山顶，但亩产充其量才只有百十来斤。这种条件，按世界土地负载能力的平均水平，每平方公里只具有承受 23 个人生存的能力，定西每平方公里却至少要承受 80 个人，最多要承受 261 个人。对这片贫瘠的土地来说，这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

一面是耀眼的富饶，一面是惨淡的贫困，强烈的反差，极端的不和谐。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贫困背后的贫困

来到西部，你会在云雾缭绕的峻岭，看到缕缕炊烟；你会在兽迹罕见的陡坡，看到新开垦的处女地；你会在那九曲十八弯的羊肠小道上，看到背负沉重的佝偻着的身躯。你不能不感叹那坚韧和勤劳。

然而，同样在这里，你亦会看到开发和利用与破坏和毁灭几乎在同时进行。

利用与破坏一：云南沧源垦殖开荒，使森林退化为灌木丛，继而退化为荒草坡，水土流失，肥力下降，旱涝频增。

利用与破坏二：云南西畴县毁林开荒，每年水冲沙盖十分严重，当地群众描述为“山上拉肚子，山脚盖被子”。开垦出的青田常被泥沙埋掉，当地人只好更加拼命地开荒，最后是岩头坡角，能种一窝算一窝。

利用与破坏三：年产香果 10 多万斤的天南茶房区，因树木

被大量砍伐，年产已降到万把斤。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使农作物受损，也使人和牲畜的生存受到威胁。目前，云南全省有 400 多万人口面临吃水难的问题。

勤劳是西部人民与大自然抗争中养成的天性。然而，勤劳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内蒙古敖汉旗古鲁板蒿乡，人均一亩三分水浇地，是个“塞上江南”一样的好地方，可是当地人家里院里除了玉米还是玉米。问“怎么不种些别的作物试试？”年轻人回答：我家从我爷爷手上就种玉米，种惯了。旗政府决定在林家地乡推广沼气池，既解决燃料又解决照明，还能缓解乱砍滥伐。农民的反应是：我们有的是柴烧，点不点灯都无妨，祖辈黑着不也过来啦！

云南武定县正兴区，青年外出做工，老年人留在家中盘田。青年们施过化肥的地里，老年人要再施一遍农家肥，青年人深耕过的土地，老年人要再浅耕一遍；青年人买回了良种，老年人照种自己的“祖传”种。富宁县的农科人员背着新培育的稻种满村转圈，无人肯要。

与这种排斥相反，1986 年 4 月 11 日，陕西佳县白云山太上老君庙里香客如云，传说，这天是真武神过生日。布施者络绎不绝，庙里收入高达 7 万元，相当佳县每天财政收入的 20 倍。那天河对岸的山西临县渡口壅塞了几百人，要求渡河求神者，多是山高地薄、生活不景气地方来的。原来 5 角钱一张的船票陡涨到 2 元，定员 68 人的小船塞满了 174 人，结果行至河心，船翻人亡，只有 45 人生还。那些在黄河旋涡中随波沉浮、命在旦夕的香客，竟还有高喊“真武保佑”的。

云南中甸县一户农民搞经济开发收入数千元，全部拿去献给了菩萨，以保佑他来年更加顺利。

一方面是资金的大量短缺，一方面是资金的大量虚掷；政府

给老百姓送钱，老百姓偏要到天国去还愿；一方面是对经验和长者的崇拜，一方面是对知识和创新的鄙薄；发达地区送去了致富的金钥匙，许多人却觉得不如使惯了的刀斧更顺手，这颇有些不合情理，却也演尽了落后地区不少人的文化心态。

当一个又一个一号文件叩开亿万农家小院，苏南、温州等地的农民仿佛一夜之间入了魔道，霎时，专业户、商贩、乡村企业家林立，商品经济不胫而走。同样的一号文件，在广大的落后地区显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位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结合部的德钦县，绿草如茵，牧场150万亩。黄牛、牦牛、骡、马、猪、羊、驴存栏数26万头，人均牧畜5头以上，位居云南全省第一。然而县城里的肉食品要靠外县调入。只因当地人自产自足，概不出售。

云南楚雄中邑社区一位18岁的青年农民，全家7口人，天天粗茶淡饭，家里养着10多头牛、50多只羊、20多口猪，折合人民币不下万元。因只为养在那里显富，收入不足100元。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由原始公社末期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对那里的人来说，历史进程虽然压缩了，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却难以彻底改弦更张：

在当地，你用钱是买不到东西的，如果脱下一件衣服，即可任意换取所需之物。人们使用货币的地方是买酒。

楚雄新村区一户农民自留山上水果丰收。立冬时节，他挑到城里卖了100多元，回村后被人唾骂为“讨饭花子”。从此只好守着水果喂猪或看着烂掉。

不懂商品交换，不认货币，自然就更谈不上集市贸易和讨价还价了。景洪县橄榄坝的农民菠萝丰收。昆明德和罐头厂前去订货，经过核算运费，买方要求降价。当地人认为讨价还价是看不起人，宁可不卖也不肯减一分，结果10多万吨菠萝大都烂掉。

面对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亚文化社会圈子，敢为天下先的商品经济的意识、观念、行为的觉醒和萌芽是太容易夭折了。

“传统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而且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念，导致传统的满足。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满足中，排斥了对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得到的商品的需求，因而也就泯灭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积极性。”这就是贫困背后的贫困，它无疑比经济的贫困更可悲。

“输血”效应

贫困，是应该得到援助的，无论这贫困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是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助力。于是，在国力有限的30多年间，源源不断的物力、财力流向了广大落后地区。多么宝贵的“输血”啊，它期望的是启动生机与活力。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量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场景一：宁夏海原县双河乡一家兄弟四口都是成年男子，穷得叮当响。县里拨款800元让他们买木料盖房子。过了些日子，老四不见乡里有动静，便理直气壮找上门去问：“咋不盖房子啊？”乡干部说：“盖房子你们也得搭把手，自己先把基（土砖）打上嘛。”老四一听生气了：“我们能打胡基的话，房子早盖上了。”乡干部无奈，只好作为任务派给村里，找人替他们把房盖上。如今，政府帮助盖好的两间新房立在那里，室内家徒四壁。

场景二：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工作组帮助海原县罗川乡组织劳务输出，与西大滩煤炭筛选厂说定，送100名壮劳力，每人每天收入三四元。第一次动员，全乡去了四五十人，干了几夭，纷纷返家。第二次动员附加条件：谁家去人为谁家提供无息贷款购买羊只，做工首月每人补助30元伙食费。去了一百人，不到两

月照样溃不成军。人们宁愿回家守着苦日子，坐吃救济，也不愿外出做工。

场景三：广西南丹县里湖乡 17000 多人，1986 年，国家拨给扶贫款 17 万元。但当地人除了嗜酒，别无所好。一次圩集，一个酒贩竟能卖出千余斤酒。酒后随地而卧，醒来各自东西。寨子边上修公路，谁做工谁拿钱。满寨子的青壮劳力无一人上前，眼瞅着外地来的包工队把钱挣走。

场景四：贵阳市为花溪区高坡乡拨了一笔专款，用于扶贫。为了方便山区农民，将专款的大部分购买了化肥，用卡车运上山去。化肥到了村口，没人愿来卸车，村干部只好请进入贵州的四川劳力前来卸化肥，然后将剩余的扶贫款作为劳务费支付给他们。有数字表明，国家历年拨到高坡乡的扶贫款总额为 2700 万元，按现有人口，每人相当 2000 元。

据统计，国家投放到农村的社会救济款，每年以 30% 的高速度向上递增。渐渐地，落后地区首先在都市有了自己的高楼大厦，柏油马路，有了大小不一的工业雏型。但落后地区依旧落后，贫困地区依旧贫困。在所有可喜表象的背后潜藏着令人忧心的巨额亏损和“越输血越贫血”的事实。扶贫的本意在于脱贫，在于将贫困引上发达的道路，但越扶越贫，且躺在救济上一贫不起，却是政府各级救济部门始料不及的事情。耐人寻味的是，这在交通、信息传播绝不发达的西南西北，这种现象却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宁夏海原县的民政科长老田抱怨说：“我搞了二十几年民政工作，这扶贫真是越来越难干了。开始，你救济他，他还感谢你。时间长了，习惯了，不给不行，少了也不行。调过头来倒好像是你该他欠他的。说是‘我吃的是共产党的，又不是你的，你为啥不给？’有一回，我们买了几十只羊，分给红羊乡六套村，

嘱咐村干部：先挑些有饲养经验的贫困户分下去，帮他们把养殖业搞起来。没想到事后，一个姓杨的农民提了把刀来找我们，说：‘每次救济都有我，这次分羊咋没我？不给我就杀肉吃！’

你说气人不。去年，我们想了个新的扶贫办法。拨款给县机砖厂增添设备，安排 100 名贫困户劳力烧砖，每月能挣百八十元，结果：去了没几天，人走得差不多了，说是‘在机砖厂干活，把家里的救济粮、救济款全耽误了，回去没活干，可以找乡政府要救济。’唉！真难办。”

贫困，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结果，它曾作为动因之一，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写下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宣言》精神的指引下，历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无产阶级在这片土地上当家做主的愿望。当时，几乎人人相信，贫困将会同资产阶级一起被埋葬在脚下。时光荏苒，又过了 30 多年，贫困，以及与贫困相依伴的某些消极现象，在我们这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依旧存在。众多调查材料表明，国家救济越多的地方，农民的进取性越差，贫困越呈现出一种难治之症的状态。扶贫在这个意义上反倒成了保护贫困。这真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其实，分析起来也很简单，如果不劳而能获，为什么要劳？如果无须等价交换而能无偿索取，有什么必要输入等价交换的观念？这实在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价值观念。

希望之星

没有钱不行，有了钱也不行。

没有资源，穷，有了资源还是穷。

同样的政策，东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西部一些地区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鬼打墙”，走不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于落后地区贫困病的探源及疗治，是早已在进行着的。人们发现，几乎在每一项贫困原因的背后，几乎从每一项扶贫措施的结局中，我们都能找到与传统判断相悖的反证。

资金短缺的反证：资金确实短缺，但一旦有了资金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一个县老企业几十个，利润只有 50 万元。每年按报批的新项目申请扶贫款，似乎只有上新项目才算扶贫。结果，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管理上冷冷清清，看效益惨惨淡淡。问题最终成了不是有没有资金，而是有了资金怎么用，怎样使它增值，怎样使它发挥效益。

缺乏先进技术的反证：贵州农科院为高坡乡找到了适宜当地生长的优良稻种，无偿提供技术，保证亩产 500 斤（当地品种一般只有二三百斤），少了包赔。区政府为了推广良种开会动员，允许愿种新种又不放心者先将 500 斤稻子担回。结果，试点的两个村在村长、党员的带领下，栽插的良种稻仅占整个稻田面积的 1‰。

农田基本建设差的反证：云南西盟境内有四条河，总流量秒立方米 43.6，落差 1300 多米。先后建起了一批小水电站，现在只有一个在工作，其他电站皆因缺乏技术力量而停止使用。接踵而来的是电线被人拿去拴牛、编篱笆、搭瓜架。

文化教育设施落后的反证：总的来看，西部的文化教育设施比较落后，然而也不乏例外的情况。贵州高坡乡的中、小学都是国家拨款建的。云顶村小学投资 5 万元，意在建一座 430 多平方米的教学楼。交工合同是去年五月，至今才盖起了一层。高坡中学彩电、电子计算机、录像设备、显微镜、实验室一应俱全，但

无人问津，上生物解剖课，本应只买一头猪，结果买了两头，教师每人分几斤改善生活。生物老师大为恼火：“猪都杀了，烫了，还让我来上什么课？”

除此，交通、信息网络、文化卫生事业……我们都可以找到诸多反证。

落后地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社会基础结构薄弱制约着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素质差又阻碍着社会基础结构的建设，所有相辅相成的因素同时又是相悖相逆的因素。这似乎是一组怪圈，一组互相缠绕纠缠不清的怪圈。然而，恰恰是在西部，我们看到了破解怪圈的希望。

进入乌蒙山区，滇黔公路两边到处堆着刚刚采掘出来的煤炭。各种机动车辆的司机和车老板就站在公路边上和煤老板讲价钱，然后随车装走，十分方便。被人称作穷得去不得的威宁县，目前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 20 亿吨以上，理论储量在 50 亿吨，因多是鸡窝煤，不具有大型开采的价值，又因离地表很近，挖上十几米就可见煤，于是当地农民一家一户的，几家联办的小煤窑星罗棋布。

开着车在赫章县境内的公路上跑一圈，只见炼锌的茅棚一片连着一片，成百上千，密密匝匝。

谁也说不清，在这成千上万的挖煤、炼锌大军中，是谁第一个离开黄土地的。在偏远的山乡中，人们的信息质量相同，价值取向相同，在穷极思变的时候，一两个率先突破者往往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当然，这首先要政策作依托。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单纯扶助为经济开发，这就是希望。

希望之星一：威宁县岩仓区幺站村的祖顺章，在他那个 70 多户的小山村里就是一个率先突破者。

幺站人的炼锌业启自明末清初，建国后又几起几落。1985

年6月28日，祖顺章在村里点起了第一座炼锌炉。两年间，全村人都卷进了这个行列。每年农闲的几个月里，家家户户挖煤、跑运输、炼锌、搞销售。祖顺章家向银行贷款7000元，周转资金有10000多元。他说：现在有钱不能放在家里，要让它转起来。

希望之星二：下巴身小山寨聚居着39户苗家，过去全村人守着300亩岩坡地和靠天落雨的10亩山窝窝田，吃苞谷饭，喝南瓜汤。全寨人均收入不过100元。终于，王新祥几个人牵上自家喂的牛下山出售了。从出卖自喂牛发展到跨县跨省贩牛，全村101个劳力跟上的有33人，3年间，经他们手出售的商品牛共有1650多头，成交额80多万元，从中获利4万多元，向国家缴纳税金1万多元。

希望之星三：甘肃秦安县干旱，水土流失严重，平均亩产只有142斤，52%的人要吃返销粮。17万农业劳力中有40%的剩余劳力，其余60%的人也有40%的剩余农闲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地潜在的商贩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货郎担发展到了14100多，据不完全统计，年收入达到1500多万元。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农忙务农，农闲串乡。完全脱离土地、长年经商者有5000余人。兴国镇小商品市场有670多个摊位，他们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江苏、浙江等20多个省市进货，然后批发给本县及邻县一万多货郎远销到青海、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等地。1984年以来，兴国市场向国家上缴税金累计462000元。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刺激了秦安县针织品、成衣、皮衣、小五金、食品、小塑料制品、手工艺品的发展，产值达到690多万元。

希望之星四：贵州白酒驰名中外，但由于生产能力低，供不应求。1986年，贵州安顺市酒厂打了一场城乡结合、互惠互利

仗。本厂只生产了 8000 吨酒，却销售了 12000 吨，4000 吨基础酒来自乡村的 90 多家农户。酒厂领导说：我厂多生产 1000 吨酒，须增加 1000 万元投资，资金、厂房、设备都是问题。镇宁县农户有酿酒传统，我们两下一结合，我厂出原料、出质量标准，县里出质量检查员和酿酒专业户，进行基础酒加工。结果只投入了 100 万元，就得到了 4000 吨酒。当地青年高兴得把新房都腾出来造酒，出酒率比厂里还要高出 10%。过去银行不敢向他们贷款，如今，家家户户在银行有存款。去年，仅此一项，镇宁县得到税收 100 多万元。

希望之星五：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贵州条件最差的威宁县灼圃乡开辟了“南方草地畜牧业建设”科研项目，历时三年获得成功。项目通过鉴定，并由此带动起了周转 18 户生产商品羊的专业户，培养了一批技术推广员和试验员。这 18 家专业户中有的人原来连自己家里种多少田亩都说不清。如今，在高强度的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指导下，已能够比较自如地进行畜牧业生产了。这些原来只知道伸手向国家要救济的农民，如今敢于向银行申请贷款发展生产。在还没有完全见到终期效果的时候，有的农户已经在分期分批偿还贷款了。这在当地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以上五例仅限于贵州、甘肃两省任意挑选的几个贫困县。西部，这样的希望之星几乎在每个贫困县都可以找出若干，他们无疑是西部发展商品经济最积极的因素。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启动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经济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很久以来就在探讨——西部的希望何在？把他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方案和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希望之星”联系在一起，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改革！顺应已经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将西部从自然经济的轨道推

向商品经济的轨道。

听任落后地区的自然过渡是没有希望的，真正的希望在于对社会主义“大锅饭”体制的改革，在于调整出一个社会化规模的商品经济关系，在于促进落后地区自身“造血”功能的健全，在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记者手记

骏马是否还可以长鸣？

1999年6月的一天，编辑部（当然是十年前我曾热爱并为之努力工作的中国青年报社的编辑部）老朋友，这几天全国包括港台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编剧之一的罗强烈先生打来电话，称他和老朋友、当年我的同事之一，为火爆一时的报告文学《大国寡民》到北大演讲，并被收入《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一书第一辑“当代中国思想背景”第一篇（“寡民背后的大国：底层与体验”）（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1月版）的作者卢跃刚，他们俩编辑一本当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性报道的文集，并选中了我参与写作的两篇文章，叫我写点回顾总结性的文字。接到这个电话时，我竟有一种这一切都非常迟到的感觉。——一种不知道该写点啥才能对得起当年，又对得起现在的感觉。因为写这些东西的时间离现在都已十多年了，一切都变化很大了，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自我感觉是自己已无当年那种勇猛锐气和纯正又精细的新闻感觉了。一转眼的功夫，离开了青年

报这个被视为中国青年新闻界中的国家队已快10年了；我来深圳这个朝好里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现代文明城市，朝坏里说是一些人眼里的物欲金钱欲横流的地方，也整整8年了。我能再在感觉上恢复到80年代，年轻的自己那种工作平台上来写这种总结性文字吗？

1987年5月底6月初，中国青年报以四篇连续报道的规模（共1万余字）推出了我们中国青年报西部记者的一个力作《西部贫困探源》，立即在当时的新闻界甚至是理论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其标志之一是新华社编辑出版的权威杂志《中国记者》，于当年的7月号即发表了该社编辑邵建武的评论：《但愿骏马长鸣》。称这组报道“题材重大、主题重大、视野开阔、境界高远”，“有阳刚之气”，“是骏马嘶鸣”。接着是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胡跃平告诉我，他们此后在京开记者会，会上发了一些材料，其中也有这组报道。人民日报后来也搞了一组西部报道。编辑部收到的有关信息虽然没再有人向我们转达，但我在贵州所面对的是不断有省政府的、体改委的、社科院的人问我，你们那组文章，宁夏那部分材料是在哪里得到的？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负责人宋汉年、研究员吴承旺、助研杜小书（三位课题组成员）竟带着他们的一份《贵州农村社会生产力研究》报告来找我交流。我们报道中引述的一些话提出的一些观点，竟被他们当作学术论据，写进了他们的学术论文之中。至于我们报道中对扶贫工作的反思、对贫困现象背后人的观念问题的透视，则更激起了相当多的人们的共鸣。我在贵州参加过的一些扶贫工作会议上，就有人不断地在谈话中引出我们的报道。

一组现在看来，更多地是从文本意义上与采访方式上，又被界定为是“调查性”的报道，为什么当年引起共鸣？为什么又会在它已见报了12年后，又被人们提及要重新结集加以总结？我

想诚如邵建武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这是源于这组《西部贫困探源》的题材意义重大。仅从“贫困”两个字里来理解，它涉及的是中国差不多 1/10 的人口的生存状况以及 1/3 省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这组报道见报那一年的下半年，中央通过了一个有关世界级人权问题的报告《87 扶贫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发表后，中国政府总理曾向世界庄严承诺：2000 年时，中国要基本上消灭绝对贫困，绝不把贫困带入 21 世纪。仅此一点可见这个题材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深层次的问题之一，并且全世界关注。作为人类的一支，其生存状况发展状况上的贫困问题，还与世界性的贫困问题相连。

这组报道引导人们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主题重大”。且不说这个问题中央关心，被提到中央决策层面予以讨论，从世界性的经济学社会学学术角度而言，它的主题意义也是重大的、世界性的、全人类的。

记得 80 年代特别是 1986 年前后，我便常有一个问题问自己：“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大报驻贫困地区的记者，抓什么样的东西，写什么样的报道才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文字推上报纸的版面？”我为此梦牵神绕。于是开始读书调查，不断地思考。那一段我反复读的书有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我觉得那是一份出色的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报告。贫困在那里孕育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对革命的理解；我读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写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这本书我是在贵州安顺采访时，在当时的团地委书记袁周那里第一次看到并借来读第一遍的。此后 1986 年 7 月又托报社编辑邓琮琮在北京买到了一本。寄到贵阳后，又看了第二遍，并在书页中批了大量眉批；后来到北京开会期间，又跟孙亚明等人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后面的内部书店购书，又买了两本，分别送给了记者站的通讯

干事（现新华社贵州分社信息社总编辑）顾筑胜。1986年，贵州的青年理论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活跃，他们请来了上海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有的人如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等，现已成为访美学者、博士、博士生导师）在贵州就发展问题展开讨论。内蒙古自治区研究室的西部发展战略研究者、提出“反梯度”理论的郭凡生（《摆脱贫困的思考》的主要作者之一）到贵州与会，曾在金桥饭店有一场演讲，吸引了一大批渴望摆脱贫困的贵州青年包括不少干部。我立即前往采访，后来写了篇《觉醒的西部意识》，发表在贵州团省委主办、当时处于创办试刊阶段的《现代青年报》第二期上。另外一本特别值得一提的书是，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富饶的贫困》，这是一本从发展经济和社会学双重角度切入贫困问题的报告，当时它给贫困的定义是“贫困地区的人的素质差”，因而引起颇大争议。可以说当时说什么的都有，但真正驳倒素质论的文章没有见到。那时候这本书一时洛阳纸贵，在贵阳买不到，我托人在省新华书店搞到了100本，然后用通讯员经费买了送人，包括发给记者站联络的各地州县市的通讯员。我最初发现这本书是1986年的9月初北京全国社科书展，我们那时在北京开会，星期天休息时，几个弟兄抽空去逛书展，在书展上买到了第一本《富饶的贫困》后，我跑回报社的地下室，一口气读了一遍。我被书中大胆的激动人心的创见所吸引，特别是为书中出现大量的我所熟知的一些材料所“激将”，一夜通读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当记者的没写出这样的文章？”这种文字本来应该是记者写的，像保罗·哈里森所做过的那样。于是我就产生了寻访一下这本小册子的两位作者的想法。于是11日那天，我采访到了两本书的作者王小强、白南风，后来写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否石破天惊？》一文，发表在现代青年报的创刊号上。后来听当时的团省委书记（现为国家

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回来传达说,这篇文章受到了当时主管团内宣传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的肯定。

促成这组《西部贫困探源》的出笼,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1986年秋天,报社经济部编辑刘扬的贵州行。那段时间,我正忙于筹备中国青年报贵阳记者片会,租房、租车,找关系打折,安排行动路线等等。没时间陪刘扬离开贵阳到乡下跑跑,但我介绍他去了一次贵阳往西走的第一个县安顺地区清镇县(现已改为县级市,划归贵阳市)。当时团县委安排他到乡下走了走,去过一个乡场并赶了一次集,夜晚在团县委办公室将就睡了一夜后,他回贵阳跟我说了两件事,使我至今都忘不了。一件事是他在乡场上看见老百姓砍了几根碗口粗的树,卖了五六元钱后,在一个汤锅摊(不知是不是死猪死狗死马肉煮成一大锅——刘扬语)那里买了二元钱的肉加一大碗酒,在那里过把瘾。喝醉了倒在地上,吐得一塌糊涂,引来野狗舔食他的呕吐物;一件事是,他睡在团县委的木凳上,晚上饥饿的老鼠竟敢跑来咬他的耳朵。贫困问题怵目惊心,贫困地区的人的生存状态更让他——一个从北京大城市里来的人,看在眼里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他对老百姓在贫困、短缺食物的条件下,迷恋乡场上的肉汤锅,才有那种卫生标准“极高”的推测。当然他还听了很多关于贫困、扶贫问题的种种传闻,我们聊下来的结果是——应该搞点“贫困探源”式的东西,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我们所能付出的力量,来寻找为什么贫困的原因。至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探源”这个词。

紧接着我们到贵阳花溪宾馆开记者片会。作为“东道主”,记者部谢湘特意为忙于会务、协调吃、住、行飞机票之类的我,安排了半小时发言。我想起刘扬鼓励我谈谈贫困问题,于是一口气,我讲了贵州贫困问题近40分钟,引起了与会记者,大部分

都是来自西部地区的记者们的共鸣。我查了当时保存下来的笔记本，见到麦天枢、孟勇、殷红、张文彦、李明今都有关于他们所在省区贫困问题的发言。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到贵州任省委书记时间也不长，听说团报在贵州开记者会，锦涛同志在10月14日，下午4点多钟抽身到会上，来看望报社的领导李至伦、张飙等同志和各路记者。锦涛同志到贵州工作初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州县搞调查研究，因而到贵州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对贵州的省情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介绍的贵州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讲贫困问题。锦涛同志介绍贵州的经济情况听了也让人深思：贵州当时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有40多个县，120元以下的有26个县，需要财政补贴的有66个县。贫困地区要解决经济问题，首先要甩掉精神包袱。贵州贫穷，有它特殊的原因和规律，如山区、交通困难，导致社会封闭。这也带来了人的素质问题。说贵州人懒吧，但实际情况也不一定，为什么？如此困难的自然经济条件，换一些人来这里生存，可能会为此自杀。而贵州人民却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得很顽强，说明他们特别能吃苦。但贫困问题形成后，也相应带来了思想上的包袱。比如不少人中缺乏一种进取精神、听天由命，导致自然灾害的破坏力被放大。缺乏开发性的扶贫，扶贫没能激发出强力的造血功能。一些人思想上养成了依赖情绪——“穷就穷到底，国家好料理”。于是扶贫工作就有了一个前提，怎样把摆脱贫困与思想解放结合起来？从宣传工作和制定政策的角度，也都有一个如何激发人们的信心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树典型，这样才对贫困地区的群众有感染力、说服力。因此，典型不能高不可攀。发展经济重要的是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怎样从贵州97%的土地为山地和丘陵的现实出发，来考虑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锦涛讲贵州当时缺粮，每年需要国家调粮十亿斤时，也

总结了环境破坏的惨痛教训，讲贵州森林覆盖率曾从50年代初的28%下降到80年代的12%，导致水涨沙涌，有限的坝子（山地平原）上的一些农田被淤塞。锦涛同志还谈到了贫困与所有制的关系问题，指出了贵州经济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经济比重太低的问题，反映了过去一大二公的思想。求大求公，反而没有促成贵州生产力的大发展。扶贫工作关键要激发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机制，要促成这里的市场发育，促使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反贫困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并且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等等。锦涛同志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事先并无准备，他随机性地这么一讲就讲了近一个小时。没想到，他关于反贫困的一些谈话，也激发了我们与会的记者与编辑部同志的高度注意。记得锦涛同志走了以后，晚上任红、梁长春、刘扬他们又邀了一些记者商定了要搞“贫困探源”这个选题，并初步确定了每个记者回去后各自搞一个点上的调查，然后寄回北京由编辑部汇总。“贫困探源”最初就是这么确定下来的，或者说是记者编辑之间不断碰撞形成的。记得那次记者会我们还去了一次安顺，当车行至平坝县境内时，碰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辆货车因车祸碰倒了一位路边老乡，情况并不严重，但一时没有交警来处理。于是这位老乡的家人就拉了一条凳子，放在马路中央拦住所有过往车辆，不让走，要陪，一拦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们怎么去交涉，那老妇人都以身拦车，不让我们这些与那个车祸无关的任何一辆车从旁边绕行过去，那情形非常让李至伦、张飙他们感慨。想想这件事，真是比后来我读到的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的文章《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所例举的社会低效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按照经济学家茅于軾的见解，没填邮政编码，街头看热闹等低效现象，是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的话，你在中国贵州的交通要道上这么被人为的原因塞一次车，或许也就可以触摸到贫困地区为

什么贫困的根本原因了。茅于軾特别能震撼人心的话是：“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或者是“错怪了穷的原因”。“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贵州山区公路本来就非常稀缺，稍好一点的路更特别稀缺。那时，正常情况下，贵阳到安顺都要走近3个小时，那老妇人一发脾气耍赖，就让过往车辆在那里排长队歇着没脾气。

过了1987年的春节，各路记者们的稿子陆续到了北京，这是西部贫困探源的第一稿散装件；后经经济部编辑邓琮琮精心编辑，整合成了第二稿。宏观一点的全局一点的内容，包括一些思想，都是编辑部同志讨论研究确定下来的。记得3月底或4月初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节，邓琮琮带着她编成的第二稿小样来贵阳找我谈修改时，那稿大约有1.4万余字，是一个长篇。编辑部的意图是感到这个稿一是还缺一些材料，需要补充采访；二是还要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即用贫困地区的新闻事实，来提升贫困地区的亮色。于是我们又有了一次贵州的西部行。我们从贵阳出发，到安顺得到了团地委的支持，团地委让出了他们惟一的一辆北京吉普212做我们的采访工具车，我们到镇宁县采访了专业户造酒的情况，后到六盘水、到威宁县、赫章县、毕节县（地区所在地）、纳雍县，行程1000多公里。在返回安顺时，车刚过六枝，吉普车脚刹失灵，我们一路是靠驾驶员的经验，用手刹跑了三四十公里慢慢回到安顺的。回到贵阳之后，邓琮琮又辗转飞到兰州，因那段时间黎戈宁与麦天枢在搞西部移民的采访调查，所以有关甘肃的贫困地区材料是邓琮琮去补起来的，稿子终于在1997年5月出了第三稿，于5月底——我们又回北京开会时分四篇发表了出来。

“贫困，谁能给贫困下个定义？”没曾想 1987 年见报的这组稿的第一句话提出的问题，十年后再次成为我来深圳后写贵州贫困报道时面对的问题。1997 年，因中央安排深圳与贵州两地结对扶贫——“深黔携手、扶贫帮困”。市委在发动这场跨世纪的扶贫活动之前，为了让深圳市民了解个中深意，特地在 3 月下旬，组织了一个记者采访团到贵州去采访。10 天在贵州黔南州、毕节地区跑了 2400 多公里，不少地方对我而言是故地重游，我在返回深圳写的“贵州专题”中，第一篇文章标题及内文的第一句话都是设问：“什么叫贫困？”给出的回答是著名社会学家朱厚泽同志的一段原话：“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贫困是指一定时空状态下，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情景难于让人接受和容忍。其状态之困难，水平之低下，已经到了难以维持其个体生命和种群的延续。或者虽然简单维持个体生命和种群的延续，但还远远低于同时代大多数人已经达到的生存状态和一般水平，因而引起人们的不安和社会的震动。”

这是至今我所见到的关于“什么是贫困”的最好的一个定义。

那场活动后来深圳人民给贵州的捐献资金达 1 亿 4 千余万元，修建了 100 多所希望小学以及生活生产基础设施，并且还接受 80 年代扶贫工作的教训，按市场经济规律扶贫，开展了一系列深圳与贵州间的经济合作项目。有的资金加深圳机制注入贵州的地方国企后，已起到了激活这些企业的作用。贵州方面给的最实在的一个评价说“深圳人民动了真情”。当然，外部的真情是改变贫困的一种稀缺资源，但更稀缺的资源是自己奋起与贫困作最顽强的斗争。这种人与事在贫困地区都是有的，他们反贫困的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我提升”，才是真正的骏马嘶鸣。同样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新闻与经济学相比似乎做得

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当我们能动员一切资源去围剿贫困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罪恶时，贫困还有存在的空间吗？

编辑手记

穿行在云贵与黄土高原之间

初稿被毙了

我手里的稿子厚厚的一摞，一共8篇，来自云南、贵州、广西、宁夏、陕西、山西和内蒙，这是编辑部设计、8省区记者采写的，讲西部的贫困，列举了很多现象。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广西记者杨宏的稿子，很长，字迹工整，案例丰富，看得出采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编辑部上下看过之后，却认为基本不能用，没有总体思路，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就是《西部贫困探源》的初稿。

我成了这摞稿的编辑后，最初的想法是尽量“起死回生”，只要有素材，或许能编出一条思路来。反反复复揣摩之后，最初的想法不得不放弃。8篇稿的素材确实很多，但案例重复，有的有观点，素材却很单薄，整合困难，贫困现象之外的原因呢？脱

贫的希望呢？这是编不出来的。报社和部门领导最后决定，由我补充采访，重写。

贵州行

去贵州前，我把王小强、白南风写的《富饶的贫困》速读了一遍，带上了火车，这是当时的畅销书，《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报社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在当时年轻的知识分子中，《走向未来》充当着某种教科书的作用。那是新闻界崇尚理性，摒弃桎梏，进行观念启蒙的时期。

如今早已在《深圳特区报》顶门立户的杨柏，当时是贵州的记者，凭着交情，他向花溪团委借了一辆212吉普和一名布依族司机，自己掏油钱，开始了我们哪穷朝哪开的黔西之行。

贵州的民谣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自古就不是个富庶之地，那次贫困之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云贵高原，山岭险峻，气势开阔，群山万壑中，212吉普像一条浮在半空中的游虾，一乎山腰、一乎山顶，就是落不到地面上。路平时，峰回路转，视野可以放得很远，阳光下，锋利的山仞层层叠叠，忽明忽暗，置身其中常会有一种错觉。狭窄的公路，一侧壁立，一侧深不见底，路边、沟里，时不时会看到翻下去的车，让人提心吊胆，不由自主攥紧门把，准备一有情况就跳车。遇到搓板路，人在车里抛上抛下，牙齿打架，一次只能蹦出一个字，全身的劲都使在手能抓住的地方。

就在这崇山峻岭中，蕴含着丰富的矿藏，铜、煤、锌……

有矿的地方石头多土少，被石缝留住的一点土成了山里人的宝贝，不论大小多少，东一撮西一撮撒上几粒种子，就交给老天

谷管理了。苗青的时候，羊和其他牲畜时不时要光顾一下，这样的麦子自然谈不上有多少收成，有多少算多少，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

黔西有煤，人们说，有杜鹃花的地方就能找到煤，杜鹃花漫山遍野，小煤窑也漫山遍野，花开得最灿烂的地方，也是小煤窑的黑窟窿斑斑点点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山的疮疤。大多数的煤窑都就近公路，煤挖出来顺势就堆在路边，来往的司机送完货，回程捎上一车，自己用、转手卖，都很划算。

黔西的煤在当地被叫作“鸡窝煤”，一疙瘩一块，很碎，大多距地表浅，稍微挖挖就能见到煤层，煤的质量很好，乌黑发亮，是上好的无烟煤。这种煤，国家觉得没有开采价值，地方政府要正经八百地上马，困难重重，于是，个体窑主们有了一片天地。找几个人，用木桩支起一个简陋的巷道就可以开挖了。挖出的煤用不着运输，随手倒在路边，过往的车辆随走随拉，当时就能拿到钱。

我们在一片煤窑前停下，想找一个下去看看，杨柏探头走了几步又退回来说：最好别下，够悬的。这时有工人背煤上来，窑主就收他一个签子，记上数，为的是最后算账。一筐煤看上去有六七十斤、七八十斤的样子，由于巷道局促，工人们背得很辛苦，倒在地上不起眼的一点。我们问在窑口收签子的人：你这一天能挖多少？说是也就几千斤。见我们有些不信，抬高了嗓门：这没准，遇到不好挖时，一天才千把斤。他后面的山上是另一家煤窑，高大的绞车轰轰隆隆地转着，规模一看就知道是眼前这个窑主的几倍。煤窑雇工，小的五六人，大的二三十人不等，基本上是附近找不到更好生活出路的农民，劳动保护自然说不上，走时还是一个囫囵人就不错，因为条件恶劣，死伤是常有的事，但凡有办法的都干别的去了。县里对这种采煤既不表态支持，也不

制止。据说略微有些手续，在乡上就办了。站在县上的角度，先不说代价，起码多少缓解了救济上的压力。

像这种自说自话的经济增长点，在黔西最穷的赫章和威宁是另一番景象，成百上千的茅棚，在山沟里一个挨着一个，绵延数十里，远远望去，像刚揭锅的蒸笼，白气腾腾，那是一家一户在炼锌。由于土法上马炼锌污染严重，容易引起铅中毒，国家一直不允许私人炼。但这条戒律在当地显然已经作废。钻进任何一个茅棚，都可以看出那一簇簇蓝色的火苗上正燃烧着主人生活的新希望。

八七年的时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先污染后治理”和“发展与环保同步”在北京各种各样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争论得热火朝天，结论自然只有一个：后者。但这个“结论”就像国家禁止私人炼锌一样，到了“穷极思变”的赫章、威宁老百姓那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和杨柏采访了一位70多岁的老汉祖顺章，他是威宁么站村的炼锌大王，自从炼了锌，就和过去一年四季的主食烂土豆告别了，家里的房子是村里最新的，全家人整天脸上挂着笑，一副很有奔头的样子。村里人都拿他当榜样，跟着一块炼，于是，也不吃烂土豆，有钱买大米了。

我们问他：“您知道这种炼法伤身体吗？”“知道。”“要是炼锌、吃大米、少活几年和吃土豆、空气好、多活几年，您愿意选择哪个？”“吃大米，少活几年。”“您70多了，高寿了，您的儿孙们也愿意少活几年？”“我们这明末清初就炼锌了，好几辈人啦，没事。”

污染——死亡，这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土豆变成了米饭，却是顿顿可以感受到的生活质量的提高。炼锌与死亡之间，老汉看不出有什么等号，他炼的锌销路很好，换来了新房子、白

米饭和一打打的钱。也许有一种既对身体好又能挣钱的活路，但他不懂，也不知上哪去找。事实证明，在全国其他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远比“发展与环保同步”的要多，以致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一难题苦恼。当初不想付的代价，最终证明一点也没有少付，无论是祖顺章还是这个国家。

威宁县的首脑们都集中住在一座很旧、但就当地条件而言已属不错的两层木石结构的灰楼里。每屋一桌、一床、一箱和一个高背洗脸盆架，几把椅子，很像统一配给的单身宿舍。县穷，干部的轮换就频繁，所以往往不带家眷。

吃过晚饭，我、杨柏和几个到县里扶贫带职下放的大学生挤在县长黄平的房间里聊天，问到当地的草海，一片很有名的高原湿地；又问到蒋文兰，一位从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来当地种草的人。黄平说，蒋文兰我们很佩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丈夫和孩子丢在兰州，一人跑到这来种草，一呆就是几年，有慢性肾炎，春节也不回家，还是丈夫带着孩子来看她，不简单。开始，山里人都不信她，现在追着管她叫老师，说什么是什么。

我和杨柏决定，明天上山去看看她。

大山里空荡荡的，十里八里见不到人，车开了两个小时，似乎不怎么对劲，畜牧局局长让停车，说自己记不清，好像走错了。趁空我们赶紧钻出车，找块平地站会儿，整理整理颠散的骨头。

车开始爬坡，路越来越看不清，漫山的大雾，遮天蔽日，放慢车速，亮开车灯，也只能照见5米左右，寒气从车缝往里钻，汗湿的衣裳变得冰凉贴在后背，迷蒙中慢慢看到道路两边越来越多的水泥杆拉起的铁丝网，知道到了。地方叫灼圃，是蒋文兰创办的我国南方第一个高原草地试验站，这名字也奇了，不知是哪位高人起的，海拔2400米，日照短，终年潮湿寒冷，居然起了

“灿烂温暖的育地”这么个名字。吉普车停在再也开不动的地方，对着一排新起的石屋，屋前十几个民工正在用石头铺地，已经铺出了篮球场那么大块，听见车声，都停下活直着腰看。这地方，难得有人来。我们很快意识到蒋文兰不在，出迎的人中没有一位中年女性，一问，她刚刚回兰州休整，失之交臂。

石屋燃着煤火，试验站的人都穿着羽绒服；说这里7月也要生火，脱不下毛衣。我们只穿着两件单衣，围在炉边，前面热后面凉，翻转身，后面热前面凉。墙和屋顶衔接的地方露着缝，简陋但很干净。墙上有一幅纪伯伦的诗——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完成梦想愿望的渺小的人，而不做一个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翻译不太好，但用意明确。

1979年，南方山地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草种飞播试验。两年以后，当时的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农牧渔业部聘任的南方专家技术组组长任继周前往考察，发现人工草地退化严重。在强悍的原生植被面前，飞播的优良草种面临灭顶之灾。有人断言，南方山地人工种草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不适宜开辟牧场。任继周认为，我国秦岭淮河以南13省区，10亿亩草地，3倍于新西兰草原面积，可利用的有6亿亩，轻言“不适宜”为时过早。他选择了飞播草种退化最厉害，地理条件、自然条件、社区条件最差的威宁灼圆建站，由贵州省农业厅和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联办。于是有了在南方建立第一个草地试验站——贵州高原草地试验站的开端。

当39岁的蒋文兰作为研究所建站的实施者只身来到威宁时，身边只有一个从半路“截”来的女高中生。县里给了她最热情的接待，但并不相信她能搞出什么名堂。连县领导也认为她坚持不了几个月就会打道回府。灼圆距县城50公里，没有任何生活设施，除了土生土长的山民，还没有人能在这里落住脚。县里给她

派了一辆专车，供她山里山外拉送东西，不久司机就撂挑子了，一个大小伙子，当地人，说“实在受不了”。可蒋文兰没有下山。

聊了一会儿，暖和过来，我们提出去看草，接替蒋文兰在站上主持科研的李向林和当年被半路截来的女学生小孟陪着，说这天气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

灼圃初建，已有 7000 亩飞播的和天然的草场，800 亩试验地和 1600 多个试验小区，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雨雾像一道屏障，遮住了视线，只有脚下的感觉很清晰，草毯起起伏伏、松软而富于弹性。三叶草、黑麦草，鲜嫩肥硕，这是蒋文兰和站上的人几年中辛勤创造就的。

边走边聊，李向林讲了个故事，说当地有个传说，当年两个英国的传教士进了这大山就没能出去，山里人搞不清什么传播上帝福音或精神鸦片之类的事，只是看中了马背上驮的半口袋粮食，杀了人，夺了马，才知道口袋里装的是一些草籽。没有人知道他们带着草籽进山干什么，就那么稀里糊涂给埋了。从那以后，当地有了三叶草和黑麦草，自生自灭，岁岁枯荣。蒋文兰他们种的三叶草和黑麦草是从新西兰引进的。

我们就和小孟开玩笑，说当初你和蒋文兰进山的时候可够悬的。她说，哪啊，开始根本没人理你，当地人听说蒋老师是种草的，都觉得新鲜，草还用种吗？这山上长的不都是？看我们给草施肥，给草锄草，觉得我们在那没事瞎鼓捣。时间长了，草长出来了，他们的羊就老往我们这跑，不拦上，试验地都给踩坏了。拦上后，羊不来，人来了。看着我们的草，越看越喜欢，问这问那。

说着话，对面的雾里涌出一群羊，穿着光板儿皮袄的老羊倌在后面跟着。李向林说，走，带你们看看我们的羊和长毛兔去。羊和兔都圈在一个大房子里，中间隔开。羊都脏兮兮的，挤在一

起，拱来拱去的，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李向林说，这些都是良种羊，每只年产5公斤羊毛，当地的羊只能产一二公斤。蒋文兰在的时候，挑了18家农户，和乡里合作，贷款买羊，把羊和草场一起承包出去，目标是一亩草地出2500公斤鲜草，两亩地供一只繁殖母羊，然后每天上课。当地人不知道什么叫划区轮牧，放羊一直是吃干净一块再吃一块。草场承包后，舍不得吃自家的，就把羊放到别人地里去，还得给他们劝架。告诉他们，草吃得太干净不行，不吃也不行，会长老的。施肥也要跟到地头，不然会把肥料扛到集上卖了换酒喝。

细密的雨雾不知不觉把头发濡湿了，一缕一缕贴在脸上，刚才屋里攒下的热乎劲儿慢慢散尽，身上有些打颤，看到前面有户人家，都说去看看。进了屋，没人，炭火上烧着一钵羊肉，满屋香味儿，梁上挂着熏猪腿，里间一张竹床，再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正要走，主人回来了，一问，原来是18家承包户之一，姓胡，包了420亩地、146只羊。提到蒋文兰就说：蒋老师是太有良心的人，没有她这样的老师，政策再好我们也搞不起来。以前养羊也就随便喂喂，打不上什么毛，老师用科学，我们照着做，以后就会好了。

转了一圈回到站上，正赶上午饭，白菜、豆腐、蒜苗炒肉，还有汤，我和杨柏都说，这山上的伙食还不错嘛。小孟就接了说这是现在，当初可没这些。我们让她讲讲当初是怎么被半路“截”来的。她就笑，说，哪有那种事，是我自己要来的。我高中毕业在家闲着，蒋老师上山前，在贵州农学院做了一段时间准备工作，想找一个能吃苦的帮手，我父亲在农学院医务室工作，知道这事，我就来了。刚上山时，还没有现在这所房子，只有坡下那两小间，我和蒋老师住一间，两人一张床，另一间3个民工住。每天早上6点起床，总是她叫我，起来自己挑水，走4公里

路，回来准备一天的饭，其实很简单，烧些开水，烤几个山芋，吃几个，带几个，就算饭了。出去就是一天，开始是平整土地，划区，种上草以后是大量的试验测试记录。每项试验多少天完成，一天的记录也不能少，工作量非常大。遇到今天这样的大雾，上午测的地块，下午再去找不着了，还得重测。这里长年大雾，一年中只有冬季3个月天好。重测的事也不知做了多少。蒋老师有慢性肾炎，我开始不知道。看她累得直不起腰，就劝她下山看看，她总是说等等，忙完手里这些事再说。我上次出差到兰州，见她儿子就问：想妈妈吗？他说：想，可我都不认识了。听到这，大家都低头吃饭，再也没人说话。

后来，我在兰州见到了蒋文兰，她长得很好看，气质文静。也见到了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接受了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视察灼围和她在地头交谈的照片，但提出不要写她个人。回到北京，我很快收到她的一封来信，信中再三嘱我不要写她。我体会她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答应了她。

除了蒋文兰，在黔西偏远的村庄，我们还拜访过一位乡村女教师，那是一次偶遇。司机刘师傅实在太累了，停在路边休息，我和杨柏沿着公路旁边的缓坡慢慢往上爬，无意中路过一个小学。说是小学，其实也就一所房子，安门窗的地方都空着，教室很暗，里面黑黢黢的。正在上课的女教师看上去很小，比《一个都不能少》里面的魏敏芝大不了多少。孩子们有的朝前有的朝后地坐着，看得出是几个年级凑在一起的复合班，老师分期分批，讲完了这班讲那班，不听讲的孩子说是自己做作业，因同在一间教室里，所有的课都在听，想分也分不开。

见来了两个外乡人，孩子们兴奋起来，老师也像学生一样好奇，课自然停了。我们从女老师那知道，她只有18岁，家在几

十里外的县城，平时就住在学校，两个星期回家背一趟米，一个星期只有一桶水，还是老乡送的，吃喝都靠它，常常没水洗脸。孩子们上学很苦，天不亮就得赶路，带上几个土豆就算午饭，中午下了课，在柴上一烤，外面焦里面生，就这么吃了。

孩子们的字写得五花八门，有的看上去是一个方块，但没有一个认识，倒像是抽象派的画。离开时，老师和学生把我们送到屋外，看着我们下山，几次回头，都看见他们还在那里站着。

车继续往前开，不时见到三三两两的人，扛着一段树干赶路，一问知道是赶圩的，肩上的木头是卖的，变两个钱好换酒喝。贵州出酒，出好酒，当地人因此也嗜酒，赶圩喝多了回不了家，是常事。走村过镇，常能看见一些男人手里举着酒杯，晒着太阳边喝边聊，酒在他们中间递过来递过去，就像是零食。政府组织当地人外出打工，问清了活计和工钱，不合适，不去。政府还是得救济。

在黔西就这样转了10天，所见所闻，样样都有。

返程的路还是那种路，车还是那辆车，但不像出发时那么提心吊胆了，颠习惯了。采访即将结束，心情放松了许多，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能睡着。从盘山公路下来，刘师傅说，刹车坏了，一路上，靠手刹下的山，怕我们担心，没敢告诉我们。那是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我不懂，见杨柏愣在那儿半天不出声，最后说：天呐！要是在那些急转弯中没刹住，我们睡得糊里糊涂就上别处报道去了。刘师傅人很厚道，当过兵，一天无论开多长的路，多累，都不抱怨，只要饭能吃好就行。在部队时他就是汽车兵，带过徒弟。他说，教徒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不许打瞌睡。要是发现副驾驶睡着了，最绝的一招就是急刹车，“一次就扳过来了。”我们说：“那你不把人撞坏了？”“我有数。开车的哪能打瞌睡？后边坐着人呢！”我知道，他也累，也要睡觉，睡不够时也会打

瞌睡，但他不敢睡，后边坐着我们呢。

回到花溪后，杨柏宴请刘师傅，答谢他一路的辛苦，刘师傅在家里又专门回请了我们，告别时，他对我说：“邓记者，将来孩子大了，我带他到北京去玩，去找你。”多少年过去了，我在北京没有等到刘师傅带着他孩子来，我曾问过杨柏，花溪团委的刘师傅好吗？他说挺好的。再后来，杨柏去了深圳。刘师傅的音信就再也没有了。

甘肃行

离开贵阳，乘火车经成都抵达兰州，孙凯来接我。当时，甘肃记者黎戈宁有事外出，拜托孙凯帮忙，他那时还是《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员，好像是什么局的团委书记。我们俩谁也不曾想到，多年以后，他不但成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还成了记者部的主任。

甘肃的目标是定西，那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和云贵高原不同，黄土高原的突出感觉只有一个字“土”，土房子、土路、土墙、土瓦，土头土脑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颜色。当时已是4月天，看不见绿意，找不着树，真有点“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味道。记得一首歌谣里说：人是泥捏的，住在土屋里……那就是定西。惟一可称道的是路，比贵州强远了，沥青路面被太阳一照，黑黝黝地发光，从高处一望，宛如游龙。

团县委派了一名副书记陪我下乡，这在当地已经成了一项专门的工作，甚至是主要工作之一。上至中央领导，下至记者，时不时就会有人去上一趟，定西的干部和老百姓都习惯了，什么人没见过？

定西穷困闻名，一说扶贫，人们就往那跑，开始还要现挑现

找，时间长了，就有了专门给人参观的贫困户。要看穷，熟门熟路，就是他。上至中央考察团、省委书记、省长，下至各种各样的记者，走马灯似地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那个家还是那样，只是主人历练得颇有了些礼宾接待的水平。

当地的水质有问题，痴呆多，有的一家好几个。带我去的这家，夫妇俩看上去都不怎么明白，生了3个儿子，除一个稍好，其他两个和父母差不多。这样的家庭光靠救济是扶不起来的。政府每年送粮、送钱，旧的土坯房不行了，找人在旁边帮盖新的，但还是穷，不怎么管用。我们去时，50多岁的男主人站在新盖的散发着湿气的房子前，傻呵呵地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老伴儿站在他的身边。团县委副书记说：他见的多了，都训练出来了。两房屋里没有一间不是家徒四壁，旧屋里没什么，新屋里什么也没，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生活用品，甚至看不见吃饭的碗。炕上是一团乱七八糟的黑棉絮，屋角是一小堆烂了的土豆。这种日子他却过得很热闹，因为穷到了底，转而具有了被参观的价值，使他比村里其他人家见过更多从上面来的大人物，新旧两间土坯房成了他的背景，在他的身后看着他送往迎来。

与黔西比起来，定西不但环境恶劣，而且资源匮乏。

我问这个村的村长：村里这样的人多吗？说是不少。问：为什么不考虑治水？说上边来人看过，也没想出办法。那为什么每次都把人往这领呢？要钱嘛，要不怎么办？

重起炉灶

说实话，从贵州、甘肃回来后，最初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理性定位还是有了。相对于一篇新闻报道而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太长的一个过程，它并不如我们所希望和想

象的那样，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是什么。在重起炉灶的《西部贫困探源》写作中，揭示贫困的同时弘扬理性思考，为社会提供新的思路 and 希望。于是充分借鉴了《富饶的贫困》一书中的理性分析和判断，放弃了初稿中的重叠案例和补充采访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加重了宏观描述的比例和作者的主观指向，使这组报道成为 80 年代后期本报产生过重大反响的深度报道之一。原稿的上下两篇最终经现在的副总编（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周志春定夺润色，改编成见报时的 4 篇。

时间：1986年5月24日

作者：张建伟 左志

第五代

张建伟：重现“第五代”的十天

第五代

1978年，国门打开。于是，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漂洋过海，聚成一股股有人贬之、有人褒之的留学热潮。悠悠七载已逝，种树原为结果，但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逾期未归。一时间，舆论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舆论并非没有来由。

国内一家权威新闻单位发出信息：我国留学生学成后将有百分之八十滞留不归。

某著名华裔学者提出警告：中国在美留学生，倘能回来百分之十，不必大惊小怪；倘能回来百分之二十，可以举杯庆贺了！

一些留学生派出单位发现：派出者拖期一年未归，惊呼“花了钱，赔了本”！国外有关资料表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留学

生回国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这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

国内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我国再派留学生，将像苏联当年归返犹太移民一样，索取高额教育培养费。

西方记者的新闻鼻嗅出了异味：估计中国留学生政策可能关闸……

中国门，开，还是关？一闸千钧，关系重大！

历史的联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时，一架波音 747 凌空而起，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一行十二人乘机飞往美国。半小时后，左侧发动机发生事故，飞机迫降东京机场。

工作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天津外经贸委研究室副主任杜厦，此去大洋彼岸，惟身兼双任：考察、招聘。

天津对外开放，深感人才匮乏。胡启立同志在津视察时建议：可到国外去招聘我国自费留学生。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宝库！

东瀛，这个对杜厦来说不期而至，曾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引发了他对历代中国留学生的无数联想……

第一代留学生，毫无疑问，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严复乘桴西去学习英国海军；秋瑾东渡日本求索救国之途；孙中山栖身美国，两度檀香山求学。殊途同归，第一代留学生先后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严复一部《天演论》唤醒了千千万万昏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秋瑾操刀反清，成就一代女侠；孙中山团结起一大批留学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一代留学生。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始，以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

级共和国终，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第二代留学生，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震撼中动身。以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陈毅、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奔赴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以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为代表的投向“赤光一线”的赤都；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青年赴日留学……这一代留学生的优秀分子，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立与建设，谱写了与日月同辉的灿烂的篇章。

第三代留学生，以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等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看到：一个愚昧、落后的祖国无力在世界争强。新中国诞生后，这些在国外已负盛名、生活优裕的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拦，义无反顾回到祖国，为中华科技、教育、文化的腾飞尽了最大的力量，成为领导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中坚。

第四代留学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歌声中奔向苏联、东欧，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我国独立的钢铁、石油、机械、纺织、汽车和化工工业的发展，无不以他们为骨干，中国的现代经济，与第四代留学生的卓著贡献相连。

……历史的回顾使人感奋，现实的舆论令人担忧，杜厦一时心潮难平。

旧金山机场到了。工作组就要面对第五代留学生了。

西海岸湿润而夹带寒意的海风扑面而来，杜厦步下舷梯，大脑中是一个未知的符号：

“第五代——？”

具有中国特色的排列组合

为了解答这偌大的“？”，工作组十二位同志的足迹走过美国二十二个州，六十六个城市，九十八所大学，召开大会四十九次，同七千多留学生见了面。召开座谈会六十六次，参加人数七百五十二人，与四百四十八名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作了个别谈话。杜厦尤为活跃，精神抖擞地穿梭于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华盛顿和纽约之间，深入各大学讲坛、图书馆、实验室、宿舍——他常常就睡在留学生宿舍的地板上，从深夜谈到天明，结识了众多的炎黄学子，获得了五彩纷呈的印象，又加以严格的检索、归纳……

印象之一：耿耿报国情

国内某些舆论认为：公费生身受国禄，可望归国；自费生有相当的自由度，不会回来啦！甚至有人愤怒地指责这种现象为“投敌叛国”。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哈佛大学，杜厦见到一位才貌出众的中国女性——陈荣君。

她的父亲原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毅然回到祖国。“文革”中，他被关进了“牛棚”，为此，直到1979年，荣君还不能跨进国内的高等学府，不得已飞越太平洋，自费到美国求学。

临行前，卧于病榻之上的父亲把她招到床前说：“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三十岁的荣君一直未婚。她在美国攻读管理秘书学位——半工半读。

在杜厦面前，她流着泪说：

“我是一定要回国的，我一定回去，一定！”

可能，像陈荣君这样学业完成后决定立即回国的自费生目前尚少，申请到“绿卡”（永远居留权）的也许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留居美国。

但一位著名华裔学者说：在美国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他们大都是留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这种现象带来的是：台湾有了世界先进的电子工业。

现代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谭国兴，原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后分别在伦敦理学院、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学位，专攻酒店经营管理，现在美国一公司任职，待遇优厚。当他从美国当地报纸上看到祖国派人赴美招才的消息后，立即给杜厦写了一封信。

“祖国对外开放，建了大批酒店但缺高级管理人才，不得不让洋人来管理，想到此，我毛遂自荐。我有七年的管理经验，我希望回国担任合资酒店的中方总经理，或帮助祖国培养酒店管理人才！”

万绍鸿，斯坦福大学经济管理博士生，留学生联谊会主席，并被该校聘为副教授。为了祖国经济的振兴，他与许多自费留学生一道，决定为祖国在美国开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并为此自费往返祖国多次。他们的计划受到国务院和上海市等领导同志的普遍重视。

田克，旧金山州立大学半工半读毕业生，现已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经理。听杜厦讲到天津招聘人才的情况后，他说：“我将尽快回国，全力以赴，赤膊上阵——一分钱报酬不要！”

雍恒，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营管理学位，已在美国一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听说杜厦来美，他先后七次电话联

系，见面之前，他在杜厦下榻的旅店等候了三个多小时。

“天津市经济开发区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如果你同意，可在今年回去试工三个月，具体报酬……”

雍恒摆摆手，打断杜厦的话：

“我决定今年夏天就到天津，报酬我分文不取。在我熟悉贵公司的情况后，我愿担任贵公司的驻美代表，为推进天津的对外贸易奋斗一番！”

在杜厦接触的三十位已经毕业或将毕业的自费生中，已有十位决定来津试工。有的已经成行。

殷殷慈母愿，耿耿报国情。

自费生同样是炎黄子孙。

在祖国建设和对外开放中，他们将发挥特殊作用。

印象之二：为伊消得人憔悴

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面孔，架一副眼镜——杜厦的挚友、在密西根大学进修的朱嘉明与杜厦不期而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嘉明亲自做饭招待。席间，杜厦得知这是朱嘉明到美国后第一次买菜做饭。为了省时间用于学习，他几乎每天都是啃面包。因他是访问学者，该校每月为他提供八百美元，他几乎全用在自费进修英语和买书上。杜厦留心到，他出国时带的那双皮凉鞋，仍然穿在脚上：一问，果然并未买新鞋。

“干嘛这么苦自己呀？”

“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这样。”朱嘉明淡然说。“公费生国家一般每月提供数百美元的生活费。同国内比，钱是不少。但在美国求学，住宿费每月至少是二百美元；倘想精通英文，聘请个美国教师，一小时课程就得二十几美元；与我国不同，美国大学实行淘汰制，学校里没有铁饭碗。一个学期之中，教师要求学生阅

读的参考书往往多达上百种，而一本书至少得十几美元。”

“为了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只好艰苦些。”

公费留学生们知道：这是目前国家财力所能尽的最大的努力了。

自费留学生就更加艰苦，他们完全靠打工挣钱维持学业，白天拼命学习，晚间拼命工作。他们没有节假日。

“国内有些人认为我们在这里吃喝玩乐，”一位留学生说，“其实，这种艰苦、紧张的环境，在国内呆惯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印象之三：双重人才效应

在马里兰大学，杜厦见到江姐的儿子彭云。彭云与妻子易小冶热情招待了杜厦，同他谈了一个上午。

“谈谈祖国的建设吧！”

“谈谈祖国的改革吧！”

“谈吧，谈吧，别停下来，接着谈呀……”

一直不停地谈的杜厦偶尔也闪过一个念头：“应该说国内对他们的传闻，应该问问他们，你们不回祖国了吗？”但他一直没有问。

易小冶原是北京某刊物的编辑，她一方面全力支持彭云的学业，一方面已在成人补习学校毕业，又开始攻读马里兰大学的正式课程，学的是她在国内的本行：信息传播学。

他们将自己心爱的孩子留在了国内。

易小冶低声说：“我想孩子，可是这学习的机会，太难得……”

彭云说，学业完成后，立即回国。

国内一种舆论认为：博士后（取得博士学位后再进行十八个月科研的制度）政策使留学生拖期不归。

彭云便正在做博士后。

国内还有一种舆论：留学生还要带老婆，说是什么“伴读”，这还能回来？！

易小治便是“伴读”者。

对做博士后问题——

美国移民法规定：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做十八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必经过派出国同意。这种研究可使博士生增强独立工作能力，拓宽知识，以便回国后适应国际高度竞争的局面。这使留学生获得知识与能力双重效应。

工作组同近五百名留学生进行了交谈。明确表示取得学位后立即回国的 88 人；已经在做博士后的 66 人；打算做博士后的 195 人；未拿定主意的 87 人；由于与外籍人或台湾人结婚或已取得绿卡要留居国外的 11 人，只占百分之二点五。

到 1985 年底，旧金山地区有 23 名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其中九人没做博士后，已回国工作；14 人做了博士后，其中 7 人已回国；另 7 人尚未到期。

对“伴读制”问题——美国许多舆论的看法是：理解。夫妇遥遥万里分居若干年才不可理解。有的报纸甚至根据国内传出的某些小道消息攻击说：“不让配偶出国，是扣为人质”。

据统计，今年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四百四十八名留学生中，有 221 人的配偶在美国探亲或留学。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配偶在爱人身边，不仅可以互相关照，而且“伴读者”同样参加学习，实际上等于国家同样一笔钱却使两个人进修——双重人才效应，何弊之有！

我国驻美使领馆人员及国际舆论都认为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政策，呼吁不要关闸。

印象之四：群星灿烂

七年来，我国留学生的成就如何呢？

刘西拉，美国普度大学研究生，1985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协会授予雷曼瑞斯科研奖，这是专门为在土木工程科研中有突出贡献者设立的。他已在去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

胡传文，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仅用三年零三个月即获得核动力工程学博士学位，创该系历史纪录，在毕业前一年就受聘到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他已决定，放弃在美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国参加大型核电站的建设。

田匡宇，美国耶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年方二十出头。他通过实验发现了一个新的负离子，受到李政道教授的称赞。

张欣，自费留学生，在勃克莱分校获经济学硕士，又在密西根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世界银行聘为助理研究员。他已下定决心到天津市工作，利用在世界银行两年的工作经验及学识为祖国的对外开放服务。

陆具祁，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的研究生，专门从事“重子”研究，已发表论文二十三篇，其中有三篇作出重大贡献。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他准备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业后即回他的母校南京大学工作。

中国留学生，群星灿烂。

李政道教授作如下判断：

二十世纪，世界科技是犹太人的时代。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炎黄子孙将占据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世界科技将进入中国人的时代。

印象之五：中美人民理解的桥梁

1978年，当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迢迢万里来到大洋彼岸时，映入眼帘的是个复杂、陌生的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也不了解他们。隔绝了三十年，期间又充满了无数歪曲和偏见，“中

国人”这三个字，使不少美国人惶恐。许多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想租寓一所房间，比登天还难，一些房地产商认为，黄皮肤的陌生人来到哪里，谋杀、暴乱、抢劫就跟到哪里，房地产便要跌价！

但中国留学生用他们的行动，逐渐唤醒了人民美好的回忆，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如今的美国，每到感恩节或圣诞节，中国留学生成为最受欢迎的客人；在中国的春节，美国人也送上他们友谊的礼物。

一位博士生曾赴加州讲学，一位马戏团演员获悉此事，专程把他接去看戏。演出开始前，这位美国人向全体观众致辞：今天是本团最光荣的日子，我请来了中国人！于是，全体观众起立，热烈鼓掌。

简·克里格曾留学中国。学业结束后，她匆匆回国，途中才记起一只贵重的皮箱丢在宿舍中。她焦急、后悔，谁知第二天，皮箱竟奇迹般地被送回她的住处。

现在，中国留学生们的到来使她心中友谊的种子破土而出。

她赶到中美交流处，把那些陌生的英文拼写姓名一一抄上。每年感恩节，她把洛杉矶大学里所有的中国学生、学者请到家中作客。金黄的玉米、喷香的火鸡，陶醉着友谊的使者。

六年来，简把愈来愈多的中国留学生介绍给美国家庭。

她四处托人，邀请美国人做义务英语教师，并成立了辅导班，1979年以来，辅导了数百名中国人。

她筹集捐款、组织旅游，让中国留学生从多方面了解美国文化，自1980年以来，每年三次，无一例外。

——一天晚上，工作组成员杜厦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故居中。

这是一座乳白色的二层小楼，位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外的

林阴道上，现在是洛杉矶地区中国留生活活动中心。

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租寓在这位孤老太太家中。不久，老太太病危住院。想儿子，儿子没来。这位留学生把她送进医院，并在紧张的学习期间照料、陪伴她。弥留之际，老太太立下遗嘱：

这栋房子，将来永远用来接待中国留学生。

——一个个炎黄学子的身影在杜厦的眼前浮现、排列，组合成一个个鲜明的判断：

心向祖国的爱国之心，
承继先辈的报国之情，
奋发有为的竞技状态，
感人肺腑的美好心灵。

这一切，构成中国第五代留学生的群体形象。

尽管留学生中也有极个别花天酒地之徒，但绝无碍于这一代的整体形象。

他翻开笔记本，写上：

“第五代——！”

人的现代化

还有一个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的“？”：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座大熔炉，“第五代”即使全部学成回国，是不是已经成为被“美”化的人，成为“资本主义化”的人？除了学识，他们会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重新锻造？这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观念？这些观念能被视为“资产阶级观念”弃之如敝履吗？

杜厦寻求答案……

观念之一“人人争当经济人”

一个十四岁的美国中学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因为他开办了一家商店，经营有术，大赚其钱。舆论界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

这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使杜厦惊讶的是中国留学生们的变化：

——许多公费生被派出时大都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到了美国，几乎全都兼学起应用学科，有的干脆“改行”，专攻商业或企业管理。

——自费生由于可以自由选择专业，所学大部分为贸易、金融、工商管理、市场经济、法律、秘书、工业工程和计算机等，都是适应经济部门的学科。

——中国留学生在美成立的第一个学会是“经济学会”。

这是为什么？国内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可不是在经济部门，而是在研究部门、教育部门、政府部门，总之——事业单位。

“同中国相比，不，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彻底改变了这种价值观。”一位留学生说，“在现代史上，有福特、洛克菲勒做榜样，另外像哈默、杜邦，还有发明汉堡包的麦克唐纳，家喻户晓，比总统更有名，当然也更有钱。这种追求观使美国成为一个举国上下、老老少少都追逐利润、争当经济人的国家，高等学府中第一流的学生几乎全部投入企业；或者是企业家，同时又是科学家。”正是这一点，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中国留学生也要成为经济人吗？

“是的。”在多次座谈会上，留学生们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学成回国后，面临的是美国、日本这样的竞争对手。倘若我们国家能像搞政治运动那样，投入美国搞经济那样的热情、力量和想象力，才能振兴祖国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说服力。”

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怎能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

观念之二：竞争的唯一标准

竞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位博士生回国前被邀在美国大学讲学。她想：“该向美国宣传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她讲道：“我在美国看到，你们也不是什么都好。比如，大学中许多有过突出贡献的讲师、教授，一旦不出成果了，你们就解聘他。在中国就没有这种现象，安全感很强。”

这时，讲坛下的一位美国教授举手要求发言，他不解地问：“一位不合格的老师，不解雇他，该怎么办呢？让他继续讲课，不是误人子弟吗？”

讲坛上答道：“在中国，也不会让他再教学的。”

“那他干什么？”

“可以……比如说，可以把他放到图书馆嘛！”

台下哄堂大笑。

在美国，图书馆的老师是学识最渊博的人，他们担负指导学生阅读的重任。

不久前，一位国内的领导人访美，发现给他开车的司机原来竟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不解地问：“在美国，大学教授也开出租车吗？”

教授答：“没有地方聘用我。”

一位中国研究生毕业后在美国某研究所就职。一天，室主任请他看一份规划报告然后呈送所长。他看后认为“此报告不行，照此办理，将一败涂地。”他向所长谈了这一看法。所长说：“他的不行，你拿份行的出来。”第二天，他写出一份报告呈递所长。第三天，他被提升为室主任，原主任被解聘。

这种激烈的竞争，有力地铸造着中国留学生的新的价值观

念。

在历次座谈会上，杜厦都听到留学生们谈及这种真正的竞争，它有一个根本点：

起点均等，终点不均等！

——在“起点均等”的条件下，无论资历，无视权威，无关党、政、三教九流、车夫马贩，专家教授，都允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向前冲刺。让每个人都去试试。“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在这里，没有什么“资历深的允许干，先干，资历浅的不允许干，后干”。不，大家一起向前，竞争的起跑线对每个人均等。

竞争的这“半个观念”正逐渐被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有的单位正冲决种种障碍提供机会均等的环境。于是，有人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但留学生们说——且慢！还有另外“半个观念”：终点不能均等！

——在同一起跑线，无论何等人物、何种资历，谁最先冲破终点线，谁就获得最高荣誉，取得最高报酬，不会等那“资历更高的，权威的”或“照顾方方面面的情绪”，大家在终点线上一一起吃“大锅饭”！

留学生们说：这种唯一的竞争标准，就是一个人的才干！“起点均等”意味着每个人与他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而“终点不均等”意味着人人都有贫穷和富裕、保有荣誉和丧失荣誉的互变可能。

在这种情境中，留学生们怎么能遵循我们的老祖宗总结出的必须“终点均等”的名言：“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高标见嫉”等等等等。

留学生们说：中华民族在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交融中，应该能够“以不卑不亢的胸怀走向世界；同时，以兼容并蓄的气度让

世界走向我们!”

观念之三：被视为“耻辱”的帮助

一个自费生，迢迢万里来到美国。他走下飞机，踏上异国的土地，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不知道怎样问路，到哪下榻，在哪购物。他口袋里只有三十美元。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投下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打个电话与亲人联系。

他想，亲人一定会来接我。他有姑姑在美国，是她的一万美元的保证金担保他来美国上学的。

机场已空无一人，姑姑却不见身影。一阵苍凉感袭上心头。他安慰自己：姑姑有急事。打个电话问问。

话筒内传来姑姑亲切的声音：

“啊，你来啦！我们全家祝你平安到达。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工作，对，到餐馆刷盘子。不，你不必急着回家来，直接乘车去餐馆吧……”

完啦。他目瞪口呆。在中国，即使平时来个客人，也要迎接一下，起码也要四菜一汤招待一下。何况来自国外的的亲人！

他一怒之下，找到先到美国的一位朋友，诉说心中的不平。

朋友哈哈大笑：“你姑姑真好！她给你联系了工作。你快感谢上帝吧！”

在每日累死累活刷盘子的劳作中，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中，他明白了，这就是美国——

平时，美国人决不主动去帮助别人（意外事故、亲人生死婚丧等事除外）。他们认为：主动帮助别人，是视对方为弱者，这是双方都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等于说：“我瞧不起你！”

中国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在美国不得不陷入“不自立不能生存”的境地！靠父母、靠朋友、靠亲属——一句话：靠别人，不行了！

但他们同时认为：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

他们在国内形成的对父母和他人的依赖感，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适者生存”碾得粉碎，从而锻造出一种新的性格：不屈不挠，顽强奋斗。

他们的生物钟被重新调整。国内养成的睡午觉、聊大天、打扑克、逛大街等习惯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每人都揣有一个小本本，上面是每周内以“分”为时间计量单位的活动日程表。

尽管如此，他们仍随时感到“小舟倾覆”的威胁，非顽强地自主创造不能达到的彼岸！

于是，当杜厦收到一份份留学生决定在美国创办中国公司的报告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相信：祖国正需要这种精神！

观念之四：货真价实的高节奏

也许，是六十年代农场的劳作使他感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沉闷；也许，是七十年代在灯泡厂的机械动作使他的性格转向另一个极端——余临昌，这位自费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生，现在在美国一数控机床厂任工程师。听说天津市来人赴美招才，他立即找到杜厦。

“我有一个建议……”他说。

他的建议是：“美国的机床市场十分薄弱。台湾的企业家看准这一点，来此办机床厂——运来台湾的机床，配上日本或美国的电脑，翻手就是成倍的利润。他认为：祖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床工业，完全可以打入美国市场，但需要有人来干。

他说：“我曾先后三次向祖国有关代表团和派出机构提出过建议，但……”

杜厦说：“你到天津去！天津市政府一定会采纳你的建议！”

余临昌一下子神采飞扬。

当夜，二人倾心交谈，直至凌晨二时。

第二天，杜厦一觉醒来，余临昌已经不见了，留下话：“我已回国办事！”

杜厦感慨万分：这才是真正的高节奏！

1986年2月6日，杜厦同工作组其他成员再度相会旧金山。他们交换了看法，得出了一致的意见。

飞机凌空而起，飞向北京。

很快，一份关于我国留学生情况的详尽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国务院……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我国留学生共出国三万八千人（包括七千自费生）左右。学成回国的已有一万六千人——这已证明“百分之八十不归”的提法不准确。在已回国的人中，已有一百七十多人取得国内重大科研成果奖，百分之七十八的人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或学科带头人。仅以清华大学为例，回校担任教师的留学生已为研究生开出了一百六十七门课程，为本科生开出一百五十五门课程，其中许多为国内空白……

5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的留学生工作会议指出：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方针，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七五’期间由国家财政拨款公派的留学人员总数继续保持现有水平，而地方、部门自筹资金以及与国外交换的留学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会有增长。”

“第五代留学生是完全可以使祖国感到自豪的！”

记者手记

重现“第五代”的十天

操戈圆明园

1986年春，《中国青年报》地方记者全会在北京圆明园举行，称“圆明园会议”。此前，由于我在1985年底采写并见报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中国青年报》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关注的焦点。许多报社把《追踪记》等本报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突破性的报道”结集成册，学习研究。当时有一种“总结”说：专题性、宏观性、启蒙性——这是“张建伟报道模式”的三个特征，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观念性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圆明园会议”本应成为本报的一个新的起点，总结过去的经验和不足，以利继续前进。

不幸的是，会议在某些方面发生了逆转。我成为许多记者的众矢之的。他们经过私下的商议，决定在会议上对我和我的报道

模式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本来，作为被密谋打击的我，是无从得知这次密谋是如何运筹帷幄的。但我的一个个性“救”了我。

许多认识我的人都认为“张建伟是很聪明的”，就算真是这样吧。但许多真正聪明的人，都不会在所有方面都聪明，也可以换句话说，这些“聪明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自己人生的某些方面，以获得在另一些他认为更重要方面的“加强性成长”。我从来都认为：除了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多数人的智商是差不多的，只是智商有所作为的领域不同，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拉开差距。检讨我自己，我并没有有意忽略自己的某些方面，但似乎是天生的，我对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事情”，采取了“忽略不计”的态度。

例如，记忆力是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本应加强的特质，许多记者以此自诩。他们只要到过一個地方，从此便不会忘记；他们只要见过某人一面，从此便不会忘记；甚至，有的人只要使用过某个电话号码，从此就不会忘记。这些人的这般记忆力常常使我感到自愧不如。我从来都记不住这些事情。有的人我见过数次仍然记不住人家的名字，常有尴尬的场合，弄得很不好意思。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我是否真的适宜从事记者职业。但在另外许多方面，我又有着很好的记忆力。例如，我在采访时，几乎从来不做笔记（当然，司法报道除外），除了记几个我认为重要的数字。我的观点是：如果对方所谈是我感兴趣的，那就一定能记住，不必记录；相反，如果被采访者所谈的东西我没记住，那就一定是不值得记住的东西，也就不值得写在报道中，去浪费读者的时间。好的报道，一是重要，一是有趣，对重要和有趣的东西，我相信自己不必记录也能记住。再例如，我也从不作读书笔记，但所读过的书，在一定时间内，我能很完整地叙述出来。这种对记

忆力在某些方面的无意忽略和有意强化，我认为对自己是适宜的——但也仅仅是对我自己适宜而已，我不敢让它成为别人的“财富”。

在人生方面，除了涉及人格上的事情，其他方面，我也都认为是小事。例如新闻业务争论，我从来认为是正常的，那争论无论多么激烈，甚至拍桌子瞪眼喊口号，我都视为正常。只有涉及人身攻击或室外密谋，我才视为不正常，是人格上的缺陷。在1986年的“圆明园会议”上，正是我的这一观点“救”了我——它使我对记者们对我和我的报道的“毁灭性进攻”产生了“善意的误解”。

一年后，《中国青年报》地方记者片会，我参加了“唐山会议”，恰好，“圆明园会议”上向我发起进攻的主攻手同我聚居一室。后来互相很有好感，他便披露了“圆明园会议”上许多记者“密谋倒张”的内幕。

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那件事情真是对不起。我是被他们当枪使了。你知道，那次会议我来晚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要向你发动进攻。我一时兴起，就同意当主攻手，他们来配合。”

我问：“真的是一次密谋？”

他说：“真的。但我没想到会是那样……我上当了。”

我说：“算了。事情过去了。”

但这样说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那次会议上的情景历历在目。

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天。一天晚上，是业务讨论，记得所有的记者都集中一室，很挤，我是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业务讨论的场合，一般都很认真，但也很随便，是不拘形式的。

这时，那位主攻手发言了。在《中国青年报》社，他被公认为是“铁嘴钢牙”之一，其发言也，其势滔滔，很有势头。我还

记得他是这样说的：最近出现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报道模式——观念性报道，这种报道，没什么事实，全是观念性的东西，却冠以什么启蒙啦、宏观啦等等时髦的词汇。他认为，这样的报道肯定是短命的，这样的记者肯定是没有出息的，等等等等。

在他说着的时候，周围的记者都点头称是，有的还附和上几句，叫做“打边鼓”。终于鼓声大作，发言者更加慷慨激昂了。

他几乎是吼着说道：“新闻报道，第一应该是事实！”

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欢呼起来，并热烈地鼓掌。

“第二是事实！！”

又是欢呼，又是热烈地鼓掌。

“第三还是事实！！！”

还是欢呼，还是热烈地鼓掌。

他的发言终于结束了。他像凯旋的将军，被持续的不间断的掌声和欢呼声捧下讲台。然后，会场忽然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密谋，尽管我对这次“业务研讨”做了最善意的理解，面对此情此景，我还是很尴尬。

这时，1986年春，我加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队伍，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刚刚两年时间。而我面前的记者们，都是“老记者”，虽然在年龄上比我只大六七岁。他们都是《中国青年报》“文革”后复刊时所谓“马上打江山”的功臣。直到今天，我对这一批记者，仍保持着由衷的尊敬。

而且，尽管是业务探讨，我，一个新记者，面对一批“老记者”的猛烈的业务进攻，该如何应答呢？

仍然是那个“误解”救了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很平静的，好像一次被动的辩解。我说我写的报道也都是事实，而且带有观点的事实也不能说就不是事实。报道如果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新闻共

同体的认可，就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探讨其经验和肯定会有有的教训，那么，我们的报道就会更有长劲，我们这些记者就会更有进步，我们《中国青年报》就会更有前途，等等等等。

当然，我发言后，没有任何掌声和欢呼声。

而且，我发言后，当晚的业务探讨会议就结束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整整 10 年后，在另一次大辩论中，它才被重新提起。

但在这一年，我的深度报道实践却没有中止。相反，真正的具有“观念性报道”特征的深度报道在这一年——1986 年——真的诞生了。

偶然的机遇

“圆明园会议”后，我回到天津。由于“误解”，我没拿记者们对我的“进攻”当回事，继续探讨着报道突破的新的可能性。但“观念性报道”，老实说，这个词如此强烈地楔进我的心灵，还真是“圆明园会议”上的攻击性发言所给予我的。对此，我至今都在感激。

我想的是，我们难道真的有过什么“观念性报道”吗？这是 1986 年，改革开放有 8 年了，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新的现代化观念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当年，我们每“引进”一个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新观念，几乎都要付出严酷的代价。

而且，就是那些似乎已经存在的新观念，例如从事现代化事业所急需的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新的英雄观念、投资观念、乡土观念、自立观念等等，其真谛，别说在当年，就是在今天，我们究竟明白多少？

观念性报道，如果需要，如果读者欢迎，我们为什么不搞？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在方生方死之间徘徊的时代，我们作为记者，为什么不能为新的思想解放助动？如果漠视新观念的诞生和发展，我们是不是失职？

关键还在于那份“社会责任感”。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些学新闻的人，都读过《报刊的四种理论》，它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们的内心。用不着论述什么，在一个政治集权的国度，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勇敢地、理智地实践“社会责任论”的主张，是爱国的有责任心的记者命定的抉择。他无可选择地选择的，只有社会责任感。

机会与挑战并存。一个记者，他可能会在这种选择中灭亡，但也可能在这种选择中新生。

那天，1986年5月5日，我到了天津记者站，遇到共青团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长左志。他举着一盒录音带对我说：“建伟，昨天，五四青年节，一个叫杜厦的讲师到天津作了一次报告，是关于留学生的，我给录音了。你绝对应该听一听。”

我漫然应之，接过录音带，没当回事。

关于留学生的——不过又是宣传什么爱国主义而已，不会有什么新东西的。这样想着，我回家后，把录音带扔进文件堆中。我没听。

这一年的1月1日凌晨，我的女儿出生。5月12日那天晚上，有9点多钟吧，她忽然又哭又吵。我心里烦，忽然在文件堆中发现了那盘录音带，便塞进录音机中，带上耳塞，不经意地听起来。

刚刚听了10分钟，我便激动起来。他妈的，如此一个大新闻线索，险些让我给忽视了。

女儿不再哭闹了，但我的耳塞也再没拿下来。我听了下去。

观念性报道——不错，我在录音中听到的，正是留学生们在那边正在实践着的，而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闻所未闻的新观念！

爱国的留学生——不错，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宣传的，但我从来都不知道，爱国，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热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被我们很多人是视为“不爱国”，甚至“卖国”的！

多么重大的新闻线索。从我拿到录音带到今天，我已经给耽误了整整一个星期。不可饶恕的耽误！

再不能耽误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要行动。

第一天：夜访杜厦

终于听完了录音。我想都没想，就拿起了电话。

“左志，这个叫杜厦的，他还在天津吗？”

“他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讲师。”

“我能见见他吗？”

“当然可以。”

“现在。”

“现在？”

“对，马上！”

“都11点啦！”

“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能把他从床上砸起来吗？”

“……好吧。”

骑上自行车，与左志约好会面地点，然后，我们驶入南开大学，在午夜时分。

杜厦竟然不在家。我很高兴他也是个“夜猫子”。他正在一

个朋友家“神侃”。这也使我高兴，这预示着他是一个很能谈的采访对象。

杜厦终于站到了我的面前。个头很高，配合着他满脸不屑的样子，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

他的问候语是：“你早该来找我啦！你说你们这些当记者的，成天写的那是什么东西！有点真格的没有！”

我谦恭地说：“是我不对。我没能早点听你的录音。我耽误了一个重大题材。现在，请你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他使劲盯着我，忽然大手一摆：“今天不谈。明天再说。你今晚再听听我的录音。明天下午你向我提问。”

很顺利。我很高兴。当天晚上，我没睡。我又一次听了录音。这一次，我一改过去的习惯，做了简略的笔记，都是一些明天要采访的问题。

13号上午，我睡了一会儿。下午，我又约上左志，再入南开园。

第二天：穿越时空的探视

我打开了录音机。采访在杜厦的办公室进行。

专题性、宏观性、启蒙性——“张建伟报道模式”的三个特征，这是《追踪记》报道之后别人给予张建伟的“报道特征”。而实际上，《玩命地干，拼命地玩》（我在1984年的一篇报道，曾引起轩然大波，总编辑为这篇报道作了6次检讨）也罢，《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也罢，距离这“三性”还差得很远。

但一个记者，你一旦成为注目的焦点，一旦别人认定你就是“怎样怎样”的，你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别人的感觉走”，虚荣心使你很怕自己达不到别人期许的目标。这对一个记者的成长，

常常有害，但也常常有利。外界的影响力毕竟是巨大的。

我有虚荣心，好像还挺严重的。我有许多不在乎的东西，但我在乎自己的名声。在我的职业领域内，我希望我是最棒的。而一旦真的成为最棒的，哪怕是我自己虚荣地认为自己是最棒的，我都不愿意再一头栽下来。我要虚荣地保持住那“虚荣的位置”。

这样的虚荣使我永远努力。

专题性、宏观性、启蒙性——既然我被认定这“三性报道”是我的专利，而我也很虚荣地承认了，但其实却并没有做到，那么，找个机会做到吧。千万别让喜欢我的报道的读者们失望。读者，只有读者，是记者的上帝。我永远是读者的俘虏。

那天的采访，自然围绕着留学生们的话题，但在我心中，那“三性”始终主宰着我的提问。因此，与其说是一对一的采访，不如说是一种探讨。

首先我要确定专题的“场”。这个“场”，好像磁场，必须能吸引读者，引起兴趣，否则，任何专题都注定了它的失败。那么，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专题的“场”是什么呢？是专题覆盖下的问题。杜厦去了美国，专题考察了留学生问题，他对这些问题能够提供“观察性的解答”。这就够了。

其次，我要确定这个专题够不够我所理解的“宏观性”。它是个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大题目吗？我是否可以通过这个题材，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跨越时空的探视？我们确定了一个词：第五代！这就够了。我可以把第五代留学生同前四代留学生在历史的时空下进行比较。它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吗？或者，五代留学生，尽管延续百年，却仍然处在同一历史的纬度？很好，深度报道被称为“释义性报道”，阐述这个问题，给予确定无疑的回答。

第三，通过这个题材，是否可以给饥渴的需要现代化观念的人们，给予一些观念性的启蒙？当然可以——杜厦说——这正是

你这篇稿子要着力做到的。他这样指导我。我接受他的指导。

总之，整整一个下午，我收获颇丰。后来回忆起来，想想如此一篇巨作（对新闻报道来说，1万多字，称得上是巨作了），居然只有一个下午的采访，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实际上，连被采访者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当我关上录音机，说“就这样吧”的时候，杜厦吃惊地望着我，满脸的疑惑。“你真的能把它写出来吗？”

我知道，他的问题其实是：“你能写好它吗？”

我说：“试试吧。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

第三天：飞车入京

我和左志约好，赶14日最早的一班火车，到北京总社去汇报这个题材。它太大了，需要解答的问题也太多，电话中说不清楚。

到北京的时候，还不到早上8点，报社的人们还没上班。我们等在记者部。我想先和记者部主任郭家宽谈谈。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这样一个大题材，既使在《中国青年报》，有哪一位编辑能理解它的重要性？按照分工，留学生题材的报道，应该属于学校部的范围。不是说学校部的编辑没有资格编辑这篇尚未写作的报道，但我最信任的编辑是科学部主任李大同，我相信只有我们两人的配合，才会珠联璧合。但这有点“越轨”。我希望得到记者部主任的支持。

家宽来了。他听了我的汇报，听了我的问题，沉吟良久，说：“一个好题材！决不能给糟蹋了。应该由李大同来编辑。”

感谢家宽，他给了我“越轨”的权力。

李大同听完我的汇报，也是一声不吭，沉吟良久，说了一句和家宽同样的话：“一个好题材！一定要搞好它！我来编辑。”

感谢大同，他给了我一个“受折磨”的机会。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们有一句口头语：“你要是想一个星期不得安生，把稿子交给卢跃刚；你要是想一个月不得安生，把稿子交给李大同。”这就是说，卢跃刚有让记者把一篇稿子改一个星期的记录。而在李大同那儿，让你把稿子改一个月，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记者来说，这确实是很苦的“折磨”。因此，许多记者都害怕和大同合作。

但我不怕。我喜欢他的这种编辑作风。他的口头语是：“一定要把它搞得天衣无缝！”我从来认为，一个记者，遇到李大同这样的编辑，是他的福气，你可能只是一块毛坯，但经他的手，能把你打成铁；你如果是一块铁，他能把你百炼成钢。实际上，你的稿子遇到李大同这样的编辑，他给予你的，决不仅仅是“改一下稿子”而已，他是在帮助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而且，只有他认为值得“折磨”一下的稿件，他才这样“折磨”你，也只有你真的改不下去了，他才会亲自出马，甚至口述，直到把你的稿件真的改得“天衣无缝”。这里有他的水平，更有他的激情。我记得有一次，他看重一篇稿件，但记者“改不动”了，于是他口述，要记者在计算机前改稿。他感情充沛地“口述”着，他已经把那稿件的所有细节都吃透了，仿佛那就是他自己的稿件——虽然在稿件发表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有他的名字。忽然，他的口述停顿了下来。由于激动，他的嗓子哽住了。他要接着说，但一时间，再也说不出话来。那位记者是个小姐，她后来说：“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敢往后看。我真的给感动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一个记者，如果他的记者生涯中没受过这样的“折磨”，他

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吗？我不相信。

总之，我决定了，把《第五代》的编辑权交给李大同。

我们很快写出了第一稿，李大同说：“不行！”

左志于是走了，返回天津。我面对那“不行”的稿件，继续耕耘。

地下“苦囚”七日记

这篇稿件居然整整修改了7天，整整修改了6稿，而每一稿都是1万多字。

我至今难以想象：这是怎样完成的——在“中国青年报”“囚笼”般的地下室中。一盏15W的灯，白天黑夜都亮着，很微弱的光，在一堆稿纸上闪烁。除了上厕所，在这整整7天时间里，我不记得曾经离开过这间“囚笼”，吃饭也是一个朋友送来。而每改完一稿，似乎也是朋友把它送去给李大同，我似乎也很怕他一次又一次说出“不行”。

但我终于渐渐习惯了他“不行”的宣判。我忽然意识到：无论有多高的水平，无论你修改过多少次，一篇稿件，相对于一个优秀的编辑，更重要的是，面对读者的目光，它永远是“不行”的。我们所以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下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朝着“行”的方向，逼近一些，再逼近一些，如此而已。学无止境，文无止境，改无止境，你当了一个记者，你便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追求之路。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李大同说：“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我的事了。我要再把它改得天衣无缝。”

我几乎幸福得要栽倒了。

但我还想看到它的诞生。

瞒天过海

忽然，我感觉到有事情发生，而且是不小的事情。打听一下，说是来了一份红头文件，对留学生政策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与我的稿件有关的地方，是这样两点：

一、留学生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不准滞留，要读博士后，可以回国再读。而在我的稿件中，把在海外读博士后，视为“用别人的机器，铸造自己的利剑”。这显然与文件的政策不符。

二、取消“伴读制”。就是说，留学生的伴侣不准出国“伴读”，因为“两口子”都出去了，还会再回来吗？而在我的稿中，视“伴读制”为“双重人才效应”。你花了一笔钱，却有两个人受教育，何乐而不为？至于“不回来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呗，“科学已经没有国界”。

懂得我们的新闻体制的人都知道，如果你的稿件出现了如此与政策不相符合的地方，哪怕仅仅是一个疑点，这篇稿件都不再有面世的可能。

但这篇稿件居然面世了，而且就在当晚。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具体过程，负责运作的编辑和领导们没告诉我。我后来知道：那是一个“瞒天过海”术。

显然，这篇稿件一旦面世，一旦被“上面”追查下来，那将是一个比“《玩命地干，拼命地玩》事件”更为严峻的重大事件。“《玩》事件”可以说成“把关不严，认识不深”。但这一次可就是“明知故犯”了。

因此，这“瞒天过海”计的“天”，指的是报社主要领导。一旦“上面”追查下来，他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顶多

是个“疏忽的错误”。而只要一把手保住了，这篇稿件就不会把整个报社“搞垮”。

后来，当我听说他们（责任编辑，记者部主任，至少一位副总编辑）为了这篇稿件而采取的这番措施时，我内心的感动是不可言喻的。所有这些“当事人”，实际上在开始这样做之前，已经把他们自己的“乌纱帽”摘了下来，揣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交出去。

下午4时，白班编前会议上，开始议定当晚需要见报的稿件。

责任编辑说：“张建伟来了篇稿件，还不错。”

主要负责人问：“写什么的？”

“是关于留学生的。”

“哦，留学生。那没什么问题，上吧。”

在1986年，所有的关于留学生的稿件，几乎只有一个主题：爱国主义。几乎从来没有人想到，关于留学生的稿件，还会有什么其他主题。因此，那当然是“没问题的”。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天晚上，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回家。报社的书法家米博华（现《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弄来一叠宣纸，书写这篇稿件的标题。从他写的20多幅字中，大家挑选出一幅。

李大同当然没回家。他“占据”了夜班副总编辑的位置，为稿件作最后的修改。没吃晚饭，弄来几个烧饼。他一边咬着干烧饼，一边说着那句不知说过多少次的话：“一定要把它弄得天衣无缝！”

我也一直坚持着。7天7夜没怎么睡觉了，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支持着我。但到夜里12点左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我不行了。”我说，“我要去睡觉。”

“去吧。”李大同说，“这里有我呢。”

清晨，我早早起来，看到了1986年5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

从来没有过的大字标题。从来没有过的“留白”。从来没有过的作者名字字号。文章占据着一版大半个版的位置，二版几乎全部占满。油墨的味道好香！我想。然后静静地等待即将引起的轰动。

《中国青年报》万岁！

当天早晨8点，报社主要负责人走进了办公室，一眼看到早就摆在桌上的报纸。天哪！这就是那篇“关于留学生的稿子”吗？怎么是这么大一个东西！他问：“喂，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

是共青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打来的：“你们今天发表了一篇很好的稿件！标题好，内容好，主题好，写得好……”总之是一连串的“好”。

主要负责人说：“哦，稿子好啊？”他没说“我还没看呢”。

当报社同事上班来的时候，北京的反应已经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发现，报社门口，有读者贴了一幅标语：“《中国青年报》万岁！”

应该感谢和理解我们的读者这份真挚的感情。一个记者，当他的文章写出了读者的心声时，读者决不会吝惜自己的情感，他们会把自己的心声，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献给这位记者和他所在的报社。关于这些读者的心声，后来有李大同的归纳。这里，我要说的是：在1986年的时候，由于对留学生政策的紧缩

和观念的束缚，几乎是把留学生们当作“通敌叛国”一样对待的。这种对待并没有写在政策条文里，它是在实际的运行中被留学生们的家属“感到”的。而在这时，只有《中国青年报》敢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呼出了他们被压抑多年的心声。

我不知道这篇报道是否影响了后来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但它起码影响了钱学森先生。报道发表半年后，钱学森先生赴香港访问，向香港报界发表了《关于留学生问题的意见》：

现在我们送出大量留学生，去美国的就有一万多人，他们很多都不回来了。也有些人很生气，就不客气地批评他们。我说，你不要批评。现在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即使他马上回来，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他发挥不了。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继续搞一下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呀？到1990年，等到我们的情况变了，我看他们都会回来。我相信，因为他们也就是钱学森嘛！钱学森也就是会回来的嘛！所以没问题！这个讯息，也请朋友们传达给他们。我对他们是寄托了希望，我完全相信他们。我不责怪他们，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们学成归国，为祖国服务，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他们会看到中国的前途。

钱学森 1987年1月

《第五代》发表后，我也成了新闻人物，采访者不断，多数婉拒了，但也有经不住诱惑的时候。例如，当要把我的照片刊登在新闻业务刊物的封面上时，我还是接受了。检讨起来，在名和利面前，我还是太看重名声。

而且，两年时间内，有了数篇轰动全国的报道，我飘飘然了。当年年底，中国新闻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新闻作品集，便以《第五代》名之，是为我的第一个新闻集。书的后记，表达了我

当时雄心勃勃，也可以说有点狂妄的意态。后记有个标题，叫做“永远说再见”：

同最亲密的朋友道别说“再见”时，依依惜别之情常涌心头。但同我自己的过去说“再见”时，我却感到心安理得。

无论自己的过去多么辉煌，没有勇气说“再见”的人，那辉煌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对记者来说尤其如此。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必须每篇报道都不同凡响，总有点新意，让人震动、思索，甚至产生美感。他必须无视那由什么专家评定的什么新闻奖，注意不要被它牵着走，从而丧失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必须拒绝一切诱惑，才会永远走在成功者的行列中。

他的诱惑只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读者。

对记者来说，读者是惟一的上帝！因为，只有被广大读者共同喜爱并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记者，才能成为名记者。

排除掉一切虚伪和客套，对记者来说，成为名记者——我认为——正是他事业上追求的最佳境界！

我追求这个境界。我还不能肯定，我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我是否敲响了名记者殿堂的大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非只有60岁以上的记者才有资格进入这所殿堂。

但是，即使进入了名记者的殿堂，也须勇于说“再见”。名记者最要紧的素质是：他永远是他自己的优秀作品的敌人，尽管他是靠这些作品成名的。他的强烈的成就欲望须永不息止。

当《玩命地干，拼命地玩》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时，我已经陷入苦恼之中了。我的苦恼并非因为个别好心人对这篇作品的批评，而是觉得，我该突破“陈旧”，进行更赋予创造性的实践了。

一年后，《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被总编辑命名为“张建伟模式”，发表后再次引起强烈反响。随后，“系列专题报道”形

成热潮，但我的目光已朝向新的报道范式。

很快，《第五代》诞生了。这一次，它的影响是国际性的。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次超越。

《第五代》之后，我又陷入面临超越的痛苦之中。我像一只在风涛险处扬帆的小船，寻找着下一次停泊的港湾。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寻找到。但我必须寻找。

我说过“再见”了。

我命中注定永远说“再见”。

如此“狂妄”的意态，大约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后来再出版作品集或其他专著时，便谦虚得多了，懂得用一种谦恭的包装来讨好读者，并给认识我的人们看。我不知道这是进步，或者竟是社会所需要的“成熟”。

但有一点是我未曾想到的。许多当年的年轻人见到我，说他们正是看了我的这第一部作品集，尤其看了如此“狂妄”的后记，才认识我，喜欢我，并愿意步我的后尘，立志也当个名记者的。这使我高兴，但更多的是惭愧。

今天的我，毕竟和当年的我真的“再见”了。

时间：1986年3月1日

作者：吕志贵 范永

浸透血泪的上访信

吕志贵：字字得来皆是血

浸透血泪的上访信

1985年10月18日凌晨，黑龙江尚志县车站东面的铁路上徘徊着一个男青年。一列火车呼啸而来，他猛地扑了过去……

公安人员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份浸透血泪的上访信。遗书上留下了悲愤的遗言：“一心想着干点事业，三十多了还没考虑个人问题。起早贪黑，黑天白天地干，到头来落到这种地步，还能叫人活下去吗？……”

“西安事变”

死者叫李永焕，生前在尚志电子仪器厂做技术工作。他自费念了3年电大，学会两门外语，正准备考研究生。从入厂的第二

年起，他年年被评为厂劳模。

一起搞技术的还有两名青年：张开福，夏驻军，也都是厂劳模。1985年春天，由于工厂管理十分混乱，6项新产品都没有按期交货，外单位订货很少，工人无活可干……3个青年慎重地探讨多次，觉得只有实行承包、改革才能解决问题。3月15日晚上，3人来到主管技术、业务的副厂长李恒章家，建议李向县里主管部门提出实行集体承包。李恒章经过一夜的考虑，表示同意。

但是刚过一天就发生了变化。李恒章将3个青年酝酿搞改革的事报告了厂长兼党支书朱成珍。朱成珍大为不满。这些年来，她在厂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惯了。如要改革，她不懂技术，只会整人的人势必要“靠边”，那手中的权力“魔杖”岂不在瞬间消失？她用自己整人的“本领”很快地降服了李恒章。李恒章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3个青年说：“昨天晚上，我和朱厂长研究了你们的问题。你们这叫‘兵谏’，要搞‘西安事变’哪！你们背后有活动……”第二天，朱、李到乡镇企业局告状。李进门就嚷：“我们厂兵变了，‘西安事变’了。……两人添枝加叶地将3个青年攻击了一番，最后提出对他们要严肃处理，一个开除，两个停职停薪检查。局领导不同意，要他们慎重处理。然而，朱、李二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打算。

夏驻军患有肺结核，厂里批准他上半班。李恒章却说他的病好了，取消了他的半班。李永焕因妹妹病故，心脏病犯了，要求适当休息。李恒章说他的病是装的。而李恒章自己有病，长期住院治疗，工资照开，奖金照拿。3人为此争吵起来。李恒章恼羞成怒，当场宣布：“我开除你们，给我滚出去！”

6天后，朱、李召开全厂大会宣布：夏驻军，永远开除；李永焕、张开福给以行政记过处分，停职停薪检查。他们还威胁工人说：“我们的手腕是硬的，有措施对付你们。我们宁可把厂子

整黄，也不让他们熊黄。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雪上加霜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朱、李以“工厂没活儿干放长假”为由，将张、夏的爱人变相开除。

三青年含着热泪多次上访，但县里某领导偏听偏信，使朱、李更加得意洋洋。

3个青年多次到工厂要求上班，朱、李不予接待。朱、李还多次派人在3个青年的住宅周围进行监视。只要3人和他们的家属一出门，便被盯梢、跟踪。李恒章还两次拆开私人信件，进行检查。

为了彻底“治住”3个青年，6月5日，李恒章偷偷地溜到夏驻军家，看到桌上有一块自动比对电路板——这是他在搞三型钟时布置夏驻军搞的一个科研项目。夏虽然被开除了，但仍在坚持实验——李一腔的怨恨立刻有了渲泄口。他赶到县政府向某领导报告：“夏驻军偷工厂的元件了。”他两次去夏家调查，要追究夏的刑事责任。

绝人活路

3个青年上访不成，回厂不能。张开福、李永焕一度想离开电子仪器厂。他们到工厂办理手续，朱、李说：“在受处分期间不能调转。要想调转，一、必须写检查，承认错误；二、张开福住的公房必须交出；三、张开福的爱人也得调走，电子仪器厂要她没用；四、每人拿培养费5000块。”这些苛刻的条件，张开福、李永焕无力满足，只好叹气而归。

3个青年为了生活，不得不找点临时工作挣钱度日。于是，3个青年便去校办工厂上班，试制汽车、摩托车打火机。

没过多久，他们的情况便被朱、李派出盯梢的发现了。朱、李又采取了新的秘密行动。他们雇了一个人到校办工厂骗买了一只尚在试制中的打火机。李恒章得到打火机，一看电路图比自己设计得还科学，马上移到自己的产品上；再一看，里面用的电容是3个青年过去搞实验时从厂里领的料，捌分钱一只（挪用到这里是错误的），他更是喜出望外。朱、李马上跑到公安局报案，夸大事实说：“他们偷的材料，是造洲际导弹的重要元件。”公安局一听事态如此严重，于10月12日上午派人到校办工厂，将3个青年带走传讯。

3个青年几经挣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李永焕就这样怀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并非尾声

好友的死使夏、张二人无比悲愤。他俩投书本报和上级党委控告朱成珍、李恒章。省长侯捷、副省长安振东和省纪检委领导同志马上批了意见，让省、地、县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尚志县调查解决问题。小小的电子仪器厂急骤地震荡起来了。朱、李害怕工人说出真情，马上制定25条厂规，其中有12条保密制度。朱成珍威胁工人说：你们在哪儿说的话，我们都知道。不论在路上，在火车上，还是在家被窝里。

但是，正义的呼声是堵不住的。经联合调查组深入、细致的调查，这起迫害青年严重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基本查清。

目前，调查组正对事实作进一步核实。我们期待着将处理结果公诸于众的那一天。

记者手记

字字得来皆是血

写这篇批评报道的动因是个偶然。1985年11月下旬，当时任《辽宁青年》杂志社记者的我同夏阳同志到北京组稿。《中国青年报》群工部主任尤畏同志对我们说：“最近，我报收到黑龙江省尚志县（今尚志市）两名青年的一封上访信，控告他们县长和厂长打击、迫害要改革的三名青年知识分子，酿成一名青年卧轨自杀的血案。这个线索很好，不知你们是否感兴趣？我们最好合作完成这次采访。”他给我们看了上访信，信中说：三名青年夏驻军、张开福、李永焕是尚志电子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在1985年3月向厂里提出搞承包改革，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的朱成珍和副厂长李恒章却认为他们是搞“兵谏”，搞“西安事变”，竟将一名青年开除，两名青年勒令停职检查，还将两名青年家属以“没活儿干放长假”为由也变相开除。3名青年不服，到县里上访，县长伙同厂领导调动公安、工商等部门对三青年进行打击、迫害，逼得三青年走投无路，致使李永焕在10月18日凌晨

自杀身亡。看了这封血泪斑斑的控诉信，我们真有点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当时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刚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国要打破僵化的管理模式，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机制，实行承包、改革。根据中央这些精神，三青年提出在工厂进行承包、改革，代表了改革方向。如果上访信内容属实的话，完成这篇批评报道，既为青年申张了正义，维护了青年合法权益，只能对促进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和警策作用。

12月7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范永同志和我在哈尔滨汇合了。虽然初次见面，但共同的神圣使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了。我俩感到既兴奋、紧张，又特别有压力。要知道，由两名年轻普通记者调查、处理一个在职的县长，在全国尚没听说有先例。责任重大呀，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得上。我们慎重、细致地研究到深夜，做好采访前的准备：一、从哈尔滨出发后，在一切公共场所（包括乘火车、汽车，进商场、饭店，逛街、游览等）我俩不谈这次采访的事，以免泄露采访意向；二、一切与这次采访有关的材料、笔记本随身携带，以免丢失或泄密；三、到尚志后，由范永同志持《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出面联系，我则以通讯员的身份出现。因为当时省级报刊尚不能跨省采写批评报道。如问我的单位，则报辽宁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我曾工作过的单位）。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于这次采访当时我们也特别有信心：《中国青年报》早已把上访信批转给黑龙江省了，省领导对此案特别重视，省长侯捷同志在11月13日指示“对尚志领导的问题，请纪检部门调查处理”。省纪检委书记王斐和副省长安振东同志对此也有批示。由省纪检委、省委组织部和松花江地委纪检委、组织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先我们一周到了尚志县。我们这次采访，也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只要充分

发挥记者的聪明才智，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

然而，事情远比我们预料的严重得多。次日中午，我们刚到尚志，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向县里说来采访，县领导特别“热情”，把我们安排在一家高档的旅馆里。就在我们出外寻找尚志电子仪器厂的厂址时，放在旅馆里的提箱、挎包和放在桌上的材料、采访本被人翻了一遍，范永放在提箱夹层（挺秘密的地方）中的500元钱还被拿走50元。显然，这是旅馆人员在某些人授意下搞的。他们不是为了钱，要为钱的话，就该把500元全拿走，而不会翻动我们故意放在桌上的材料和采访本。他们是想知道我们来尚志的目的。

这天晚上，我们又碰了软钉子。我们去见省地专案组，想套套近乎。组长是省纪检委的一位处长，他告诉我们。县里的一位副县长和纪检委的同志也参加了调查，副县长任专案组副组长。我们问起了案情，他们什么也不说，特别冷淡。在我们的恳求下，他们勉强答应我们可以参加专案组的一些活动，但不准插言。我们发现：只要那位副县长在座，问题一触及副县长，被专案组找来的人就谈虎色变，啥也不说了。回到旅馆后，我俩悄悄合计：看来，我们要客观、公正、准确地搞好这次调查，要把案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确实很难啊。我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同情受害者，但调查之始不应先找他们。先找他们，很可能被认为记者是带着倾向来的，甚至惹怒县里和专案组。我们应该竭力地隐蔽采访和真实目的，同专案组和县里搞好关系，最后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于是，我俩决定：先从专案组那里突破。次日晚上，我们又去专案组住宿的县招待所“侃大山”。我发现，专案组的同志特别爱打扑克，便提出跟他们赛一把：北京队对黑龙江队。这下可热闹了，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一晚上下来，他们又约我们再打第二晚上。这一“打”，真的打出了感情：先唠个人情

况，再唠家庭情况，再唠单位情况，最后彼此间竟无话不唠了。其中地委的一位同志同我们最“铁”，他悄悄告诉我们：专案组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涉及此案的县长这些年来一直干得不错，地委已决定将他提拔为县委书记，在专案组的那位副县长的哥哥任地委书记，如县长提拔，副县长一挪就是县长了。没想到，在节骨眼上出了这封上访信。而电子仪器厂的朱成珍、李恒章，都是省里有名有号的人物，社会关系极其广泛。还有，专案组对记者来调查，也有点“害怕”：怕我们把“情况”提前捅出去，或者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样他们就被动了。我们心里有了这个“底”，打个机会便同那位处长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报社这次搞调查，同专案组的调查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专案组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调查是为了开展舆论监督。专案组是代表党和政府出面的，我们一定服从专案组的领导，配合专案组工作。我们这次调查没带任何框框，一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谁是谁非，完全靠事实说话。我们如果调查完了，认为有必要写报道的话，也一定先征求专案组的意见，再发表。是否能写文章，现在决定不了，得调查完毕才能结论。这样一讲，那位处长特别高兴，他也十分理解记者的甘苦，答应尽量给我们创造采访条件，同意把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无保留地都借给我们看。他要我们尽量隐蔽锋芒，同县里打好“关系”，待调查结束时再揭盖子。我们都同意了。

同专案组的关系理顺后，我们就利用一切机会麻痹县里，给他们假象，每天同那位副县长都说这类“虚假”的真话：尚志县是抗日英雄赵尚志和赵一曼打鬼子的地方，啥时候副县长安排我们采访一下；海林是全国著名的滑雪场，有空儿到那里看看；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还有七八个线索，我们还要到那里走走。尚志这个案子，是报社要结果，是我们挂角一将的事儿，啥时你们搞

完了，我们带回结论就行了。那位副县长信以为真，背地里悄悄对我们说：有啥困难，需要钱，需要啥东西，尽管吱声。我们说啥也不需要，暗地里加紧了调查。一周后，为了把这场“戏”演得更像，我们在吃晚饭时故意装出急躁、不耐烦的样子说：“搞这个案子太没意思了，受不了啦！”同副县长说到呼伦贝尔采访去，第二天就真的开拔了。

我们在内蒙古采访了七八天，根据专案组临走前的约定（12月底前初步调查结束），在12月23日返回尚志县。这次，我们干脆同专案组住在一起，我们找知情人一一谈了话。他们出于义愤，把事情真相一一说了出来。案情搞清后，我们返回单位，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对我们的采访很满意，考虑是批评县级领导的稿件，在全国影响巨大，必须再次敲实，让所有的事实都必须准确，每个字，每句话都要有确凿的根据，都要板上钉钉子。

1986年1月15日，我们第三次到尚志县。这次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了。专案组此时正忙于给问题“梳辫子”，然后拿出结论。我们也要从厚厚的材料中进一步提炼，写出文章来。这时，我们同专案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例如，如何看待三青年承包——酿成血案起因这件事，专案组起初认为，三青年提出承包，领导不同意，就该服从组织，不该一味地坚持个人意见，以至越闹越僵，最后酿成血案，三青年也要负重要责任。对此，我们表示了不同意见：三青年坚持改革，这是符合中央改革精神的。搞承包，打破旧的管理模式，打破大锅饭，势必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势必引起两种观念、两种利益的激烈冲突，尽管三青年有这样那样缺点，但他们的主流是正确的，而县和厂领导对他们是不公正的。这才是导致血案的真正根源（当然，自杀是不可取的）。经过讨论，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看法。还有，如何对县长进行问题界定，县长是否参

预了打击、迫害青年知识分子？从调查材料看，厂领导朱成珍、李恒章几次向他们反映虚假情况，他都没有经过调查就被公安局、工商局、教育局出面对3个青年进行干涉，最后导致李永焕自杀，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但说他“伙同厂长朱成珍、李恒章”打击、迫害知识分子，证据尚不充分。专案组对县长的结论非常难下，说他“打击迫害”，不够。说他没有错误，也不是那么回事。因此，他们向我们征求意见。我们谈了这样看法：县长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偏听偏信，虽然主观上没有打击、迫害青年知识分子的故意，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打击、迫害的事实。我们列举了经过调查的大量事实，对上述观点一一做了诠释。专案组也接受了我们的观点，但同时有些为难，认为一心想当县委书记的县长不会接受这个结论，他们要我们先找县长谈一次话。我俩接受了这项特殊使命后，精心研究了一晚上，准备了3套谈话方案，第二天便把县长“请”来了，稍做寒暄后，便切入正题。我们先请县长谈谈是如何处理三青年这个事件的。县长详细讲了事件经过，就是不讲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对此，我们一点也没有退缩。首先，我们对他以往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你是从基层一步步凭着业绩干上来的，对群众比较公正，有‘青天’的美誉。你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为官清廉，到县工作后，组织分给你一套大房子，你不要，至今还住狭窄的小房里。”然后，把话锋一转：“但是，你在处理三青年承包事件时，还是有严重失误的。作为一县之长，主宰着几十万人的命运，基层领导向你反映问题，事关改革大事，你应当下去调查、核实，在弄清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再下结论。就是自己工作真忙得脱不开，也应派人去调查，而你却没有这样做，下面反映一次虚假的情况，你就动用一次国家管理机构对三青年进行干预，最后导致了这个血案。”我们把调查来的一桩桩事实同结论挂在一起，同他交换了看法。虽然我们

是他的领导，没有一点处理他的权力，但是谈着谈着，他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厉害。他完全同意我们的分析，承认自己犯了主观主义、偏听偏信的错误。专案组得到这个报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县长的难关被攻下后，我们又多次找朱成珍、李恒章谈话，耐心听了他们的申诉（凡是他们讲的，事后我们也做了认真核实）。我们还找了工厂、县机关几十名有关人员也谈了话，有的谈着谈着就放声大哭起来，他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后才找夏驻军、张开福和李永焕的家属谈了话。虽然他们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从青年成长的角度对他们一些不当做法也给予了批评（如拿厂里材料，虽然8分钱一只，也给人制造了口实），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看法。

在尚志期间，我们把调查的情况都向专案组及时汇报了。好多情况他们没有掌握，从我们这里得知后即马上进行补充调查。同样，他们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方便，合作得非常融洽、愉快。在此基础上，他们着手写调查报告，由我执笔在招待所也完成了《浸透血泪的上访信》这篇通讯。在这篇通讯里，我们选择的都是有多人佐证、完全准确的材料。对一些缺乏充分证据，尽管很生动、很有可读性的东西，如朱、李的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弄虚作假的问题，剽窃他人成果等问题，都一一剔除了。完稿后，我们先给专案组看了，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材料属实，没有出入（但他们不肯签字），我们便返回北京、沈阳了。

这篇批评报道，我们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采写期间，正是新年、春节之际，寒冷的黑龙江省，气温都在零下30多度，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大雪。为了搞清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常常熬到深夜12点，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子，熬尽了心血。真可以说，每个字，每句话都是用心血换来的。这篇通讯得到了《中国青年报》领导的肯定，为了更准确无误，他们还在原稿的

基础上，从标题到内文，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修改，使文章更增加了战斗力，更增加了光彩，更无懈可击了。修改后，他们让范永同志从报社向黑龙江省纪检委打电话，把稿件从头至尾给他们再念一遍，再次征求意见，纪检委负责同志认为稿件完全属实，没有问题。在念稿、征求意见的同时，报社把这一切都录了音，作为存档，以备需要之用。

《漫透血泪的上访信》在3月1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倒头条重要位置发表了（《辽宁青年》在第五期发表），在全国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社收到了许多来信和电话，对三青年的改革行动表示支持，对朱、李二厂长表示强烈的义愤，一致要求上级组织对他们进行处理。与此同时，被报刊批评的朱、李表示特别的不满，他们联名写了近20页的控告信，分别寄给团中央和辽宁省委的第一书记，说文章完全是“捏造”、“诬陷”和“失实”的，要求组织对记者进行处分（那时，还没兴起“送记者上法庭”）。团中央和辽宁省委分别让我们把采访经过报了上去，因证据充分，便通过了。不久，黑龙江省纪检委做出组织处理决定：朱成珍被开除党籍，撤销党支部书记和厂长职务，李恒章被撤销副厂长职务。那位县长受到党内批评，连环式升官没有实现。县里给三青年平了反，死者做了抚恤处理，生者又回厂上了班。县里对该厂重新改组了领导班子。

这次采访的成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教诲。搞批评报道，既要激情，更要理智，还要灵活。世界上不会有人把自己挨批的东西拱手捧给记者，这就要求记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重重矛盾的迷雾中层层剥出事件的本质，比法官办案还要细致、准确，把文章搞得无懈可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时间：1986年2月20日

作者：于培明

除恶的中坚——记破获陈小蒙、胡晓阳案的公安战士

于培明：乍暖还寒时节的挖掘与竞争

除恶的中坚

——记破获陈小蒙、胡晓阳案的公安战士

春天来了。

惊蛰一过，尽管春寒还时时袭人，可是，春天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

就在这初春季节，上海人民注目的陈小蒙、胡晓阳强奸、流氓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人们兴高采烈，心头仿佛又增添了几分春意。

历尽艰难，冲破重重阻力才侦破此案的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的公安人员，也长长地舒了口气，由衷地笑了。他们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一幕幕难忘的战斗经历……

案情从十五个字露头

“我听张××讲，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1984年10月间，在一份在押犯人的检举材料中，卢湾分局的同志看到了这样15个字。这立即引起了公安战士的警觉：

什么人被轮奸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参与犯罪？这些，在押犯人一无所知。

公安人员找到了张××。

“有这样事。我也是听她自己讲的。只知道她去跳舞时被人轮奸了……她的名字叫S……”

公安人员很快找到了S姑娘。

“你们在什么地方跳舞？”

“因为是晚上，我没留意路名。只记得路两边有许多树木，很僻静。”

“一起跳舞的有些什么人？”

“有一个绰号叫‘小鸽子’的，名字我叫不出。”

“是谁奸污你的？”

“先是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三十六七岁模样，然后是‘小鸽子’……”

案情露头了，可这是一个无头案。公安人员几经周折，终于寻到犯罪分子的踪迹，他们带着S姑娘在新华香料厂门口，驾车靠近该厂青工葛志文身边。

“就是他！‘小鸽子’。”S姑娘轻轻地说。

“没有看错？”慎之又慎的公安人员驾车加速，到百米外后又转弯迎面向葛志文缓缓开去。

“肯定是他！”S姑娘斩钉截铁地说。

突破“小鸽子”

1984年11月下旬。

卢湾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葛志文歪坐在椅子上，轻轻地抖动着脚尖。两只眼睛转动着，四处察看，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葛志文，知道为什么叫你进来吗！”

“不知道。”

“你经常带哪些女青年到什么地方跳舞？”

“小鸽子”眼里露出了几分慌乱，装起糊涂来了。

“你们在跳舞时干了哪些流氓犯罪活动？”

“小鸽子”的头一下子瘫了。他交代了以跳舞为名诱骗女青年Z某到陈小蒙家中，与陈小蒙、陈冰郎一起对Z某轮奸的经过。

在连续的审问下，葛志文又陆续交代了与同伙一起奸淫、猥亵一批女青年的罪行；并交代了同伙的名字：陈小蒙、陈冰郎、陈丹广、胡晓阳、康也非。

短短的四五天里，扑朔迷离的案情开始有了眉目。这是一伙以跳舞为名，对女青年合伙进行奸污的流氓罪犯团伙，其黑窝主要在陈小蒙、陈冰郎兄弟家中。

令人震惊的是，这六名罪犯竟全部是干部子女，有的人的父亲还身居要职。

令人感到莫大讽刺的是，主犯陈小蒙竟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刚提拔不久的记者部负责人。平时，他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有关领导同志谈法制的专访文章。

案情明朗了，嫉恶如仇的公安人员决心在“太岁”头上动土。

1984年11月3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收审。市公安局负责同志听取汇报后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人不抓，还要我们当公安局长的干什么？”

一伙十恶不赦的罪犯

当天下午，公安人员出现在陈小蒙、陈冰郎的面前，此刻，这两位“花花太岁”颤抖起来……

审讯中，陈家二兄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的供词以及其他交代，在人们面前活画出了一伙十恶不赦的罪犯的嘴脸。

陈小蒙、葛志文、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等人，向往西方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1980年，胡晓阳全家来沪。不久，胡即结识了陈小蒙等。他们臭气相投，结成了罪恶的团伙。

他们或以跳舞为诱饵，在贴面舞、黑灯舞的舞会中或舞会后，合伙或单独强奸、奸淫女青年。

或显示自己高干子女的身份，以帮助调动工作、解决困难为名，行奸淫女青年之实；

或勾搭作风不正的女青年，合伙搞淫乱活动；

或利用女青年的爱好，以商讨文学，帮助复习功课为借口，设法进行强奸、奸淫；

或相互介绍，合伙淫乱。

在短短的四年中，他们先后合伙或单独强奸女青年六名（包括强奸未遂）奸淫女青年五十余人。其中陈小蒙一人就以暴力胁迫手段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未遂），以流氓手段奸淫

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

这真是一伙十恶不赦的罪犯。公安战士愤怒地拍案而起，发誓不给这伙流氓罪犯以严厉惩处，决不罢休。

智擒胡晓阳

此时，主犯之一的胡晓阳还逗留在深圳。他已经得到了将要逮捕他的通知。

葛志文被捕后不久，陈小蒙即挂长途电话给在深圳大学工作的胡晓阳：“上海已经动手了”，“‘小鸽子’被抓进去了”……

就在卢湾公安分局向上级发出收审胡晓阳的报告后，有人立即得到了信息，悄悄托人带信给胡晓阳，要他不要回上海。

究竟怎么抓？正当公安人员在思索时，胡晓阳却有恃无恐地随着到深圳去参观的父亲一起坐飞机回沪了。

公安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决定在外面伏击拘捕。

一月，正是上海最寒冷的天气。室外的夜晚，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在这样的气候里伏击，公安人员将面临多大的困难！可是，他们全然不顾，一心一意地搜寻着胡晓阳的蛛丝马迹。

终于，他们得到了一个信息，胡晓阳将到衡山宾馆去。公安人员立即悄悄地散布到衡山宾馆周围。他们冒着寒风，耐心地等待着。

胡晓阳露面了。霎时间，公安人员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扣上手铐，把他推上警车。

在拘留所里，胡晓阳供认了同伙们揭发的犯罪事实，并且供认了他在北京、郑州等地的流氓犯罪事实。

随即，公安人员收审了康也非和陈丹广。这伙罪犯终于全部落网了。

尾 声

罪犯的犯罪事实终于完全弄清了，这也就决定了罪犯的可耻下场。

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985年11月4日至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并于1986年2月1日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审判长在法庭上庄严地宣布：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三名被告犯罪事实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其他三名罪犯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罪犯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紧张的复审，认为原判量刑恰当，依法驳回了罪犯的上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人民应该感谢卢湾公安分局的公安战士，正是因为有了像卢湾公安分局那样的公安人员和司法人员，我们人民的权利才能不受侵犯，人民的人身自由才能得到保护。

敬礼！正义战胜邪恶的中坚力量。

记者手记

乍暖还寒时节的挖掘与竞争

整整 13 年了。

在度过了一个抗日战争再加上一个解放战争的时间后，去回忆那短短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我惊讶自己竟然还能记得如此之清晰，甚至连公安人员审稿时那种欲说还休，欲助无奈的神情都历历在目。

应该说，以现在的目光看，无论是文学的功力、内容的丰富、乃至结构的安排等等，《除恶的中坚》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平常之作，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全国有十数家省、市的报纸，包括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乃至香港的《大公报》都全文作了转载。至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为之振奋，本报在上海的代印点在印刷那天的《中国青年报》时，由于到印报车间去拿当天的《中国青年》报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在车间的门口加哨“站岗”，以阻止“私”拿报纸者。

《除恶的中坚》为什么能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正处于“乍暖还寒”时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大开的国门使广大群众在看到了世界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渴望参与到国内各个领域的改革之中去，渴望更多地了解国内政治生活的情况。然而，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许多传统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头脑，反映在新闻报道上，则是强调纪律，强调统一，而忽视了新闻的个性，新闻的竞争，以及由竞争后带来新闻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于是，当《除恶的中坚》成了一棵在刚开始有所松动的土壤中冒出来的极其稀疏的小苗之一时，其所引发的震动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其所报道的还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披露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处以级刑的内幕新闻。

1986年初。春节刚过不久，我就接到了市委宣传部要各报记者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通知。按当时的惯例，每逢重大节日的前夕，或者重大案件的报道，市宣传领导部门总是会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以使新闻单位予以配合。当时正是上海市民对干部腐败，尤其是市委主要领导人的身边人的腐败表示强烈不满的情绪十分强烈之时，“陈国栋（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胡立教（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当时为上海市人大主任）的儿子”的传言四处流传。此时，受贿1万7千余元的陈国栋的秘书（兼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已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会不会是解决胡立教儿子的问题呢？一打听，果然。同时，我还得到消息，侦破此案的上海卢湾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是1984年10月从一个在押犯人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开始，几经周折侦破此案的，前后历时约1年半。当时，我很兴奋，这兴奋来自于两点：一、当时正值全国对干部子女特殊化议论纷纷之时，如能把这一案件写出来，对党中央下决心抓干部子女特殊化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二、我对公安人

员仅从一句话开始，就侦破了这样一个强奸、轮奸大案尤感钦佩。更何况他们所触及的案犯都是干部子女，主犯之一的胡晓阳的父亲是分管组织干部大权的、侦破时还在任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啊！我立即向报社作了汇报，得到了时任国内政治部主任的陈小川同志的大力支持。

怀着强烈采访冲动，我立即通过熟人找到了卢湾公安分局的办公室主任，不料他当头给了我一盆冷水：“除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犯罪事实及判决外，我们没有接到要我们提供情况的通知。”无论我如何软磨硬缠，直至大光其火，他都丝毫不为所动，至多露出一脸无奈。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卢湾分局的公安人员正经受着极大的压力。破案后，他们在向有关领导机关汇报案件侦破过程时，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侦破的难度，表扬了侦破此案的有功人员。却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他们居功自傲，并且不允许他们再对外作任何破案介绍。此时，卢湾公安分局的同志心里也正充满着一肚子的无奈呢。

出师不利，却更坚定了我千方百计写出并且一定要写好这篇报道的决心。我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发觉无论是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还是从卢湾公安分局都不可能再挖掘出任何新材料，惟一的出路是找参加过卢湾公安分局汇报会的人员。经过三天的挖空心思，我发现这也几乎是一条绝路，因为卢湾公安分局极其有限的几次情况介绍，听取汇报的基本上是上级领导。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极度沮丧之时，我爱人（当时为上海《支部生活》记者）传来了一个令我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支部生活》通讯员、卢湾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秘书在给她送稿子时，无意中告诉她，卢湾区政法委和卢湾公安分局曾将此案的侦破过程向卢湾区委常委会作了2个小时的详

细汇报，听取的一共只有 11 人，均为卢湾区的主要领导，而那位秘书则是这次汇报会的记录员。

在我爱人的协助下，经过一再的赌咒发誓，反复的拍胸脯保证，只差没有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诺言，卢湾区的这位秘书终于打消了顾虑，“偷偷地”将会议记录交给了我。

都说破案难，看了会议记录，我才发觉，尽管陈、胡流氓集团案的破获是从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开始的，其难度大可想而知。然而，公安人员真正面临的考验是在破案以后。前者，他们只花了一个半月，后者，他们却花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其根由在于，这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团伙的六名成员全部都是干部子女，主犯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的父亲是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而主犯胡晓阳的父亲更是当时在任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主任、执掌着全市的组织干部大权的胡立教，其余四位罪犯的父母也都是处级干部，有的还是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老干部。

在案情还没有向上公开的侦破过程中，公安人员有的只是对罪犯的愤怒和势必侦此案的决心。可是一旦到了按程序向上汇报，并依法收捕、审问时，一个无形的包围圈，乃至由此而来的强大压力，使公安人员充满了压抑和悲愤。

1984 年 11 月 30 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刚作出明确的指示：收审。立即就有人企图向陈氏兄弟通风报信。当天下午，陈氏兄弟分别被捕。晚 10 时 40 分他们刚被带到卢湾公安分局进行预审时，“关切”的电话就接踵而至，直到第二天凌晨 1 时才暂告停歇。

对胡晓阳的收捕更是艰难倍至。迫于当时的形势，在报道中，只是十分简单记述了胡晓阳的收捕过程：

“就在卢湾公安分局向上级发出收审胡晓阳的报告后，有人

立即得到了信息，悄悄托人带信给胡晓阳，要他不要回上海。究竟怎么抓？正当公安人员在思索时，胡晓阳却有恃无恐地随着到深圳去参观的父亲一起坐飞机回沪了。公安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决定在外面伏击拘捕。

一月，正是上海最寒冷的天气。室外的夜晚，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在这样的气候里伏击，公安人员将面临多大的困难！可是，他们全然不顾，一心一意地搜寻着胡晓阳的蛛丝马迹。终于，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胡晓阳将到衡山宾馆去。公安人员立即悄悄地散布到衡山宾馆周围。他们冒着寒风，耐心地等待着。胡晓阳露面了。霎时间，公安人员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拷上手铐，把他推上警车。在拘留所里，胡晓阳供认了同伙们揭发的犯罪事实，并且供认了他在北京、郑州等地的流氓犯罪事实。”

这段文字见报后，有人竟然指责记者报道失实，说胡立教带儿子回沪，是为公安部门创造收捕胡晓阳的条件。可他竟然忘了最起码的一个事实：既然胡立教是要为公安部门创造条件，那他为什么不主动送儿子投案？！当然，这是后话了。

案犯们被捕后，很快就一一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没等公安人员品尝破案后的欢愉，公检法内部的严重“分歧”就出现了，分歧的焦点是：胡晓阳够不够死刑？！

早在胡立教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时，胡晓阳就曾奸淫过妇女。到上海后，他还得意洋洋地向同伙们传授了所谓“拍婆子”的经验：“把钱往她们的奶罩里一塞，你就可以干了。”在上海期间，他曾轮奸妇女1名，强奸妇女3名（未遂），奸淫妇女12名，猥亵妇女10名。而这些数字都是找到受害者后一一落实了的数字。胡自己交代而未找到受害者的数字均未包括在内。很显然，这样的罪行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早就被判处死刑了。可

是，就因为犯罪人是胡晓阳。有人就以其对3名妇女强奸未遂为由，反对判死刑。直到1985年8月，芮杏文与江泽民分别担任上海的党政一把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到真正统一思想，定刑判决时，已到了1986年的1月，此案离破案已整整一年有余了。

破这个无头案只用了一个多月，定罪量刑却用了一年多时间。联想到公安人员破案有功，却反被无端指责，心里真是堵得慌。正是带着对公安人员的敬佩、同情而又无奈的心情，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写出了稿子。同时开始为审稿而奔波。

当时，中国的新闻界有一个极其严格的规定，稿件一定要经过提供情况单位的审核后，签署同意发表的意见，报社才会见报。说实话，我对这篇稿件能否通过审核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果然，卢湾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十分惊讶而又略带激动地看完这篇稿件后，只是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根本不作任何表态。为了尽快让稿子见报，国内政治部主任陈小川打破常规，把我从上海调到北京，要编辑杨浪陪我赶到公安部办公厅，请办公厅主任审稿。经过整整几个小时的审阅，这位办公厅主任指着叙述公检法内部分歧的那一段，说：“公检法内部有不同意见，是经常有的，不能把检察院和法院推到公安部门的对立面去。”在看着我们删除整整一段、100多字后，他又说：至于事实的把关，你们还要找上海卢湾公安分局。”一听这话，我的心又揪紧了。按惯例，未经过当事者审查的，一般不会见报。离开公安部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我和杨浪两人在路边小店里站着吃完了一碗浇上糊糊的面条，由于稿子能否发表还没有着落，心里七上八下的，至今都不知道这碗面条是什么滋味。值得庆幸的是匆匆赶回报社后，小川与分管副总编商量，依然决定：发！我立即将稿子稍作润色发到夜班，这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这样一篇平常之作，放到今天，根本不算什么。在当时，却经历了那样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艰难曲折”。可是再想想，这也是必经之途。从严格控制的舆论工具，到今天逐步走向市场化操作，必定要走过这一段乍暖还寒的路途。这是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不幸”，更是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毕竟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时间：1985年6月7日

作者：李伟中

战士万岁

李大同：在生活的反差中表现英雄

战士万岁

我愿做默默无闻的小草
扎根在老山阵地
为祖国站岗放哨
用自己红的血绿的衣
把南疆装扮得更美好

——老山战士 董自传

十一名赳赳男儿执枪肃立，十一双灼灼虎眼在钢盔下闪烁着光辉。这是在四月三十日，老山脚下，边防某部十一勇士“敢死队”出征前的一幕。

现代战争是这样无情：“生”的幸运不会降临到他们每个人的头上。我激动地走上前去，说道：“瞧你们这般气概，真不愧

为人民英雄!”小伙子们笑了。

一位名叫史华利的大个子纠正我的话说:“我们不过是草芥之人。”

眉清目秀的袁厚贤又伸出手指强调:“都是路边的无名‘小草’!”

感叹这些小伙子的生命或许流星那样一闪,就将陨灭在地平线下,我问道:“你们,不感到有什么遗憾吗?”

“我遗憾的是自己太年轻。生活中有许多滋味,美好的,甚至丑恶的,我也许再也没法感受到了。”新兵孟志平望着远方说。

“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和姑娘谈过恋爱呢。我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哪个姑娘看得上我!”粗犷的史华利感慨大发。

“你们不觉得当兵吃亏吗?”我又问这些自喻为“小草”的士兵。

“当然吃亏喽。‘当兵没有名和利,不如回家去种地’。自古以来,留下名字的士兵又有几个?”

史华利的话音刚落,战士们七嘴八舌,向我诉说他们在家致富的朋友、在高等学府中深造的同学,以及亲友们对他们当兵的种种不理解……

听着他们的话,我在默想,从远处看,他们个个像英雄;走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却又全是这样平凡的人——

你,袁厚贤,你这浙江安吉县农民的儿子,你母亲患乳腺癌,父亲有胆结石;去年家乡遭了灾,很多乡亲的公余粮都减免了,队干部就是不减免你这军属家的,你读到信后好伤心。爸爸还有那么多的“私心”,说家里欠下很多债,领了连队的补贴;你这次积极要求参加“敢死队”,私下又找首长说,如果你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希望母亲能住到部队的医院里治病……

你,史华利,你这安徽宿州市工人的子弟,你嘴里少不了

“粗话”，又夜夜梦想有爱情，老是感叹“快乐的单身汉，为什么有那么多忧愁”？你还那样自卑地说：“退伍后能找到个破工作干就不错了。”自认为一身健美的肌肉，“回家拉板车正合适”……

你，孟志平，你这从郑州来的小新兵。你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是多么地丧气呀。你还告诉我，你当兵是为了“搭跳板”，以期退伍时能谋到个职业。你在学校一直入不了团，算得上“落后分子”；你是到了“李海欣高地”，在哨位上宣誓入团的……

还有你，方南生，你家住在城市，偏要去追求一位农村姑娘。可是，这姑娘考上了大学，继续向你表达爱情，你却“自惭形秽”，像个懦夫一样逃避了。昨天晚上，你一个人躲在山脚下，对着录音机说话、唱歌，录下一盘留给妈妈的磁带。你担心在这次冲锋中死去，妈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正是你，你，你和你——你们这些无比热爱生命的普通士兵，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和理由享受生活的甜蜜，可你们却“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豪迈地投入到会葬送锦绣前程与年轻生命的战斗中去。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小草们”告诉我：“不要用小市民的市俗观点，看待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小草们”还说：“从个人来讲，我们是‘吃亏’。但是，我们为祖国牺牲，死而无憾！”

“就是缺胳膊断腿找不到对象，也是光荣的。”

……几天之后，他们几乎全都将碧血洒在了祖国南疆滚烫的土地上。

哦！老山，“中国”界碑的脚下，生长着成千上万这样年轻的“小草”。他们挺着自己柔的枝、嫩的叶，把中华民族的安危担在肩上。

“捣蛋鬼”的战场形象

当我站在老山之颠
总感到老山
不同于内地的山川
虽然整天稀泥满脚背
炮声隆隆不断
它却像大熔炉一样
培养、锻炼、考验着
我们新一代

——老山战士 徐月明

深秋夜晚，前线的村庄。荧光屏闪亮。边防部队某部首长在天井里看电视。一声惊呼——“屋顶有人！”

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是越军特工吗？不像。“可能是三连那个‘捣蛋鬼’在上头。”那家伙为看电影之类，破窗、翻墙有过多次“前科”。

“捣蛋鬼”叫苑树民，入伍前被三个学校开除过。他是硬让父亲扭来当兵的。可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屡屡诉诸拳脚。战友们不得不对他白眼相看，首长们不得不给他多次处分。

部队向战区开进。他这位在连队获处分的“冠军”，成了全部队的“重点帮助对象”。干部们好话向他说尽，战区纪律也讲了，他该会审时度势，不再捣蛋了吧？

“苑树民不是睡在床上吗？”三连指导员对前来打探的卫兵说。被子一掀，大家愣了。这小鬼把枕头塞进被子里，放脚的部位还撑上一双鞋。装得真像！

抓不着他怎么办？展开“心战攻势”。首长亲自对着屋顶喊

话：“要看电视，就下来看吧——”“扑啦啦！”一条黑影从屋顶跌下，栽进老乡煮猪食的大锅里。

大家一看，果然是他——苑树民。这样的兵能打仗吗？

1984年12月的一天正午，一位鼓荡着雄风的中国士兵，正在老山的热土上冲进。他就是苑树民。

我边防部队一位副连长，过“生死线”时中弹牺牲。他身上的作战文件如果被敌军抢走，后果不堪设想。首长命令苑树民所在排，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副连长和文件抢回来。他们头天午夜就上去了，遭受到敌军炮火猛烈封锁，直到第二天中午任务也未完成。敌人将开始行动，情况紧急。这时，苑树民喊：“我去！”

他冲上去了……

当初，三连开上老山，有一次，急需人顶着危险到三公里外背给养品，苑树民也曾冲出来喊：“我去！”

苑树民的请战，使得连长、指导员面面相觑。

“信不过我么？”他有点愤愤然，“打仗可不要再另眼看人！”

他到底还是抢着去了。不过，指导员特意找来两个老兵，要他们悄悄地“照看”着苑树民：“可别让他跑了……”他原来相好的“哥儿们”中有不少人进了牢房。大意不得！

后来证明，这一切顾虑都是多余的。小苑上老山不久，就仿佛换了一种眼光看待世界。

是战友的牺牲给了他启迪，还是老山的暴雨清洗了身上的污泥呢？

是战场的特殊环境提供了表现人真正心灵意向的机会，还是战争的火焰促使他更容易看清真理？

总之，这一切起作用的实际结果是：苑树民不仅训练刻苦、听从指挥、接受批评，还给平素视为“仇敌”的战友打饭端水

……他甚至专门找指导员声明：“我反正是准备牺牲的，你放心好了。同志们认为我平时爱打架。打架，不怕死；战场上打仗，我也不怕死！中国人嘛，得有个起码的良心。我苑树民是真货是假货，战场上看！”

没想到，一个漆黑的夜里，连队在最前沿抢运完烈士和伤员后，苑树民失踪了、他——伤了，亡了，还是……跑了呢？

两个搜索小组紧急出动，重上阵地，寻找苑树民。在阵地顶端，同志们发现一团黑影在尖石上蠕动。上去一看：“呵，苑树民！”

他的身上全是血，背负着一位重伤员，仿佛正驮着一座大山。原来，他抢运完伤员和烈士，又一人爬到最前端的哨位，“想打死两个越南兵解解恨，争个立功的机会。”

哨位上，一位战友正踞枪坚守。他告诉爬过来的小苑：“这里有一位重伤员，你快把他背回去！”

“还是你背吧，我来打！”小苑要接人家的枪。

“那不行！你再不送他下去，他就要死了！”

就这样，苑树民默默地背负起伤员，一寸寸、一寸寸，爬上他人生新的旅程……

战场，人生的特殊课堂，使无知变为成熟，使矿石冶炼成钢。此时此刻，十八岁的苑树民正冲杀在战场上……

枪弹，扫射在山岩上溅起片片火星；炮弹，反复砸入蔽日的战尘，大地在颠簸摇晃。那不绝于耳的隆隆声响，对整个生命世界喊着：“死亡！死亡！死亡！”

看，苑树民正拖着抢到手的烈士遗物往回爬……啊！一团团爆炸的火光吞没了他。

“还活着！”满脸鲜血，手臂不听使唤，可他仍然咬着嘴唇爬、爬、爬……

“咣！”他右腿炸飞，生殖器炸坏。年轻的士兵晕厥了。滴滴青春血，深深爱国情，流渗在他手中紧攥不放的烈士遗物上……

在昆明的一所军医院里，伤刚好转的苑树民，微笑着坐在手摇车上，东跑西跑。尽管他将终身残废，脸上破了相；尽管他可能难以成婚，但他每天仍然乐呵呵地“忙”：安慰负伤而消沉的战友；动员前来看望他的父兄早日回家；他还写申请书，说：“我要做一名共产党员！”

“快活神”的罗曼蒂克

分别前你对我说
要送我一点赠品
让它陪伴着我
度过漫长的岁月、人生的坎坷
唉！快别这么说
你的来信就是最好的赠品
假若是没有它
我就会感到寂寞
是它给我奋进的信心
就让它永远陪伴着我

——老山战士 廖明和

老山上有株快活的“小草”，别看他有着漂亮的脸蛋和整洁的仪表，却顽童似地爱笑。

为这个“嘻嘻哈哈”的毛病，他刚当新兵就受到了处罚。那天，这个名叫刘亮华的“新兵蛋子”，在演兵场操练时老咧着嘴“嘿嘿”出声。班长火了，令他面壁立正：“看你对着墙还笑不笑？”他照样笑。笑罢，还找连长告班长的状；连长批评他，他

又要去找部队首长。

他笑，真诚地笑、开怀地笑，谁让生活中总有那么多事令人开颜呢？

而今，他操着一雄赳赳的硬汉子派头踏上了战场，铁青色的战云并未能遮没他唇际的笑。

这不，他又笑了。好甜蜜哟，手里摇着女朋友的来信和照片。你看他，眉飞色舞地大喊：

“快来看呀，我亲爱的照片！”

战友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这小子又高举着照片声明：“我的动力就是我的女朋友！你们看，真漂亮！”意犹未尽，他还把信向大家摊开，指着末尾一句装作女腔念道：“我等着你戴着金光闪闪的功勋章出现在面前。”大伙儿全都笑弯了腰。

看来，他的动力还真不小。为了参战，他在全连第一个写下决心书；刚上阵地，他第一个带头到前沿抢修工事；阵地上人多无处住，他又主动缩到石缝里，“半蹲半坐为睡”，顶着炮火度寒宵。

今年三月初，上级把拔除越军一个重要据点的任务，交给了刘亮华所在的六连。连队挑选了十八名勇士，组成一支突击队。刘亮华见自己的名字上了“龙虎榜”，乐得又蹦又跳。他还跑去找首长“挂号”，要求开誓师会时第一个表决心。

誓师大会在小河边庄严召开。刘亮华抢到队列前发言。他气宇昂扬地掏出三张纸。大家以为是他写的决心书。谁知，他说：“我的决心书是我亲爱的人写的。”

“哗——”严肃的会场上腾起笑声。这家伙也不看是什么场合，抖开纸就大声朗诵：

“我亲爱的亮华，你好！……你是一名祖国卫士，你的形象

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堂啊！……好女要嫁英雄汉，我是属于你的。你什么时候凯旋，我就等你到什么时候；如果你伤残了，我也愿嫁给你，侍候你一辈子；如果你不幸牺牲，我愿做你家闺女，服侍老人。你要是当孬种，别进我的家门。”

你别看，这封信还给壮士们铆足了劲儿。誓师会上，一只只隆着肌肉的拳头高举过头顶……

表完决心，连队请他们在白纸上留下“永恒的誓语”。且看高亮华大气如虹，竟将自己同全国战斗英雄刘四虎相比。他提笔挥道：

“刘家前辈出了个刘四虎，扬名四海；后起之秀将是刘亮华，为国争光！”

三月八日凌晨，突击队贴近敌阵。刘亮华作为十八勇士的先锋，利用敌夜视仪观察间隙，时而低姿匍匐，时而挺身跃进。我军炮火急袭一过，刘亮华带着自信的微笑，第一个冲上阵地主峰。上级首长当即在电台里给他报请二等功。

刘亮华更来劲了，突烟奔火，厮杀斫击，尽情释放着青春的能量。右侧一洞口喷着火舌，他连扔四颗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主峰两名越军想溜，他合着骂声送去一串子弹，让敌人魂归西天；反斜面一敌人藏在洞里顽抗，他跃过去往里塞手榴弹，结果其狗命。这种时候，他也幽默地“哈哈”道：“伙计，对不起，请您让位吧，我要防炮了。”说罢，将敌人的尸体扔出洞外……

战争，改造着青年；战争，锻造出猛士。但是，战争丝毫没有改变一代青年热爱生活的天性——正如伴随地球旋转而不断变化的历史，并没有改变小草对阳光的向往一样。也正因为有了阳光，才有小草的存在和成长。

战斗结束。刘亮华皮毛无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甜甜

地笑着，兴冲冲地端详着女朋友的照片，自言自语道：

你呀你，你的眼力还真不错呀，找了个功臣……”

“刺头兵”的斑斓色彩

战争是残酷的
可死亡不属于我们
即使被弹片击中
也可在微笑中永生

——老山战士 张春来

战争中生的希望有时不及死的可能，战场上需要军人具有不怕死的精神。在攻打某高地的战斗誓师会上，二连的干部们正在慷慨表态：

“血洒老山，死也要倒向前面！”

“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这时，突然立起一个魁梧的士兵，一张口就出言不逊。他反对“盲目的感情冲动”，振振有辞地扬言：

“英雄男儿守边关，智斗顽敌不蛮干；壮士鲜血不轻洒，活着回来迎再战！”

他叫赵志刚，是个不甘平庸的兵，有着炽烈的幻想和桀骜不驯的天性。

每个人都有追求，人们从赵志刚常把拿破仑等名挂在嘴边，窥见了他的部分“野心”。据说有野心的人都很自傲。赵志刚虽然只有十九岁，勉强入了团，不过是只有两个口袋的士兵，凡事却拒绝依赖权威。有时候，他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向首长提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意见，平日里，他做些事也叫人哭笑不得。那天，指导员在指挥所工作，突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一

抬眼，赵志刚闯了进来，手舞足蹈地大喊：“我今天杀人了！我今天杀人了！”指导员顿时大吃一惊。结果呢？是他刚才用狙击步枪消灭了一个敌人。这简直像存心戏弄！

上阵之初，赵志刚就曾傲言：“我的命可不能轻易丢！”他认为，战争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不怕死只是取胜的因素之一。当时，越军特工常在夜里摸到我阵地前沿，偷着把我方的定向地雷调反过来，然后弄出“情况”，诱使我边防战士起爆地雷炸伤自己。赵志刚便设计出定向地雷放置杆，可及时按照“情况”和地形调整角度，挫败了越军特工的诡计。他又傲言了：“我打仗只要有定向地雷就行。越军要是冲上来，我一枪不放，保证要他们都躺下。”

我边防部队对某高地发起冲击。敌人用密集的炮火覆盖了通路。两次冲锋失利了。赵志刚的分队奉命冲锋。他们选择了一条极其危险，但可出敌不意的攻击路线——踏过地雷区！

此去凶多吉少，抉择生死将会像呼吸一样简单。坑道里，漾起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战士们一个个铁着面孔，默默地整理着装具。赵志刚却照样神气十足。副连长问他：“怎么样，害怕不害怕？”他以满不在乎的口吻捏腔拿调地说：“怕什么？上面那几个‘东西’，还不够我开心哩。本人上去，不仅要消灭他们，立个大功，还要活着回来交差”。

这话把大家逗乐了。气氛由沉闷变激昂，战士们纷纷表决心。副连长问：“你为什么那么自信？”赵志刚眼珠一瞪：“嗨！从当兵那天起，我就把脑袋交给了军队。需要我牺牲我就牺牲，牺牲不了就提着脑袋回来，还大有用处呢。”他语气中充溢着男性的骄傲，充溢着民族的尊严。

战壕中的赵志刚，像一头蜷伏下来、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副连长刚一指示攻击目标，他“腾”一下就跃了出去。只见他矜

羊般从一块石头飞速跳到另一块石头上，避开地雷，倾刻就杀到越军战壕边。他身后动作稍慢的同志，被敌军炮火封锁在半路上。

这时，闪过来一个身背电台的敌军官，小赵抢在他开火前，两颗手榴弹炸得他四分五裂。

赵志刚继续抖擞傲骨，“啊啊”怒吼着狂冲猛打。六名敌军吓得往山下逃窜，赵志刚撩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打光了子弹，把枪一甩，提起手榴弹就往下砸……

旋风般完成了攻击任务的赵志刚，只身跃上峰顶。他向战友们招手欢呼：“喂——快上！快上！上面没人。敌人都被我打死了！”

遭敌炮火袭击的战友，大多数负了伤。他们见顶峰的烈火金焰里，挺着英勇的赵志刚，刹那间士气大振。被地雷炸断脚的战士，也颠着腿冲上了敌阵。

赵志刚踌躇满志，用睥睨一切的目光扫视着战场，到处搜捡战利品。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炸响，把他两条大腿的皮肉撕得稀烂。

战友们赶来抢救。赵志刚傲慢地拒绝，气势汹汹地吼叫，要战友们先救别人。

赵志刚自己，用手指抠住山岩，拖着动弹不了的下半身，抖抖颤颤往下爬。他大腿上红的血、碎的肉，粘糊在那灰白色的岩石上……

赵志刚在爬，带着他在军中的追求，带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带着他舍不得扔下的缴获来的两具火箭发射器。他终于爬到了山下，以挑战的口吻对他的上级说：

“怎么样？我赵志刚活着回来了吧？可惜，是爬回来的，稍微狼狈了点。”

“出风头”小兵的痴情热望

云抹着碑
草垂着泪
他的名字：战士
他的年龄：十八
故乡的山水梦见他
他也梦见故乡的山水
让故乡的炊烟永远平安
曾是他最大的欣慰
……他已经十八岁
他只有十八岁
为了保卫可保卫的一切
他永远啊永远十八岁

——老山战士 陈少华

老山上有一位沉毅的战士，霞起霞落的清晨的傍晚，常见他独自坐在小河边，吹奏他心爱的口琴。人们还见丛莽之中，不时有他闪展腾挪的身影。少林武功发力的壮喝，荡响在亚热带山林。

他名叫钱灿贤，是一位普通的士兵。平时在队列里，他那一米六三的身高象小草一样，毫不起眼。可现在，当连队准备成立一支“党员敢死队”的时候，他却要大出风头。

尽管钱灿贤仅仅是一名共青团员，却妨碍不了他高昂起渴望钢盔的头颅，五次找连队首长，要与那些党员“平起平坐”，成为“敢死队”的一员。为此，小钱提出四条理由：

其一，军人的功勋要建立在战场上，我做梦都想打头阵，立

大功。

其二，我军事技术好，连队各种武器都能打，军事智力测验还得过奖呢。

其三，我身体强壮，家里弟兄多，父母也还健朗，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其四，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渴望入党。这里的共产党员，不是名利地位的象征，而是要带头冲锋，为祖国牺牲在前。我就是要争取做这样的共产党员！

钱灿贤的热血，已被正义战争的炉火加温。然而，连队第一次确定“敢死队”员名单时，没有他。第二次，又围绕着他发生了争论。说真格的，论小钱的技术、智慧和果敢，他称得上是一名好兵。但是能否成为一个“敢死队员”，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这就是：有没有宁死不当俘虏、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思想境界。

他——一个寻常的小兵，刚刚跨进青春的门坎，刚刚开始人生的思考，能如此豪迈地超越“自我”吗？

这时，指导员想起来到前线不久发生的一件事：那天，钱灿贤警戒着我军一个重要设施。忽然，林子里有一处叶摇草动。钱灿贤带领两名小战士扑过去，追呀追，眼见像有人拨开枝叶，逃进了森森的老林。跟下去吗？那两个小战士心里直发毛。带着孟浪的青春锐气，钱灿贤说道：“你们俩在上面掩护，我下！如果抓住特工，你们来帮我背，万一我被他们抓住，就拚命喊，你们听了，赶用冲锋枪照着我打！”说罢，他孤身冲了下去。不一会儿，两个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小战士，看到钱灿贤笑呵呵地跑了上来，说他找到了目标才发现，是一只可恶的猴子在捣乱。

钱灿贤内心升腾着强烈的进取热望，急切地等待着时代的命令和祖国的召唤。他写道：

“等待，我坚定地等待，硝烟中见赤胆，敢上刀山，敢下火海，壮我军威震敌胆，胜利红旗插山巅。”

连队讨论决定，还要进一步对钱灿贤进行考验。一次，观察敌军阵地时，别人藏在我方哨位上看，钱灿贤竟独自摸到离敌军洞口二十多米的地方。班长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回答：“我想看看越军在吃什么，还想看看他们人多不多。人少的话，我抓他个活的回来！”为这事，小钱随身武装了跳刀和背包带，外加一支冲锋枪和两条肌腱发达的臂膀。

研究战法的军事民主会正在举行。钱灿贤滔滔不绝地提出：“出击时我方伤亡过大怎么办？敌军反扑怎么办？……”

好家伙，他一连提了二十五个“怎么办”，而且一一解答了在这二十五种情况下的处置办法。

部队副政委这时问小钱：“假如你被敌人紧紧包围了，你打算怎么办？”钱灿贤雄强地回答：“同归于尽！”

“敢死队”终于破格地吸收了钱灿贤。于是，这支年轻的共产党员队伍中，加入了一名共青团员。

凌晨，钱灿贤在干渴的焦土上滚爬奔突，在全队中第二名冲上了主峰，为祖国又夺回一座峻峭的山岭。然而，恶战之后，除了钱灿贤和赵开洪，“党员敢死队”的战友们，全都英勇地倒下了。

这时，指导员通过步话机呼号：“你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快下阵地来休整！”

“我不能下去！”钱灿贤喊：“那么多同志牺牲了，高地上洒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

这样喊，就这样干。钱灿贤、赵开洪硬是不下阵地，还主动要求，坚守在最重要、最危险的哨位上。当天夜里，他们打退敌军一个班的偷袭，毙敌五名。

第二天入晚，指导员再一次催促他们下地。钱灿贤不服气地喊：“我昨晚还没打过瘾呢！才打死他五名。我还要打！敌人就要大反扑了……”

就在这天夜里，钱灿贤、赵开洪和增援上来的刘成俊，接连打退强敌三次猛攻。晚十点多钟，越军的大小火炮横暴恣虐，炸起一片片腥红的大火。钱灿贤的防炮洞炸塌了。他从土里挣扎着往外钻。战友赵开洪和刘成俊壮烈牺牲。

此刻，这个哨位三十米宽的阵地上，只剩下了钱灿贤；此刻，他与上级失去了联络，弹药也炸飞了；此刻，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展开了集团冲锋。

钱灿贤，一会儿冲到这儿，一会儿冲到那儿，喊着、骂着、吼着，拚死向敌人还击……

他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已多处负伤。这时，打剩下的大约一个班的敌军还在往上冲。钱灿贤把枪藏进身后的石缝，咬牙抱起石头，砸了下去……

借着照明弹的红光，敌军发现钱灿贤已没有子弹，便“嗷嗷”怪吼着扑上来。想抓活的。

钱灿贤——这位年轻的中国士兵，挺身从哨位上崛起，双眼闪射出一个伟大民族不可玷污的尊严。烈火熊熊，吞噬着他的征衣；长风浩浩，高扬起他的头发……

“啊”！他一声壮喝，冲向敌人。“轰——！”一声巨响，撼天动地。钱灿贤引爆了腰间最后留给自己的“光荣弹”。敌军最大的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美丽的小河边，再也听不到他的口琴声；苍翠的丛莽中，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战友们在重炮深深犁过的土地上，细细寻觅着钱灿贤的踪迹。他们看到，我们共和国的这位年轻的士兵，炸断的手指上套

着“光荣弹”的拉火环，鲜血融进了祖国交给他把守的山岭——就像所有的小草依恋着大地母亲。

部队指挥所中，指挥这场战斗的首长激动地高喊：

“战士万岁！”

啊！自喻为“小草”的战士，没有金饰，没有盛名，却奉献出金钱买不到的宝藏，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安宁！

记者手记

在生活的反差中表现英雄

——读长篇通讯《战士万岁》

李伟中同志只身深入老山前线采访。本报在六月七日用了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他写的通讯——《战士万岁》。

未曾读文章，一看标题，就为小李担心：这样“显赫”的一顶“帽子”，下面有撑得起来的“头颅”和“躯干”吗？就连著名作家魏巍，在写战士时，也只用了极有分寸的评价——“最可爱的人”。小李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记者，到报社没有几年，也还未写出过引人注目的新闻报道。况且战士题材，近期已有诸多高手试笔，各领风骚。小李，弄不好你可要相形见绌啊！带着这样的担心，带着那种保持“距离”的审视眼光，我往下读。读着、读着，一股久未体验的兴奋从心底涌出，很快占据了整个身心……到结尾处，我几乎跟着那位首长一起高呼：战士万岁！

无疑，这是一篇难得的、成功的好通讯！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题材好，有人说。不错，为保卫国家

流血牺牲，在任何国度都千古而不朽，题材确实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写这个题材的高手众多，为什么未曾感到过这种难言的震撼呢？

“小李不怕艰苦，不畏危险，深入采访，才写的这样好。”还有人这样说。也不错，这是写好任何一篇报道的前提条件。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别人就没有这样做呢？

这篇通讯一定还有些独到的地方！我又读了一遍，一时也未看出有什么特别的高妙之处。那么，是什么东西激动了我呢？一个偌大的？存入脑中……

近来，看日本电视剧《命运》时常和朋友们发生些有趣的争论，联想起《战士万岁》这篇通讯，忽有所悟。

在《命运》这部电视剧里，检查官和罪犯哪个演得好呢？尽管“大岛茂”在《血疑》一剧里有极为出色的表演，在《命运》里也有“重戏”，但我和朋友们还是不得不遗憾：罪犯岛崎要比“大岛茂”的表演出色得多！有的朋友说，这是因为罪犯的戏要比检查官重。

仔细一想，觉得不然。事实上，剧作者把所有的重戏都放在了检查官身上：失妻、失女、错认、明知错认、给明知错认的女孩以父爱，等等等等。罪犯岛崎没有这么多的戏，他不过是浑然不知而已。然而罪犯岛崎的表演给人以一种巨大的震撼，检查官相形之下却显得苍白，让人想掉眼泪的恰恰是前者！这又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是生活的巨大“反差”使然。

“反差”是个摄影术语，用来指黑白色调的对比度。有趣的是，生活中这种“反差”，竟也无处不在：红与黑、深与浅、伟大与渺小、勇敢与怯懦、杰出与平庸、善良与邪恶……不胜枚举。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不同素质的“反差”；每一个人与他

周围的人和环境，又表现出不同“对比度”的反差。高明的作家，往往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在反差中成功地表现生活。

在《命运》里，粗壮的杀人犯和娇小的少女是反差；暴戾、鄙侮和温顺、善良是反差；辱骂、殴打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是反差；谎言和诚实是反差；罪犯在善的感召下洗心革面、重新作人的情感迴旋更是一种强烈的反差……正像激起层层水雾的瀑布比平缓流动的江河更能使人驻足一样，对这种生活的反差，人们往往感到更真实，更激动人心。

《战士万岁》这篇通讯，表现的是“战士”这个宏观概念，这是个“数以万计”的概念，而在洋洋万言的文章中，李伟中同志只精心写了四个战士，这实在是极为恰当的选择（我们不难想起，魏巍同志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表现志愿军战士的名文中，只写了三名战士。这是“群像不群”的辩证法在“群像”文章中的生动体现。恕在本文不加论列。）。我想，这四名战士，都可以说是连敌人都不能不钦佩的当之无愧的英雄。在表现这些英雄时，李伟中同志敏锐地在鲜血和生命的壮烈之外，捕捉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通常被认为是和英雄格格不入的东西，一种似乎“犯忌”的东西。

事实上，每一个采访者在采访英雄人物时，都未尝没有看见这种东西——这些事，那样平凡，那样普通，有些甚至不那么光彩，可我们在生活中又那样经常地耳濡目染。这些事情，和英雄的壮烈、令人景仰不那么合拍，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不是谁强加给英雄的，相反，恰恰是英雄本色！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生活中有无这种“反差”，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现象。是避开不谈使你所写的英雄鹤立于普通人之群呢，还是正确地加以表现，使人感到我们国家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的产生，正是由于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呢？李伟中同志选择了后者。

用小标题标出的这四名战士，分别为“捣蛋鬼”、“快活神”、“刺头兵”、“出风头”，看他们在战前，有的被学校三次开除，是受处分的“冠军”；有的公然宣布“我的动力就是我的女朋友”；有的天天想着当“拿破仑”；还有的闪展腾挪练少林武功，准备在战场上“出风头”。李伟中同志不惜笔墨，将这些战士的平凡之处、普通之处、可笑之处，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谁看了这些都会感到，这和我周围的人有何区别？这和我有何区别？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死亡！死亡！死亡！”的隆隆炮声中，冲上敌军阵地，杀灭敌人抢救战友，自己被炸断双腿、炸坏生殖器、用手指抠着山岩拖着不能动弹的下半身爬回来，还在嘲笑自己“狼狈”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在战火中扔开敌人的尸体，掏出女友的相片欣赏时；当你看到他们浑身负伤，引爆“光荣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时，又怎能不让人感到这些普通一兵的伟烈！

这种真实地通过生活的强烈反差表现出来的英雄形象是远非那些单纯地处在硝烟烈火中的英雄形象所能比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既是生活的辩证法，又是文章的辩证法。

记得报社一位同仁曾向我谈过他的看法，“文章高手写东西着意表现；而低手东西却只能叙述。”应该说，这看法是有些道理的。

“表现”和“叙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现离不开叙述，而叙述决不等于表现。表现是目的，叙述是手段。文章低手之所以只会叙述，在于他写东西只想讲几件事，讲个把故事，往往却忘掉（或根本就没想过）叙述这几件事是为了什么，当然难免流于表面，失于肤浅。表现则不然。它是作者捕捉住了人或生活的更为深刻的内涵，并着力加以刻画的完整过程。成功的表

现，通常能够造成某种“意境”；平白无奇的事物，通常被挖掘出新的意义。

几乎可以肯定，伟中同志在采访这四名战士时，一定还有许多精采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只会叙述的人来说，是要大书特书的素材。我们还可以断定，伟中同志在构思时舍弃了大量的材料。不难发现，文中刻画的四名战士所用的材料，全都是最能在“反差”中表现战士的材料，这是颇具苦心的！毫无疑问，运用“反差”，是“表现”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不是作者强加给生活什么东西，相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些把先进人物写得“高大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文章，之所以苍白又丝毫不能感动人，恰恰是作者歪曲了生活。

据说，伟中同志在采访前，曾细心研读了苏联近期著名的战争文学——《在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是出自苏联一位女新闻记者之手的真实的报告。报告通过一个个普通的医生、集体农场社员、女工、中学生的几乎完全真实的自述，展开了一幅酷烈的战争画卷。这些在生活中毫不起眼的女性，从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什么“英雄”，却在战争中默默地承受了男人也无法想像的巨大牺牲。她们不是朱可夫，也不是马特洛索夫，没有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众口皆碑的业绩，可她们那平静的、深沉的自述，又是怎样地震动了苏联文学界啊！

也许，伟中同志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普通人作用于战争的伟力，从而萌发了在生活 and 战争的巨大反差中，表现普通士兵的愿望吧！

姑妄言之。

时间：1984年6月17日

作者：韩磊 陈安平

绿荫遮盖下的丑恶——淄博市社会福利院调查纪实

韩磊：我们敬的是《中国青年报》的勇气

绿荫遮盖下的丑恶

——淄博市社会福利院调查纪实

民政部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部门举办的城市社会福利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多数社会福利院办得是好的，像《中国青年报》今天刊登的山东省威海市社会福利院，就是办得好的典型。然而，也有少数的社会福利院办得并不好，甚至很不像样，领导班子涣散，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管理制度混乱，违法乱纪严重，给坏人以可乘之机。《中国青年报》今天登载的山东省淄博市社会福利院所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骇人听闻，造成的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各地民政部门必须从中吸取教训，采取切实措施，对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进行认真整顿，把社会福利院办成像威海市社会福利院那样的先进单位。

1984年5月13日夜。

几个步履沉重的壮汉拉开了练拳的架式——或少林，或形意，或太极……

出拳！疾如闪电！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和古怪的笑声……

对面不是木桩，不是沙袋，而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八个并肩而立的精神病人。

这是发生在山东省淄博市社会福利院精神病病房里的真事，打人的是该院的护理员刘新成、王来福和刘敬波三人。

这座成立于1948年的社会福利院，现有孤、老、残、幼等八十余人（院内统称“院民”，实为收养人员），其中三十多人是青少年，十几名是退伍军人，该院职工的任务是护理并照顾“院民”们的衣食住行，为“院民”服务。

然而，事实正相反，从看守大门，打扫甬道，清理厕所，到为不能动的病人端大小便，都是由“院民”来完成的。不仅如此，“院民”中的儿童还要为护理人员打洗脚水。

十几岁的痴呆青年冯岩，去年送到院里代养。进院一个半月后，家长发现儿子的胳膊莫名其妙地断了；同时，脚上出现冻伤。家长心急如焚，要给儿子做双棉鞋。院方答应由他们来做，但一直不见动静。今年春节过后，入院七个月的冯岩半身褥疮，一丝不挂地死在苇席上。死时身上有伤，两脚溃烂，露出骨头，脚指甲完全烂掉……

“院民”徐超祯大娘偶染小病，开始只是泻肚，但院方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护理。徐大娘昏迷中曾从床上滚落下来两次，一次长达七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死去……

张玉英是个文文静静的女痴呆病人。去年有人反映，看见戴着面具的男人窜到她病房里去，院方不予理会。后来又有人反映，她像是怀孕了，院方领导仍不过问。今年四月，医院为她检

查身体时发现，她已怀孕八个月了，只好做了人工流产。流产后三天回到院里，她下身淌着血，痴痴呆呆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院方还是置之不理……

这些是千真万确推不倒的事实。“院民”们含泪向记者诉说，有些护理员把病人当靶子打。院领导中有人常把女痴呆病人叫进厕所，上下乱摸。“院民”孙续平患脑血栓不能动，被火烧伤后没有人理，不久死去。“院民”王连和，系七十多岁的孤老，被院方人员一拳打裂脸上的皮肉……

在拐角处，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猛然拉住记者，神情诡秘地说：“来，来……”他把记者带进一间低矮的小屋里，在落满尘土的床铺上摸了半天，颤巍巍地捧出一支香烟来：“我是个退伍军人，欢迎你……”一语未尽，泪如雨下。

在病房里，两个女病人依偎在一起。记者问：“她们在干什么？”答曰：“她们在胡闹。”记者怀疑地走近几步，见她们的手指上有血痕，手指掐得叭叭作响，她们在捉虱子！

又一道门被猛然打开后，一股浓烈的臭气扑鼻而来，眼前的情景令人心惊肉跳：十几个男病人“住”在这低矮破旧的房子里。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好几个人一丝不挂，对着来访者做出或羞或嗔、或喜或怒的表现。

窗户上既无纱窗，也无玻璃，地上粪便狼藉，病人身上的肤色都肮脏得难以辨认。

被“院民”称做“阎王爷”的副院长贾世俊承认，按照规定，护理人员应该给被护理者端茶、送饭、擦身、剪指甲；同时他承认现在的情况正相反。

“我们不能保证每个月都让大家洗一次澡。”他有气无力地说。

记者严肃地问他：对现在本院的状况该做何评价？

“我们不能确保‘院民’的人身安全。”他神色茫然地说。
够了……

走出淄博市社会福利院，沿着浓荫遮地的绿色长廊走去，看那梧桐树叶掩映下的小巧别致、缀有彩色陶瓷的现代建筑，多美的小城啊！正是这座小城，去年一年为该市的社会福利院拨款三十余万元；正是这座小城，为八十八名“院民”配备了三十九名工作人员；也同样是这座小城，为使“院民”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提供了医疗设备和大小洗衣机，翻建了锅炉房，新建了两层的病房楼和四层的职工宿舍楼。在此情此景之中，在此时此刻之间，记者该对这座小城说些什么呢？

记者手记

我们敬的是《中国青年报》的勇气

这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仅凭零散的记忆，写出这些打捞沉船般的文字。

1984年6月，我在中国青年报文化生活部工作，具体一点讲就是和杨浪一起编“星期刊”一版。当时我们还带着几个海军的宣传干事，一个叫胡洪波，一个叫陈安平。

我偶尔在群工部群众来稿中，发现一篇控告山东省淄博市社会福利院残酷虐待收养人员的控告信。信无署名，仅具“知情人”三字。于是我便和杨浪商量，此事是否能当成一个线索，专门去山东一趟。

当时杨浪心气很高，跟我说，要去就一炮打响，调查要详尽，采访要扎实，不可有半点差错。

就这样，我带着海军宣传干事陈安平，在没有车票的情况下直接上了火车，到了济南。

照例去记者站报到。记得宁光强满面春风，笑问到何处去。

我们和光强不熟，只简单把来意说了。光强大概也看出我们人地两生，就主动提出请团省委告知淄博团市委，为我们提供方便。

辞别光强，我们乘车到了淄博（张店）。当地的团市委对我们非常热情，搞得我们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团市委书记是女同志，得知我们来意后非常支持，并说她本人就能举出一例以证明群众来信所告不虚。

第二天一早，团市委副书记亲自陪同我们来到了淄博市社会福利院。

此时此刻，我还从未涉及过民政事业及“福利院”。进门之后的触目惊心，后来见报了。肮脏混乱我都不吃惊，最震撼我的就是笼子一样的房子，动物一样全身赤裸的人以及他们的“表情”。

我和团市委副书记都被惊呆了。

当我开始采访时此公和我同时记录，分别提问。我要求海军的陈安平也记录，免得日后横生枝节。

后来我又找“院民”个别采访，越听脑袋越大。将近中午时，该院副院长（一周后被捕）居然提出请我们吃饭，我们都感到气愤。我指着采访记录问他：“这些都是事实吗？”该人一一承认，绝不否认，然后还要请客。

我们走了。下午去了市民政局。民政局说该福利院的情况“有风闻、有反映”，但没有深入调查过。

我感到事态严重。同时血往上涌。晚上嘱咐陈安平，我连夜把稿写好，你明天一早回北京，向杨浪、富强等汇报此事，并把稿子交上听取意见。

当晚我开了夜车，把稿子写好后放在陈安平床头。等我第二天睁眼时，该海军干事已经揣着稿子上了火车。那时哪有传真机呀，打个长途电话都掂量能否报销。

陈安平一走，我匆匆去了烟台。在烟台团市委，得知报社要我马上回去。我又匆匆忙忙无票上车，居然侃得卧铺睡到北京。

到报社才知，报社非常重视此稿。富强等人逐段逐段和我核实现实，我颇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委屈，但当时我只能装成没脾气。

终于，他们制定了报道计划。以星期刊一版全版报道此事。具体方案是：头条发一消息，然后全文刊登我这篇稿子，同时配发民政部按语，再配发山东一好的典型，以免有昏天黑地的感觉。

杨浪在我回京的同时，派出陈安平再去山东采访好典型，并希望光强协助他。

我拖了几天，拿到定稿的小样再回淄博送审。又是无票上车，到了济南站，陈安平接到我，再转车去淄博。

此次来淄博，顿感炎凉不同。稿子一递上，个个目瞪口呆：原先对我那份热情，早已化为冰水；原来追着我攀老乡的团干部，现在见了我唯恐避之不及。

但我们还是去了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市公安局等单位。把小样拿给他们看，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沉着脸闷头抽烟，明确意见一句没有。

我发电报告诉杨浪，送审已毕。杨浪回电：开始运作。见报后注意收集反应。

等待见报这两天，对我来说是最难堪的。团市委的人躲着不见了，我们又不爱逛街，只好在房间聊天。

终于，我们从邮局拿到了报纸，那时的邮局是卖《星期刊》的。看见稿子发出，不觉欢天喜地。青岛啤酒加大个儿的海螃蟹，吃得昏天黑地。

这时，我初来淄博时接风宴上结识的几位企业团委书记纷纷

来电话，说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并希望兑现诺言，到他们那里走走。

从那时起，整整15年，我一直没有去过淄博。我无心去和当地什么人计较，我真想永远抹去这段回忆，但是——

今年四五月份，我已经调离本报半年了。一天，山东省淄博市技术监督局宴请国家局一批官员，我有幸添陪末座。当主人和我握手时，我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当年的淄博团市委副书记，但他毫不留意我的惊诧。

席间，我小心翼翼地问，您是一直在技术监督系统工作吗？他说不是，他说他干了好多年共青团。他向我敬酒，说初次见面，欢迎到淄博局来。我心想，你我是真的初次见面吗？也许你也悄然认出了我？也许你也是故意装作不知？算了，为天下真小干杯吧！

好了，没完没了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怀旧。我们言归正传，这篇报道其实不是难度很大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原是很自然的事。那年头坏事也简单，坏人也单纯，批评报道并不见得十分难写。今天要搞批评，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怀旧主要是回忆当年拨乱反正的大气候及文化生活部内部建功立业的小气候。青春和热血，永远令人忧思难忘，其余则不过是些过眼烟云罢了。

时间：1981年8月6日

作者：马北北、李鹏图、梁长春、张凤山

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

梁长春：取尚方宝剑

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

——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搞特权的领导干部。当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让我们看一看，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北京市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是怎样做的吧！

丰泽园饭庄里的“秘密”

丰泽园饭庄，因中南海“丰泽园”而取名，是首都数得上的高级饭庄。它独具风味，驰名中外；座无虚席，生意兴隆。

然而，局外人哪里知道，这家饭庄却时常有一些“特殊宾客”来光顾。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钱，而他

自己只付一、二元，名之曰“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 1977 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 16 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 124.92 元，而他自己只付给 19.52 元。如果以饭庄所存“王磊部长饭菜 1 份”的单据计算，该部长吃“客饭”少付的钱数，就更为可观了。

对于这些“大人物”来吃“客饭”，饭庄领导也委实有难处。有一年某领导夫人光临，饭庄按实价收了几十元钱。不料，服务局某局长第二天就跑到饭庄来说：某夫人来了电话，告你们饭庄算错了钱。你们重新算算，把多算的钱退回去。局长亲自出马批评，饭庄领导还能不照办？马上将所收款的三分之二退给了这位夫人，并表示了“歉意”。因之，饭庄领导对待商业部部长这样的“特殊宾客”，心里很矛盾：迁就不管吧，饭庄的帐咋结法？照价收钱吧，这是商业战线的“大领导”，得罪不起啊！尤其是这位部长光临，常常百般挑剔，动辄大发脾气，更令人生畏。书记、经理只得亲自下厨房，选派名厨师，精心制作，什么中华烟，茅台酒，各种最佳风味菜，尽管往上送，往上端。他们想的是，只要部长高兴就行，饭庄的生意好赖，还不是仰仗这些“大领导”！

投书中纪委引起的风波

对这些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职工表面不敢吭声，背地里常议论：“哎！王磊部长又来吃‘客饭’了，一顿饭菜几十元，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像这样的人领导搞四化，我们咋能有信心？”……

陈爱武心里更是不平静。他想，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中央

领导应该带头，从中央领导做起。像王磊部长这样的领导同志还这样干，怎能有资格管下边？自己作为一个团支部书记，应当同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于是，他决意要向组织上反映。

然而，反映这样的“大人物”的问题谈何容易！陈爱武开始碰钉子了：

他找到饭庄常支部的几个委员。几个委员说：这些事咱们没办法，管不了啊！

他到市服务局“上访”，一位同志和他谈话说：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

他想找市委，有人告诉他：市委大楼里谁不知道这位部长的“秘密”？就是没有人捅破窗户纸罢了。

怎么办？很难怨这些同志，他们确实管不了啊！“地方管不了，还有党中央。向中央反映！”就这样，他写了一封揭发信，于1980年7月12日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小陈投书中纪委，上级派来了调查组，在丰泽园饭庄引起了一场风波，有支持，有非议。

有的讲：吃“客饭”在饭店系统算不了什么问题，也不光是丰泽园一家。该吃还得吃，社会这样，我们就这样！

有的说：好家伙，一下子捅到中央了。你一捅，丰泽园五年缓不上来（指与领导搞僵了关系，影响生意了）。丰泽园一团糟，你脸上光彩？你的劳模，还不是全靠丰泽园？

有的好心“规劝”：你荣誉这么高了，还缺什么？干好活，和领导搞好关系，少管闲事，保住劳模为是。

“有党在，我不怕”

面对这一切，陈爱武思绪万千。

几年来，自己在为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自己很高的荣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要奋力在本职岗位上创优异成绩，但更应对党负责，使自己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计较个人名利！而今，虽说是“得罪”了部长、顶头上司，但这样做，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准则”的要求，符合党中央决心扫除种种不正之风的精神。想到这里，小陈心里更加豁亮了：“有党在，我不怕！”

是的，我们的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就在陈爱武投书中纪委后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就对他反映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团中央领导找他谈了话，给予鼓励和支持。最近，中纪委决定在严肃处理王磊同志搞特殊化问题的同时，表扬了陈爱武同志，对他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

陈爱武在职工支持下坚持反对不正之风

六月十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组织的五讲四美检查组一行十一人，中午在四川饭店吃了六菜一汤，共值二十九元，但每人只交了二角五分、四两粮票。下午，在丰泽园饭庄完成检查任务时是四点半。却又在饭庄一号大房间（一般只供外宾、宴会专用）大吃了一顿。经职工回忆和饭庄领导证实，那天他们吃的菜有：醋椒小桂鱼（古子，即汤锅）、虾黄蛋糕鱼片（鱼盘）、盐爆里肌筋（鱼盘）、砂锅碚盘（二号锅）、鸡茸扁豆（大盘）、炸五丝筒（鱼盘）、烹腊肠青椒黄瓜条（鱼盘）、酱牛肉（七寸盘）、炒肉丝粉皮（大盘）、辣油黄瓜条（七寸盘）、鲜蘑扁豆（七寸盘）、拌腐竹（七寸盘）、糖醋白菜（七寸盘）；另有粽子、银丝卷各一大盘、米饭一斤、菜叶四袋。这些菜目有的是宴席菜，有的没有定价，据饭庄管业务的同志计算，共值三十五元五角四分。有经验

的老师傅说，这顿饭三四十元买不来。记者查看了丰泽园饭庄宴会菜单 No0027881 号，上面主办单位、主要客人、标准、宴会地点、接洽人均空白。菜单没有填写具体菜目，只记着：五讲四美检查组工作饭十人（交）二元五角、粮（票）四斤。饭庄职工反映说：名曰“五讲四美”检查组，实际上是大吃大喝组。师傅们把详细情况告诉了陈爱武，并支持他在第二天（六月十一日）就向市委纪委筹备组反映了这一情况。市委纪委筹备组很重视，很快责成市第一服务局党组纪检组进行检查处理。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下发的《关于领导同志用餐和工作人员用餐收费问题的规定》说：“各级领导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到饭店、饭庄用餐，要按规定价格收费，坚决纠正吃高标准少收钱的不正之风。”“局机关工作人员到基层单位工作，应到职工食堂用餐。如因工作原因不能在职工食堂吃饭时，应到职工食堂用餐。如因工作原因不能在职工食堂吃饭时，在饭店、饭庄吃什么标准就按什么标准交费。”据丰泽园饭庄负责人说：“去年报纸批评丰泽园吃客饭的问题，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局里的那个规定，饭庄执行起来有困难。”

当记者请陈爱武谈谈感想时，他说：“我很拥护陈云同志说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于不正之风必须进行批评。我还是那句话：我要继续为党当好哨兵。”

记者手记

取“尚方宝剑”

1981年7月14日下午，陈爱武同志来编辑部反映情况。陈爱武是北京丰泽园饭庄的青年厨师、全国劳动模范。一年前他因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特殊饭的不正之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由于过去采访过陈爱武，我们交上了朋友，他有事总来找我。我把陈爱武介绍给当时的经济部负责人李海燕、徐祝庆。一见面，陈爱武就显得情绪特别激动，他愤愤地对我们说：“近一段时期社会舆论在抵制不正之风方面，不如前一段了，大吃大喝之风又开始抬头。”接着，他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组织的‘五讲四美’检查组一行11人，中午在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下午又来我们丰泽园饭庄大吃大喝。饭庄职工议论纷纷，气愤地说：‘名曰‘五讲四美’检查组，实际上是‘大吃大喝组’。我们在师傅们的支持下，第二天就赶到局里和市纪委筹备组反映情况，但至今没有结果。”

男儿有泪不轻弹。陈爱武同志当时是全国闻名的敢于向不正

之风挑战的勇士，但他在反映上述问题时流下了眼泪。从他的泪水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愤慨和忧虑。这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腐败不除，现代化建设难实现！”这句口号在当时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强烈呼声。陈爱武同志的反映情况，使我们意识到这一事件非常具有典型意义：①大吃大喝之风虽然是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但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党心民心所不容。②陈爱民同志再次揭露、抵制发生在丰泽园饭庄里的不正之风，是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对不正之风的一个缩影。③随着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党中央已再三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存存亡的问题。”④大吃大喝发生在“五讲四美”检查组，这对现实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从这单一事件的狭义真实性和此类事件普遍存在的广义事实性上看，这一事件无疑是有新闻价值的。对事实有了基本判断，是采访报道成功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报道就能成功。因为即便是单一事件，在它的背后也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如果我们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对策，贸然进行采访，就有可能因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阻力而导致采访失败。那么，这一事件有哪些复杂因素呢？记得当时听取完陈爱武同志的反映情况后，李海燕、徐祝庆同志便与我一起分析事件的复杂因素：

——陈爱武同志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特殊饭的不正之风后，一直处境十分艰难，丰泽园饭庄领导不仅经常对他热嘲冷讽，还给他“水晶鞋”穿，在工作上刁难，让他干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他却是有名的“冷盘”高手，曾在全国技术大赛上夺取萝卜雕花冠军。为此，两个月前，我还专门写过一份内参。

——年前本报对王磊同志的批评报道，尽管稿件事先经中纪

委审阅同意，得到团中央的支持，但忽视了送国务院主管领导审阅，以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说“连找王磊同志谈话都来不及”，并因此对本报进行了批评。随后中宣部传出了有关批评报道的送审制度。一年后再度批评在同一饭庄发生的吃特殊饭事件，如何把握万无一失？

——对一年后在丰泽园饭庄再度发生的吃特殊饭事件进行采访，可能难以得到饭庄及北京市第一服务局领导的合作，这无疑给采访增加了难度。饭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史庭钧就曾公开说“批评又怎么样，该吃还是要吃”。

——陈爱武同志一个多月前以向局里和市纪委筹备组反映了此事，但至今没有结果。

四

根据分析上述复杂因素，徐祝庆同志决定派我带着刚到报社不久的张凤山同志前往采访。在整个采访、报道中，我们采取以下对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取“尚方宝剑”。我立即将陈爱武同志反映的情况写了一份内参，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及北京市委。与此同时，我还直接去中纪委汇报情况，得到了中纪委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邓颖超、黄克诚、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对内参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对此事尽快严肃查处，并公开见报批评。同时，也引起了北京市委领导的重视。记得当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副市长陈希同还请我去市委当面汇报情况。

先打外围后攻坚。在深入采访中，我们打破了以往从上至下逐级采访的惯便，按照从下至上的路线进行采访。我们首先去丰泽园饭庄找知情人进行采访。先后找了当天当值的主厨师傅、服务员等七八人，详细了解了当时的情况，查阅了当天的宴会单，取得了确凿无疑的第一手材料及证据。随后，我们公开身份找饭

庄领导进行采访、核对事实。饭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史庭钧因一年前本报批评在该饭庄的王磊事件，一直耿耿于怀，但这次由于我们事先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在事实面前他说：“我算服了你们。”

及时向上反馈新的信息。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在深入采访过程中，我们不断向中纪委及北京市委汇报调查情况，取得他们的支持。记得有一次我向中纪委常委曾涌泉同志汇报情况后，曾老明确而严肃地转达王鹤寿同志的指示：“不但要公开批评、见报，而且北京市第一服务局要在报纸上公开作深刻检查。”接着，曾老对我说：“怎么样，小伙子，我请你明天去北京市委和北京市第一服务局转达王老的指示。”随后，曾老让秘书分别给北京市委和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打电话。第二天上午8时，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市委。在传达室得知，市委安排召开市纪委筹备组全体会议，听取转达王老指示。我被前来迎接的同志带到二楼会议室，放眼一看，圆桌一圈早已坐满了人。陈希同当时兼任市纪委筹备组组长，他见到我便离座迎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是青年报的吧，欢迎、欢迎。”没想到的是，如今陈希同作为党内最高级别的腐败分子已成为阶下囚，这是后话。当我掏出本子，一字一句地传达王老、曾老的指示时，一种青年报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早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我当时还是一个非党同志，却在市一级的党组织会议上传达上一级党组织的意见。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生怕问我是否是党员，以“验明正身”。这件事已过去18年了，对于当时与会者来说，至今还是个“秘密”。这天下午，我还去了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党委传达了王老、曾老的指示和市纪委筹备组拥护中纪委的指示精神的意见。后来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的检查（2000余字），在本报二版见报了。在我的记忆里，复刊以来，本报批评过的单位

在本报公开作检查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向中纪委及北京市委汇报调查情况时，我们还特意反映了饭庄领导刁难、打击报复陈爱武同志的情况。后来，陈爱武同志被市委保送北京经贸大学读书，而饭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史庭钧则被撤职并调离饭庄。

用事实说话。按照余世光、王石、徐祝庆等同志的意见，我们在消息写作中抓住明知故犯作文章。这样既交代了重大历史背景，又强调了现实意义。如何体现这一主题，我们在消息写作中特别注意了让事实说话。我们精心选择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如记录“五讲四美”检查用餐的“宴会菜单”（包括每道菜用的是几寸盘）和食客付款金额及饭庄的帐单；引用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一年前下发的《关于领导同志用餐和工作人员用餐收费问题的规定》等等。这些活活生生的事实细节，充分揭示了新闻事件的本质，并增强了报道的可信度和力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稿件见报前，我们将小样送市委及批评涉及的单位、个人，进一步核对事实，做到了万无一失。

连续报道扩大战果。为了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我们对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徐祝庆同志还拟定了短评、社论，不断扩大战果。读者通过连续报道，了解到从事件披露到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应及事件处理结果的全过程，从而增强了反对不正之风的信心。

这篇报道见报后，中央台作了转播、新华社全文转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及全国大多数报纸、电台都采用了通稿），社会上反响强烈。北京市在市委的部署下，几十个区县和市属局党委分别召开会议，从检查吃喝问题入手，纠正不正之风。这篇报道在1981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幸获奖，并被收入当年的《新闻年鉴》。

这次采访报道，虽然已过去18年了，但它是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它给我在此后的新闻实践以许多有益的启示：这篇报

道较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不仅对社会及实际工作产生影响，而且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济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是指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具有社会性的问题以及非经济因素，如社会腐败现象、传统观念、官僚主义、僵化体制以及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等。因此，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视角，不仅应捕捉经济生活中显现出来的各种新生事物，而且要捕经济生活中不断形成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们的经济报道需要非经济视角。只有不断拓宽经济报道的新闻视角，经济新闻才能不断向广度、深度进军。

时间：1980年11月4日

作者：安志博 汪发楷

武汉“公子楼”调查

汪发楷：让人难忘的“公子楼”

武汉“公子楼”调查

在地处武汉市中心、交通方便、环境清新的三阳路，有一栋质量高、朝向好的新楼，住进去的基本上都是市、区、局领导干部的子女，周围群众称它为“公子楼”，以示不满。九月二十五日，三阳路几名青年写信给《湖北青年》，要求该刊派人调查。

《湖北青年》记者经过认真调查，证明来信所反映情况属实。这栋住宅建成后，市、区、局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市委关于优先解决无房户和拥挤户的分房原则，纷纷打电话、写条子、或亲自到市房地局，要求给自己子女分一套。市房地局领导根据这些电话和条子，拟定了一个分房名单，把二十八套新房分给了这些干部子女（其中分给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从大副主任的子女的占三分之一）。在分配过程中，有三户后来有变化，其中两户换给了

另外的领导干部子女，有一户听说群众意见很大，与在别处分有住房的一般干部作了调换。

该刊记者在调查附记中说：“人们认为，如果领导干部住房确实困难，理应按规定给予照顾。问题是，这些领导干部除个别同志住房面积稍小外，绝大多数都有一百平方米左右很宽敞的住房，子女结婚需住的房子并不紧张，何况有的子女还很年轻。新宅分配后，就有六户是一个人占一套房子，有的干部子女连对象都未找，仍在父母家生活，也占一套。至今尚有两户长期无人住。有的干部子女利用这里的住房当“跳舞厅”。

在调查中，群众反映武汉市的“公子楼”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市房管部门领导以房揽权、搞不正之风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李任之同志听到群众反映后，曾几次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批评，指示有关部门严肃处理此事。可是阻力很大，至今没有一户搬出。目前，根据省、市负责同志的批示，省、市纪委正在进行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武汉市的广大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湖北青年》为此发表了题为《特权贻误后代》的评论说，劝那些搞特权的同志“应该想一想：过去几十年，如果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信任和支持，怎会有我们的今天？当年，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别的不说，就说革命群众为了保护革命干部的子女，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有时真是忍痛割爱，用自己亲生的骨肉，去换取革命后代的生存。那么，我们今天在为自己的子女谋取安乐窝的时候，怎么就忘了人民的子女，不顾他们无房或缺房的困苦呢？”

评论说：“当然，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问题在于如何爱？靠搞特权为子女苦心经营，只会使后代不知世上的甘难苦楚，养成脱离群众、高人一等的贵族少爷习惯实际上是害了他们。”

评论说：“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各级干部子女、特别是高干子女，对自己父母的职权和地位要有个正确认识，头脑里应该警惕特权思想的侵蚀。父母的条件再优越，也保不了子女一辈子，今后的路还得靠子女自己去走。否则，在那里仗权弄势，以‘特殊公民’出现，迟早总有一天会受到社会戒尺的惩罚。”

记者手记

让人难忘的“公子楼”

19年前的今天，我们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一组关于武汉市“公子楼”的报道，在武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读者打电话向我表示支持，并询问有关情况。

一时间，新闻界争相转发这组报道；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人民日报大篇幅转载，一些外国媒体也纷纷转发……

报道立即引起了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本报报道“公子楼”之事（1980年11月4日）的第二天，武汉市委常委就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让某些领导退出在“公子楼”为子女多占的住房，同时责成市政府在短期内落实此事。11月28日，一些领导为子女多占的住房，已有16户迁出“公子楼”。

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19年，但回顾起来，仍然有不少感慨和体会。

“公子”何所惧

“公子楼”顾名思义，就是“公子”们住的楼房。这栋楼现在仍然“健在”，只是与快速发展的大武汉相比，它已经显得很不起眼了。但在当年，它可是武汉市首屈一指的住宅楼。

该楼地处武汉市中心的三阳路，这儿交通便利，环境宜人。楼房里所住的人不是“公子”，就是“小姐”，多为市、区、局领导干部的子女。

这栋楼成了当时武汉市民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即“公子楼”。

1980年9月25日，家住三阳路的几名青年写信给《湖北青年》杂志社，要求该刊派记者对“公子楼”之事进行调查。

抓准出击点

我家当时就住在《湖北青年》杂志社楼上，因此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湖北青年》副总编安志博同志主动同我商议如何抓住这件事进行报道。

当时，反对和制止不正之风是众多老百姓的迫切要求，而领导干部搞特权，更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共同议定的出击点是：从领导干部搞特权入手展开批评报道。

当我向报社汇报这件事时，群工部主任尤畏和记者部主任孙毅当即表示支持。作为驻外记者，听到他们热情而又有力的话，我的腰杆一下子硬了许多。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和安志博商量：《湖北青年》先发稿，本报转发。

安志博曾在《长江日报》工作多年，可以说是个“武汉通”，他们调查起来，比我们更方便。时间不长，老安就抓到了关键线索，我和他顺藤摸瓜，把“公子楼”的问题基本查清。

原来，三阳路的这栋新房建起后，武汉市的一些领导干部纷纷打电话，写条子，或亲自到市房地局要求给自己的子女分一套。市房地局也无视分房原则，把28套新住房全部分给了干部子女，其中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的子女占三分之一。

我和老安及时将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报道计划。于是，《湖北青年》1980年第十一期，公开披露了“公子楼”事件，并配发了一篇很好的评论。

11月4日，本报在一版以消息的形式转发了《湖北青年》的报道及评论。随后，我和安志博合作，先后发了几篇消息，直至问题的圆满解决。

注重借“东风”

现在回忆起来，我感觉到当时巧借的“东风”，一是来自报社；二是来自当地党政领导和团的领导。

“公子楼”之事披露后，报社领导给予了积极的表扬和鼓励，从余世光、钟沛璋到尤畏、孙毅，都是一种声音；既支持又教方法。对于长住外地的记者，这些无疑是催人奋进的“东风”。

稿件见报后，不是没有遇上阻力；我和安志博都分别接到过恐吓电话。有人威胁我们：“要是再报道，小心打断你们的双腿”。有的则通过人婉转地做工作：“公子”们都有背景，你们别捅马蜂窝，弄不好惹一串麻烦。”

我们及时将这些情况给团省委汇报。时任团省委书记的邓国

政同志非常支持。后来，这事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就在我们深入采访“公子楼”之事的关键时刻，当时湖北省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召见团省委负责同志，在研究有关对策的同时，批评团省委不该捅这个漏子。

因我们是中央驻汉新闻单位，别人不好直接批评。但间接的批评和非议也不少。

好在团省委和报社在关键时刻立场非常坚定，继续给予有力支持，因而我们的采访工作一直没有中断。特别是安志博同志，利用他的关系了解到很多内部情况，使我们心中更加有数。

就在此时，湖北省纪委也着手调查“公子楼”之事。在强大的舆论和组织压力之下，“公子”们不得不让步了。

武汉市委常委及时开会，作出了让“公子”、“小姐”退出多占住房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多数人搬出了“公子楼”。

这件事的圆满解决，应该说是一次重大批评报道的成功尝试。从中我体会到，搞批评报道，不能图一时痛快，一定要抓准出击点，讲究战略战术，真正做到有理、有节、有章法。另外，重大批评报道除了报社本身的支持之外，记者一定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支持力量。否则，孤军奋战，盲目从事，弄不好就有可能形成“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酸”的被动局面。

时间：1979年11月10日

作者：李珽基 王艾生 高集 柯夫 周山

“花花太岁”逃不脱人民法网

李珽基：报社决定出击

“花花太岁”逃不脱人民法网

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结伙强奸、轮奸案，对已逮捕在押的罪犯熊紫平、熊北平、马少华等八人，即将宣判。这帮危害人民四年之久的罪犯落入法网，杭州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花花太岁”罪恶累累

杭州市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有一个柳浪闻莺夜花园，花园里有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这就是闻名全市的熊家。

这幢房子深宅大院，铁门高墙，屋内有豪华的设备，气象非凡。熊北平、熊紫平这两个罪犯就住在这里。人们把这对孪生兄

弟叫做“清波桥头两只熊”（熊家的房子在清波门附近）。他们利用他们的特殊条件和身份，纠集了一伙流氓歹徒，聚众赌博，敲诈勒索，欺压群众，强奸女青年……犯下累累罪行。这里成了地地道道的流氓黑窝。

“两熊”及其同伙以找工作、介绍对象、交朋友、开音乐会、看电视等为名诱骗女青年或把她们强拉入这幢房子，关上铁门，然后露出狰狞面目，拿出尖刀等凶器，以“破相”、“杀死”恐吓，进行强奸、轮奸。

四年多时间，这帮流氓在这幢房子里和别的地方轮奸、强奸、奸污、猥亵女知青、女青工、女店员、女教师、女学生、现役女军人，经查实的就有一百零六名，其中熊北平和熊紫平两犯共蹂躏了女青年六十多名。这兄弟两人成了当今的不折不扣的“花花太岁”。

“两熊”一伙的暴行，极大地摧残了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女青年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被污辱和被损害的女青年，有的精神恍惚，萎靡不振，失去对生活的勇气；有的痛不欲生，曾想投湖自杀；有的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父母，暗自饮泣；有的染上疾病，面黄肌瘦；还有的暗自堕胎，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也有个别的被引诱受骗后，走上邪路。“两熊”依法被捕后，几十个被害女青年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泣不成声地控诉惨遭迫害的过程，她们强烈要求政府为她们消耻雪恨，为民除害。

“两熊”一伙还不择手段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打骂欺压群众。1974年11月，杭州重型机械厂一个青工到熊家学拳击，熊紫平硬说这个青工偷了他的手表，并叫人冒充民警进行威胁。这个青年万般无奈，含泪回到家中同母亲商量，忍痛将自己准备结婚买的一套新家具卖掉，又向邻居借了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只三百七十七元的进口手表送到熊家。“两熊”多次敲诈，共得人民

币一千五百五十四元，供他们挥霍。1977年9月，浙江省萧山县长河公社江三大队两个十几岁的姐妹，在公园里扫树叶，误入熊家院内（熊家的后门开在公园内）。熊紫平硬说她俩是小偷，拳打脚踢，并牵出狗来恫吓。妹妹在门外哭喊，姐姐在院里求饶。姐姐被吓得神经错乱，送往医院治疗。类似这样欺压百姓的事情还有许多。

“两熊”是何许人

原来，“两熊”的父亲是追随林彪的一个“大人物”。1967年，他以“太上皇”的身份来到杭州，凌驾于浙江党、政、军之上，称王称霸。他本来有房住，却一眼看中了这幢居住面积达五百零六平方米，并附有宽敞的花园的高级楼房，把它苦心经营为自己的安乐窝。“大人物”夫妇把“两熊”当作掌上明珠，百般溺爱。熊北平和熊紫平从小就生活在特殊优越的环境中，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外界任何东西的约束，成了“超级公民”。

在他俩刚十岁时，家在上海，但被专门送到环境优美的杭州读书。他俩学习很不好，又懒又馋，一个星期要换一个座位，经常欺负女同学。有一次哥俩去某疗养院偷窃营养品和钞票，把机密文件也偷来。在学校闹得实在不像话，校长亲自把“两熊”送回上海，还得向他们的父母检讨说：“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哥俩在上海市西中学读书时，经常迟到、早退、打架、旷课，一次熊北平竟把七十多岁的老校长打了，人们敢怒不敢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7年“两熊”十四岁，就借助父亲的“权势”，不到服役年龄却当了“兵”。他们在部队经常破坏纪律，不出操，不上课，成为“特殊兵”。熊紫平当了文书后，认为“只要嘴上

说得好听，立竿见影就行”。1971年在上海养病期间，他借机强奸了一位教授的女儿。熊北平和熊紫平退伍回家，有关机关安排他们到临安、桐庐县工作，他俩坚决不去，在杭州闲荡。1975年2月，竟有人指示省有关部门把他俩改为“在杭州市接受安置”。“两熊”泡蘑菇成功，更加得意忘形。分配他们到工厂，也经常不去上班。熊北平在杭州制氧机厂当电工，工具箱子从来没有打开过，成天和一伙人在家里鬼混。工厂领导也不敢去管，成了“挂名工人”。在社会动乱的气候中，他们的邪恶欲望极度膨胀，追求享乐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说：“趁年轻时不乐，何时乐！”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不甘心其“后台”的垮台，叫嚣“准备牺牲我们的一切，不怕坐牢”，熊北平还煽动他的同伙说：“等形势好转的时候，就没有我们的痛快日子了。”他们的母亲也纵容“两熊”干坏事。1970年下半年，熊紫平回家探亲，正值他母亲留女儿的女同学在家过夜。深夜，熊紫平持刀闯入小屋，奸污了这个姑娘。他母亲听见呼救声，却故意不睬。第二天还向姑娘说：“算了，算了，说出去你还有脸见人？我们这样的人家，是会有人相信出这种事的。”这个姑娘被奸污后怀孕，熊的母亲还逼她堕胎，这使“两熊”作恶的胆子越来越大。

林彪垮台以后，1972年夏，“两熊”的父亲被调离审查，他们的母亲也相继离去。他们人是走了，但是还有相当大的余威。王洪文1974年到杭州，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庇护“两熊”的父亲，说对这位“大人物”的处理是“错误的”。“两熊”继续霸占着这所房子为非作歹，主管单位一再提出要收房，但始终收不回来。这样，从1974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四年多时间，这幢楼房成为流氓犯罪的窝子。

熊北平和熊紫平，继续耀武扬威，招摇撞骗，竭力宣扬他们的父亲没有倒台，他们的家庭还是有权有势。一些想借助熊家的

仅势达到个人目的，找工作、落户口、买高档商品、甚至找住房的人，络绎而来。有的则想借熊家招牌为护身符，从中作恶。“两熊”提出要“弄几个漂亮姑娘来玩玩”，外号叫“花路将军”的马少华便毛遂自荐说：“这个，包在我身上。”仅他一人就诱骗二十多个女青年到熊家，多数被奸污。一些在街头闲逛或者“靠拳头吃饭”的人，也闻着了“两熊”住宅的臭味，“贴”了上来，结为“兄弟”。一个膀大腰圆、外号叫“九斤”的，人称是清波桥一霸，甘愿做“两熊”的保镖。外号叫“烂茄儿”的流氓，对“两熊”言听计从，当了他家的杂役……

谁坑害了他们

“两熊”一伙为什么会变成比“王老虎”还恶、比“高衙内”还坏的罪犯？

十年动乱，沉渣泛起。这伙罪犯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祸害下产生的一个毒瘤。罪犯中，年龄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二十岁，除“两熊”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则出身于工人、农民、职员家庭。在十年的动乱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打砸抢盛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好人受压，坏人横行，整个浙江被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翁林鹤之流，搞得乌烟瘴气。自幼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熊北平和熊紫平，从小学到中学，记得最牢的是“造反”、“斗争”、“砸烂”；他们信奉的就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对法律、公德和秩序无所顾忌，恣意妄为，在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

看看马少华是怎样变坏的吧！这个青年在学校时，爱好文艺，能歌善舞，是一个活泼伶俐的青年。中学毕业后，正是四害横行时期。不能升学，没有职业，缺乏正当的家庭和社会教育，

在大街上游游荡荡，开始抽烟、喝酒、打“扑克”、逛马路，逐渐走上歧途，调戏女青年，得了“花路将军”的绰号。他羡慕熊家的权势和阔绰，想借助熊家的势力向上爬，追求吃喝玩乐，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这伙流氓中，一个外号叫“大头”和另一个叫“尼姑”的青年，是省一级中层负责干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学习成绩都还不错，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揪斗，打倒，他们有的成了“黑五类子女”，有的成了流浪儿，他们被卷进了混乱的漩涡，纠集起来，在坏人的教唆勾引下，开始作恶犯罪，打群架，扒窃，污辱女性。熊北平向他们的小兄弟说：“做人就是这么回事，得乐且乐，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啦。”

“两熊”结伙强奸、轮奸案的破获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允许出现“花花太岁”，绝不允许任何罪犯得逞。他们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年一代的坑害之外，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青年健康成长也是极重要的。清波门居委会七十多岁的胡秀英老妈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溺爱孩子，实际是把孩子害了！”这话语重心长，说得多么好啊。

罪有应得

“四人帮”大肆作乱的岁月，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两熊”一伙为所欲为，谁要敢揭发，熊北平和熊紫平便威胁被害者说：“不许声张，你要说出去，凭我们家，把你弄臭是很方便的！”然而被害者没有被吓住，有的还是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伙伴，告诉了妈妈，告诉了师傅。工人师傅气愤不过，向熊紫平所在的杭州市重型机械厂领导揭发。第二天厂党委接到匿名电话说：“你们敢管这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厂党委坚决清查，初步查出熊紫平奸污女青年的罪行。清波门居委会治保主任发现，有一个面容憔悴的姑娘被熊北平奸污后怀孕，这位治保主任立即向街道派出所揭发。熊北平得知后，上门指着治保主任说：“你再敢胡说，我杀光你全家！”治保主任没有被吓倒，走访了被害者的邻居，向派出所提供了大量“两熊”犯罪的重要线索。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杭州市公安局抽调得力干部、民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查，掌握了确凿证据，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将熊北平等八名罪犯依法逮捕。

社会主义乾坤朗朗。这伙横行一时的害人虫，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记者手记

报社决定出击

这篇东西不应该由我来写，因为它是一个集体的产品。当年参加采访的几位同志已风流云散，只有我还挂在中国青年报的名下。我现在既没有资料，又无人回忆，我又不会“炒作”借机炫耀什么“鲜为人知”“幕后新闻”等，只好凭一点记忆，提供一些情况。

一份《青运情况》引起……

中青报复刊之初，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编辑部的报道思想、题目都来自实际，那时提出“跟中央紧些再紧些”、“跟青年近些再近些”。编辑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轮流下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除了编前会讨论争论外，每月有一些情况汇报会，各种情况，各种思想，大家议论争论一番，最后达成共识，报道思想也有了，题目也有了。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在一次汇报会

上，南下的同事，一路是上海、浙江，一路是福建、广东，汇报了情况：谈到浙江杭州有一个“两熊”（熊紫平熊北平双胞胎）流氓集团，为非作歹，蹂躏女青年，影响极为恶劣，民愤极大。第二天《青运动态》详细登了这一集团的情况上报、下发。中央负责同志对情况很重视，认为“两熊”事件很有代表性，要引起注意，加以研究，采取对策。为此报社专门成立一个小组，由国内部负责，拿出一个方案。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在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留下的乱摊子，百废待兴，正如一团乱麻，须慢慢清理，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直线上升居高不下（其中百分之七十是青少年）。最突出的是抢劫和强奸流氓犯罪。那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出门上班心在跳，担心家里门被撬；上班下班心都跳，担心孩子走邪道……”孩子们受无政府主义流毒毒害，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拿一个典型案件开刀，把犯罪气焰压下去，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两熊”事件，具有代表性，决定出击采访。于是报道的设想，步骤，人员的组成，给中央写了报告，然后由《中国青年报》的李珉基、王艾生，《人民日报》社高集、柯夫和公安部一位同去组成工作采访组，开了几次小会，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奔向杭州。在列车上，大家心情很沉重，思绪万千，在素有“人间天堂”的杭州，竟长出了这么个毒瘤，弄得乌烟瘴气。十年浩劫，一切道德法制，都摧毁了，这一情况，不仅仅是杭州。“文革”期间生长的孩子们，到底怎么了？

触目惊心话杭州

一到杭州，这个“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丽花园，经过十年浩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凄凉景象；到处是“文革”派贴的标语，连“断桥残雪”，“平湖秋月”等景点

里都是标语，而“两熊”流氓集团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柳浪闻莺”的一幢别墅里，在柳浪深处，已不再听到黄莺的鸣叫，不时传来的是被蹂躏妇女的啼哭和哀鸣，以及野狼般的嗥叫。

这幢别墅，座落在“柳浪闻莺”、靠近一领导机关、成为军事禁区，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别墅的主人，因工作而到别处，别墅里只有从部队退伍回来的熊家兄弟和一个佣人。而“文革”的风暴，冲击不到这里，这幢别墅就成为一个避风港。“二熊”就凭借着这种优势，把它变成了实现淫乱的魔窟。

到了杭州的第二天，我们听了有关的人介绍情况后，就到公安局看材料。工作人员搬出来的卷宗足有一尺多厚，我们五个人，足足看了三天，把重点的卷宗，择检下来，然后交换材料，议论一番，这篇文章的纲目就形成了。

“二熊”犯罪团伙，涉及十多人，被蹂躏的猥亵的有几十人。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一起玩玩，打打牌，后来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越陷越深，为首的骨干就只有几个人。“文革”后期一切都乱了，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他们能去的地方就只有西湖等景点。每到傍晚，三五成群的女孩子便到草坪上望着长空，自己的前途命运，谁也不敢想，也不想去想，这些孩子中间，有不少是“黑五类”的孩子，政治上受歧视，他们惟一的慰藉，就是在这里数着天上的星星。

犯罪团伙里有一个叫马××的长相很好，是一个“走资派”的孩子，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勾搭上了“两熊”，为了讨好“两熊”就经常到湖边，找一些女孩子到别墅里玩。有的天真的女孩子，对这幢别墅怀着神秘感就去了，进去之后，被这些罪犯威逼利诱糟蹋了，从此马某就充当了猎犬，专门找女孩子供他们淫乐。为什么“两熊”不出来直接勾引女孩子们，因为他俩长相平平，个头不高，他们自惭形秽，把“猎艳”的差使交给马×

×。

我们在访问一些受害者时，她们都泣不成声地说，当时我们对这幢别墅有些好奇心，想进去看看，加之他们花言巧语说，在里面可以读书，唱歌玩耍娱乐，我们就约好几个朋友进去了，谁知一进去之后，就被分别关在几个房间里，想走也走不了，想喊也没有人听得见，他们换了另一副面孔，威胁我们说，这里是高干住处，是保密机关，并指着一部红机子电话（事后知道那是一部未接线的电话）说，这电话直通公安系统，你们如果不从，我就通知公安局把你们当反革命抓起来……。“两熊”犯罪团伙，就是这样不择手段，软硬兼施，糟踏了几十个女青年。这一数字，在通讯里未具体涉及到，只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写进通讯里面。

我们在看卷宗，听着受害者控诉时，心里按不住一腔怒火，我们的心灵被震撼了。当我们坐下来，解剖着这个毒瘤时，我们感到，一个社会，当它的上层建筑被摧垮时，什么毒菌都可以生长出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多么多么地重要啊！它不是一句空话，是建立在活生生的现实基础上的。

全国震动了

我们初稿完成时共万余字，标题叫做《在一幢别墅里发生的……》。小样在编辑部里传阅，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很多同志自动地找我们，提意见，谈看法。总的讲，觉得通讯写得不错，很解气，但稍觉含蓄了些，我们又根据大家意见，做了些修改，分别送给中央领导同志陈云、彭真、邓颖超和公安部、人民日报等单位。我们在杭州时，曾向省领导铁瑛、南京军区政委廖

汉生等汇报过，他们都很支持。可是小样送审后，迟迟未见批复，后来才知道，中央在考虑发表的时机。《人民日报》对发表这一通讯，举棋不定，记得本报老余曾问这位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发表不发表时，负责人说“这件事太丑恶了，登在党中央的报纸上太丢人了……”过了不久，中央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因为“两熊”事件，会议破例让本报余世光和我出席了会议，彭真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治安形势，提到“两熊”犯罪团伙，并讲“不杀不足”平民愤的，要杀一批……”当时我们在底下感觉到，发表的时机到了。我们当场和公安部调研室的同志把握讲话的精神和分寸，在带来的小样上只作了删改，直接送给了彭真同志，他当场拍板可以见报。

见报时对通讯标题，议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拟定了《花花太岁难逃法网》，这标题虽不太理想，但是较前者明快一些，一是强调了犯罪的性质；二是强调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通讯发表后接着是公审大会，全国直播“两熊”事件，引起了轰动，刮起了一场伸张正义的风暴！

“两熊”事件轰动了全社会，编辑部开始铃声不断，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向编辑部，有拥护的，有分析批判的，有提供情况让记者去采访的，日平均千余件，最多时达到几千件，香港报纸《大公报》《文汇报》也择要转载了通讯，全国在议论着，思考着。对犯罪分子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威慑。这一报道给“严打”造了声势，打下了基础。不久全国“严打”就开始了。

时间：1979年1月20日至3月10日

作者：李谦 顾志成 邝夏渝

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

顾志成：《第二次握手》：“文革”时期的文字狱

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

回想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文苑遭浩劫，百花尽凋零。广大群众没有戏看，缺少书读，人们在精神文化和生活的大灾难里挣扎。就在这样的時候，绽开了一枝傲雪凌霜的腊梅——它就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当时叫《归来》，又名《归国》）。

1973年前后，这本小说便开始在青年群众中流传了。它竟然有那么大的魅力，到处抄传，不胫而走。许多手抄本被读烂了，于是再抄。唐山市有个青年，连续八昼夜抄了两份，他说：“这本书生动感人，读了给人向上的力量。”湖南某学院，有近半数学生传看这本书，有的人躲在岳麓山树林中抄写它，有个学生在读后感中写道：“这本书告诉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才是

建设祖国的根本，可是，为什么不准我们上好文化课呢？”

1974年底，开始到处清查和收缴这本书，广大群众不服。北京市某街道有个女同志对追查者质问道：“歌颂纯洁的爱情、崇高的事业心有什么错？”上海有个工人，花了好多个日夜，把它刻在蜡纸上，没地方去油印，厂里医务室的同志悄悄地帮他，在诊疗室里从日落印到日出。他们印的许多本《第二次握手》，更广泛地在工人、学生、干部中流传。不识字的老工人偷偷听人念完后，愤愤地说：“这本书引人走正道，是哪个天煞的不准读？”小青年打趣地说：“这是‘民间出版社’出版，‘群众书店’发行，天煞的挡不住罗！”这本书在群众中扎了根，谁能禁得住、收得净呢！

群众如此喜爱《第二次握手》，为了读它、抄它，甚至不惜冒政治风险，这种情况是很感动人的！但是，在“四人帮”的淫威下，群众公认的好作品，非但不能出版发行，反而被打成“反动小说”，并且强行收缴，加罪读者，他们完全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思想文化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民主权利。

《第二次握手》的厄运是怎样开始的呢？

1974年秋，这本小说在首都的群众中间流传开以后，有一个宣传单位，把它整理成了内部材料。姚文元看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抓住不放。10月12日姚文元批示，叫人赶紧找这本书给他看。10月14日下午又打电话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和外国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这是“四人帮”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随心所欲地动用人民公安机关去制造文字狱的铁证。反动文痞姚文元给这本书

加如此大罪名，是施展他们一贯的卑劣手法，妄想从中揪出一个反动的“科学家集团”，并借这本书攻击周总理，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彻底摧残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

《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终于查到了。他叫张扬，当时只有三十岁，是一个在湖南大围山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他被关进了监狱。

事实是铁面无私的，张扬写这本小说的经历，完全粉碎了姚文元的鬼算盘。既没有谁鼓动他写，也压根不存在什么“科学家集团”。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这个聪明好学、腼腆寡言的青年，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他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他热爱为祖国作贡献的人。早在一九六三年他只有十八岁时，在高中读书到北京来度假，住在药物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舅舅家里，他听到了一些科学家从国外归来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周总理接见和关怀科学家的情景，使这个中学生心里很感动。于是，他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小说，题名为《浪花》。此后，他进一步搜集材料，重新构思，一九六四年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后，取题叫《香山叶正红》，小说从此定型。一九六五年张扬到山区插队，以后的八年中又写了三稿。一九七三年前后，“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桎梏越箍越紧，优秀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遭到禁锢，特别是反映知识分子题材和描写高尚爱情的作品，更有被斩尽杀绝之势。张扬曾忿忿不平地对一个朋友说：“太无书可读了，样板样板，不是寡妇就是光棍。爱情，本是人类灵魂的一种财富，生活诗意的一个源泉，现在一提爱情就是资产阶级的，恐怕这些人心理变态了吧。”于是，他再一次增补润色了自己的作品，定名为《归来》。开始是借给挚友看的，不知是谁传了出去。在传抄过程中，北京一名读者把它改名为《第二次握手》，这就是在社会上广为传抄的、约有六万字的那一本。

张扬是个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喜欢观察和思考。他对“四人帮”横行期间摧残文化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的怪现象，是很反感的。他曾想过：“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岂不要毁了？”这个年轻人把自己心里的郁闷、焦灼，变成了一种力量。尽管疾病缠身，农活忙碌，他仍坚持改写这部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作品。他要鞭笞旧社会的黑暗，要真实地反映新中国的科学家们的生活和事业，歌颂周总理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热情关怀。他终于写出了小说的第五稿，约二十万字，并且配了插图。朋友看了好心劝他：“这本书不要拿出去了，知识分子被批臭了，沦为专政对象，小心你会出问题。”张扬说：“怕什么，我又不想拿去出版。我就是不相信文盲能制造原子弹。要建设现代国家，没有知识分子行吗？”想不到啊，就在这时姚文元把魔爪伸到了他头上！这部小说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

在森严的铁窗里，在紧张的审讯中，这个瘦弱的青年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据理而争，常常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张扬知道他写爱情、写爱国科学家、写周总理关心科学事业，都是触犯“四人帮”的“天条”的，有人强行要他认罪，他毫不隐讳地回答：“我就是通过爱情来写政治，我喜欢我的书，我不向你们投降。”

从读者的反映，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到成书内容，也从审讯情况来看，人们找不出哪里有一点是反动的。然而，有关公安单位不但没有及时了结此案，反而向法院对张扬提出起诉，并且在“起诉书”中写道：张扬“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

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如此等等，这真是典型的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欲加罪而何患无辞！这里应当特别提到，法院审理此案的有关同志，是维护法制、坚持正义的。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研究《归来》，认为它算不上“反动小说”，因此不能判罪。但这个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张扬也未能获释，继续被关押到今年一月才得以平反。

从《第二次握手》这本书和作者的厄运，联想到其他有过同样遭遇的文艺作品和作者的受害情况，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随便扼杀一部作品和一个作者容易，而大胆保护一部好作品和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却难。所以造成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形，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和猖獗的形而上学，对一些文艺作品总是动不动就从中找“影射”追“后台”，往政治问题上生拉硬扯，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横加罪名，使许多好作品和作者祸从天降，有口难辩，受到“莫须有”的迫害。这种流毒必须彻底肃清！否则，搞文艺创作的同志总是战战兢兢，思想解放不了，怎么能写出人民需要的新鲜作品来呢？有关的同志也应从中记取教训。应当学会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评断文艺作品的是非，对姚文元那样的“批示”决不能唯命是从，违心而为；而助纣为虐，加害于人，则更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发扬社会主义文艺民主，勇于坚持真理，维护革命正义，有胆有识地去保护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和作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真正得到繁荣！

记者手记

《第二次握手》： “文革”时期的文字狱

有朋友问我：“在你近40年的编辑生活中，令你最难忘怀的是哪一篇文章？哪一本书？”

从何回答呢？是在人民大会堂里记录着周总理的讲话，还是依偎在茅盾、巴金先生的膝下，聆听他们对我改过的书稿的意见……那可都是记忆长河里闪烁的辉煌点呵！我沉思一小会儿，还是想讲为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许多青年读者中秘密传抄着或曰《归来》、或曰《归国》、或曰《第二次握手》的小说，它文字长短不等，可是故事梗概、人物情节完全是相同的。这就是后来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三个月，又正式出书发行的《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是部较为优秀的小说，它第一版的发行量多达140万册，作者张扬也是赫赫有名，现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但是这本书问世的艰辛及其作者张扬因它所遭遇的劫难，对于今天千千万万的幸运读者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那是1978年，停刊十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了，我便结束了借调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的生活，回到了报社文艺部。那时部里只有四个人，除完成采编报道外，每天还负责处理两千件群众来信来稿。12月初的一天，吃午饭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还在看来稿。可能是惦记着去食堂，也可能是我偏爱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的来稿，我对按着次序信手拈来的两张字迹潦草的信纸，只是睨了一下便想扔去。突然，一串耀眼的字吸引了我，把我那只伸往废纸堆的手缩了回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歌颂周总理的好书。”

手抄本都是禁书、坏书，它怎么会歌颂周总理？我的兴趣来了，便一行行看了起来。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这本书通过描写一个留美女科学家归国，引起男主人公苏冠兰的回忆，揭示了解放前后两种社会生活的变化，鞭打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热情歌颂了新中国，反映了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所做的努力与贡献。书中充满高尚、纯真的爱情。尤其是作者描写了周总理对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倾注的心血和对科学家的热情关怀、爱护。这本小说内容新鲜，故事生动，语言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读后很受鼓舞，当然，这本小说还写得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看了这段近乎内容摘要和主题分析式的介绍，我的兴趣浓了。这封信的内容触及了我的心扉，也涉及了我喜爱的文学事业。我又静心往下看，它下面的话让我激动起来——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和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人才不应被埋没，好作品不应长期受禁锢。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湖北宜昌树脂厂工人 李谦

我反复地读着李谦的来信（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此文），回想着历代及“四人帮”时期的文字狱事实，脑子里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没有考虑肚子饿去食堂吃饭，便去找主任王石汇报。他立即让我去找本来看看。

我连续两天东打电话西去借，都没有。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连沉冤20年的“右派”都还未给平反，人们大都心有余悸，家里是不会收着手抄本的。可巧，我邻居家的女儿从北大荒回来了，这是位热情有胆略的姑娘，她说她箱子里有一本，是在北大荒插队时抄来的。我连夜看完之后，又通过熟人从东城区公安局等处借来三四本对着看。版本不同，内容大同小异，正如李谦信中所说，这是一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好书。在东城区公安局借手抄本时，从一位公安员口里得知当年查搜它的原因，是奉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命令，且任务很急，是秘密进行的。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更不明白晕头晕脑的文化大

革命，怎么连爱祖国和爱科学也给搞得混沌不清了！

为了查明作者是谁和查禁此书的原因，我立即带介绍信去了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去时，我想得很简单，快去快回，查明此事的来龙去脉半天时间足够了。谁知进了一座大院，楼上楼下敲门，后来又在几处办公室里外往返折腾，直至下午3点多，前后找出许多同志和领导，都不接待，都说不是他们干的。凭着编辑记者的敏感，在他们互相推诿的空隙间，我发觉此案情况复杂……同时，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直索至底的决心。快到下午下班时，终于找到了被认为可能熟悉情况的一位处长，王树堂同志。他很认真地回忆起来：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上，反映了《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阅读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情况后，立即指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你们的情况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以（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在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丁国钰的指示：“请传新同志阅，拟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王树堂接着介绍说：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第3297号）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

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甚广。”

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

“你是专案组的？”

“是的，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任务。”王树堂同志用一种很骄傲的语调。

“涉及面很大吧，全市这么多单位和街道？”一缕视我无知的笑意滑过他的嘴角，“我说过了，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哪能局限在北京市呢？首先，我们专案组向好几个省派出了人，用公安战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力量，很快查出了手抄本的原始名字有好几个：《归来》、《归国》、《第二次握手》。也查出了作者是湖南人。”

“天呐！”我忍不住地惊呼着，我被王树堂同志的一通情况介绍压得透不过气了，更为湖南的那位不知名的作者担心。“到湖南又是怎么查的，作者查到了吗？不会被那个吧？”我迫不及待地问着，却又不愿把话问明，生怕听到作者“被杀”或“畏罪自杀”之类的词儿。

“到湖南又是怎么查的，作者叫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着。

王树堂想了一会对我说：“至于怎么个追查的，我不能向你透露，这是我们的纪律。况且，专案组是派其他同志去的湖南，对湖南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记得从湖南回来的办案同志讲，作者是湖南浏阳的知识青年。”

我根本不去注意他站起来要走的态度，只是仍旧坐着，凭着一张口干舌燥的嘴问他个没完，并向他介绍这本手抄本的内容，说它的主题和不是坏书的理由……终于，他找出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

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考虑处理。”

为查清情况，我决定去湖南，在《中国青年报》报纸复刊前，我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过三年，对它的感情很深，于是便将发现和调查《第二次握手》的消息告诉了出版社的王维玲同志。王维玲想派编辑邝夏渝与我一块去湖南。我与小邝在一起工作过，她文静而年轻，我欣然同意了。

这天是12月15日，我和邝夏渝登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坐在机舱里，拂窗可见碧蓝的青天，洁白的云彩在机身下面驰动着。我的思绪也像浮云那样蠕动无绪，是那刚过去不久的日子里，曾亲眼望见过陈毅、胡耀邦等老一代革命家被斗争的场面，也见过作家孙轶青、赵镇南、肖也牧被揪斗、被毒打的惨景……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张扬呀，为什么也不被放过？我心里默默呼唤张扬的名字，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扬在哪里，也不担心找不到他，最揪心的是：他不要像肖也牧那样被打死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把他从囹圄中拉出来。

到长沙后，我们直接找到省公安厅，接待我们的叫黄志明，他除了介绍张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之外，还为因“四人帮”被粉碎拖下来了处决张扬的事，愤愤不平。

当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直为这“拖下来了”庆幸。

“人呢？”我问。

“在押。”

“我们可以见他吗？”

当年的我毕竟没经验，不懂办案的事，也很少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以为只要向他们讲明这本《第二次握手》不是坏书，作者是受“四人帮”的迫害，就能够平反，就应该放他出狱……

想不到情况糟透了。黄志明几乎也把我们看成了坏人，敌对

的目光、严厉的口气。他翻过来调过去地看我们的介绍信和工作证，瞟了我一眼说：“你们说这本小说爱国也好，歌颂周恩来也好，可是，它是反党的，我们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的立场。”

就这样调查了两天，毫无结果。得到的是，我们所住的招待所赶我们了，两天搬三次家，最后一次不得不搬进30多人一屋的省工会信访接待室的招待所。真是神了，30多个老幼皆有的女人挤在一起，听她们聊起来可真奇了，有为自己的冤案叫屈的，有为被强制下乡又想返城的，有的是告厂长的，有的是为冤死的同志鸣不平的……干什么的都有，上访内容也五花八门。房间里连只洗脸盆也没有，就更不提其他条件了，半夜里我听见有人在我床前撒尿，那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早晨起来，我好不容易在厕所里发现了个似滴水又不滴水的水龙头湿了湿毛巾，算是洗脸了。作为堂堂的大报记者，凭着记者证（介绍信被省公安厅收留了）在长沙城竟找不到一个住处，至今我也认为是个谜。当然，没有依据，我是不好多猜测的。

我是个能观察问题，比较敏感的记者，心里头当然坚信这是有关方面故意刁难我，以为我和邝夏渝是从京城来的娇小姐，这样一来可以逼我们早点回北京。好就好在省法院的审判员李海初同志很同情我们，我们得知张扬的档案在法院，向他调查情况时，他很客观地介绍了情况，并暗示这个案子是翻不了的。原因嘛？不能说。

阴冷的长沙，总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我和邝夏渝从省法院出来，抬头一望，路对面竟挂着湖南省文联的牌子。我们快步到了省文联，想得到点帮助。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找到了几个人，包括省文联主席康濯同志，他们对我们要调查的问题都表示无能为力，都认为《第二次握手》的案子是翻不了的。原因是这个案子在湖南是人人共知的，铁板上钉钉的死案，不能翻的。那

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在祖国刚刚开始复苏的疆土上，还没有绽放出“为冤假错案平反”的词。从康濯同志的口中我得知，省文联有个叫王剑菁的女同志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我一听，如同黑夜里看到一束烛光那样，好亲切，好有希望——竟然在孤独无援、八面碰壁的城市里找到一个青年报的老人，她一定还拥有着共青团的风格，会支持着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报纸。在省文联院里，王剑菁同志领我们进了间窄小光线极暗的房子，这就是一位诗人、一位老记者的家。当听完我们的来意，听完全国许多青年、团员因看或传抄《第二次握手》受到开除公职、团籍或批评处分时，她愤怒了，当讲到我们共同的老书记、已升为中组部长的耀邦同志如何关怀老团干，如何日理万机地在中央工作时，她突然拉紧了我的手，激动地说：“你我虽然不相识，可我们都是耀邦同志的兵，他出任中组部长，这是春天的信息。为了帮助你们弄清楚《第二次握手》的问题，我明天一上班就找康濯，有北京的支持，省文联也应该有个态度。”

等我们再见到康濯同志时，他的态度较前积极多了，并对我们所遭遇的处境表示愤慨。

几经周折，省法院同意我们查阅张扬案卷，但不准抄录，不准带出档案室，直到晚上下班时法院来锁门才离开。当然，这“优待”的条件还是法院那位正直善良的老审判员李海初同志给的。

张扬的全部案卷分主、副两种版本，各为十三部，叠在桌子上，各有二尺厚，另还有好几本捆成一叠的版本不同、名字不同、故事相同的手抄本原件。

从案卷中得知：张扬有个舅舅叫周昌龄，是北京药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1963年，19岁的张扬由长沙去北京看望舅舅，临行前，他的母亲和姨母向他讲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

往事。

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从舅舅的苦学成才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回到了长沙，张扬依据舅舅的那段往事，又加上在北京从舅舅和舅舅的朋友那里了解到的科学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片段，写出了一篇名叫《浪花》的小说。到了第二年，他又将《浪花》改写，增长了，改名为《香山叶正红》。

1964年他高中毕业，1965年9月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大回山区的浏阳县中岳公社。在劳动期间，他一真修改着这本小说，1967年他将《香山叶正红》改为电影剧本；1969年至1973年插队时，他又借劳动之余修改成小说稿，改名为《归来》，意思是指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从海外归来而言。

那么，办案人员又是怎样从八亿（当时的中国人口号称八亿）中国人中查出张扬的呢？主副案卷中都收有《第二次握手》落难于北京的最初材料，直到我看完了预审主卷之后，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清楚了市公安局王树堂同志难以向记者透露的内幕。

1974年国庆节，北京市北新桥一个小胡同里的值勤大妈向街道查户口的人员反映：有几个年轻人在偷偷传抄一个大大的“笔记本本”。那大妈不识字，但用她“阶级斗争”的观念，那个“本本”肯定有情况。那个查户口的人立即抓审了传抄的几个年轻人，并收走了那个“本本”。他们将它送到了东城区公安局。《北京日报》就在这个区里，很快知道了消息，并派来记者取走了“本本”。

主副案卷里，都反复、详细地记载着北京市公安局接姚文元指示，成立专案组追查《第二次握手》的全过程：专案组成员首先集中到北新桥街道，将传抄和传看过的人集在一块儿，用互相检举、揭发的形式，交代出手中的抄本是谁传来的。比如说：张三交代抄本是李四手里传来的，专案小组就追查李四，李四交代是从王五手中传来的，那就追查王五……被追查的约有几十人，涉及好几个省市。一环扣一环顺藤摸瓜。记得材料中有一条线索是追查到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学生头上，那学生是湖南人，他交代书是从衡阳化工厂工人徐源手里抄来的，原名叫《归来》。在传抄中将《归来》改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是首钢一位工人。专案组去湖南后，先审查徐源，又几经周折，最后查到浏阳中岳公社。1975年1月7日，张扬被拘留……

预审记录很多。一开头是这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拘留你？”

“不知道，也许是我写小说《归来》吧？”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嘛！”预审员首先引用了领袖的话。而办案的主导思想也是按此将张扬打成反革命的。《第二次握手》中的艺术人物也都被一一封上了种种与作者反革命联系的头衔，比如：女主人公丁洁琼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是“特务”；科学院党委书记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神父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等等。

主卷里有长沙师范学院200名工农兵学员被蛊惑对张扬进行斗争的大批判稿；也有中岳公社贫下中农开大会，在大会上举手通过要求枪决张扬的决定……

上面的材料足够判罪了，于1975年9月22日将张扬逮捕，并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向上起诉。起诉书中，列张扬主罪第一

条是：“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其他几条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进行阶级报复，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

“起诉书”一再强调张杨是“罪大恶极”，要“严惩”。

张杨被关在死刑犯牢里。是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前未来得及处理，还是张杨命不该死？直到1977年8月8日，法院的老审判员琢磨张杨“主罪”时，他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估计‘判二十年即可’。内定的‘要杀’，办不到了。”下面是我抄录的卷中1977年8月10日下午刑庭讨论的记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因此要公安部门重新改判。”

△“写小说，是反动的，毛主席有过指示，可以判个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当时要杀，是不是因为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过十年徒刑。”

△“怎么定刑？”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个案子不要急于处理。”

△“有的人劲头很大，要杀。我的意见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时间又过去了4个月，1977年12月7日上午，刑庭向法院

党委汇报的摘录是：

△“这个案子难说，看看说他反动的有几条。”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

结论是：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领导小组汇报再定。

那时，我从来不去关心被组织部门视如命根子的绿色铁皮柜里的档案，更不去研究那些玩艺儿与人的命运的重大关系。查阅了张扬的案卷，我才恍然猛醒，认认真真地抄录着，因为我明白那字字句句都关系着张扬的生还是死！我用冷僵的手共摘录了两本稿纸。

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在和报社领导通电话的声音里只能听到些“好好干”鼓励的话，至于对这个案子的把握尺度，全凭自己掌握的材料和判断水平了。

在此期间，我们白天翻阅张扬的案卷，晚上拜访团省委负责人石玉珍同志，当时恰巧碰上湖南省召开第七次团代会，想借青春向上的力量推动《第二次握手》冤案的平反。石玉珍同志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在顶着省里压力的情况下，于1978年12月20日以团代会秘书处名义发了大会《简报》增刊，全文是这样的：

《归国》一案值得重视

《归国》一书一九七四年曾以手抄本（形式）在我省青年中流传，发现后，经省委同意，一九七四年团省委和省公安局曾联合发出文件，把它作为《少女之心》那样的坏书那样收缴、封存、销毁，小说的作者张扬（男，现年三十三岁，系长沙市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五年一月被拘留，现关押在省看守所。

《归国》又名《浪花》、《香山叶正红》、《归来》、《第二次握

手》等，主要是讲一个在旧中国长大的女科学家丁洁纯（应为：琼）留学美国，参与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不忍看见自己亲手研制的产品残杀生灵，拒绝再次参加研制，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软禁。她摆脱了监视、追踪，辗转英、法等国，于五十年代回到祖国，受到郭沫若、竺可桢等科学家的重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她，欢迎她为祖国服务。最后，丁洁纯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贡献。书中穿插了丁和我国一科学工作者曲折的爱情故事。

据看过该书的同志说，全书没有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没有攻击社会主义的内容，没有低级下流的情节。省文联看过该书的同志也认为，虽然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什么大问题，有的同志还认为可以出版。

最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读者来信，派专人来我省，打算请《归国》的作者去北京改写、加工这部作品。据青年报和青年出版社的同志说，《归国》在北京日报第960期内参上点出这是一本坏书，姚文元看了这个内容……因而，一九七五年一月，公安部门把张从下放点浏阳抓到长沙，关押在看守所。

目前，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两位同志仍在长沙调查。

报：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

送：大会正副秘书长、各代表团团长

（共印60份）

我读着《简报》，被一股股热流撞击着。这是我们在调查的困境中得到的最大支持。我们连忙把《简报》的消息向北京汇报。多么想让耀邦知道，他培育领导下的共青团，多么有伸张正义、冲锋无畏的风采！

为了让文艺界的同志了解真相，争取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

我们拿着这份《简报》增刊再次去找省文联。这时康濯同志比上次显得积极多了，他已看完了手抄本，凭着一位老文艺家的良知，他慷慨激愤地说：“这确实是本好书，在你们明处与他们（指扣压张扬的势力与机关）打官司的同时，我们会暗暗组织些作者、评论家来分析评论这本书，做到舆论上的支持。”

当时，听到康濯同志的“暗暗”两个字，我与小邝已高兴得向他鞠躬了。因为那时的省文联还是一盆死水，他和许多人还戴着“修正主义”的黑帽子呢。能够做到“暗暗”支持，也算有胆有识了。

我们知道团代会的那份《简报》增刊送到省委，也送到了主管政法工作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夫生同志的手上。为了早日摸到省委对这起冤案的态度，便一天三次地到省接待室。当时我们很天真，认为他们会听我们讲述案卷的真实情况的。但是，三次都被挡驾，且是次次都被“轰”了出来。说实在的，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再大的官也怕记者，因为往往是报上一点批评××名字，××就可能会丢乌纱帽，还从没听说过有过把记者“轰”出门的！我和小邝心里明白，这已不单单是几个办案人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省里大院的态度，如果我们不采取点措施，他们不仅把我们“轰”出大门，怕是晚上还会把我们“轰”出那几十人一间的通铺招待所。是的，我们的态度也应强硬些。于是，我们找到法官李海初同志商量出向法院院长请示提审张扬的主意。

这主意很好。可是院长经过向上请示后，只同意我们旁听，不准我们发言，更不准提问题。

我与邝夏渝都不太同意这决定，觉得这种不明身份哑巴般地坐着有点辱屈人格与报社，然别无他法，也只好如此了。

我、邝夏渝与老审判员坐法官位置上，看着张扬从门口慢慢

走来。他站到“犯人”位置上，骨瘦如柴，不停地干咳，不知是冷还是什么原因（他上衣很薄，下身只穿一条单裤）讲话时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向邝夏渝点点头，两个人同时将印有“北京”字样的手提包放在显眼的案台上。让“北京”冲着他。

他一直不抬头，用湖南话回答着问题。

“张扬，请你讲北京话好吗？”我有点忍不住了。

老审判员与张扬都同时一怔。显然，我违反了事先规定的约法三章。张扬也将冷冷的目光投了过来。

我按了按手提包上的字，用大姐姐般的温情冲张扬笑笑。

他很惊奇，愣愣地看着我。

“张扬，在小说里为什么要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声音里带着友好的感情。

突然，他的眼睛由愣转亮，滔滔不绝地讲了小说构思与热爱周总理等。那表情又是激动又是委屈。

审判变成了交谈，审判堂上气氛温和起来。老审判员着急又不着急，他并没有阻止我们，也没有丝毫维护他上司规定的意思。

我凝视着张扬那瘦长的身影慢慢移动着，沉重的脚步迈向那个黑洞般的牢门。多有才华的青年人，难道就因为他有才华、他能写出别人还写不出来的好小说，就该遭这牢狱之苦？“四人帮”都粉碎两年多了，可是他们的路线还在被顽固地执行着。我佩服张扬的骨气和才华，又担心着拉他的劲用不上，反使他冤死牢房！心中的悲愤难以明说，一出监狱大门，我就忍无可忍地鼻子一把、泪一把起来。法院的同志不知怎么一回事，忙过来扶住我，一向自称坚强的我，只好说好像有什么煤烟熏着眼睛了。

左等右盼，省委大院毫无解冻《第二次握手》的信息。为了

周密地做好与省委对话的准备，我们必须到张扬插队的中岳公社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某些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指印。小雨夹雪的长沙太冷，身体单薄的邝夏渝冻病了。我请她立即回京治病，她却要和我一同去中岳公社。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她留在长沙招待所服药等待，我独自去中岳公社。

登上去浏阳的长途汽车，由浏阳再转长途，然后步行20多里山沟泥巴路，在不断向山民寻路的情况下，到傍晚时刻，我终于找到了张扬插队的山沟沟。原来，那里的贫下中农很少有文化，我接着揭发张扬“罪行”材料的人名单，挨户去拜访，不带偏见地让他们重复出当年材料中的事实……憨厚的山民们，有的用哈哈大笑，有的用似乎羞怯的声调，一一向我声明说，那些由他们出面证明张扬“有罪”的材料都是上边来的人代写的。

“省里来说张扬写了一本反动书，是反毛主席的。谁反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嘛！”他们说。

“张扬毒死了你家的大肥猪么？”我问一位社员，是他在一份证明张扬毒死贫下中农大肥猪的证明上压了指头印。

“没哩！我家是死过猪娃，是瘟死的。”

“张扬打过汤世和么？你说说当时的经过？”我向一位证明张扬有人命案的公社干部调查。在张扬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证明1967年夏天公社保卫干部汤世和被张扬打死材料。可在副本里，又收有汤世和因肝硬化1968年病死在长沙第一医院的死亡通知书。

“张扬从没见过汤世和，更没打过他，老汤是得肝炎死的。”他大约一时忘记了几年前抓张扬时，他所编造的那个荒唐故事了。

“那你怎么证明张扬打死汤世和一事呢？”我问。

“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他们动员我说，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我这也是听上级的话哩！”

.....

三天的中岳公社调查，我走访了几十个与张扬接触过的人。憨厚的山里人没有一个说张扬是调皮捣蛋的坏青年，就更谈不上什么反革命了。有的人还说：“顾同志，你早几年来就好了，早来了，那个聪明的娃子就不会死了。”

“谁说张扬死了？”我回问他。“上面来的人说，他是定了死罪的，可怜的娃子怕是死好几年了。”他的声调苦哀哀的。

多好的山里人啊！善良而愚昧。然而，“四人帮”及其某些人正是利用他们的愚昧来施展法西斯专政的淫威的。

从中岳公社回到长沙，我对张扬能平反的信心更足了。我们再一次到省公安厅找办案人黄志明等人。

“你们算什么记者？是在为反革命说话！”他严厉地训斥我们。

“张扬一案搞错了，应该纠正。”我申辩着。

“纠正？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仍是态度友好地说服着他，天真地认为我们的态度能感动“上帝”。可是他错认为我们惧怕他的淫威，又拍桌子又瞪眼：

“你知道嘛？你在替谁说话？”

“凭着姚文元的批示，你们错抓了一位青年，我们只是要求你们放了他。”

“不要抓着姚文元为稻草，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批准的？”

“谁批的？”我心中一怔，从卷中我知道，逮捕张扬是经过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后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批准的。

“只要是冤案，谁批错了都应该平反。”

“这是华主席批示过的案件。”办案人得意地瞟我一眼，那寒气逼人的架势足可以把你击倒。

“华主席批的又怎么样？就是毛主席批的，是冤枉也得平反。”我态度又一次强硬起来。

在毫无结果地回招待所的路上，我给报社打了电话，汇报了调查情况。王石在电话里表扬我做得对，叫我不要怕阻力，并鼓励我继续摸清其他方面的态度，向省委汇报……离开报社半个多月了，我关心着报社里火热的工作，更想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力量。听了王石的话，我很高兴，便大声地对着话筒：“请领导放心，我决不怕阻力。是的，这个案子一定要平反……”

第二天，我们又去有关部门找办案人。

“昨天都谈完了，即使《第二次握手》不是反动的，张扬是经华主席批过的，他也是反革命。”

“张扬不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替他平反。”

“昨天，你给谁打电话？”

“这你们管不着，电话是打给我们领导的。”

“他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

“哪些领导领导青年报？胡耀邦还管你们？”

“那当然了。”我的语气是得意的。

“胡耀邦管你们？你认识他？”办案人紧紧追问。

这时，我用调侃的语气说：“那当然，他不仅管我们，我们跟他还很熟呢！在干校劳动5年，天天在一块儿。”

“昨天电话是打给他的？还是让别人向他转告？”

我心里又得意又慌，得意的是他心里也怕，怕把事捅到耀邦同志那里。那时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正在着手为许多冤假错

案的平反做准备。听到胡耀邦的名字，会让他心虚哩！而我心慌的是一个小小记者出差哪与耀邦同志有星点关系！现在信口开河地将自己与耀邦扯在一块，是不是狐假虎威？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害怕胡耀邦。

“我说过了，无可奉告。今天来，一是我们要见见张扬，向他了解一下写《第二次握手》的构思和经过；二是请你们转告省委有关领导，我们要向他们汇报这个案子。”

“这是你们个人意见，还是你们领导意见？”

我与邝夏渝同时哈哈笑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地说：“是领导又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北京的领导完全同意为张扬平反。”

又是半天舌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办案负责人答应将我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想不到打给报社的电话竟引起了他们如此关注和警惕。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欢愉不已，不知是发现了某些人的某种惊恐心理，还是觉得给北京挂电话会对解决案情有利。我与邝夏渝一叽咕，又挂电话给王石。同样，我们又得到了支持。

要过元旦了，我与邝夏渝都想到了爱人与孩子。她爱人在广州部队，北京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在家；我呢，赶紧给爱人发信，让他节日期间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家。那时，我们都没带收音机，在这里也借过报纸看，一进邮局先买报纸。让我们欣喜若狂的是：党中央正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报道会上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我们俩一齐跳着，流着泪，为冤死的彭元帅流泪！为张扬一案找到了平反依据而激动！那天，长沙下雪加雨，我们俩的皮鞋全踩湿了，脚冻得如同猫咬似的，身上也冷得不行。但我们全忘记了，又一口气跑去找那位办案负责人。没曾想到看过报纸的办案人，不仅坚持原来态度，还声明对报纸

上江华同志的《严明法纪、纠正冤案错案》文章不理解，对为彭德怀平反也不理解。

该查的都查清了，湖南的态度并未改变。我又给主任王石打电话。他同意我们去找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汇报这一案件，并提出平反。

我们一天几次找省委，12月30日下午，省里面终于来电话，说省委管政法的书记可以见我们。当晚9点，团省委书记石玉珍用一辆灰色小轿车，将我们送到了省委大院的一间会议室。我们俩用平常向报社领导汇报工作时的那种谦和的语气，诚恳的表情，有理有据地做了详细汇报，希望面前的刘书记能支持我们工作，对张扬一案给予复审、平反。想不到这位刘书记用一种上级批评小员的严肃口气，愤愤地说：“你们青年报是青年团办的，怎么管到我们省委头上来了？”

“我们青年报是保护青年人的报纸，谁把我们的青年无故打成反革命，我们都要管。”

会议室里的气氛像是缺氧似的，双方的情绪都带着烦躁与激动。

“你们既然看了张扬的全部案卷，应该知道这个案子是谁批的，知道它的严重性。”他是书记，在大发雷霆的训斥中却还保持着应有的组织性，不点出当场人都知道“华国锋批示”的秘密。

“知道。但是，就是毛主席批过的，错了也得平反。《人民日报》不是已登了为彭德怀元帅平反的消息了吗？”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态度也很严肃。只是想尽力地把心里要说的话准确地说出来。

“你——”刘书记也忽地站了起来，只是没有把要说的话下去。

气氛更僵了。秘书忙赶了过来，说是天太晚了，明天再谈。

我想到进省大院之艰难，只怕明天这位书记不会见我们了，便用缓和了的口气说：“如果你们对此案平反有疑虑，请你请示华主席，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

一时，对话无法进行。还是秘书机敏，说礼堂放电影了，问我们要不要去看。

书记也口气平缓地说：“先看电影。”他打了个邀请我们的手势。

记得那是部朝鲜片子，什么故事，全没有记住，心里只琢磨散场后的对话内容。散电影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谈话的会议室，夜漆黑的。我看了看表，时针将要指到12点，我说：

马上就是元旦了，我们回去要把《第二次握手》及作者的冤情向领导汇报。我们希望放张扬出狱。如果不放，我们除发内参外，还可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歌颂周总理的好书，而作者张扬至今仍被关押得不到平反的消息。刘书记沉默着，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表示考虑我们的意见。

元旦那天，我从北京机场回报社以后，便将所有情况及所摘的取证材料向主任王石作了汇报。随后，我立即写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内参”。1979年的元月18日下午，长沙特别监狱（关死囚犯人）的铁门终于打开了，骨瘦如柴的张扬从那里缓缓走了出来。同时，报社接到了湖南省委打来已经释放张扬的长途电话。元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了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元月23日，当出版社另一名编辑李硕儒接张扬来北京，我与小邝到火车站接他时，三双手是握在一起的……他的手滚烫，一量体温摄氏40.5度。原来，几年的监狱生活把他的身体给搞垮了，严重的胸膜炎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当时报社为他平反，出版社要为他出书。接他到北京来，是让他尽快修改

《第二次握手》的书稿。现在，首要的是使他恢复健康。于是，很快把他送进了结核病院。医生从他胸腔里抽出4瓶血水脓水后，他铁青的脸才慢慢有了活色。然而，病情垂危的张扬住在医院里，湖南方面虽然放他出狱，可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平反和安排工作。他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月薪也只有几十元，在经济上，她对张扬几乎拿不出分文。为了抢救张扬，报社领导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双方商定替张扬交付住院费用。邝夏渝、李硕儒和我几乎是每天轮流去医院护理张扬，给他带点吃的，再讲些现实生活大事及中央精神（因他在狱中关了4年多，对外界情况不了解）。记得，当我从书包里掏出家里仅有一两左右的香油时，他拉着我的手哭了。后来提到这件事时，张扬仍很激动。

元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出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当时，连《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的大记者也天天找我要有关的新信息。在报社领导的旨意下，我综合着大量信稿中的思想火花，于3月10日在报上发表了《要有胆有识保护好作品》的调查报告。报纸的威望一下子火爆起来，印数从几十万份直线升到150万份。来稿来信也涨出了一半。

然而，湖南省有关方面不干了，他们仍然坚持极“左”的一套。看了报上有关张扬平反过程文章后，省公安厅干部孟昭珍、黄志明、吴振茂、陈岭梅于1979年5月11日向耀邦同志写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的告状信。

告状信约有八千字，信中把《第二次握手》撇在一旁，只字不提，却在其他方面，把作者张扬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同时声声讨伐记者丧失立场为反革命说话……还质问报社说：“你们的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

信的最后还写着：“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

《湘江文艺》等报刊也积极配合，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在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建议督促青年报收回影响……”耀邦同志立即在这封信上批示：“转中国青年报同志阅酌——胡耀邦，5月17日。”耀邦同志对报社的信任使我们很高兴，我们继续为《第二次握手》的平反作宣传。

我虽然知道张扬的案子是依据姚文元的直接批示追查的，也知道正式逮捕张扬时经过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但他是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都能为毛主席判的错案平反，他华国锋还会为一个小小的知识青年坚持自己所办的错案不纠正吗？然而，我太幼稚了，湖南的告状信由短变长，由省公安厅的四人属名变成了封封都盖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大印，雪片般飞向中央……当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将收到的告状信转到团中央书记处时，耀邦同志又收到了公安部直接送过去湖南省发来的第二封告状信。

公安部如此转发告状信是破天荒的。原来是当年参与策划罗列张扬罪行、签字逮捕张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已升为掌管国务院公安部大印的副部长了。还有当年华国锋在省里的那位曹姓秘书，此时也在中南海里办公，对他们来说足够了，一个眼神，一个大印，足可以碾碎一张报纸及它的记者的。

因中央书记处连续收到几封告状信后，有点坐不住了，尤其是政治局委员们的信都转了过去。团中央书记处一天几次来查问此案，中宣部派人送来了公函：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公安部转给胡耀邦同志一封湖南省公安局四同志的来信。耀邦同志批示，让我们“同《中国青年报》共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将此信转给你们，请你们核对信中反映的情况，准备意

见后，争取本周来我部共同研究一下。

鉴于青年出版社已决定出版《第二次握手》、北影也决定改拍成故事片，请你们向青年出版社和北影打个招呼，先不忙于出书和拍电影，待讨论后再定。

此致

敬礼

中宣部

1979年5月29日

与此同时，中央的有关单位还派人来报社，就此事进行调查，甚至查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凭我直觉，报社有些人严肃起来了，他们可能担心平时傻里傻气的“小顾”会不会在湖南调查中有失误。为准备去中宣部的发言，王石连夜翻阅我所摘录的张扬案卷材料。我和邝夏渝陪着报社与出版社的领导，向中宣部领导及新闻局整整汇报与讨论了一天，终于驳回了湖南的诬告信。随后，报社决定连载《第二次握手》。由我将24万字的小说（张扬病中修改、增补后的新稿）缩写成6万字，分成30节，各节上下有纽扣相连，在报上刊出。连载大受读者欢迎，到处抢购报纸，上海街头邮局的玻璃都被挤破了。

后来，《第二次握手》出了书，被搬上了银幕，作者张扬也成了—时红遍文坛的作家。有多少家报刊抢着报道，多少人挥笔，文字激昂……也有许多朋友劝我，让我写文章或是去应邀作报告，我当时都拒绝了。我已得到满足了，因为书的问世出版，作者的平反出狱走向文坛，这都足够说明：对它，我已完成了神圣的编辑记者职责，应让自己的时间去关心另一本书稿或更多的作家朋友了。

后 记

罗强烈

1999年3月,《中国青年报》成立“蓝旗工作室”。《中国青年报》的基本品格是富于正义和良知,标志着舆论监督的调查性报道是其核心;作为“蓝旗工作室”的开篇之作,我选择把本报1978年复刊以来20年的调查性报道汇集成书,以承传和弘扬这种基本品格。

虽在报社编了16年文学副刊,但当“职业记者”只有3个月,面对几代青年报人20年激情、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我不免有些诚惶诚恐,幸有跃刚和建伟鼎力支持,方得相应的力量完成此书。

我检索《中国青年报》20年的目录,从中遴选出100多篇(组)调查性报道,包括几篇具有历史意味的消息,然后,和跃刚一起确定最后选目。

为了用今天的思想去激活当年的历史,也为了从当年见报的

“冰山一角”，来看看潜藏在重重社会帷幕之中 20 年的“整座冰山”，我们决定约请每一篇（组）调查性报道的当事记者撰写一篇“新闻幕后”，把一个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历史真相交还给读者。

从 1999 年 5 月 5 日发出约稿信，到无数的电话催齐“新闻幕后”，从复印见报原文到增删剪贴编辑成册，前后历时半年有余。除个别记者担心“新闻幕后”再惹风波的应选篇目，除“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报告”篇幅太长，我们忍痛割爱之外，进入本书的 82 篇（组）调查性报道及其“新闻幕后”，几乎囊括了本报 20 年来相关的经典报道和优秀记者。

我对本书 82 篇“新闻幕后”的作者表示谢意。

我对采写了本书所有调查性报道的 100 多位新老报人表示敬意。

我对 20 年来为撑起《中国青年报》这面大旗而写过调查性报道的新老报人表示敬意。

1999 年 12 月 2 日于北京仓夹道